臺灣史研究

第31卷　第3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編 輯 委 員 會

《臺灣史研究》第 31 卷第 3 期

主　　編：鍾淑敏
助理編輯：顧雅文、莊勝全
編輯委員：吳叡人、李力庸、林文凱、康培德、許佩賢
　　　　　陳宗仁、陳翠蓮、陳鴻圖、曾文亮、曾品滄
編輯助理：劉鴻德、李安瑜
編輯顧問：杜正勝、李壬癸、劉翠溶、賴澤涵、莊英章
　　　　　黃富三、施添福、溫振華、林修澈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Editorial Board

Editor-in-chief	Shu-min Chung		
Assistant Editors	Ya-wen Ku	Sheng-chuan Chuang	
Editors	Rwei-ren Wu	Li-yung Lee	Wen-kai Lin
	Peter Kang	Pei-hsien Hsu	Tsung-jen Chen
	Tsui-lien Chen	Hung-tu Chen	Wen-liang Tseng
	Pin-tsang Tseng		
Editorial Assistants	Feng-ted Liu	An-yu Lee	
Advisors	Cheng-sheng Tu	Jen-kuei Li	Ts’ui-jung Liu
	Jeh-hang Lai	Ying-chang Chuang	Fu-san Huang
	Teng-fu Shih	Chen-hua Wen	Siu-theh Lim

目　　錄

《臺灣史研究》第 31 卷第 3 期

研究論著

大清帝國統治下臺灣的唐人用語分析／陳宗仁 …………………………… 1

19 世紀林圯埔竹材流通與
　　鹿港海岸變遷的關聯／楊朝傑 ………………………………………… 33

Forgotten Imperial Culture:
　　The Spread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Kazuhiro Iwama …………………… 77

留日臺籍建築師徐迺欣與他的時代：
　　聚焦 1943 年〈朝日日記〉／郭聖傑 …………………………………… 13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臺灣史研究》
第 31 卷第 3 期，頁 1-32
民國 113 年 9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大清帝國統治下臺灣的唐人用語分析

陳宗仁*

摘　要

在帆船時代，中國東南沿海居民前往東亞海域各地經商、種植或採礦，會自稱與被稱為「唐人」，此語涉及這些海外唐人的自我認同，而與「唐」有關的用語，如「唐山」、「唐話」亦屬於這種唐人海洋文化的一部分。16、17 世紀逐漸從福建、廣東前往臺灣的移民承襲了這些用語；但是 1680 年代大清帝國統治臺灣後，臺灣文獻大量出現「漢人」的用語來稱呼這些閩粵移民，究竟 18、19 世紀來臺移民是「唐人」或「漢人」？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依據「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分析與「唐人」有關的用語，認為大清帝國統治時期，臺灣文獻中的「唐人」用語呈現高度重覆與刻板化現象，但是具有「使用中」意涵的「唐人」用語也不絕如縷地出現在文獻裡。

關鍵詞：唐人、唐山、大清帝國、福建移民、華人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4 年 1 月 29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4 月 25 日。

一、東亞海域各地的用語分析
二、17 與 18 世紀上半葉臺灣的用語分析
三、18 世紀下半葉以來臺灣的用語分析
四、「唐人」用語的使用與趨勢變化
五、結論

在臺灣史的論述裡，特別是 1895 年以前的歷史，我們稱從中國大陸來的人，不管是移民或者官員，均稱之為「漢人」，當然還有少部分的「滿人」。因此，在臺灣史研究中，通常使用漢人開發史、漢人拓墾史或漢番關係等概念。此種現象當然是受到史料的影響，例如在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建置的「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檢索其中的「古契書」資料庫，並無「唐人」用語，但「漢人」用語則有 1,709 筆，顯示當時臺灣民間大量使用「漢人」一詞。[1]

但是臺灣的閩粵裔人群除了自認為是漢人外，至今仍稱自己的原鄉為「唐山」，但是，漢人的原鄉為何不是「漢」山？這種用語不協調的現象亦出現於馬來西亞，例如 2018 年時當地的官員呼籲人民不要使用歧視性的話語，如「叫華人回唐山」，[2] 華人回去的地方為何是「唐山」？另外，在 17 世紀以來的臺灣文獻裡，除了頻繁出現「漢人」的用語外，有時亦會看到「唐人」的記載，由於學界對此問題似乎較少討論，因此本文擬探討此一問題，研究的重點是搜羅臺灣文獻裡的「唐人」用語資料，探討這些「唐人」用語是什麼意思。

本文主要依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建置的「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進行分析。此一資料庫收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的《臺灣文獻叢刊》，共計 309 種、595 冊，出版於 1957-1972 年，另外再加上蔣毓英的《臺灣府志》。資料庫內容以大清統治時期的方志、文集為主，亦包含 17 世紀以前、日治時期與臺灣有關的

---

1 這些古契書雖無「唐人」用語，但有「回唐」用語 163 筆，「唐山」用語 29 筆。「THDL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下載日期：2024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s://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

2 〈姆加希：叫华人回唐山不应出现　新政府严惩宗教极端者〉（2018 年 9 月 25 日），「南洋」，下載日期：2023 年 8 月 23 日，網址：https://pse.is/64ltfk。

中文文獻。

依據「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檢索「漢人」一詞，共出現 571 筆，「唐人」有 188 筆，[3] 漢人用語出現頻率為唐人用語的三倍。唐人用語之中，又有半數與本文所論無關，如指唐朝之唐人或浙江之「錢唐人」等，扣除後，尚有 94 筆。[4] 這 94 筆的唐人文獻遠少於漢人文獻，依指涉地區是否在臺灣，畫分成兩類：臺灣之外的東亞海域各地與臺灣本地，分述如下。

一、東亞海域各地的用語分析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有一類唐人文獻與臺灣無關，而是涉及東亞海域各地，共 39 筆，依指涉地區分為以下五類：

（一）東南亞群島區域

共 9 筆（見表 1），涉及 14 世紀的爪哇、15 世紀的麻六甲，以及 17 世紀以後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的咬𠺕吧（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臺灣方志主要記載 18 世紀咬𠺕吧的唐人，其中 1740 年代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記載值得重視，其文謂：

> 咬𠺕吧（一作葛喇吧）其人凡三種：紅毛為貴；中國商販留住者謂之唐人，久者曰「舊唐」、初寄籍者「新唐」，次貴；土人為賤。……法尚嚴，約束紅毛及唐人無得吃鴉片；犯則重罰不宥。然唐人往往竊食，至有懷其土入中國，依法製烟，流毒漳、泉、廈門；今則蔓延及臺，雖禁，不能遽絕。[5]

---

[3] 資料庫的檢索數據並無法反映唐人這個用語在所有文獻中出現的次數，因為每一筆文獻被切成頁數不等的檔案，檢索時呈現的是這個檔案裡有無唐人這個用語而無法顯示這個檔案裡出現幾次唐人用語，但資料庫顯示的數據還是可以反映哪些文獻有唐人用語。另外，原檢索 187 筆，但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外紀分別記載日本與咬𠺕吧的唐人，故視為兩筆，共 188 筆。

[4] 與本文無關的唐人資料，包含唐朝之唐人，如「唐人楷法」、「唐人詩」、「唐人諸稗說」等，共 73 筆，以及地名或人名用語與唐人有關，如浙江之「錢唐人」、山東之「高唐人」，共 19 筆，另外，叢刊編者所寫弁言 2 筆，這三類共 94 筆，占總數一半。

[5] 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74 種，1961；1741 年原刊），頁 502。

表 1 東南亞群島區域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資料出處
1	《諸番志》附錄《島夷誌略》	67	（大元出征爪哇之後）自時厥後，唐人之商販者，外番率待以命使臣之禮	
2	《臺灣外記》	425	（馬尼拉）三、五載，借事殺唐人，名曰「洗街」；恐其大盛，生事也	
3	《海國聞見錄‧南洋記》	18	番病，每向三寶求藥，無以濟，施藥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唐人尚以浴溪澆水為治病（外洋諸番，以漢人呼唐人，因唐時始通故也）	
4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1 修）	502	咬嚁吧條：其人凡三種：紅毛為貴；中國商販留住者謂之唐人，久者曰「舊唐」、初寄籍者曰「新唐」，次貴；土人為賤……法尚嚴，約束紅毛及唐人無得吃鴉片；犯則重罰不宥。然唐人往往竊食；至有懷其土入中國，依法制烟，流毒漳、泉、廈門，今則蔓延及臺	
5	《重修臺灣府志》（1744 修）	582	略（以下文獻若抄自右欄之著作，且已經本文引述者，不再引用原文，代以「略」字）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6	《續修臺灣府志》（1762 修）	685	略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7	丁紹儀《東瀛識略》	111	中華人之在彼者曰唐人，衣冠未改也。唐人為荷蘭推舉為官屬者，曰甲必丹	
8	《廈門志》	260	噶喇吧條：其人分三等：紅毛人、唐人、土人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9	《廈門志》	261	厤喇甲條：男女椎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	《星槎勝覽》

這是 18 世紀中葉的文獻，文中敘及唐人是「中國商販留住者」，這是唐人的基本定義；19 世紀丁紹儀《東瀛識略》亦載：「中華人之在彼者曰唐人」。[6] 但是唐人之中，又以久住番地或是初來寄籍的不同，分為「舊唐」與「新唐」。

（二）越南（占城、安南）

有 6 筆（見表 2），17 世紀中葉大明國文人朱之瑜（1600-1682）與徐孚遠（1599-1665）先後至越南，記錄了「唐人」、「舊唐人」等用語。19 世紀澎湖士紳蔡廷蘭（1801-1859）因船難漂至越南，事後將見聞寫成《海南雜著》，書中多處記錄唐人用語，如：「安南呼中國人曰唐人」，亦見到說華語之人「自稱唐人」。

[6] 丁紹儀，《東瀛識略》（文叢第 2 種，1957；1873 年原刊），頁 111。

表 2　越南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出處
1	《諸蕃志》	2	占城國：唐人被土人殺害，追殺償死	
2	朱舜水《朱舜水文選·安南供役紀事》	17	見翁該艚，帖同前（該艚者，專管唐人及總理船隻事務；以該伯為之）	見聞
3	徐孚遠《徐闇公先生年譜・附錄二交行摘稿》	91	在交日久，傳語日變，莫測其情；或言舊唐人有洩余姓名者，故愈欲余謁晤而甘心焉	見聞
4	蔡廷蘭《海南雜著》	3	又一小艇來，中一人能華語，自稱唐人（安南呼中國人曰唐人）；登船，愕曰：「客從中國來耶？不識港道，胡能至此」	見聞
5	蔡廷蘭《海南雜著》	7 7 9	適市，遇唐人（彼國稱中國人曰唐人，或稱天朝人）林遜（同安人） 召福建幫長鄭金（同安人）擇房舍安置（唐人多閩、粵二籍：閩稱福建幫、粵稱廣東幫，各設一幫長辦理公事） 宿黃文家，談鄉情歡洽。主人喚子婦出拜客。庸中唐人爭來問訊。信宿乃還	見聞
6	蔡廷蘭《海南雜著》	33 33 34 37 38 39	嘉隆心德之，常厚視唐人。今國王嗣政十餘年，亦加惠如昔，商旅安之 陰致書求救於暹羅國王；果以舟師十萬來援，用唐人為鄉導 議者多以此咎唐人，不知首惡皆土人 又逼於征斂（土人每丁，年徵稅錢十二貫，唐人減半） 女好納唐人為婿，呼唐人為叔 其巫祝醫命、星卜算術諸家，皆唐人為之	見聞

越南文獻亦有甚多唐人的記載，如阮朝國史館編《大南實錄》即載：「令凡廣東、福建、海南、潮州、上海各省唐人之寓屬轄者，省置該府、記府各一，仍照見數。或為兵、或為民……」。[7]

（三）澳門

僅見一條，即 1900 年丘逢甲（1864-1912）所寫〈澳門雜詩〉，其中有注釋文字，謂：「葡酋昔有遍發唐人墓者，為某壯士所手刃」。[8] 由於澳門是個半島，與中國大陸相連，何以此地有唐人墓？

7　阮朝國史館編，《大南實錄》（東京：慶應義塾大学語学研究所；橫浜：有隣堂，1961），第 3 冊，頁 358-359，阮世祖庚戌十一年（1790）二月条。

8　丘逢甲撰、周憲文編輯，《嶺雲海日樓詩鈔》（文叢第 70 種，1960），頁 137。

1900 年丘逢甲奉潮州保商局委派到南洋,「調查僑民,兼事聯絡」,[9] 他先至香港,再到澳門。在澳門停留期間,他聽聞了上述葡萄牙人挖唐人墓的事情,遂將此事寫入〈澳門雜詩〉第十二首:「誰報兕酋發塚冤?寶刀飲血月黃昏」。兕酋指的是葡萄牙海軍上校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1803-1849),他於 1846 年擔任澳門總督,1849 年 8 月 22 日在馬路上被沈志亮等六人包圍、刺殺,殺手們逃入香山縣境。事後,廣東官方圍捕時,多人被擊斃,沈志亮被捕,梟首示眾。此案起因,據沈志亮供稱:「小的祖墳六穴,因啞嗎勒開闢馬道,全行平毀。小的心懷忿恨,起意乘間把啞嗎勒殺死」。[10] 因此,丘逢甲所寫「某壯士」即沈志亮,「遍發唐人墓」即指澳門總督啞嗎勒開路毀墳。沈志亮之事蹟成為後世文人歌頌的題材,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詩詞多稱為壯士、義士、愛國者,惟獨丘逢甲稱他為壯士之餘,稱其祖墳為「唐人墓」,換言之,對丘逢甲而言,在葡萄牙人管轄之澳門境內,中國裔居民之墳為「唐人墓」,其人當為「唐人」。

其實 18 世紀時,澳門已存在唐人用語,如 18 世紀中葉澳門同知印光任、張汝霖編纂的《澳門記畧》,多處提到唐人,其中有張汝霖所寫〈請封唐人廟奏記〉,謂「惟澳門一處,唐、夷雜處」,[11] 顯示澳門亦長時期存在唐人用語,而且大清官員亦認同此一說法。

(四)琉球

有 7 筆(見表 3),都與出使琉球官員的紀錄有關,主要記載「唐人」一詞的琉球話讀音,其次則是明太祖賜琉球三十六姓的傳聞。另外,1800 年(嘉慶 5 年)內閣中書李鼎元出使琉球,在所撰《使琉球記》中謂:「國人呼中國為唐山,呼華人為唐人也」,國人指的是琉球當地人,這段記載是李鼎元在琉球時見聞所得。

---

9 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收於丘逢甲撰、周憲文編輯,《嶺雲海日樓詩鈔》,頁 401。

10 關於此一案件始末,參見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編,《澳门编年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四卷:清后期,頁 1616、1647-1655;郭衛東,〈論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文化雜誌》(澳門)45(2002 年冬),頁 43-54。沈志亮口供出自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 931/803. 本文轉引自前述郭衛東之文,頁 43。

11 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畧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頁 81-83。

表 3 琉球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出處
1	《使琉球錄三種，使琉球錄（陳侃）· 夷語》	39	正使，申思。副使，付司。唐人，大刀那必周	見聞
2	《使琉球錄三種，使琉球錄（蕭崇業）· 夷語》	153	略	陳侃《使琉球錄》
3	《使琉球錄三種，使琉球錄（夏子陽）· 夷語》	287	略	陳侃《使琉球錄》
4	《中山傳信錄》	262	唐人，叨濃周	見聞
5	《清代琉球紀錄集輯 · 使琉球記》嘉慶 5 年 6 月	174	遊臨海寺。寺創於順治十二年，為渡唐官船祈報之所——國人呼中國為唐山，呼華人為唐人也	見聞
6	《清代琉球紀錄續輯，琉球入學見聞錄》	69 72 182 183	言姓名，則曰唐名；稱中國，曰唐人（猶曰漢人） 人物類：人，虛毒。唐人，駄樓周虛毒 明太祖賜唐人三十六姓 其天鍾秀於茲，以俟唐人之居而開百世之盛者歟	見聞
7	《琉球國志略，卷三 封貢》	57	惟久米村唐人三十六姓及本國常充貢使選者，有姓字名號，倣效中華	見聞

（五）日本

有 16 筆（見表 4），主要為 17 世紀時的文獻，當時因為通商與倭寇侵擾，故中文文獻較多有關日本的記載。

「唐」這個字在現代日文音讀為とう，訓讀為から。から的漢字可寫作「加羅」，原本是日本社會稱朝鮮渡來人「韓人（からびと）」的訓讀字，此語與「漢人」均在唐朝以前已存在於日本社會，但在 9 世紀以後，「から」與「唐」混用，轉為「唐」的訓讀字。[12] 此後，中國大陸的人從海路至日本者，被稱為「唐人」，「から」與「唐（とう）」兩者有時亦成為日本人泛稱外國人、物的用語，但日本文獻或中國文獻有關日本唐人的記載，大多數仍指從海路來的中國大陸人民。

16 世紀末浙江總兵侯繼高所編《全浙兵制　附日本風土記》，即載日本人：「呼我大明曰大唐，呼我國人曰唐人，久住倭地者曰舊唐人，蓋以唐之威令素行于夷狄，

---

12 參見葛继勇，《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29-37、67-74，與書中頁 75-89 之附論〈《万叶集》中的“からくに” “からひと”〉。

表 4　日本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出處
1	《諸番志・附錄 東西洋考》	88	「元史」曰……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盡殺蒙古、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閩等是也。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眾，得還三人耳	《元史》，頁 4629
2	《明史選輯》	170	（豐臣秀吉）召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	
3	《明經世文編選錄・附錄　類報倭情疏》	230	色沮，遽令釋縛。引至艙中，彼酋設飯相陪；言奉彼國王差往東番商貨，並不干擾唐人。風候羈誤，實出無奈	
4	《明經世文編選錄・附錄　題報倭船疏》	253 254 256	島酋村山等安——即我呼為「桃員」，近年受彼武藏總攝之命，監主市易、交關唐人者也 稟稱：「即係常年通販船經由彼地駐泊，收買鹿皮等物則有之，並無登山久住意。或是漁捕唐人……且各商去國已遠，不必謹守國法；有信附舟唐人恐嚇而起釁者、有被劫海唐人教誘而取利者」 渠又自請：歸島之日啟知國主，查實先犯料羅、續犯大金之人。如係何島商倭，則請官蒞殺之於國中；如係唐人撥置，則差倭縛送之於境上，以表效順無貳	
5	《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神宗實錄萬曆 45 年條	119	為肥前州，島酋村山等安──我呼為桃員者，近受武藏總攝之命，監主市易、交關唐人者也	
6	《崇相集選錄》，附錄〈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凌雲奏〉	123	同上	
7	《崇相集選錄》，附錄(《東西洋考》)	125	肥前州島酋村山等安者，受彼武藏總攝之命，監主市易、交關唐人者也	
8	《臺灣關係文獻集零・浮海記》	23	復至一島名朦泉者，居焉。朦泉皆倭所居，無唐人往來；故其詩與字，莫有辨其美醜	
9	《朱舜水文選》，〈與陳遵之〉	80	弟飄流無已時，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	見聞
10	《朱舜水文選》，〈與孫男毓仁〉	87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准；我故無意於此	見聞
11	《臺灣外記》	3 10	昔之日本最敬唐人（凡各洋悉唐朝與通，故稱中國人曰唐人) 我們這些唐船就許多人，又舊唐人多少（來往者，唐人；在地居住者，稱舊唐人)。按本卷共出現「唐人」用語十五次，都與日本有關，本表僅列出與本文較相關者兩條	

12	《重修臺灣府志》	580	長岐有大唐街（皆中國人所居，立唐人為「甲螺」以治之），有花街	
13	《續修臺灣府志》	683	略	《重修臺灣府志》
14	《廈門志》	235	為妓者皆唐人所生女也，別為籍以居之；生子，則為輿夫	
15	《臺灣割據志》	12	其實當時明人來日本，率匿名稱幾官，蓋一、二排行之類。官，稱爺若郎之類，猶唐人五郎、三郎之稱也	
16	《臺灣鄭氏紀事》	2	按當時明人來我邦，率匿名稱某官，蓋一、二排行之類，官稱爺若郎之類，猶唐人五郎、三郎稱也	

故也」。[13] 故表 4 有三條資料提到 1610 年代日本長崎代官村山等安事蹟時，即謂他在長崎「監主市易、交關唐人者」。另外，17 世紀中葉大明士紳朱之瑜東渡日本，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謂：「弟飄流無已時，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14] 顯示朱之瑜至日本後，亦自認為是日本人所謂的「唐人」。

江日昇《臺灣外記》敘述 1623 年鄭芝龍押船至日本，亦有類似的記載，如謂：「昔之日本，最敬唐人（凡各洋悉唐朝與通，故稱中國人曰唐人）」，又寫到顏思齊密謀推翻日本幕府，其中有一人謂：

> 我們這些唐船就許多人，又舊唐人多少（來往者，唐人；在地居住者，稱舊唐人），合做幾路，放火的放火，占炮臺的占炮臺。幾筒倭兵，何足介意？

顯示日本的唐人亦自謂自己是唐人，自己的船是唐船。

到了 18 世紀，臺灣方志記載「長岐有大唐街」，並解釋「皆中國人所居，立唐人為甲螺以治之」，在此一敘述中，方志作者認知的中國人，在日本稱為唐人。

綜上所述，《臺灣文獻叢刊》收錄的文獻中，分別提及爪哇（雅加達）、越南（占城、安南）、馬尼拉、澳門、琉球、日本等地，這些地方均有唐人的用語。有些作者認為是當地人對於來自中國大陸人民的稱呼，部分文獻亦顯示，從中國至海外者，亦認同自己是唐人（如表 2 第 4 條）。另外，《澳門記畧》寫於 18 世紀，

13　侯繼高編，〈附錄：近報倭警〉，收於侯繼高編，《全浙兵制　附日本風土記》（臺南：莊嚴文化，1995），卷 2，頁 174、180。

14　朱之瑜，〈與陳遵之〉，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朱舜水文選》（文叢第 182 種，1963），頁 80。

書中另載「唐人（之那）」，[15] 「之那」即葡萄牙文 china 之唐字讀音，此書作者認為對譯之詞是「唐人」，而非中國人或漢人。由於《嶺雲海日樓詩鈔》之詩寫於 1900 年，亦即澳門直至此時，仍被視為唐人社會。

二、17 與 18 世紀上半葉臺灣的用語分析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所收唐人文獻共 55 筆與有臺灣有關，以下按文獻寫作或出版時間，區分為 17 與 18 世紀上半葉、18 世紀下半葉、19 世紀上半葉、19 世紀下半葉等四個階段。這種區分主要是為了觀察不同時段唐人用語的變化，故約略以五十年為單位，但因第一階段「17 與 18 世紀上半葉」屬於「唐人」、「漢人」兩用語並存與消長期，需對文獻進行較詳細的比對與討論，故特立為一節討論。

本階段共有 17 筆文獻（見表 5），大半均形成於 18 世紀上半葉，但《裨海紀遊》係郁永河記載 1697 年來臺見聞，而《臺灣外記》雖成書於 18 世紀，但描述 17 世紀之事。這些文獻均有唐人用語，但若考慮「漢人」用語之有無與唐人用語的知識來源，可歸納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用語有「唐人」而無「漢人」

《臺灣外記》在描述日本與馬尼拉的福建移民時，共使用唐人用語 16 次，如上節所述；另外，涉及臺灣的唐人用語主要與荷蘭人有關，即表 5 提到的兩筆（編號 2、3），如 1622 年鄭成功率兵來臺時，荷蘭人謂「唐人不知死活，敢犯吾境」，而鄭氏之船則是「唐船」。但全書未見「漢人」、「華人」等用語。另外，《裨海紀遊》兩度提到唐人，如謂「趨利賴科」為唐人，賴科是當時北臺灣著名的通事兼墾戶，但全書亦未見「漢人」用語。

《臺灣外記》作者江日昇為閩南人，自謂其父江美鼇為鄭彩部下，1677 年投降大清，對鄭氏始末「靡不周知」，「口傳耳授」江日昇，故《臺灣外記》此書乃得自江美鼇之見聞，[16] 可知「唐人」為鄭氏部將之用語。楊英所寫《從征實錄》

---

[15] 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畧校注》，頁 191。

[16] 江日昇，《臺灣外記》（文叢第 60 種，1960），頁 15。

表 5　17 與 18 世紀上半葉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出處
1	《裨海紀遊》	33 35	客冬有趨利賴科者，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為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 其夫見婦為客狎，喜甚，謂已妻實都，故唐人悅之（海外皆稱中國為大唐，稱中國人為唐人）	
2	《臺灣外記》	47	王率文武餞行，臨別又囑其「步步小心，唐人多詐」。揆一王頓首拜命	
3	《臺灣外記》	195	遙聞鹿耳門外炮聲轟天……王笑曰：「唐人不知死活，敢犯吾境」	
4	《赤嵌集》	16	〈過他里霧〉：「年來不用愁兵馬，海外青山盡大唐（番稱內地為唐）」。另一首：「舊有唐人三兩家，家家竹徑自迴斜」	
5	《諸羅縣志》	163	雜俗：諸流寓於臺者稱「唐人」，猶稱「漢人」也。鄭氏竊據，唐人既多，往來相接，長幼尊卑皆呼兄弟。半線以上，稱「付遁」（番語親戚也）。稱內地，統名之曰「唐山」	
6	《諸羅縣志》	300	略	陳小厓〈外紀〉
7	《臺灣縣志》	268	王禮，〈臺灣吟〉：唐人（臺呼內地為唐人）鼓檝涉風潮，坊里雜居欣共招；雖是姓名編戶籍，算來土著正寥寥（臺係四方雜處）	
8	《臺海使槎錄》	139	略	《海上事略》
9	《臺海使槎錄》	109	略	《赤嵌集》
10	《平臺紀略》，附錄〈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50	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南洋諸番稱中國為唐，猶言漢云。今臺灣人稱內地亦曰唐山）	《鹿洲初集》卷 2
11	《治臺必告錄》，附錄〈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56	略	《鹿洲初集》卷 2
12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1 修）	486	略	陳小厓〈外紀〉
13	《重修臺灣府志》（1745 修）	431	略	《赤嵌集》
14	《重修臺灣府志》（1745 修）	455	略	《海上事略》
15	《重修臺灣府志》（1745 修）	790	范咸〈題褚太守（祿）觀稼圖〉：番兒學唐人（番謂中土為唐），亦解把耡犁	
16	《番社采風圖考》	15	范咸：「衣冠漸已學唐人（番謂漢人曰「唐」），婦女紅衫一色新」	
17	《淡水廳志》	430	吳廷華〈社寮雜詩〉：十年新學唐人俗，五色絲穿長命錢（土番生子　必隨產浴於水，謂可去災）	

乃鄭成功部將寫鄭氏史事，書中雖未有唐人用語，但寫到荷蘭長官投降時，鄭成功曾「厚賜唐山土儀」，[17] 唐山亦是與唐人有關的用語，楊英當時人在臺灣，所贈物品應是得自福建原鄉，故稱「唐山土儀」。

至於《裨海紀遊》作者郁永河雖是浙江人，但在福州擔任幕僚，曾來臺採硫，在他的著作中也收錄一些海外唐人的記載，例如一幅描繪東西洋港口、航線的地圖，顯示他在福建擔任幕僚與遊歷期間，得知了福建人的海外知識與用語，[18] 故他與江日昇相同，認為當時從中國來臺灣的人是「唐人」，並謂：「海外皆稱中國為大唐，稱中國人為唐人」。這都是沿襲 17 世紀以前即已流行的辭彙，對他們而言，臺灣島亦屬海外，故郁永河之書名即為《裨海紀遊》。

除了上述兩種文獻外，在表 5 中，尚有兩筆文獻（編號 6、8）與本小節有關。在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裡，引述《海上事略》，謂：

> 偽鄭時，上澹水通事李滄愿取金自效，希受一職。偽監紀陳福偕行到澹水，率宣毅鎮兵並附近土著，未至卑南覓社，土番伏莽以待曰：「吾儕以此為活，唐人來取，必決死戰」！[19]

方豪校注《裨海紀遊》時，認為《海上事略》亦是郁永河作品，只是《臺海使槎錄》引用時，刪改較多，[20] 依據前述文字，作者亦認為臺灣「土番」稱鄭氏部將為「唐人」。另外，《諸羅縣志》引述陳小厓〈外紀〉，亦謂鄭氏時代之人為唐人，陳小厓之生平不詳，其著作〈外紀〉亦僅見臺灣方志收錄片段，以下先引述有關唐人的記載：

> 壬戌間，鄭氏遣偽官陳廷煇，往淡水、雞籠采金。老番云：「唐人必有大故」。詰之，曰：「初，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恐有改姓易王之事」。明年癸亥，我師果入臺灣。[21]

---

17 楊英，《從征實錄》（文叢第 32 種，1958），頁 187。

18 參見陳宗仁，〈前往東、西洋：〈宇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臺灣史研究》（臺北）19: 3（2012 年 9 月），頁 1-46。

19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文叢第 4 種，1957；1736 年原刊），頁 139。

20 郁永河，《裨海紀遊》（文叢第 44 種，1959；1698 年原刊），頁 8-14。

21 周鍾瑄修、陳夢林纂，《諸羅縣志》（文叢第 141 種，1962；1717 年原刊），頁 300。

文中提到癸亥年，「我師」入臺，即指 1683 年鄭氏降清之事，而《諸羅縣志》修於 1717 年，可知陳小厓此段記載寫於 1683-1717 年間。文中提到鄭氏往北臺採金，而臺灣的「老番」，謂鄭氏之人為唐人。由於未能見到陳小厓〈外紀〉全貌，不知文中是否使用漢人一詞，但就前述引文而言，陳小厓之認知亦與郁永河相同。

（二）用語以「漢人」為主，「唐人」得自見聞

1683 年鄭氏政權投降大清，隔年臺灣設置府縣，大清官吏奉派來臺。這些官員認為閩粵移民是「漢人」，但也注意到臺灣社會存在「唐人」一語，並寫入他們的著作，此類著作可以唐人用語得自見聞或抄自他人著作，區分為兩類。本小節探討得自見聞的唐人文獻，按文獻性質的不同，包含了官員詩詞、書信及方志，由於詩詞較多，先集中討論如下。

安徽桐城人孫元衡於 18 世紀初來臺，擔任臺灣府海防同知四年（1705-1708），他將在臺期間所寫詩篇刊印為《赤嵌集》，其內容多描寫臺灣特殊地理、氣候以及風土民情。[22] 在所寫兩首〈過他里霧〉詩中謂：

> 翠竹陰陰散犬羊，蠻兒結屋小如箱。年來不用愁兵馬，海外青山盡大唐（番人稱內地為唐）。
>
> 舊有唐人三兩家，家家竹徑自迴斜，小堂蓋瓦窗明紙，門外檳榔新作花。

他里霧為原住民聚落名，在今雲林縣斗南鎮。孫元衡來臺首年（1705 年、康熙 44 年）因公至彰化，路經雲林的他里霧社，描寫當地原住民村社有翠竹、犬、羊，一片寧靜，不用擔心兵馬戰事，原因是海外青山（指臺灣）已屬「大唐」，在此句之後，他特別加註「番人稱內地為唐」。在第二首詩裡，他提到他里霧社此地，已有「唐人三兩家」在此，可見瓦屋、竹徑。這兩首詩顯示孫元衡認知到，從中國內地前來的移民稱為「唐人」，而臺灣的蠻兒（番人、原住民）稱中國為「唐」。[23]

1720 年臺灣府海防補盜同知兼攝臺灣縣知縣王禮主修《臺灣縣志》，收錄自己所寫〈臺灣吟〉六首，其中一首：

---

22 關於孫元衡的生平與在臺詩作，可參見陳家煌，〈論孫元衡及其《赤嵌集》〉，《漢學研究》（臺北）23: 2（2005 年 12 月），頁 289-320。

23 在另一首詩的註語亦謂「南夷類稱中國曰唐」，見孫元衡，《赤嵌集》（文叢第 10 種，1958），頁 25。

唐人（臺呼內地為唐人）鼓檝涉風潮，坊里雜居欣共招；雖是姓名編戶籍，算來土著正寥寥（臺係四方雜處）。[24]

此詩有作者自註：「臺呼內地為唐人」，此句易讀成「臺（人）呼內地（人）為唐人」，進而解讀為臺灣人稱內地人為唐人而自己不是唐人。但此詩另一處作者自註：「臺係四方雜處」，故詩中兩處之「臺」字應作臺灣地方解，而非指臺灣之人，[25] 因而「臺呼內地為唐人」應讀成臺灣此地稱內地來的人為唐人。通讀全詩，其意指內地之人涉風乘船，歡欣雜居於臺灣坊里，並在臺灣稱為「唐人」，唐人雖已編成戶籍，但算來土著不多，故王禮在詩中又自註：臺灣係各地移民雜處。

在 19 世紀編纂的《淡水廳志》中，收錄了 1720 年代官員吳廷華所寫的〈社寮雜詩〉，其中有詩：

五十年來渤海濱，生番漸作熟番人。十年新學唐人俗，五色絲穿長命錢。

吳廷華係浙江錢塘人，在福建擔任通判、同知等官，曾因公務渡臺，依見聞寫作〈社寮雜詩〉。上引詩作中，「五十年」是概數，指的是 1684 年大清統治臺灣後，歷經數十年，臺灣的土番由「生」轉「熟」，隱喻天子教化有成；「十年」則是指在 1720 年代之前的十年，約是 1710 年代，熟番開始學「唐人俗」，此處之唐人即指臺灣當時閩粵移民及其後裔。

到了 1740 年代，巡臺御史范咸留下兩首詩，一是〈題褚太守（祿）觀稼圖〉：「番兒學唐人（番謂中土為唐），亦解把耡犂」、另一首謂：「衣冠漸已學唐人（番謂漢人曰「唐」），婦女紅衫一色新」。[26] 詩中唐人即閩粵移民，范咸描述當時平埔原住民學習了唐人的耕種與服飾，其看法與吳廷華相同。

此外，有官員書信與方志各一條。方志的年代較早，即 1717 年完稿的《諸羅縣志》，其編寫者在「雜俗」類第一條介紹唐人的概念，謂：

---

24 王禮主修、陳文達等纂，《臺灣縣志》（文叢第 103 種，1961；1720 年原刊），頁 268。

25 本文審查人之一認為此處之「臺」字「當然可解釋為臺灣人」，筆者在撰稿之初亦曾考量此一可能性。由於詩作標題即為「臺灣吟」，其主題顯是描述在臺灣的見聞，詩句裡共出現「臺」字 7 次，如「臺地」、「臺俗」、「臺多夜行車」，均為臺灣之意，由於文獻之解讀應該從此一文獻作者自身的用語脈絡來判斷，故認為本詩「臺」字並不能解讀為臺灣人，而是指臺灣地方。

26 范咸，浙江仁和人（今杭州市區），1745 年（乾隆 10 年）來臺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

諸流寓於臺者稱唐人，猶稱漢人也。鄭氏竊據，唐人既多，往來相接，長幼尊卑皆呼兄弟。……稱內地，統名之曰唐山。[27]

文中寫到「諸流寓於臺者稱唐人」，下一句是「猶稱漢人也」，兩句合併來看，其意是這些從閩粵流寓臺灣的人，在臺灣稱為「唐人」，猶如作者當時（18 世紀上半葉）所稱的「漢人」。因此，對臺灣的官紳而言，從閩粵流寓於臺灣的人，存在兩種稱呼，一種是「唐人」，一種是「漢人」，前者在記述臺灣的雜俗、逸事時使用，而後者是大清官紳們的用語。

同時期稍晚，藍鼎元（1680-1733）來臺擔任南澳總兵藍廷珍的幕僚，在一封書信中提到鴉片烟對於這些流寓臺灣者的毒害，指出：「聞此為狡黠島夷誆傾唐人財命者」，文中之唐人是否指臺灣的唐人？由於此書信在這一段文字之後附有一段小字註，謂：

南洋諸番稱中國為「唐」，猶言「漢」云；今臺灣人稱內地亦曰「唐山」。[28]

此一小字註的用意顯然是用來解釋文中「唐人」的意思。此註說明兩個重點：「南洋諸番稱中國」與「臺灣人稱內地」，南洋諸番、臺灣人是一組概念，另一組是中國、內地，顯然前後兩組概念是相對而言，而前組概念的共同點是兩地都存在「唐」的用語。故知受島夷誆傾財命的唐人兼指南洋與臺灣兩地的唐人而言。[29] 至今臺灣人與東亞各地華人猶稱原鄉為唐山，數百年未改。

上述文獻均出現唐人用語，其中有四種係作者吟咏臺灣風物、民情時，提及唐人，另外兩種亦是在敘述臺灣風俗時，連帶提及，這些都是出自作者親身見聞，他們所指的唐人，明確是指諸流寓於臺者的閩粵裔移民，而且居住時間恐已有數十年，並非新來乍到。另外，臺灣原住民稱閩粵來臺移民為「唐人」，此種用語應當也是習

---

27 周鍾瑄修、陳夢林纂，《諸羅縣志》，頁 4 記載本志係由漳州人陳夢林主纂，「鳳山學生李君欽文、邑明經林君中桂與俱」。

28 藍鼎元，〈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收於藍鼎元，《平臺紀略》（文叢第 14 種，1958；1723 年原刊），頁 50。

29 審查人之一認為本處文獻所指唐人是流寓巴城的唐人，而非臺灣的唐人。筆者則認為兼指臺灣的唐人，判斷的依據仍應從此一文獻的敘事脈絡來分辨，由於傳統文獻在某段文字之下附加小字註即是為了說明某段文字的涵義，此一書信在提及唐人時，小字註涉及的空間包含南洋與臺灣，故唐人一詞亦應包含臺灣唐人。

自唐人。

（三）作品用語以「漢人」為主，「唐人」抄自他人著作

上文討論的《諸羅縣志》編纂於 1717 年，共有 21 筆「漢人」資料，但也是 18 世紀臺灣方志裡最早提到唐人的作品，共有兩條唐人資料，一條是作者見聞（編號 5），另一條引用他人著作（編號 6）。至於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雖然刊於 1736 年（乾隆元年），但書中內容與他在 1723-1724 年間擔任巡臺御史的見聞有關。此書出現 37 筆「漢人」資料，唐人用語有兩筆，出現兩筆的原因是引用他人作品，即《海上事略》與孫元衡之詩。

此外，1741 年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係大清佔臺以來第四部刊印的府志，也是最早收錄唐人用語的府志，書中抄錄前述陳小厓〈外紀〉之文。1744 年范咸刊行的《重修臺灣府志》引用三段唐人記載，即表 5 的第 13-15 條，但都是抄自編者自己或他人的詩詞、著作。

從這些 18 世紀上半葉大清官員的著作來看，「漢人」一詞是他們用來指稱臺灣閩粵裔移民的用語，廣泛出現在他們對臺灣社會的各種描述裡，偶而出現的「唐人」記載，除了極少數是個人見聞，其餘均是引用他人著作，這些現象均顯示「唐人」並非這些大清官員的慣用語。

根據以上所述，「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所收唐人文獻與有臺灣有關者共 55 筆，按本文四個階段的劃分，本時期共有 17 筆，約占三分之一，數量偏多，顯示大清統治臺灣初期，出現較多唐人的記載。根據本節討論，這 17 筆又可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型是著作裡有「唐人」用語而無「漢人」用語。第二與第三類型之作者都大量使用「漢人」用語，偶而才出現「唐人」，其差別是第二類型作者是將「唐人」一詞寫入其詩文中，而第三類型只是單純引用他人著作。關於這些現象的分析，詳見本文第四節。

三、18 世紀下半葉以來臺灣的用語分析

本文將「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所收唐人文獻與有臺灣有關者，按寫作時間

的先後，分為四個階段，第二至第四階段分別為 18 世紀下半葉、19 世紀上半葉、19 世紀下半葉（含 20 世紀上半葉），因為文獻裡「唐人」用語的使用型態較為類似，故併為一節討論。

（一）18 世紀下半葉

此時期共有 8 筆（見表 6），其中 4 筆方志資料均抄襲先前之方志，屬於上節所謂的第三類型。

至於在臺官員的私人著作則屬於第二類型，如朱仕玠於 1763-1764 年（乾隆 28-29 年）擔任鳳山縣教諭，所寫《小琉球漫誌》提到「蓋諸番以內地為唐山、人為唐人也」，這是指臺灣原住民稱流寓來臺者是「唐人」。

1770 年前後在臺任官的朱景英《海東札記》則解釋稱「唐」的原因，謂：「臺灣人稱內地曰唐山，內地人曰唐人，猶西北塞外稱中土人曰漢人；蓋塞外通於漢，海外通於唐，名稱相沿，其來久矣」，此種說法亦見於先前的《海國聞見錄》與藍鼎元之書信，顯示此時期對「唐人」此一用語的理解與使用，均與 18 世紀上半葉

表 6　18 世紀下半葉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出處
1	《臺灣詩乘》	60	鉛山蔣心餘太史有「臺灣賞番圖」，為李西華黃門作，詩曰：……都盧嘓轆祝唐官（番呼漢人曰唐人），來獻都都（糍團也）糗餈團[30]	
2	《續修臺灣府志》	921	略（〈題褚太守（祿）觀稼圖〉）	《重修臺灣府志》
3	《續修臺灣府志》	531	略	《赤嵌集》
4	《續修臺灣府志》	555	略	《海上事略》
5	《重修臺灣縣志》	509-510	略（〈題褚太守觀稼園[圖]〉）	《重修臺灣府志》
6	《小琉球漫誌》	60	熟番云：臺地寒由唐山人攜來。蓋諸番以內地為唐山、人為唐人也。地氣自北西〔按：應作而字〕南，有道徵焉	
7	《小琉球漫誌》	89	略	陳小厓〈外紀〉
8	《海東札記》	52	臺灣人稱內地曰唐山，內地人曰唐人，猶西北塞外稱中土人曰漢人；蓋塞外通於漢，海外通於唐，名稱相沿，其來久矣	

[30] 按：蔣心餘即蔣士銓，1747 年（乾隆 12 年）進士。李西華即李友棠，1756 年（乾隆 21 年）任巡臺御史。

之官紳相同。只是朱景英謂「臺灣人」稱內地人曰唐人，是否朱景英的意思是臺灣人不是唐人？恐怕不能如此解釋，從文獻傳抄的脈絡來看，「內地人曰唐人」此一概念早見於 18 世紀上半葉的文獻，只是先前文獻使用「番稱」、「臺呼」，此處改用「臺灣人稱」，應只是沿襲前人寫法而略改用字，似乎不能以此例而認為 1770 年代閩粵裔臺灣人並不認為自身是唐人，而唐人已被臺灣人認為是外人。

（二）19 世紀上半葉

此時期距離大清統治臺灣已超過百年，有 11 筆文獻提及唐人（見表 7），其中有 9 筆方志、筆記資料均是抄襲前人著作，顯示唐人用語已快成為歷史名詞，惟有柯培元的〈生番歌〉與〈熟番歌〉描述的是生活中的唐人，屬於本文所謂的第二類型。

表 7　19 世紀上半葉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出處
1	《續修臺灣縣志》	387	略	《海東札記》
2	《續修臺灣縣志》	560	略（〈臺灣吟〉）	《臺灣縣志》
3	《續修臺灣縣志》	581	略（〈題褚太守(祿)觀稼圖〉）	《重修臺灣府志》
4	《彰化縣志》	303	略（雜俗）	《諸羅縣志》
5	《福建通志臺灣府》：錄自《重纂福建通志》	217	略	藍鼎元〈與吳觀查論治臺灣事宜書〉
6	《福建通志臺灣府》，錄自《重纂福建通志》	1044	略	陳小厓〈外紀〉
7	《臺灣志略》	88	略	《海東札記》
8	《噶瑪蘭志略》	191	柯培元〈生番歌〉：黔面文身喜跳舞，唐人頭顱漢人奸	
9	《噶瑪蘭志略》	191-192	柯培元〈熟番歌〉：熟番歸化勤躬耕，荒埔將墾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杖畢垂頭聽官諭：嗟爾番，汝何言？爾與唐人吾子孫，讓耕讓畔胡弗遵！	
10	《噶瑪蘭廳志》[31]	409	略	〈生番歌〉
11	《噶瑪蘭廳志》	409-410	略	〈熟番歌〉

[31] 本書雖刊於 1852 年，但纂寫於道光年間，故視為 19 世紀上半葉之文獻。

柯培元於 1835 年（道光 15 年）調署噶瑪蘭通判，編纂《噶瑪蘭志略》，書中收錄〈生番歌〉與〈熟番歌〉。在〈生番歌〉中謂：「黔面文身喜跳舞，唐人頭顱漢人奸」、〈熟番歌〉中謂：「熟番歸化勤躬耕，荒埔將墾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依這兩首歌的意思，並非單指噶瑪蘭一地的情形，而是柯培元對於當時臺灣生、熟番處境的認知。在作品中，他使用了「漢人」、「唐人」等用語，顯示此時「唐人」用語尚存在於臺灣社會。值得注意的是，〈熟番歌〉中與「熟番」爭墾荒埔的唐人，應指來臺已久的閩粵裔臺灣人，而非剛從中國大陸前來的人。

（三）19 世紀下半葉

此時期有 17 筆（見表 8），大部分亦是抄襲前人文字，但仍然有新的唐人文獻，例如黃逢昶《臺灣生熟番紀事》所收〈臺灣竹枝詞〉，有詩句：「鴃音鴃舌苦難通，翻笑唐人話不同」，作者在「唐人」一詞加註謂：「唐人呼內地人為唐山郎」。黃逢昶的生平不詳，今留存《臺灣生熟番紀事》刊本一部，書中自謂「光緒八年（壬午），逢昶奉委至宜蘭催收臺北城捐」、又有〈上岑宮保撫番稟稿〉。[32] 由於 1882 年（光緒 8 年）3 月臺北城動工，當時主其事者是臺北首任知府陳星聚，福建巡撫為岑毓英，故知黃逢昶當時應為官員之幕僚，奉差委收取城捐，〈臺灣竹枝詞〉殆寫於此年。

黃逢昶在書中除了收錄了柯培元的〈熟番歌〉與〈生番歌〉，亦將「唐人」一詞寫入竹枝詞，並謂：「唐人呼內地人為唐山郎」。黃逢昶此一敘述很明確的說明，19 世紀在臺灣的閩粵裔居民是「唐人」，這些唐人稱「內地人」為「唐山郎」，唐人與「唐山郎」代表不同的群體概念。

另外，《臺案彙錄壬集》收錄 1886 年（光緒 12 年）〈中路理番同知蔡諭編新港社各番丁姓字郡名堂名〉，其中謂：

> 其有襲用唐人之姓及以「潘」字為姓者，均於姓下添一「新」字為雙姓，以「新」字為堂名。其襲用唐人之姓者，或加作金、玉、邑三部內所有之字亦可。[33]

---

[32] 黃逢昶撰，《臺灣生熟番紀事》（文叢第 51 種，1960），頁 11。

[33] 不著撰人、吳幅員編輯，《臺案彙錄壬集》（文叢第 227 種，1966），頁 114。

當時中路理番同知蔡嘉穀為苗栗之新港社人編定姓氏、堂名等，提到「唐人」用語。上述兩筆資料顯示大清統治臺灣兩百年後，閩粵裔臺灣人尚使用「唐人」一詞。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有兩筆臺灣的唐人文獻出現於 20 世紀上半葉（見表 9），均為連橫的作品，由於其說法都是沿襲前人，故附記於本小節，不再贅論。惟獨提到「唐山客」一語，指的是「新來者」，移至下節討論。

表 8　19 世紀下半葉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出處
1	《淡水廳志》	308	略	《海上事略》
2	《淡水廳志》	437	略	〈生番歌〉
3	《淡水廳志》	437	略	〈熟番歌〉
4	《淡水廳志》	453	略	陳小厓〈外紀〉
5	《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	411	略	〈生番歌〉
6	《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	412	略	〈熟番歌〉
7	《臺灣生熟番紀事》	13	略	〈生番歌〉
8	《臺灣生熟番紀事》	15	略	〈熟番歌〉
9	《臺灣生熟番紀事》	28	〈臺灣竹枝詞〉：鴃音鴃舌苦難通，翻笑唐人（唐人呼內地人為唐山郎）話不同；欲問前程何處是，但憑指畫辨西東	
10	《臺案彙錄壬集》，光緒 12 年〈中路理番同知蔡諭編新港社各番丁姓字郡名堂名〉	114	其有襲用唐人之姓及以「潘」字為姓者，均於姓下添一「新」字為雙姓，以「新」字為堂名。其襲用唐人之姓者，或加作金、玉、邑三部內所有之字亦可	
11	《臺灣私法人事編》，〈新港社各番丁之姓字及堂名〉	332	其有襲用唐人之姓及以潘字為姓者，均於姓下添一新字為雙姓，以新字為堂名。其襲用唐人之姓者，或加作金、玉、邑三部內所有之字亦可	
12	《法軍侵臺檔》	543	光緒 12 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咨報臺北府淡水縣屬英教堂被匪搶毀查明償給〉：「交椅四塊、几棹二塊，價銀共一元二角。唐人七朵八腳眠床一張，價銀十三元」	
13	《臺陽見聞錄》1891	195	略	陳小厓〈外紀〉
14	《苗栗縣志》	122	略	《海上事略》
15	《恒春縣志》	244	略	〈熟番歌〉
16	《新竹縣志初稿》	192	略	《海上事略》
17	《魂南記》，附錄（二）〈劉永福援臺始末〉	81	頻聞各日兵用鐵棍東搜西剔，響聲嘓嘓；番語伊啞，唐、洋音語兩相錯雜。其唐人通士云：「奇了，奇了，實在奇的！任搜尋亦不見的！莫非有隱身遁形之法歟」？	

表 9　20 世紀上半葉的唐人用語

	書籍	頁碼	內文	出處
1	《雅堂文集》	176	唐山客：臺灣固海上荒服，我民族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孫，遙望故鄉，稱為唐山。而號新來者為唐山客。蓋益以東南各國，唐時交通始盛，故目中國人為唐人，猶西北塞外之稱漢人也	
2	《臺灣詩乘》	169	略	〈生番歌〉

四、「唐人」用語的使用與趨勢變化

本文依據「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所收文獻，分析文獻中的「唐人」用語，發現一百八十餘筆資料中，與本文相關者，有 94 筆，其中 39 筆資料涉及日本、琉球、馬尼拉、澳門、安南、麻六甲、爪哇等地唐人，這類海外唐人的定義可借用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所載：「中國商販留住者，謂之唐人」。

至於與臺灣有關者 55 筆，本文按年代先後，區分為四個階段。依據各階段的分析，筆者認為大清帝國統治時期，臺灣文獻中的「唐人」用語呈現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

（一）大清統治初期用語的並存與消長

本文第二節討論第一階段「17 與 18 世紀上半葉」的唐人文獻，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型的文獻是指作者只用「唐人」用語而無「漢人」一詞，例如《臺灣外記》與《裨海紀遊》，這不是用語選擇的偶然現象，因為同一時期，即大清統治臺灣最初的數十年間，有些文獻只出現「漢人」用語而無「唐人」，例如早期三部刊行的《臺灣府志》均未見唐人的用語，而是大量使用「漢人」一詞。首部《臺灣府志》是 1685 年臺灣知府蔣毓英編纂，書中敘述顏思齊、郭懷一事蹟，均稱之為「漢人」，而臺灣原住民則是「土番」，[34] 1694 年高拱乾之府志亦未見唐人用語，但採行蔣毓英之漢、番概念，謂「鄭成功取臺灣……設里社以宅番漢；治漢人有州官，治番民有安撫」，談到歲時禮儀，謂：「漢人用此禮，土番無也」。[35] 第三部

[34] 蔣毓英纂輯，《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127、262。

[35] 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1960；1696 年原刊），頁 5、190。

刊行的府志是 1712 年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亦是使用漢、番等用語，只是增加更多有關漢人的描述。

上述方志的編纂者以在臺的大清官員、士紳為主，這種只用漢人用語的習慣，與郁永河、江日昇明顯不同，然而這兩類用語截然有異的文獻均寫作於大清統治臺灣的前數十年內，可知稱呼臺灣閩粵裔移民的用語不同，實代表用語背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群體，使用唐人用語的是閩粵沿海地域的人或是來到臺灣之人，他們視臺灣如同本文第一節所述東亞海域各地，當地的閩粵裔移民即自稱與他稱為唐人，家鄉為唐山；然而大清官吏則是使用漢人用語，視來臺之移民為漢人，記載於他們編寫的方志、筆記等作品裡。此種用語如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載：「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爲漢軍，以直省人爲漢人」。[36]「直省」指大清國十八省，各省居民即為漢人。

至於第二類型的作者亦是來臺官紳，他們的著作裡仍以「漢人」用語為主，但同時也注意到臺灣社會存在著「唐人」用語，在敘述、吟咏臺灣的風俗、逸事時，特別將「唐人」一詞寫入著作，如同他們使用臺灣有關「土番」的各種用語，這類著作有《赤嵌集》、《諸羅縣志》等。

第三類型的著作亦是以「漢人」用語為主，但著作裡的唐人記載純粹是引用他人著作，如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1740 年代的兩部《臺灣府志》。這種類型的知識來源雖然與第二類型不同，但他們將他人著作中的唐人描述寫入作品裡，其作法與心態其實與第二類型並無不同，都是出於對臺灣社會的「獵奇」與「考古」，關於此點，下一小節還會再論述。

總之，將上述三種類型置於時間與空間脈絡來觀察，可以了解到大清統治臺灣初期，最初是兩個知識社群的分立與並存，實際的例子就是他們的著作裡只存在「唐人」或「漢人」用語，「唐人」的知識社群指的是福建沿海地域的士紳裡，對海外地理知識、唐人群體了解者，而「漢人」的知識社群則是來臺的大清官吏。但是這個用語並存的時期相當短，隨著大清的「王化」日深，只使用「唐人」的知識社群很快地萎縮，消失於閩臺兩地，「漢人」用語替換了「唐人」，成為 18 世紀以後臺灣社會流行的用語。[37]

36　王士禎撰、齐国华整理、熊月之审阅，《池北偶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頁 39。

37　有關「漢人」詞彙的使用及其意涵、演變，涉及文獻的辨析，筆者將另文討論。

（二）獵奇與考古：文獻的重覆與刻板化

與臺灣有關的唐人文獻雖有 55 筆，但若與文獻中「漢人」一語出現的次數（571 筆）相比，其數量不多且流於重覆與刻板化敘述。「重覆」的現象指的是 55 筆文獻大半都是後來者抄錄前人記載，即本文所謂的第三類型。不斷地重覆抄錄，也形成一種刻板化的敘述模式，例如《諸羅縣志》引用陳小厓〈外紀〉，謂：「壬戌間，鄭氏遣偽官陳廷煇，往淡水、雞籠采金。老番云：唐人必有大故」，此一敘述在後來的時期被引用 12 次。此一案例頗值得分析，一是 12 次的引用裡，有四種文獻保留了唐人用語，其餘八種刪除「唐人」一詞，即把「老番云：唐人必有大故」改寫為「老番云：采金必有大故」。[38] 此現象顯示「唐人」敘事在長期的文獻傳抄過程中，會被改寫、省略。另外，為何鄭氏遣人採金的故事會在 18、19 世紀一再被引用？通讀整段故事，其意旨是說明大清為何取代鄭氏統治臺灣？原因是凡往淡水、雞籠採金，都會發生「改姓易王之事」。臺灣官紳喜歡引用這一故事，應是這故事具有傳奇性，而且解釋了大清佔有臺灣的原因。大清官紳記錄、傳布臺灣的傳奇故事即是「獵奇」，在 18、19 世紀引用 17 世紀的故事解釋大清佔臺，可稱之「考古」。[39]

又如各時期文獻作者亦不斷地重覆解釋唐人的意思，如「即海外皆稱中國為大唐，稱中國人為唐人」，或如 19 世紀丁紹儀《東瀛識略》載：「中華人之在彼者曰唐人」。[40] 這也是因為臺灣官紳已習稱「漢人」，有時想使用「唐人」一詞，便覺得應該要說明，一樣是「獵奇」與「考古」的心理機制在作用。

上述重覆與刻板化的現象也透露兩個訊息，一是 18 世紀上半葉的唐人文獻影響了後來近兩百年的唐人敘事內容，二是作者對「唐人」用語的「獵奇」與「考古」，最主要的因素當然與這些作者的出身、背景有關，亦即「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收錄的文獻絕大部分為大清官員、幕僚、士紳所寫，這些人成長於滿漢共處、共治的文化、政治環境中，「唐人」一詞對他們而言，首先想到的是唐朝的「唐」，

---

38 最早的改寫應是出自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05 種，1960；1747 年原刊），頁 495。

39 獵奇與考古的概念取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29（2006 年 9 月），頁 47-83。胡曉真在此文中，認為《滇黔土司禮記》的作者陳鼎「獵苗族風土之奇，考中原禮義之古，於是造就了《滇黔土司婚禮記》的禮學世界」。

40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 111。

在中國內地各省，這種情況更為明顯。以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收錄的《清實錄》為例，其中「漢人」用語出現 675 筆（989 次），「唐人」用語 8 筆，但都與海外唐人無關，而且其中 6 筆指涉唐朝之人。因此，文獻指稱唐朝的「唐」，在他們的文化修養裡不須做解釋，但涉及海外的「唐人」就是異說、他者，需要解釋，有些作者甚至聲稱唐朝之人已來到臺灣。[41]

（三）「唐人」用語不絕如縷

長期來看，整個大清帝國統治二百餘年間，「唐人」用語已流於重覆傳抄與刻板化，在臺灣官紳的著作裡，用語的意義逐漸僵固而失去生命力。不過，在整個大清統治期間，在一些文獻裡，仍然呈現的是「使用中」的用語，此即本文所定義的第二類型，例如 18 世紀官員孫元衡、王禮、范咸的詩句，或是 19 世紀柯培元〈生番歌〉與〈熟番歌〉，以及日本統治初期（20 世紀初期）連橫的《雅堂文集》，這類文獻中的「唐人」用語並非抄襲前人著作，而是作者自身使用或聽聞所得。這類文獻數量不多，但出現於本文分類的各個時期，這顯示「唐人」用語並未完全刻板化，而是存在於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中，故在長時期歷史過程中會被官員注意到，並寫入詩詞，呈現不絕如縷的現象，甚至到了 20 世紀，臺灣尚存「唐人」用語。

以下舉 1931-1932 年出版的《臺日大辭典》為例，此書收錄「臺灣語（即今稱閩南語、臺語）」九萬多個詞彙，語料收集的時間相當長，可以視為日本人統治臺灣後，對臺語辭典編寫之集大成。[42] 此書編寫體例是先寫臺語詞彙之日文字母拼音，再寫中文字，接著再寫日文之解釋，而書中收錄「唐人」詞條，故知「唐人」為臺語詞彙，亦有臺語讀音，至於唐人的日文解說，標示三種意思，分別是

---

41 連橫在〈釋華佑遊記〉中讀到「惟里劉山有唐碑，上書『開元』二字，分明可辨」，謂：「今記中乃有唐碑，是唐人已至臺東而傳其胤，故能識字讀書，但作菩薩誦；則以僻陋在夷，與外不通，文化漸退，遂復其朔」，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詩薈雜文鈔》（文叢第 224 種，1966），頁 22、26。

42 洪惟仁，〈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臺灣語文研究》（臺中）4（2009 年 9 月），頁 39：「由此可見，《臺日大辭典》所紀錄的是當時臺灣北部閩南語的實際語音。不但語音如此，詞彙更是如此，《臺日大辭典》厚達 1916 頁所收的九萬餘個詞彙也都是當時在臺灣北部蒐集到的口語詞彙，包括少數口語出現的文言詞彙或借自日語的新詞以及漳泉各種方言變體都不憚蒐羅。這個事實顯示，小川尚義所編的臺語辭典包括《臺日大辭典》不只是規範性的實用辭典，而是具有描寫語言學價值的口語辭典」。

唐人、支那人、民國人。

「唐人」詞條的收錄表示日本人在收集臺語語料時，聽到臺灣人尚使用「唐人」此詞，而辭典編者向日本讀者解釋，在日本人的用語習慣裡，「唐人」有前述三種意思：「民國人」指中華民國之人，日本人慣用中國大陸的政權名稱稱呼其人民，如日本人曾稱中國大陸之人為「唐人」、「明人」、「清人」，中國民國之人即「民國人」；「支那人」的指涉較廣泛，當時的南洋華人亦可稱為支那人，而閩粵裔臺灣人亦屬支那民族；「唐人」一語則是日本人在本國所稱的唐人。

《臺日大辭典》收錄的「唐人」並未明確指稱包含本島人（臺灣人），但是否與臺灣人無關？臺灣人當然不是民國人，然而當時臺灣人亦可自認或被認為是唐人或支那人。關於此點，辭典編者雖然沒有清楚說明，但不能因為日本人認為「唐人」是異於日本人的他者、外國人，即推論日治時期的臺灣人亦認為「唐人」是異於臺灣人的「中國人」。

另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臺日大辭典》九萬多辭條中並無「漢人」、「本島人」這類辭條，但在日文解釋中則使用「漢人」、「本島人」等語，[43] 換言之，當時編者可能漏收這兩個辭條，或是這兩個用語不被認為是臺灣人的用語。但不論如何，在日治時代的臺語裡仍存在「唐人」一語。另亦有「唐山」用語，見下一小節討論。

（四）新舊唐人與唐山客

大清統治時期，閩粵裔臺灣人自稱自己是唐人或漢人，那麼他們如何稱呼來自中國的人？

上文提到，中國大陸之人「落番（luò fān）」至海外即稱唐人，但在「番片（huan pîng）」日久，即出現新唐、舊唐之分別，江日昇寫日本唐人的故事或 1740 年代《臺灣府志》描述咬嚁吧唐人，均有此種說法。七十餘年後，1789 年有唐人移民至咬嚁吧工作，被人拖欠工資，在當地唐人公堂案簿中亦記載先來唐人「輕新客如草莽」、「晚屬在新客，話語不通，投論無門」等，[44] 新客即臺灣方志所稱的「新唐」，依照公堂案簿所載，顯示當時新客被舊唐人欺侮。

---

[43] 如《臺日大辭典》頁 528 解釋「漢席」時，謂是「漢人の料理」；頁 746 解釋臺語的「本地人」時，謂是「當地の人、本島人」。

[44] 包樂史、聶德寧、吴鳳斌校注，《公案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第一輯，頁 112。

19 世紀廈門出版的歌仔冊〈新刻過番歌〉亦有類似的描寫：「唐人雖多難方便，到此想起盡了然，遇着一陣小工人，招我甲伊做小工。新客小工着罔做，有做即有鐺〔鐳〕通用，……做人頭工免相欺，平平唐人免受氣」。[45]

因此，離開唐山的中國人來到海外，如臺灣、咬嵧吧，在當地居住時，其身分成為「新客」、「新唐」，此外，還可以稱為「唐山人（唐山郎）」、「唐山客」，18 世紀中葉來臺任官的劉家謀（1814-1853），在所作《海音詩》中即有唐山客一詞，謂「內地人多娶臺女」，而臺灣人謂內地人曰「唐山客」。[46] 這個內地人不是在內地娶臺女，而是人在臺灣，成為唐山客。前引 19 世紀《臺灣生熟番紀事》所載「唐人呼內地人為唐山郎」或《臺陽見聞錄》謂：「臺人……又呼內地人為唐山郎」，[47] 甚至到了 20 世紀初，連橫仍謂：「號新來者為唐山客」。

《臺日大辭典》收錄「唐山」、「唐山早」兩個辭彙。唐山的解說是指唐土、唐、支那、或中華民國。另有「唐山客」、「唐山人」指支那人、民國人，另有「唐山戇」，日文解釋是罵民國人阿呆。二戰後，福建出生的李純青來臺，在所寫《獻曝》一書中，謂：「臺北是我的第二故鄉，曾消耗了我的兒時——一個可憐的『小唐山客』」。[48]

上述文獻顯示臺灣人稱剛來臺的中國人是「唐山人」、「唐山客」，而非「唐人」。換言之，初來番地者為唐山郎、唐山客，在「番片」日久，即為唐人，而唐人之中，又以居住時間長短，出現新唐、舊唐之分別。

五、結論

史學家王賡武曾以親身經歷描述漢人與唐人的認同差異。王賡武的父親是江蘇泰州人，1929 年至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泗水任教，王賡武在當地出生，後因

---

45 南安江湖客輯，〈新刻過番歌〉，引自刘登翰等編著，《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　福建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18），頁 7-8，原本由廈門會文堂出版，木刻本，年代不詳。編者對新客之注釋為「對外地勞工的稱呼」，但筆者認為此種解釋並不準確。

46 劉家謀，〈海音詩〉，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雜詠合刻》（文叢第 28 種，1958），頁 15。

47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文叢第 30 種，1958；1891 年原刊），頁 143。

48 李純青，《獻曝》（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6），頁 1。感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許雪姬提供此條資料。

其父遷至英屬馬來亞怡保教書，舉家隨之，王賡武回憶道：

> 我小的時候就有點奇怪，因為我自己的父母是從江蘇出去的，他們反而習慣用「漢人」來稱呼，但到了南洋去，發現根本不用「漢人」這個詞，都叫「唐人」。他們在廣東話、福建話裡自稱為「唐人」，而北方人到南洋去，自稱為「漢人」。[49]

王賡武家人屬於本文所說的唐山客、新客，他說小時候覺得「有點奇怪」，為什麼他父母自稱是「漢人」，可是到了南洋，大家都自稱「唐人」？這種人稱用語差異的現象使得王賡武感覺奇怪，但這種用語交雜併存現象也出現於大清帝國統治臺灣的時期，只是現在臺灣社會流行「漢人」一詞，且自認是「漢人」，而淡忘了這裡也曾是「唐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僅存的「唐山」用語與意象，仍是現代臺灣人的歷史記憶。

本文依據「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搜尋其中有關「唐人」用語的文獻，分析大清帝國統治期間臺灣文獻有關「唐人」用語的使用方式。根據文獻資料的整理，有一半的「唐人」用語與海外唐人無關，而是朝代名或地名用語。另有一些文獻描述東亞各地的唐人，只有 55 筆，占總數不到三分之一的文獻與臺灣有關。

在與臺灣有關的「唐人」用語裡，可以觀察到幾個特點，一是在大清統治初期，曾存在一個短暫時期，臺灣的文獻裡有一些使用「唐人」而無「漢人」用語，如《裨海紀遊》、《臺灣外記》，同時也有一類是只使用「漢人」，如早期的三部《臺灣府志》，不同的用語習慣象徵不同群體的地理與族群認知，前者呈現的是福建沿海地區士紳對於海外的認知與用語，以及在臺灣活動的鄭氏家族、一般移民，如同東亞海域各地之習慣，自稱與他稱為「唐人」；另一方面，大清統治臺灣後，官員認為居住臺灣之人有居民與土番，居民指的是閩粵裔移民，官員稱之為「漢人」。在大清統治時期，兩個用語彼此競爭，但「漢人」是官方用語，長期而言，漸漸地取代了「唐人」，例如 18、19 世紀的契字文書，契中均使用「漢人」，應是民間社會為了符合官方用語而做的選擇，因此，在 18、19 世紀東南亞唐人地區

---

49 王賡武，〈中国情结：华化、同化与异化〉，《北京大学学報（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48: 5（2011 年 9 月），頁 145-146。

「唐」與「番」並稱的概念，在臺灣變成「漢」與「番」並稱。

大清統治的兩百餘年間，文獻裡依舊出現「唐人」用語，但如本文所論，大半唐人用語是在「獵奇」與「考古」的情況下，不斷重覆地出現於各時代的文獻裡，使得此語僵固、刻板化。但是具有「使用中」意涵的「唐人」用語雖然不多，在兩百餘年間，卻也不絕如縷地出現在文獻裡，說明民間社會仍存在此語，一直到 20 世紀上半葉。

本文認為大清帝國統治時期的閩粵裔臺灣人具有「漢人」與「唐人」的雙重性，過去我們只強調他們是「漢人」，而忽略「唐人」也是他們自我身分的認同。現在的我們是誰？自己的族群認同由自己決定，他人無從置喙，也非傳統所能規範，因此，我們可以是漢人、唐人、臺灣人、中國人、番人……。但是我們祖先的認同是一個歷史問題，應該根據現存的歷史資料分析。

從唐山（中國、中華、中土、內地）來到海外的人即是唐人，這是各種臺灣文獻對於唐人的定義，此種認識有助於擴展我們研究臺灣史的視野，亦即臺灣的社會、經濟面貌不僅是華南地方社會的延伸，也可能展現了海外唐人社會文化的新發展，我們可以嘗試在東亞海域的唐人社會裡，找尋不同面貌的臺灣史。

引用書目

「THDL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下載日期：2024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s://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

〈姆加希：叫华人回唐山不应出现　新政府严惩宗教极端者〉（2018 年 9 月 25 日），「南洋」，下載日期：2023 年 8 月 23 日，網址：https://pse.is/64ltfk。

丁紹儀

1957[1873]　《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不著撰人、吳幅員（編輯）

1966　《臺案彙錄壬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2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王士禎（撰）、齐国华（整理）、熊月之（审阅）

2004　《池北偶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王賡武

2011　〈中国情结：华化、同化与异化〉，《北京大学学報（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48(5): 145-146。

王　禮（主修）、陳文達等（纂）

1961[1720]　《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丘　琮

1935　〈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收於丘逢甲撰、周憲文編輯，《嶺雲海日樓詩鈔》，頁 387-410。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丘逢甲（撰）、周憲文（編輯）

1960　《嶺雲海日樓詩鈔》，臺灣文獻叢刊第 7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包樂史、聶德寧、吳鳳斌（校注）

2002　《公案簿》，第一輯。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南安江湖客（輯）

2018　〈新刻過番歌〉，收於刘登翰等編著，《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　福建卷》，頁 3-12。厦门：鹭江出版社。

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注）

1992　《澳門記畧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朱之瑜

1963　〈與陳遵之〉，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朱舜水文選》，臺灣文獻叢刊第 182 種，頁 79-81。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江日昇

1960　《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編）

2009　《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李純青

1946　《獻曝》。臺北：臺灣新生報社。

阮朝國史館（編）
1961　《大南實錄》，第 3 冊。東京：慶應義塾大学語学研究所；横浜：有隣堂。
周鍾瑄（修）、陳夢林（纂）
1962[1717]　《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侯繼高（編）
1995　〈附錄：近報倭警〉，收於侯繼高編，《全浙兵制　附日本風土記》，卷 2，頁 172-194。臺南：莊嚴文化。
唐贊袞
1958[1891]　《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洪惟仁
2009　〈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臺灣語文研究》（臺中）4: 33-69。
胡曉真
2006　〈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29: 47-83。
范　咸（纂輯）
1960[1747]　《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郁永河
1959[1698]　《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孫元衡
1958　《赤嵌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高拱乾（纂輯）
1960[1696]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郭衛東
2002　〈論亞嗎勒案件與澳門危機〉，《文化雜誌》（澳門）45: 43-54。
陳宗仁
2012　〈前往東、西洋：〈宇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臺灣史研究》（臺北）19(3): 1-46。
陳家煌
2005　〈論孫元衡及其《赤嵌集》〉，《漢學研究》（臺北）23(2): 289-320。
黃叔璥
1957[1736]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逢昶（撰）
1960　《臺灣生熟番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5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楊　英
1958　《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葛继勇
2015　《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6　《臺灣詩薈雜文鈔》，臺灣文獻叢刊第 2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劉良璧（纂修）

1961[1741]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劉家謀

1958　〈海音詩〉，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雜詠合刻》，臺灣文獻叢刊第 28 種，頁 1-3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毓英（纂輯）

2004　《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藍鼎元

1958[1723]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收於藍鼎元，《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 種，頁 49-5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31, No. 3, pp. 1-32, September 202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alysis of the Term “Tn̂g-lâng”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sung-jen Chen

ABSTRACT

Before the 19th century, people from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who traveled to the East Asian seas for business, farming, or mining would call themselves and be called “Tn̂g-lâng (唐人) .” This term involves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these overseas residents, and terms related to “Tn̂g-lâng,” such as “Tn̂g-suann (唐山) ” and “Tn̂g-uē (唐話) ,” were also part of the culture of this maritime community. Immigrants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to Taiwa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should have inherited the terminology of the maritime culture of “Tn̂g-lâng”. However, after Taiwan came under Qing rule in the 1680s, the Taiwanese literature used widely “Hànrén (漢人)” when referring to these Fujian and Guangdong immigrants. So whether the immigrants who came to Taiwan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were “Tn̂g-lâng” or “Hànrén” is worth explo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rminology related to “Tn̂g-lâng” using the Taiwan Literature Series Database. It concludes that during the Qing Empire’s reign, the highly repetitive and stereotypical usage of Tn̂g-lâng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gradually faded into obscurity due to its lack of practical value, although occasional examples with the meaning “in use” do appear in the literature.

Keywords: Tn̂g-lâng, Tn̂g-suann, Qing Empire, Fujian Immigrants, Overseas Chinese

《臺灣史研究》
第 31 卷第 3 期，頁 33-75
民國 113 年 9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9 世紀林圮埔竹材流通與鹿港海岸變遷的關聯*

楊朝傑**

摘　要

從 18 世紀末一直到 20 世紀初這一百多年間，中臺灣林圮埔沿山地帶的地景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原始雜木樹叢逐漸被滿山遍野的竹林所取代。林圮埔沿山這一地景變化的根本原因，其實是由於 19 世紀臺灣西部海岸的環境變遷。本文觀察中臺灣鹿港海岸地帶，發現當地自然環境變遷，一方面造成海岸浮覆沙埔地出現，使得沿海養蠣業繁盛，插竹養蠣的做法帶動對竹材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鹿港港道淤積阻塞，以竹子編排組成的竹筏在當時成為普遍使用的運輸工具。這些因素導致竹材生產與需求增大，尤其在清水及濁水兩溪的便捷水力支持之下，竹材能夠大量且快速地輸出流通，進而推動竹林產業的高度發展，最終造就林圮埔沿山地帶成為竹林優勢的地景。我們可以這麼說，竹材在林圮埔沿山地帶栽植與普及，反映了山林與海岸之間互相銜接的連動關係，這一實例可以提供我們理解清代臺灣民間經濟活動與商品流通。同時，這一連結山海的經濟活動，也顯示出漢人活動從西部平原推向沿山，由海口走向山區，成為 19 世紀臺灣重要的社會動態。

關鍵詞：濁水溪、竹筏、牡蠣養殖、山林地景、竹林產業、竹山

* 本文得以刊登，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的建議與修正意見，對本文的完整性相當有助益。同時也感謝李文良、林玉茹、吳玲青、曾品滄、鄭螢憶、曾獻緯、盧正恒等師友，在本文撰寫期間惠予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來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4 月 16 日。

一、前言
二、從竹林到竹材
三、「放排」（pàng-pâi）：竹材的水上流通
四、海岸變遷與竹材運用
五、結論

一、前言

清代林圯埔沿山地帶歷經了地景變化，[1] 並與全臺沿山產業發展歷程中的竹林產業關係密切。有關林圯埔地區山林景觀的描繪，最早可見於 18 世紀末清廷在臺灣的戰役繪圖。1788 年（乾隆 53 年）林爽文事件平息之後，乾隆皇帝將自稱的「十全武功」製為銅版刻畫，留下難得的戰役圖。[2] 在製作銅版畫之前，乾隆皇帝特別指示協辦大學士將軍福康安在臺灣聘僱畫工，繪製包括小半天、集集埔、水沙連等 8 場戰役，爾後福康安又自行命人添繪其他 8 場戰役繪圖，做成《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圖冊，供乾隆皇帝御覽。[3] 「小半天克捷圖」、「水沙連克捷圖」即是收錄圖冊中少見且重要的戰役繪圖，不僅描繪戰役當時大批官兵奮勇殺敵的情況，戰地現場的地形山勢、溪流及林相景觀也躍然紙上。其中，「小

1 本文所指清代林圯埔地區，廣義範圍包括沙連保（今南投縣竹山鎮、鹿谷鄉，以及濁水溪北岸的集集鎮、名間鄉一部分）及鯉魚頭保（今竹山鎮桶頭、瑞竹、坪頂、福興、鯉魚里及田子里一部分）。

2 有關清宮藏銅版畫《平定臺灣圖》的研究留下豐碩的成果，請參閱盧雪燕，〈鏤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銅版畫〉，《故宮文物月刊》（臺北）293（2007 年 8 月），頁 40-51；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臺北）25: 2（2007 年 12 月），頁 139-178；高宜君，〈毫芒之測：乾隆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探微〉，《故宮文物月刊》392（2015 年 11 月），頁 70-82；周維強，〈銅版汗青：欽定平定準噶爾回部戰圖之委法製作〉，《故宮文物月刊》393（2015 年 12 月），頁 4-17。

3 關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銅版畫《平定臺灣圖》的比較研究，請參閱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臺灣史研究》（臺北）28: 4（2021 年 12 月），頁 41-120。

半天克捷圖」的布局可見高插雲霄的山勢，溪水從中流瀉而出，窄狹的山徑兩旁多為樹叢雜木。[4] 另一幅「水沙連克捷圖」展現峰巒疊翠的山景，畫面左側是濱臨溪流的淺山丘陵地帶，局部山坡已有竹林出現。[5] 這兩幅戰役繪圖明顯呈現了山林地景的差異，小半天（今南投縣鹿谷鄉）的畫面為樹木叢生，未見竹林，而林圯埔一帶只在淺山得見零星的竹林蹤跡，可以說竹林在這片廣袤的林圯埔沿山地帶的占比相當有限。

林圯埔地區在 18 世紀末的地景，由上述戰役繪圖中可以得知是以樹叢雜木為主，夾雜若干竹林。留存於南投竹山連興宮廟內，[6] 1824 年（道光 4 年）的〈嚴禁勒索竹排船伕碑〉的文字描述則是：「沙連保民附山居住，生產竹木縛結成排，由清、濁兩溪儎運出售」，[7] 具體說明沙連保當地居民依山而居，經營竹林產業，並將竹材成綑的竹排，靠著清水及濁水兩溪的水力，放流到外地販售。當時沙連保共計 35 庄，[8] 大規模投入竹材生產，顯示林圯埔地區此時已是出產竹材之地。

20 世紀之初，日本人認為林圯埔的淺山丘陵地帶是全臺規模最大的竹材產地。三菱製紙株式會社調查報告中指出：「竹林最豐富是嘉義、斗六兩廳的阿里山西側，占全臺竹林面積一半以上，特別是斗六廳清水溪沿岸大密林」。[9] 閱讀這段描述後，我們彷彿可以看見林圯埔所在的濁水溪及清水溪流域山區，滿山遍野盡是竹林叢生的景象。

從上述三個時期對於林圯埔沿山地帶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從 18 世紀末一直到 20 世紀初的一百多年間，當地的地景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竹林景觀逐漸取

---

4 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頁 80。

5 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頁 68。

6 連興宮為當地跨村際的廟宇，信仰範圍清代為沙連堡，今則為南投縣竹山鎮及鹿谷鄉，相關討論請參閱莊英章，《林圯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7），頁 140-142。

7 〈嚴禁勒索竹筏錢文示禁碑〉，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頁 140-141。

8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上册，頁 151。

9 三菱製紙株式会社社史委員会編，《三菱製紙六十年史：1898-1958》（東京：三菱製紙株式会社，1962），頁 140。

代原始雜木樹叢，高度發展成為淺山丘陵地帶最主要的林相，甚至造就全臺灣最大竹材產地的誕生。具體而言，從 19 至 20 世紀之間，林圯埔竹林面積不斷擴大，全盛時期達到 1 萬餘公頃，占全臺竹林總面積的 20%至 30%，產量更為全臺第一，[10] 後來林圯埔改名為竹山也與此有關。[11]

本文試圖從竹材生產與需求增大的問題出發，追溯林圯埔沿山地景變化的根本原因。同時，在進一步探尋竹林用途時，發現 19 世紀林圯埔山林景觀變動之際，臺灣西部沿海也同樣面臨自然環境的變遷。其中，本文稱「鹿港海岸」的這片位在大肚溪以南、西螺溪（今濁水溪主流）以北的沿海地區，是清代臺灣中部最大港口鹿港及其外口番挖、王功（今彰化縣芳苑鄉）等港分布的區域，在 19 世紀也發生自然環境劇烈的變動，即濁水溪的溪水氾濫，夾帶大量砂石沖刷入海，一方面造成大規模海岸浮覆沙埔地的出現，另一方面導致港道的淤積阻塞。沿海居民在面臨環境變遷時所發展出的因應辦法與生業型態，開展出竹林產業與沿海地方的連結。換言之，究竟臺灣西部沿海的自然環境變遷，如何促進林圯埔地區竹林產業的形成與擴張？竹林產業的發展又如何影響山林景觀？為本文亟欲探討的問題。

本文透過對鹿港海岸的自然環境變遷與竹材運用的觀察，企圖論證林圯埔山林與鹿港海岸之間互相銜接的連動關係，並闡述林圯埔竹材由山林通往鹿港沿海的具體歷史過程。因此，文獻回顧將以林圯埔竹林產業研究及鹿港港口商品交易兩方面來討論。

首先，林圯埔竹林產業的相關研究主要從探討沿山土地開墾歷史，說明林圯埔的山坡地形有利於竹林產業的發展。張永楨及黃素真運用民間留存的清代契約文書，指出林圯埔沿山地帶山多田少的地理環境，雖然不利於稻作農耕，但山坡地卻適合發展竹林產業。[12] 由此可見自然條件對於竹林產業發展具有關鍵影響。

---

10 曾獻緯，〈日治時期竹山地區的竹林產業發展〉，《暨南史學》（南投）13（2010 年 7 月），頁 110。

11 安倍明義編，《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頁 206；新道満編，《ロ-マ字發音臺灣市街庄名の讀み方》（東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38），頁 79。

12 張永楨，〈清代竹山、鹿谷地區的農作經營：以古文書和文獻互相印證〉，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等編校，《第四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2010），頁 39-76；黃素真，〈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屺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2009）。

此外，曾獻緯聚焦於竹林產業在殖民政府與地方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透過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資料，說明國家權力試圖改造林圯埔地區傳統的竹林產業，促使該產業邁向高峰，躍升成為國際貿易的商品，持續帶動林圯埔日治時期竹林產業的繁盛，反映政府政策在竹林產業發展上的角色。[13] 藉由上述研究可知，林圯埔淺山丘陵地帶的地理條件，最適合發展竹林產業。雖然林圯埔竹林產業進入日治時期一度發展外銷，但這一區域產業本質仍與清代一樣，是以供給臺灣島內市場需求為目標。

竹林產業得以蓬勃發展成為林圯埔的區域產業，關鍵就是竹材在臺灣島內早就具有商品價值。關於臺灣農產商品化的討論，凃照彥與林滿紅認為臺灣與中國大陸頻繁的貿易關係，推動島外貿易市場的擴張，帶動了臺灣農業高度商品化的現象。[14] 事實上，竹林產業早在日治時期推動外銷以前就已具備商品價值，並與島內市場需求關係密切。換言之，臺灣島內市場的形成也是造就區域產業商品化的重要因素。[15] 本文探討林圯埔竹材銷往鹿港流通的歷史，即是為了釐清中臺灣鹿港海岸地帶竹材市場的發展，如何帶動林圯埔沿山竹材商品化，從而造就竹材產銷成為林圯埔最主要的區域產業。

其次，有關鹿港港口商品交易的研究，林玉茹累積豐碩的成果。她指出乾隆末年朝廷因應臺灣北、中部的開發，以及將中臺灣米穀配運至對岸的需要，陸續開設鹿港與福建泉州蚶江、八里坌與福州五虎門對渡，自此臺灣也從鹿耳門出入的單口對渡政策，轉為三個正口對渡的格局。其中，1784 年（乾隆 49 年）鹿港設立正口之後，逐漸發展成一個以該港為核心的區域型經濟區。其範圍北自大甲

13 曾獻緯，〈日治時期竹山地區的竹林產業發展〉，頁 107-158。

14 凃照彥認為：「通過與對岸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導致農產品市場不斷擴大，商人及高利貸資本的侵入，從而顯現商品經濟關係的擴大。」請參閱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1），頁 20-25。林滿紅亦持相同觀點，參閱林満红，〈贸易与清末台湾的经济社会变迁〉，收於吴松弟主編，《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頁 138-157。

15 曾品滄以臺灣西南沿海的養殖魚業為例，強調 19 世紀以來，西南沿海的魚塭養殖雖是以滿足島內消費市場為目標的地方型產業，但它卻因臺灣府城市場的消費需求，使得養殖活動朝向商品化發展，又因為魚塭經營具成本高、風險大的產業特性，從而導向資本化與專業化的趨勢，最終發展成為臺灣西部沿海重要的產業。此一研究視野，提醒我們重新思考清代臺灣島內的市場需求因素對於竹林產業發展的影響。請參閱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19: 4（2012 年 12 月），頁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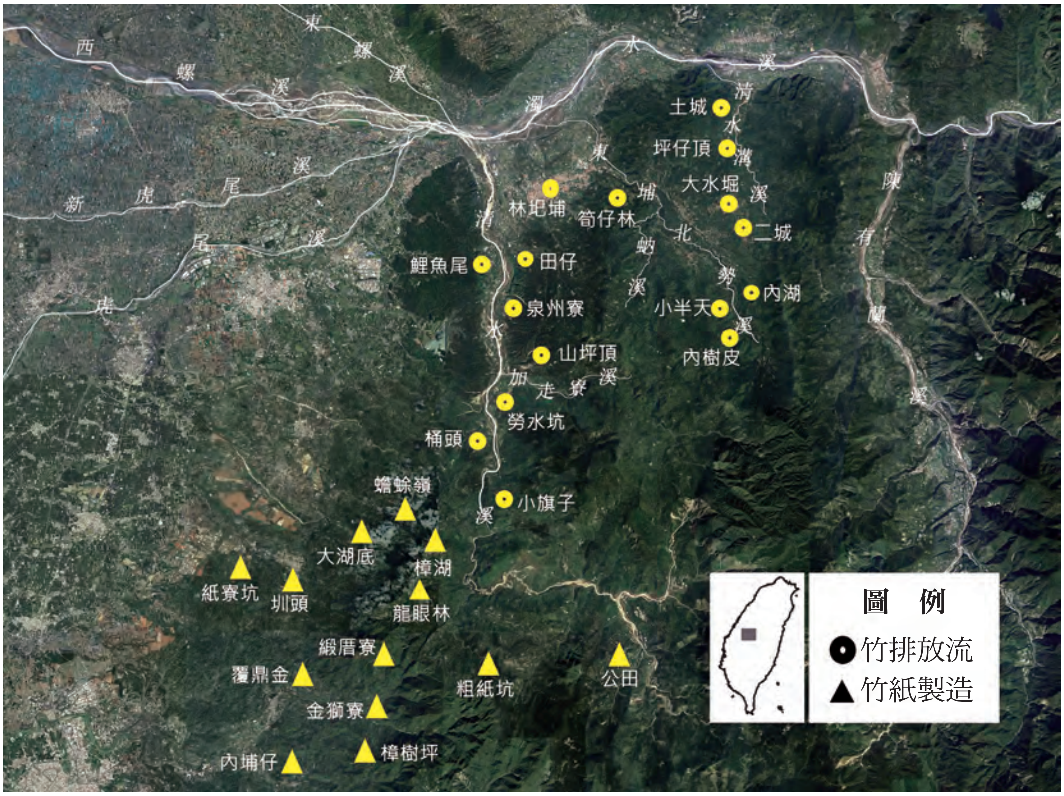

圖 1　從事竹排放流及竹紙製造主要聚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依據黃素真，〈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屺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頁 284-299；張毓哲，〈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的竹紙產業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頁 34-36。由筆者改繪自 Google Earth。

溪，南至八掌溪，其下包括三林港、海豐港、笨港及水裡港（即梧棲港）等三個次級經濟區。上述沿海港街基本透過陸路聯繫內陸重要街市，得以將經濟區內的產物輸往對岸福建，從而勾勒福建與鹿港區域型經濟區兩地間港口貿易的網絡。[16] 但相對於鹿港與對岸貿易清晰的網絡圖像，鹿港腹地與內陸街市的物流網絡卻顯得模糊。究竟林圯埔竹材如何從沿山地帶流通至鹿港海岸，又港埠海岸地帶的市場需求如何影響沿山產業的發展，是值得釐清的課題。

[16] 林玉茹，〈清中叶台湾三大区域型经济区的成立（1784-1850）〉，《东北史地》（長春）2015: 1（2015 年 1 月），頁 58-69；林玉茹，〈第三篇　近代台湾经济地理（清统治时期）〉，收於吴松弟主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六卷）闽台近代经济地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頁 339-345。

由上述討論可知，林圮埔沿山或鹿港海岸地帶的經濟活動的研究，皆累積一定成果，但相較於沿山或沿海各別的深刻研究，其實我們較少留意山海之間的連結關係，而侷限了我們對於區域經濟活動的理解。因此，本文探討林圮埔竹林地景的生成原因與鹿港海岸自然環境變遷的關聯，就要釐清山林與海岸兩地如何產生連動，也就是透過什麼機制產生何種連結。

總之，本文從林圮埔的地景變遷，討論 19 世紀當地竹林產業的發展過程，釐清 20 世紀全臺最大規模竹林產地的生成原因，也就是市場需求的因素如何造就林圮埔地區竹林產業的高度發展。首先探討 19 世紀竹材如何發展成為山林經濟的代表商品，其次討論竹材的水上流通，後續再從彰化平原及海岸地帶的自然環境變遷角度切入，探討竹林產業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關聯，期待從商品流通的角度分析 19 世紀彰化平原沿山與濱海地區的互動關係，以作為清代臺灣民間交易與商品流通的研究基礎，並有助於理解中臺灣歷史的發展動向與區域特色的掌握。

二、從竹林到竹材

林圮埔地區成為臺灣西部主要的竹材產地，與當地的自然環境關係密切。首先，竹子適合生長在少風且乾濕度適中的山谷或平原。林圮埔地區正好位在濁水溪中游東南側的淺山丘陵地帶，每年春夏之際，水氣在西海岸的海風吹拂之下，受到當地地形阻隔而容易降下地形雨，多雨且溫濕的特性，成為竹類植物有利生長的環境。[17] 其次，林圮埔地區山多平地少、河階切割分散的地理環境，侷限稻作農業發展，但卻適合竹類栽種。這一產業特色亦具體反映在〈清水溝地方出產誌略〉中：「細查清水溝一帶之竹一年計共換賣金約有數千之多，所以此處人民雖在山間，少有田園，其所收之金亦與平洋田園多少無異」，[18] 可見林圮埔淺山丘陵地帶雖不利稻作農耕，但竹林經營活動的收益卻不亞於米穀經濟，成為最適合當地的土地利用方式。

---

[17] 王子定、郭寶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竹林與竹材》（臺北：臺灣銀行，臺灣研究叢刊第 14 種，1951），頁 13；陳哲三總編纂，《竹山鎮志》（南投：竹山鎮公所，2002），頁 754。

[18] 〈清水溝地方出產誌略〉，收於不著撰者，《集集堡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無頁碼。

（一）竹林栽種歷史

林圯埔的淺山丘陵地帶是清代臺灣中部竹材重要的產地。1894 年（光緒 20 年）雲林縣訓導倪贊元纂輯的《雲林縣采訪冊》中，對於沙連保境山區產竹之事多有描述，諸如小半天山「山上民居不一，有邨曰中湖、曰內湖，煙火將及百家。所產貓兒筍、麻竹筍，為居民之利」；鳳凰山「所產大竹，可以編筏、蓋屋、製紙；筍則製以為脯，民賴其利」；大人崠山「筀竹成林，沿山多置紙寮」；大順嶺「嶺上下竹林、樹木布滿巖隈」。[19] 透過上述引文，我們可以想見 19 世紀末林圯埔的淺山丘陵地帶，滿山遍野盡是竹林密布的景象，山間居民靠著販售竹子、採擷竹筍、製造筍乾、竹紙等竹林產業維生。這樣的產業景象及山林地景其實迥異於 18 世紀。誠如前言所述，在林爽文事件戰役繪圖中所呈現的小半天山景地貌，不見竹林密布，與 19 世紀方志描述小半天當地「所產貓兒筍、麻竹筍，為居民之利」的情景不同，顯然地景經歷了一番變化，值得進一步討論。

19 世紀末小半天當地成為竹林廣布的山景，究竟林圯埔地區的竹林是自然生成？抑或是人為刻意栽植？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竹內叔雄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我們觀察的依據。他的研究指出，林圯埔一帶的麻竹是 1756 年（乾隆 21 年）由業戶許廷瑄的佃人劉玉麟，從中國移植後栽植在筍子林（今南投縣竹山鎮延山里）的小半天溪（今北勢溪）沿岸，後來陸續被移植到內樹皮、內湖、大水堀、坪仔頂等地（以上皆為今鹿谷鄉）；鳳凰山麓一帶的麻竹則是由林圯埔的陳進秀栽植。[20] 此外，當地的桂竹亦由劉玉麟由中國移植，差不多也在 1756 年左右。至於當地孟宗竹的來源，據說最早由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移民將竹苗栽種於小半天，隨著竹子長成後，才分別被移種到鹿谷、內樹皮、大水堀、車輄寮（以上皆為今鹿谷鄉境）等地。[21] 雖然無從得知竹內叔雄說法的來源，但可以瞭解的是，林圯埔地區在乾隆初年曾出現一波拓墾的熱潮，[22] 並與竹子成為當地

19　倪贊元纂輯、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雲林縣采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1），頁 220-222。

20　傳言劉玉麟所有麻竹林的竹子數目要比平地某糖廍的甘蔗數量還多，當時的面積據說有「九湖十三崙」，至於「九湖十三崙」的確切地點，不得而知。林長金，〈社子國営造林地に於ける麻竹の造林並栽培経営法に就て〉，《旗山の林業》（高雄）6（1937 年 12 月），頁 41。

21　藤森狂花，〈竹山の竹の由來〉，《臺法月報》（臺北）27: 12（1929 年 12 月），頁 111。

22　當地在乾隆年間出現大規模漢人入墾，這些移民多來自福建漳州南靖、漳浦，請參閱黃素真，〈業户

代表性物產有一定關聯。也就是說，林圮埔地區竹林產業發展的歷史，其實反映的是漢人移民改造林圮埔沿山地區原始山林地貌的歷程。

漢人在林圮埔地區從事較具規模的農業拓墾，大約是在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根據相關研究指出，林圮埔地區原屬阿里山番（今北鄒與布農卓社番）與水沙連番（今邵族）的生活領域。18 世紀中葉，由於臺灣西部平原人口壓力增加，迫使漢人遷往淺山丘陵地帶，而林圮埔地區大規模的拓墾也在此時發生。這些漢人勢力透過武力及非武力的形式進行開墾，前者有軍工匠、隘番的隘墾；後者為通事、勢豪以「番食租」交換土地。基本上，嘉慶年間林圮埔當地的土地拓墾已經達到飽和，但由於利益及生計考量，漢人拓墾活動只能再往東邊的內山推進，不斷越界私墾。[23] 上述研究成果與林圮埔地區漢人移民發展竹林產業的歷史吻合。

那麼，漢人為何大規模種植竹林，改造林圮埔沿山自然地景？此舉措恐怕與竹林成為交易商品，也就是竹林的商品化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在林圮埔地區不僅存在買賣田園的土地交易，其實還有竹林買賣的類型，翔實地呈現在契約紀錄上。〈乾隆 59 年黃柵立永賣盡根契〉是目前最早關於林圮埔地區竹林買賣的契約文書。[24] 根據契文所示，黃柵所要出售的是位在泉州寮後崁腳（今竹山鎮福興里）「自己栽種有簕竹林壹所」，這份契約並未明確記載面積，只標示四周界址為「東至崁，南至路，西至園，北至林家竹林」，顯示除黃柵家以外，北邊接臨的林家亦擁有竹林。此外，契約內容也僅指該片竹林「苞數不計」。[25] 在文書中黃柵特別強調「其銀即日同中交收足訖，其簕竹林隨即踏明界址付銀主前去掌管，永遠為業，任從砍伐變賣，不敢阻擋」，直接顯示竹林在當時已是可以銀貨兩訖的買賣商品。這意味著，18 世紀末以來林圮埔地區的竹林逐漸脫離自然原始林相而成為交易標的，甚至可以透過人為栽植持續產出竹材，成為當地山林經濟活動中重要的交易項目。[26]

許廷瑄與林圮埔大坪頂地區的拓墾發展〉，《臺灣文獻》（南投）56: 4（2005 年 12 月），頁 23-89。

23 有關林圮埔地區拓墾過程及族群關係的討論，請參閱莊英章，《林圮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頁 26-41；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18: 1（2011 年 3 月），頁 41-102；洪麗完，〈清代臺灣邊區社會秩序之考察：以濁水溪、烏溪中游之「亢五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0: 4（2013 年 12 月），頁 1-50。

24 引自林漢梁編著，《竹山林業史誌》（南投：頂林林業生產合作社，2000），頁 30。

25 「苞」就是竹林的量詞，有時也作「抱」（phō）。

26 在林圮埔地區現存的文獻中，留下不少關於竹林買賣的契約，具體說明此事。除了最早訂立於乾隆

表 1　1874 年（同治 13 年）二城陳文梓等五房第一次鬮產

鬮分次序	鬮產內容
一鬮文通	紅兄田下茶園至龍仔尾一所；二突仔猫兒竹林；頂城祖師公會一陣
二鬮文軒	大岸頂茶園二埒；二突貓兒、茶園一所；石城祖師公會一陣
三鬮文梓	西坪茶欉至柏仔一所；溪坪猫兒、桂竹、蔴竹一所；二城福德會一陣
四鬮阿亨	大路頂茶園至柏仔一所；二突猫兒竹、橫屏頭猫兒竹一所；二城福德會一陣
五鬮文福	大碑寮后西坪茶園一所；二突大片猫兒竹一所；頂城祖師公會一陣
長孫	大碑寮后西坪茶園一所，待雙親百歲以後交付長孫掌管
其他	餘公數借項與牛隻 10 隻交付雙親掌管

資料來源：引自黃素真，〈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頁 163。

隨著竹林產業邁向商品化後，林圮埔地區也普遍投入竹材的種植與生產，並成為當地家族重要的產業。根據表 1 整理自 1874 年二城（今鹿谷鄉鳳凰村）陳家五房兄弟分產的鬮書可見，茶園與竹林為各房子孫主要取得的產業項目，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可供稻作農業生產的地目。事實上，鹿谷當地因山嶺深谷遍布，除了少數且面積不大的河階面可供糧食生產外，大多數的坡地等邊際土地被漢人利用來種植茶樹、竹林等經濟作物。[27]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想像，19 世紀林圮埔沿山地帶普遍出現的地景就是竹林及茶園。值得注意的是，陳家的分產鬮書中並非以「竹林」作為籠統的紀錄，而是將竹林至少細分為猫兒竹林、桂竹林、蔴竹林這幾種竹類，顯示當時人們認為不同竹類的用途有別，經濟價值亦有所差異，於是在書寫契約時會特別強調竹類差異。

20 世紀初期，林圮埔的淺山丘陵地帶無疑是全臺規模最大的竹材產地。1908 年（明治 41 年）2 月，三菱製紙株式會社經理植田豐橘與技士佐久間隆來臺從事一個多月的竹林調查，在臺灣總督府給出的概算資料中，指出全島竹林總面積超過 14,880 甲，在這之中竹林最豐富是嘉義、斗六兩廳的阿里山山脈西側地帶，占了全臺竹林面積的一半以上，特別是林圮埔在內的清水溪沿岸，面積約有 6,370 甲。[28]

59 年的契約之外，多為嘉慶朝以後的文書，顯示 19 世紀以來竹林已成為當地重要的買賣標的，請參閱林漢梁編著，《竹山林業史誌》，頁 70-93。此外，張永楨亦透過古文書討論清代竹山、鹿谷的竹林種植情形，請參閱張永楨，〈清代竹山、鹿谷地區的農作經營：以古文書和文獻互相印證〉，頁 39-73。

27　黃素真，〈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臺灣文獻》62: 2（2011 年 6 月），頁 145-179。

28　三菱製紙株式会社社史委員会編，《三菱製紙六十年史：1898-1958》，頁 140。

1913 年（大正 2 年）臺灣總督府的調查資料更具體顯示，林圯埔沿山地帶的竹林面積計有 6,911.45 甲。[29] 當地仰賴販竹維生者有六百餘戶、五千多人，此外阿里山脈西側地帶，從事製造竹紙、乾筍為業的家戶，計有一千戶、七千人。[30] 從清代至日治以來，林圯埔當地竹林產業持續且高度發展，讓我們對於此地中低海拔山區竹林遍布留下深刻印象，彷彿認為竹林是此地自然生長而不假人工的天然產物。

（二）竹材的商品用途

基本上，林圯埔地區高度發展的竹林產業，可以分成二大類：一為竹材的販售，一為製造竹紙及筍乾。首先在竹材的販售方面，依據《雲林縣采訪冊》的記載：「大人崠山：筀竹成林，樟樹茂盛。沿山多置紙寮、腦灶，以為製紙、熬腦丁役住宿之所。鳳凰山：所產大竹，可以編筏、蓋屋、製紙；笋則製以為脯，民賴其利。小半天山：所產貓兒笋、蔴竹笋，為居民之利」。[31] 該引文中筀竹即桂竹，因為具纖維細、韌性好的特點，多被用來作為造紙的原料，亦被用來製作傢俱。《彰化縣志》記載：「筀竹，有大小二種，大者茅屋取以為桷，小者用以編籬，產於水沙連」。[32] 所以桂竹也被利用在屋樑上作為承受茅草的建材，或作為籬笆柵欄使用。至於所謂的「大竹」則是蔴竹的別稱，因其高大且直徑較粗而得名。《彰化縣志》的描述，將大竹竹稈粗大的特徵具體展現：「大竹，產內山，皮薄而腹大，空一節可作水桶一擔」。[33] 臺灣民間一般依據不同生長年份的蔴竹，而有不同用途。清末鹿谷出生的秀才黃錫三所撰〈蔴竹紀畧〉中就有以下的敘述：

> 沙連東南諸山，產蔴竹，節直幹，茂密成林，長數尋，圍大二三尺，亦名大竹。一二年者質輕，宜編筏。三四年者，幹老質堅，宜棟樑。歲出萬本，資南部沿海漁筏。隆冬伐為棟樑，不蛀；架屋，可支三十年。[34]

---

[29]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5676001。

[30] 〈三菱と竹林事件〉，收於泉風浪，《臺灣の民族運動》（臺中：臺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1928），頁 204-205。

[31] 倪贊元纂輯、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雲林縣采訪册》，頁 147-149。

[32]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下册，頁 476。

[33]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下册，頁 476。

[34] 黃允哲主編，《鹿谷黃錫三秀才文集》（南投：南投縣彬彬社文化發展協會，2019），頁 77。

由引文可見蔴竹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不僅廣泛被運用在房屋建材上，同時也大量被用來製造臺灣沿海漁業活動的竹筏。特別是西南沿海地區，如 1905 年（明治 38 年）《臺灣日日新報》所記載：「臺南之竹筏最有名者，為水沙連竹之竹筏。……然以水沙連之竹製之，較對岸之竹筏，其利濟沿岸往來行旅，尤為過之無不及也」。[35] 事實上，運用水沙連所產大竹製筏的不只盛行於臺灣西南沿海，西部濱海漁村亦多可見。文人連雅堂在其編寫的《臺灣通史》提到：「水沙連之竹，徑大至尺餘，縛以為筏，可渡大洋，凌濤不沒，故沿海捕漁皆用之」。[36] 此外，方志中還有記載一種產於水沙連的空涵竹，因其「腹空而大，各邑漁人取以駕筏」。[37] 這些紀錄都強調林圮埔地區出產的竹材中，有一種是直徑較其他竹類寬大的，特別適合用於製造近海漁業使用的竹筏，受到西部沿海的漁民親睞，因而成為林圮埔竹材輸出品的代表。

竹材由林圮埔輸出後，民間多依據竹材種類的特性，將其製成各類用品。舉例而言，像是猫兒竹，也就是孟宗竹，主要被利用於下列層面：第一是建築，如竹壁、竹門、屋頂、籬笆等；第二是家具，如竹床、竹桌、竹椅等；第三作為農具，像是整地或耕耘用的竹耙、刈耙，灌溉用的竹製水車、水管；第四是用於包裝農產品的籠，如米籠、番薯籠、土豆籠、菜籠等。[38] 這些猫兒竹的竹製品，可以說橫跨日常生活到農業生產，具體展現竹製品對於臺灣社會生活的影響。其實，各類竹製品還不單純只有上述用途，可以說臺灣日常生活各個層面皆可見其蹤

35 〈臺南之竹筏〉，《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10 日，第 4 版。在 1905 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報告中就有指出，林圮埔等地出產的竹材是製作竹筏最好的來源。此外，日本民俗學者國分直一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針對南臺灣的竹筏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也特別指出林圮埔地區的竹材，自古聞名，是製作近海漁業用的竹筏最佳的材料。請參閱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臺北：該會，1905），下卷，頁 328；〈南台湾の竹筏〉，收於國分直一，《台湾の民俗》（東京：岩崎美術社，1968），頁 286。

36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128 種，1962；1921 年原刊），頁 645。林圮埔地區的竹材直到日治初期仍為西部沿海製造竹筏的取料來源，沿海商人甚至前赴林圮埔山區購回販售，請參閱〈編筏〉，《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2 月 9 日，第 4 版；〈林圮產業〉，《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22 日，第 3 版。

37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下册，頁 476。

38 臺灣民間使用竹材製作的農具種類頗多，請參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臺灣之農具》（臺北：該局，1921）。另外，關於竹材的運用在日常生活層面的討論，可參閱王子定、郭寶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竹林與竹材》，頁 100-102。

影，從而造就竹材具重要的商品價值。[39] 換言之，竹材之所以富有商品價值，是因為竹材可以透過加工，製成多樣化的生活用具及生產工具，提供不同層面的市場需求。

其次是竹紙及筍乾生產。清代臺灣的紙製品主要從福建進口，但臺灣本地亦有發展造紙產業，惟規模不大。清代臺灣造紙主要取材自富含大量纖維的竹子，其中林圯埔地區即是竹紙產地之一。關於臺灣製造竹紙的紀錄，最早可見於翰林院庶吉士陳壽祺所纂輯《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中所記：「沙連紙，以沙連之竹製之」。[40] 「沙連紙」指的應該是以沙連保所產竹材製成的紙。誠如前述，清代林圯埔淺山丘陵地帶是竹林所在，生產桂竹、蔴竹、貓兒竹等竹材。這些竹材因為尺寸長且質量重的特性，不易透過陸路搬運，於是在林圯埔地區產竹的沿山村落，便發展出將竹材加工製造成竹紙的產業。一般而言，這些村落以桂竹、蔴竹加工製成粗紙，再依照質地及厚薄至少區分為九種等級，其中質地最佳的是名為「白皮」的精製紙，專門用於書寫及包裝質量輕巧的物品，次之則用作藥材、糕餅等的包裝紙，較差的則作為祭祀使用的金銀紙錢。[41] 笨重的竹材在產地加工之後，做成較輕的竹紙，確實有利於商品的流通。當地居民通常會將竹紙挑運到林圯埔街的紙行販售，再由紙行發售到濁水溪下游的北斗街等中大型市街。[42]

竹筍作為竹子的副產品，亦是竹林產業具經濟價值的重要組成元素。清代林圯埔沿山地區出產筍乾，是當地重要的物產代表，多採人工挑運至鹿港販售。[43] 1911 年（明治 44 年）林圯埔支廳的調查顯示，其轄區筍子的產額每年約有 126 萬斤，以蔴竹筍的產量最高，約為孟宗筍（猫兒竹筍）產量的兩倍。蔴竹筍主要以筍乾的形態銷售，地方居民會在蔴竹林搭設筍寮，並利用燒炭的窯來加工筍乾。筍乾在林圯埔當地的市場價格約為每百斤 15 円左右，主要銷往鹿港，再外銷到

---

[39] 在清代到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不僅漢人生活仰賴竹材，原住民亦是如此，相關討論請參閱永山規矩雄，〈臺灣に於ける竹材利用の概要〉，《臺灣の山林》（臺北）81（1932 年 12 月），頁 59-79；王子定、郭寶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竹林與竹材》，頁 97-108。

[40] 陳壽祺總纂、洪燕梅點校，《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上册，頁 322。

[41]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本島製紙業調查書》（臺北：該局，1909），頁 1-2。

[42]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本島製紙業調查書》，頁 70。

[43] 不著撰者，〈鹿港風俗一斑〉（1896，未刊本），無頁碼。

中國，一部分則運往彰化及臺南等地區供給內銷。[44] 例如鹿港謙和號許志湖家族在乙未戰役時暫避福建泉州期間，就曾在書信中要求住在臺灣的家人寄送筍乾到泉州。[45] 至於孟宗筍因產出最早且風味佳而市場需求大，其中以每年 10 月至翌年 1 月出產的「冬筍」價格最好，每百斤約 5、6 円，甚至 7、8 円，有時還可以達到 13、14 円的高價。[46]

整體而言，竹材因具備多元用途及售價低廉的特性，被廣泛運於生活各個層面，是臺灣庶民日常普遍且重要的用材。其中，林圯埔沿山地帶作為臺灣重要的竹林產地，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之下，當地逐步發展出竹材販售、竹紙製造等竹林產業，成為 19 世紀以來臺灣中部山林經濟的具體展現。

三、「放排」（pàng-pâi）：竹材的水上流通

林圯埔沿山地帶是重要的竹林產地，當地發展出竹材主要的兩種銷售方式：一是竹排放流，一是竹紙製造，尤其以竹排放流最為大宗。

首先，在竹排放流方面，主要仰賴於流經林圯埔沿山地區的濁水溪及清水溪水運。濁水溪具有水力運輸的價值，最遲在 18 世紀就已經被開發利用。今日南投縣名間鄉濁水村存世的 1765 年（乾隆 30 年）〈嚴禁軍工料件阻滯圳道碑記〉，其文字記載水沙連大坪頂（今南投縣鹿谷鄉）[47] 所產的樟木是供給官府造船的軍工料來源，但由於通土、埤甲顧忌木料放流施厝圳（也稱八保圳）容易導致圳道損壞，而出面阻擋，最後由臺灣道蔣允焄立碑示禁，並要求「凡運放軍工料件，務須照舊從大溪放運，……照舊由溪放運，直運海口」。[48] 此處所言「大溪」即

---

44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45 林玉茹、劉序楓編，《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1895-18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頁 54。

46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47 「大坪頂」為今南投縣鹿谷鎮的舊稱。清代漢人墾拓「大坪頂」地區，先後成立初鄉、坪仔頂、新寮街、車輗寮、羌仔寮、小半天、內樹皮等村莊，俗稱「大坪頂七庄」，請參閱黃素真，〈業户許廷瑄與林圯埔大坪頂地區的拓墾發展〉，頁 26-28。

48 〈嚴禁軍工料件阻滯圳道碑記〉，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

指濁水溪。濁水溪發源自合歡山佐久間鞍部 3,200 公尺的高山，是全臺灣最長且流域面積最廣的河流，其範圍涵蓋今彰化、雲林、南投三縣。[49] 濁水溪由群山之中流出，至八卦臺地與觸口山臺地交會處，開始進入濁水溪沖積扇平原，自此分成五條放射狀的溪流，由北而南依序為東螺溪（舊濁水溪，下游為麥嶼厝溪）、西螺溪、新虎尾溪、舊虎尾溪及虎尾溪（下游為北港溪）。[50] 濁水溪以廣闊的沖積扇平原為腹地，特別是隨著 18 世紀流域周緣聚落的成立，其在重山峻嶺與平原間作為主要物資流通與交通運輸通道的重要意義進一步顯露出來，對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產生了深刻影響。

除了水師修造船隻用的軍工料限制由濁水溪放流之外，清代林圮埔的竹材流通也受到官府的規範。嘉慶年間發生海盜蔡牽事件（1795-1810），官府為了防止臺灣本地所產竹材遭到海盜奪取而製成船筏器具，於是明令管控竹竿在沿海地區的流通。在〈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中記載：「臺產竹竿，向因洋面不靖，恐大竹篷筏有關濟匪禁出口，以致民間竹竿經過口岸均需稽查」。[51] 官府雖然對竹材實施管控，卻未禁止民間流通。而林圮埔竹材輸出頻繁的結果，被負責海口稽查工作的汛兵及書役視為有利可圖，遂對竹販進行勒索。1816 年（嘉慶 21 年）3 月，彰化縣民劉東山從水沙連沿虎尾溪放運竹材至笨港地方汛口通驗時，遭受汛兵勒索，「逆抽為規例，每枝竹勒索銅錢弍拾叁文」。而且汛兵勒索竹販之事陸續發生，受到臺灣鎮總兵武隆阿的重視，遂於今嘉義東石港口宮立碑示禁。[52] 由此可知，至遲在 19 世紀初葉，林圮埔沿山地帶的竹材已利用溪流的水力輸運沿海販售。

清代林圮埔的竹材得以大規模的運出，完全仰賴濁水溪及清水溪的水力資源支持，從而發展出竹排放流的專業化產業，並在官府政策的調整下持續發展。今日竹山、鹿谷地區最重要的媽祖信仰中心連興宮，廟內豎立著 1824 年〈嚴禁勒

頁 201-202。

49 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新北：衛城出版社，2014），頁 28。

50 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3），中册，頁 832。

51 〈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收於沈葆楨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臺灣奏摺》（文叢第 29 種，1959），頁 13。

52 〈汛口陋規示禁碑記〉，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頁 34-35。

索竹排船伕碑〉記載：「沙連保民附山居住，生產竹木縛結成排，由清、濁兩溪儎運出售」，[53] 具體說明沙連保產出竹材，當地居民通常會將一定數量的竹材綑綁成竹排，再將竹排透過清水及濁水兩溪的水力，運送到外地販售。而牡丹社事件之後，官府施行「開山撫番」政策撤除番界禁令，更加擴大竹材的伐採範圍。1875 年（光緒元年）〈私入番境撤禁告示碑〉中即載：「臺地所產大小竹竿以及打造農器等項生熟鐵斤，均聽民間販運。……如所轄文武汛口員弁、兵役及通事、匠首人等仍有藉端扣留勒索情事，官則撤參，兵役、通事、匠首即立提究辦，決不姑寬」。[54] 由於番界管制的鬆綁，一方面取消了軍工匠首獨佔山林資源的特權，促使民間的竹林產業經營得以擴展；另一方面，竹排放流至海口也無須再受到官兵稽查，物流更加通暢。這一趨勢使得林圯埔沿山的竹林產業持續興盛，誠如前述，該地在清末已經發展成為臺灣中部最主要的竹材產地。

清代林圯埔地區產出的竹材仰賴濁水溪及清水溪的水力進行輸出，這一水上流通的型態，福佬話稱「放排」（pàng-pâi），也稱「放竹仔」（pàng-tek-á）或「放竹排」（pàng-tek-pâi）。一般而言，當地竹農會先衡量溪水水量多寡，再將長短、大小一致的竹材綜橫連結成竹排，通常採 5 束乃至 7 束，然後將竹排像火車車廂般頭尾連結，做成 10 連結乃至 15 連結，以一人能操作的程度作為竹排組合的原則，進行竹材流通。[55] 日本建築學者青井哲人的研究指出，濁水溪、曾文溪、二仁溪這三條溪流，[56] 曾經是臺灣西部平原「放竹仔」的重要場域，並在河流下游地帶形成專門的竹材市場，是沿海漁村房屋建材、竹筏及蚵棚等取材的主要來源，而在此三條溪流「放竹仔」的經濟活動，最遲於 1960 年代左右就不再進行。[57]

林圯埔沿山地區以水力輸運竹材的方式，主要集中在清水溪及清水溝溪流域，[58]

---

53 〈嚴禁勒索竹筏錢文示禁碑〉，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140-141。

54 〈私入番境撤禁告示碑〉，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文叢第 151 種，1962），頁 114。

55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56 關於「放竹仔」的經濟活動應不只存在此三條溪流，筆者田野的過程中，亦曾聽聞大甲溪及八掌溪曾有「放竹仔」，惟未見相關研究，仍待日後進一步探討。

57 青井哲人著，張亭菲、楊朝傑譯，〈以竹為特色的市鎮：臺灣濁水溪流域的內陸河港市鎮群與竹造街屋的歷史意義〉，《建築學報》（臺北）104（2018 年 6 月），頁 117。

58 清水溝溪又稱南清水溪，是濁水溪的小支流，全長 17.55 公里，主要流經今南投縣鹿谷鄉瑞田村、清

尤其以清水溝溪的蔴竹林、小半天（今鹿谷鄉境）的孟宗竹及勞水坑（今竹山鎮境）的桂竹為大宗。[59] 竹農一般在砍伐竹林之後，會僱用大量人力將竹材拖運到河床附近集中堆放，接著依據長短粗細連結成竹排，最終由人工操縱運輸至平原及海口販售。當地也因為人力頻繁拖運竹材，而留下「拖竹路」的地名，[60] 甚至今日清水溪畔的泉州寮（今竹山鎮福興里）聚落通往河床的石造階梯上，仍留存因長期拖運竹材所刮鑿的遺痕，都具體印證竹材仰賴水上運輸的歷史。

竹材由林圮埔山區往沿海輸運的過程，實為高風險的產業活動。一般而言，排夫因為長時間以立姿操控竹排，相當耗費體力，而且需要熟悉濁水溪水路及深諳水性，通常由清、濁水溪沿岸的男性居民擔任。放排的過程中，排夫也要留意河道走勢，若不慎撞上溪灘或石頭即會招致「敗排」（pāi- pâi）的危險，頃刻竹材因衝撞而飛散，排夫要機警跳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人力操控放流竹材的風險本就不小。[61]

此外，勒索事件頻發亦是竹材放流的風險之一。19 世紀中葉，濁水溪中、下游地帶，因為竹販遭遇勒索事件接連發生，於是官府在處置之後陸續於林圮埔街及西螺街設立示禁碑。首先是 1824 年由彰化知縣李振青所頒的〈嚴禁勒索竹排船伕碑〉，立石在林圮埔的連興宮三川殿。碑文大意是林圮埔沿山居民以清、濁水溪販運竹材至西部沿海銷售獲利。濁水溪南岸溪洲（今雲林縣林內、莿桐鄉）是竹排放流必經之地，當地張姓居民仗勢欺人，凡是竹排經林內觸口來到溪洲一帶時，他們便會趨前向排夫勒索錢文，造成「排夫劉承行、莊先進、黃克明等被索不甘，紛紛呈稟，彼此挾有嫌隙」。1823 年（道光 3 年）7 月，劉承行僱請張受與等人協助押運竹排，以防不虞，卻被斗六門汛守備誤以為是勒索罪犯而被捉拿。後來在沙連保總理林永等人出面協商之下，議定以每一竹排抽收貳百文錢，作為沙連林圮埔天后宮（今竹山鎮連興宮）及溪洲元帥廟（今莿桐鄉仁和宮謝府

水村、秀峰村、永隆村、鳳凰村。林文燦總編纂，《鹿谷鄉志》（南投：鹿谷鄉公所，2009），頁 174。

59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60 〈道光 22 年劉清發立認墾界字〉，《林泗達等拂下竹林糾紛》，「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藏），檔號：0039/316.1/.1/01/0001/012。

61 〈清水溪竹排放流〉，收於塗有忠主編，《下崁采風錄》（南投：南投縣竹山鎮中和國民小學，1997），頁 238-241。

元帥廟）的香燈諸費。[62] 其次是立於 1827 年（道光 7 年）由彰化知縣李廷璧所立〈嚴禁破埤害課碑記〉。碑文記載西螺保業戶聯名向彰化知縣申訴，供稱豪強張姓在濁水溪溪頭等處截索排費，「只要筏夫多錢，即行破埤放筏」，破壞攔水的石笱，致使鹿場圳圳水別流而造成稻苗枯萎，衝擊政府稅收，雖然由官府多次示禁，但竹排勒索事件卻未能滅除。[63] 此外，道光年間姚瑩（1785-1853）的《東溟奏稿》亦收錄：「陳勇、黃馬均係彰化縣人，……，把截濁水溪，抽取載貨竹筏錢文。……陳勇佔住觸口」。[64]

這些勒索事件的發生地點為「觸口」或作「觸口溪州」，大致來說就是濁水溪由山區進入沖積扇平原的開端，水勢逐漸和緩，河道也由石礫轉化為砂土，漫流於沙洲之上，意味著自然地形對於排夫的挑戰逐漸減小。同時，這裡也是前述鹿場圳的取水口，放排活動甚至可能利用部分圳道放流竹材。[65] 總之，觸口一帶猶如門戶，是山區進到平原的必經之處，特別是當地遠離縣城，乃為搶劫、勒索等事件好發之地，可說是治安死角。有意思的是，上述竹排勒索事件頻發於道光年間，其實也是臺灣西部沿海環境變動劇烈的時期，港道淤塞與海岸陸化等自然變遷，致使竹筏運輸及養蠣產業興盛，竹材需求因此提升，帶動了林圯埔竹材水上流通的興盛。

雖然竹材放流具有高度風險，但從清代開始就是林圯埔沿山居民重要的獲利來源，吸引當地家族投資，大坪頂林德好（1803-1871）就是一例。根據〈渡臺祖林灶公渡臺誌〉的記載，林灶家族的第三代林德好，經營小半天一帶的大竹買賣，

---

62 〈嚴禁勒索竹排船佚碑〉，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140-141。既有研究多以碑文所記「東螺一帶」及「溪洲元帥廟」，認定該廟位在今彰化縣溪州鄉，但皆無法確實指出該廟所在。筆者在田野調查時發現溪洲元帥廟應為雲林縣莿桐鄉六合村的仁和宮，該廟因供奉謝府元帥，亦稱謝府元帥廟。當地鄰近八卦臺地與斗六丘陵交接的觸口，又因地處西螺溪與虎尾溪間的漫流地帶，沙洲廣布，即為碑文所載「觸口溪洲」地帶。最初行政區上屬彰化縣東螺保所轄，1887 年（光緒 13 年）成立溪洲保劃歸雲林縣。在住民方面，張姓為當地大姓，分布於西螺溪南岸臨河成庄，並於 1830 年（道光 10 年）11 月成立慶餘堂張八房公的組織，統合竹圍仔、石榴班（以上屬今雲林縣斗六市）、九芎林（今雲林縣林內鄉）、新庄（今雲林縣莿桐鄉）等庄的張姓。由上可知，溪洲元帥廟應為西螺溪南岸的仁和宮。

63 〈嚴禁破埤害課碑記〉，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31-32。

64 〈勦平彰化縣逆匪奏〉，收於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東溟奏稿》（文叢第 49 種，1959），頁 158。

65 由於濁水溪歷經數次氾濫、改道，究竟放排活動何段水路運用圳路已不可考，惟臺南知府唐贊衮的《臺陽見聞錄》收錄竹費一項中，記載「埤工費約貼五百餘千文」，應是放排活動運用圳道的補貼，有關竹費詳本節討論。

在坪仔頂（今鹿谷鄉秀峰村）宗親引介之下，成為府城行郊的主要竹材供應商。當時林德好單獨操控竹材出海，由濁水溪水路接到沿海，最後運抵府城販售，一切食宿皆在竹排上完成。由於販竹至海口獲利頗豐，回程走陸路時總擔心匪徒覬覦財物，經常提心吊膽。[66] 此外，日治時期曾任羌仔寮區長的林邦光（1874-1949），在其生平記事中陳述，他與親戚共同於大坪頂經營雜貨及喪事用品的「採白」生理，經營兩年後決定改途：「將資金漸集，傾買大竹。至年末，共買三枝圍之額，每枝圍約三百六十枝，至辦出海資金集有千餘圓，擬由四叔隨竹出海口而兌之。……兩人內議謂此竹賣完必要將金集齊帶還，以便相機而動」。[67] 由上述兩個家族實例，說明林圮埔山村居民認為經營大竹銷往沿海地帶販售，是可以快速累積資產的辦法。

事實上，臺灣總督府的調查報告也記載，若能順利將竹材放流至海口，則賣價即可以倍增。如 1913 年林圮埔當地蔴竹依等級粗分為大班、二班及三班，市場價格分別為 2 円 50 錢、2 円、1 円 50 錢，不過到了安平、東港、東石等海口，價格就會增加為 5-6 円。[68] 雖然經營竹材水上流通具有一定風險，但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逐漸發展成為當地的重要維生產業。除了上述清水溝溪沿岸的家族實例外，清水溪流域的福興、鯉魚尾、山坪頂、勞水坑、桶頭及田仔地區（皆屬竹山鎮），靠著搬出、販售這一專業維生的居民也有六百餘戶、五千多人，[69] 由此可見林圮埔沿山地帶竹材水上流通的蓬勃景象。

林圮埔山區水運放流竹材是以「流」作為流通單位，同時也是民間與官府抽收竹材流通規費的計算單位。根據1891年（光緒17年），臺南知府唐贊袞《臺陽見聞錄》中記載竹費一項：

> 查雲林縣屬清、濁兩溪向有私抽竹費，去年六月間業經李令聯珪稟歸公收，改為官辦，估量每年可抽二千餘串，內除局紳飯食等項約共六百餘千文，

---

66 〈渡臺祖林灶公渡臺誌〉，收於林石陣編修，《平和林灶公渡臺誌暨族譜》（南投：林灶公祭祀公業，1978），頁 139。

67 請參閱林邦光親筆，〈林邦光生平記事〉（不著年月，未刊本，林惠朗收藏，林宜敬提供）。

68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69 〈三菱と竹林事件〉，頁 204-205。

又收埤工費約貼五百餘千文，除外贏餘千串征存款目，歸於廟宇書院工程撥用，稟准試辦在案。……該縣內山一帶種竹，為出產甚多，向來載運大竹出口，一百二十枝為一溜，次者一百七十枝為一溜，小竹四、五百枝為一溜；全年核計，竹枝販運出口，實屬不少。現廖從九稟請將竹費改為竹稅，歸於稅釐項下，……，估計該處販運竹枝出口者，全年約有六、七百溜，仍照現辦章程，每溜征完釐金銀六元三角三瓣六尖，每年計可征餉銀四千餘元。[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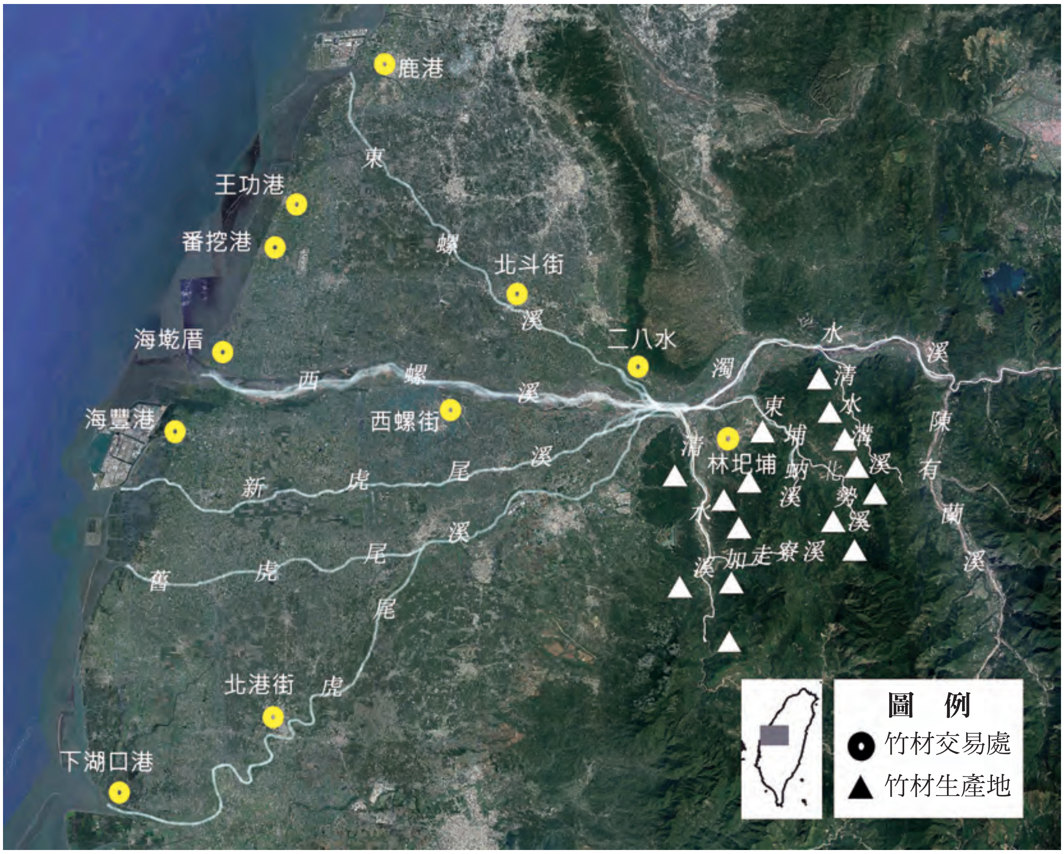

圖2　竹排放流河道與重要竹材交易街庄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改繪自 Google Earth。

70　唐贊袞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陽見聞錄》（文叢第30種，1958；1891年原刊），頁70-71。

由引文可知，清代林圯埔當地俗例就放流竹材抽收竹費，至1890年（光緒16年）雲林縣知縣李聯珪向上級建議將竹費收歸官辦，並展開為期一年的試辦。翌年（1891）則在廖從九稟請之後，原本由民間抽收的竹費正式收歸官方辦理，竹稅也成為稅釐其中一個項目。當時林圯埔新置竹稅局並由地方頭人擔任，如林月汀（1870-1931）就曾以「賞戴藍翎欽加五品銜沙、鯉兩堡聯甲分局兼辦竹稅局辦理」的身分參與竹稅局的經營。[71] 在竹稅局經費的運用方面，早期抽取竹費作為香燈資費，用以維繫地方廟宇運作；歸公後的竹稅則作為廟宇、書院工程及維修埤圳等開銷。[72] 基本上，竹費與竹稅用途相當，大多運用於地方公共事務。

關於竹稅或竹材售賣以「流」作為流通單位的原由，與竹材的水上流通型態有關。誠如前述，林圯埔地區竹材因採綑綁且頭尾銜接成若干列的放流方式，從而發展出特殊的計數單位，也就是前舉引文中所謂的「溜」，亦作「流」。基本上，「一流」的計算是依照竹材直徑的粗細來區分。光緒年間，林圯埔地區「販運竹枝出口者，全年約有六、七百溜」，[73] 若大竹出口120枝為一溜來計算，當地一年可輸出72,000-84,000枝，而小竹以4、500枝為一溜，則可達到240,000-350,000枝。日治時期，林圯埔當地的竹材有了更細緻的尺寸區分（詳如表2），所以「一流」的數量也隨之調整，但基本上計算原則與清代相同，「一流」都是尺寸較細的所含竹枝數量較多，反之，尺寸粗大者所計竹枝總數則較少。在當時林圯埔地區一年可產1,500-2,000流，[74] 也就是8寸大竹一年可輸出810,000-1,080,000枝，3寸小竹則有4,050,000-5,400,000枝。

表 2　日治時期竹材一流的計算方式

尺寸（寸）	數量（枝）	尺寸（寸）	數量（枝）
3	2,700	6	900
4	1,800	7	660
5	1,200	8	540

資料來源：〈三菱と竹林事件〉，頁 214。

71　陳鳳儀，《竹山郡管內概要》（1932，未刊本），無頁碼。

72　竹山鯉魚尾庄的重興巖（鯉魚尾巖，原稱新興巖）在清代有抽收竹費作為香燈之資。當時居民議定將放流清水溪的竹排，以 5、600 乃至 2000 根算做一流，每流樂捐 50 錢充作經費。後來光緒 17 年（1891）竹稅局成立後，乃改為春秋二季由廟祝向信徒募捐「化緣粟」維繫廟宇運作。請參閱劉枝萬，《南投縣風俗志　宗教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61），頁 53-54。

73　唐贊袞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陽見聞錄》，頁 71。

74　〈三菱と竹林事件〉，頁 214。

由林圯埔沿山地區輸出的竹材，在二八水（今彰化縣二水鄉）進行集散之後，分流輸往鹿港、北斗、西螺、北港等中大型街市及港口（如圖 2）。二八水地方成為重要竹材集散地的原因，從地理位置來看，此地乃為濁水溪與清水溪匯流之處，即前述觸口地帶，溪流由淺山河谷進入沖積扇平原的開端，水勢平緩，適合竹材靠岸堆放。[75] 同時，此處也是濁水溪流路分散的地方，竹材可以經由東螺溪、西螺溪、新虎尾溪、舊虎尾溪及虎尾溪（下游為北港溪）繼續輸往下游各重要街庄，甚至通往海口港市，例如東螺溪可通北斗街、鹿港，西螺溪可通西螺街，虎尾溪可通北港街（今雲林縣北港鎮）、下湖口港（今雲林縣口湖鄉），甚至繼續往南輸送至府城等西南海岸地區。由於清水溪及濁水溪河道上下連貫，豐沛的水力環境創造出有利於竹材的流通機制。而二八水亦因這一地理優勢，使得當地的商人可以靠著販竹而累積財富，像張老堧（1889-1944）就是著名的例子。傳聞他年少時以販竹為業，為人誠實且記憶力過人。一回三井商社帳房漏記竹材款項，他主動要求對帳，雖不識字卻能將每批竹材數量及款項一一交代，絲毫無差，自此受到三井商社的青睞，獲得該商社竹山營業所的竹材總經銷權而發跡，最終成為當地的富商。[76]

從二八水集散的竹材，會繼續放流到西北邊的北斗街與西南邊的西螺街這兩大竹材交易市場。這兩處市街是清代鹿港腹地內頗具規模的商業聚落，扮演著農產品集散的角色，許多山、海的物產皆在兩地交易，尤其臨河的緣故，同時也是竹材流通中心。[77] 這些濱臨濁水溪的市街與其周邊發展的農村，對於竹材的需求不小，遂逐漸發展出「放排」這一商業活動。這些市街的商人們多自主前往林圯埔沿山地帶購置竹材，常見的交易型態是贌下整片竹林。像是位在東螺溪下游的崁仔腳聚落（今彰化縣福興鄉三和村），居民在清代經常前往林圯埔山區採購大規模的竹材，再透過東螺溪便捷的水運，將竹材放流至當地。[78] 另一種則由竹農

---

75 三菱製紙株式會社成立後，會社自行經營竹材的伐採及販賣，不許林圯埔地區居民贌耕，並且與二八水地區的商人直接締結賣渡契約，請參閱〈三菱と竹林事件〉，頁 213-214。

76 〈創建戲院的張老堧〉，收於蔡炎城，《二水軼聞》（臺北：蔡炎城，1983），頁 25-28。

77 楊朝傑，〈清代臺灣西螺街的形成與發展〉，《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9（2015 年 5 月），頁 5-39；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北斗鎮志》（彰化：北斗鎮公所，1997），頁 493-495。

78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編，《福興庄原始典誌（增訂三版）》（彰化：彰化縣福興鄉公所，2022），頁 305-306。

自行放流，然後自己將竹材拖運上岸，但並非在河床上販售，而是在鄰近市街周緣寬闊的土地上搭建臨時性的建築進行竹材販售，而「竹寮」是最常見的型態。據說北斗當地的竹寮多開設在東螺溪沿岸；[79] 西螺街當地的做法也是從溪流中將竹材拖運上岸之後，再由牛車運送到臨近街道附近搭建竹寮販售，與北斗街的做法並無二致。

林圮埔當地竹材的水上流通，最終抵達彰化西海岸的鹿港。依據鹿港協源號後人丁玉書的回憶錄記載，傳聞清代港底一帶（今鹿港鎮菜園里）開設18家專門販售竹材的竹寮，這些竹販共同崇祀「三光（公）佛」。[80] 雖然「三光佛」的來歷不明，[81] 但透過共同祭祀一事，推測清代竹材販賣業者，可能曾經存在同業組織或神明會。細究港底為何能有18家竹材業者匯聚，應與當地的地理環境有關。清代港底所在的聚落，是鹿港港道最內側的船舶停靠處，距離不遠的虎頭澳（今大明路46巷一帶）也是船隻維修的處所。由於清代船隻修造的材料，主要使用木材與竹材，當地也因此匯聚了大量木料竹材。這些材料，並非只是專供修造船隻，亦可作為庶民生活的建材及日常用品。從港底步行約5分鐘的距離，就可以到達竹篾街（tik-bih-á-kue，今稱德興街）及杉行街。由街名「竹篾」可知，當地主要為竹工藝製作等竹材加工所形成的專業街區。日治時期鹿港街役場的調查顯示，當地竹工藝、家具及線香香腳的竹材，主要來自林圮埔。[82]

其次，關於竹紙製造方面。竹材因為大且長的材料特性，造成搬運困難，於是產地居民發展出將其加工製成竹紙的辦法，以減輕量體面積及重量，如此則有利於挑運販售，並可提高產品價值。前已述及，林圮埔為全臺最大規模的竹材產地，擁有滿山遍野大規模的竹林，當地理應也是全臺最大的竹紙產地，然而事實卻非如此。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進行全臺竹紙製造業的調查指出，嘉義

---

79 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北斗鎮志》，頁 493-495。

80 丁玉書記載港底的 18 家竹寮，因咸豐年間爆發水災，港口淤塞而關門，以致三光（公）佛無人祭拜。請參閱丁玉書，《勿忘草》（彰化：丁玉書，2006），頁 110-111。不過，筆者不認為港口淤塞會造成竹寮全數倒閉，因為今日到鹿港港底當地訪問，仍可聽到當地人講述竹寮經營及竹材放流的情況。參閱楊朝傑訪問、記錄，〈許永橙先生訪問紀錄〉（2022 年 7 月 4 日於鹿港許宅，未刊稿）。

81 根據丁玉書記載「三光佛」奉祀於中厝黃成發（黃炎興之父）宅，筆者於 2022 年 7 月 4 日前往鹿港中厝黃宅田野，該宅正廳仍供奉「三光佛」。從造像可以判斷「三光佛」應該是「三寶佛」，即由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等三尊佛像組成。至於竹寮業者何以選擇該神祇供奉，則不得而知。

82 鹿港街第二公學校編，《鄉土誌》（彰化：該校，1931），頁 29。

廳以 250 戶居首位，其次為斗六廳及鹽水港廳各 70 戶，依序是新竹廳 39 戶、臺北廳 9 戶、桃園廳 7 戶、南投廳 3 戶、苗栗廳 2 戶。[83] 這份日治初期的報告，反映出清代以來全臺最大規模的竹紙製造集中於嘉義廳，而林圮埔所在的南投廳並非竹紙的重要產地。而嘉義廳下製造竹紙的產地分布於打貓東頂堡（今雲林縣古坑鄉南部及嘉義縣梅山鄉全部、大林鎮東北部）、大目根堡（今嘉義縣竹崎鄉中部）、嘉義東堡（嘉義縣番路鄉、中埔鄉、大埔鄉全部及竹崎鄉東南部），也就是阿里山山脈西側地帶的村落（如圖 1）。[84]

誠如前述，我們瞭解林圮埔當地的竹排放流興盛，關鍵因素就是濁水溪及清水溪的大型水力支持，成就當地竹材交易的盛況。相對來說，阿里山西側地帶雖然也是重要的竹材產地，但由於沒有溪流水力供給運出，從而發展竹材加工為竹紙的產業，形成不同於林圮埔沿山以竹排放流的產業型態。

透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瞭解林圮埔地區得利於濁水溪及清水溪水力之便，成就竹排大規模運出。排夫藉由溪流水力將林圮埔山區的竹材送出，隨著水路來到濁水溪沖積扇扇頂的二八水，由此集散分為南北兩水路運送：一為東北邊由東螺溪繼續運往北斗街，最終可以抵達濱海的鹿港大街；一為西南邊水路由西螺溪及虎尾溪送出。西螺溪可以接連西螺街，至海口麥寮街及王功港；虎尾溪則可通北港街、下湖口港，往南可通往南臺灣。竹材透過清、濁水溪上下通流的河道網絡，聯繫了山區、平原直通海口，便捷的水路促進竹材販運，同時山區與海岸的經濟聯繫也在竹材水上流通的過程中展露無遺。

四、海岸變遷與竹材運用

19世紀彰化西部鹿港海岸地帶，因為濁水溪夾帶的大量泥沙，使得水域快速淤淺而陸化，自然環境的劇烈變化，一方面造成鹿港港道的淤淺阻塞，致使大型船舶無法靠岸，當地於是興起以竹筏作為接駁大船貨物的運輸工具，加速了對竹材的需求。另一方面，沿海形成大面積的沙埔及灘塗，也促進牡蠣養殖業的興盛，

8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本島製紙業調查書》，頁 35-46。
8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本島製紙業調查書》，頁 22、34-35。

尤其傳統上普遍使用插枝式的養蠣方法，竹枝的需求間接帶動了彰化沿海居民對於林圯埔竹材的需求市場。

（一）鹿港港道淤積

1784年清廷正式核准鹿港與福建泉州蚶江口對渡，確立其作為中臺灣最主要港口的地位。「鹿港飛帆」是清代彰化縣境八個具有代表性的景觀之一。《彰化縣志》是如此描繪這般景象：「煙火萬家，舟車輻輳，為北路一大市鎮。西望重洋，風帆爭飛，萬幅在目，波瀾壯闊，接天無際也」。[85] 清代就已擁有數萬居民的鹿港，是臺灣府治（今臺南市）以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市街。在活絡的貿易之下，港道上經常可見來往兩岸貿易的商船。日治時期鹿港街役場的調查資料中提到，1785-1850年（乾隆50年至道光30年）這六十餘年間是鹿港與對岸貿易的全盛時期，也可說是兩岸貿易的黃金時代，當時每日進出鹿港可載運七千石米穀的大船高達一百艘，二千石以下的船隻也不少。[86]

不過，鹿港這處位在大武郡溪（也稱鹿港溪）出海口的河港，不如南臺灣的打狗（今高雄港）和北臺灣雞籠（今基隆港）良港天成。在港道南方不遠就是東螺溪入海地帶，在大武郡溪與東螺溪活躍的泥沙堆積之下，港道早在18世紀就已淤淺。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爆發之時，朝廷派出大量官員與軍隊渡海平亂，鹿港就是當時臺灣二處重要的進兵要口。當時閩浙總督李侍堯（1725-1788）的幕僚趙翼（1727-1814）留下這段紀錄：「幸林爽文等皆山賊，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師得以揚帆至。然海口舟大不能附岸，須鹿港出小船二十里來渡兵」。[87] 趙翼雖然沒有隨軍隊來到臺灣，不過他協助李侍堯處理公務，某種程度上也掌握了戰役當時的訊息。這段引文中「海口舟大不能附岸」的紀錄，其實已經透露出鹿港港道受到溪流泥沙堆積而淤淺的跡象，因此造成吃水較深的運兵大船無法進港靠岸，只能停泊港外，仰靠接駁。

雖說 18 世紀末葉以來，鹿港港道淤淺的問題就已經浮現，但進入 19 世紀之

85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上册，頁 112。
86 鹿港街役場編，〈鹿港港灣ニ関スル調查〉（未刊本，1923），無頁碼。
87 〈平定臺灣述略〉，收於趙翼撰、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第三册：皇朝武功紀盛，卷四，頁 54。

後情況卻愈趨嚴重。1811 年（嘉慶 16 年）9 月，閩浙總督汪志伊（1743-1818）上呈一份給嘉慶皇帝的「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圖 3），這幅收錄在清宮抄錄奏摺副本中的附圖，具體呈現了當時難得一見的鹿港海岸地景。[88] 鹿港以西的海面上由北而南分布著四座沙汕，分別是鹿港外海的「北汕」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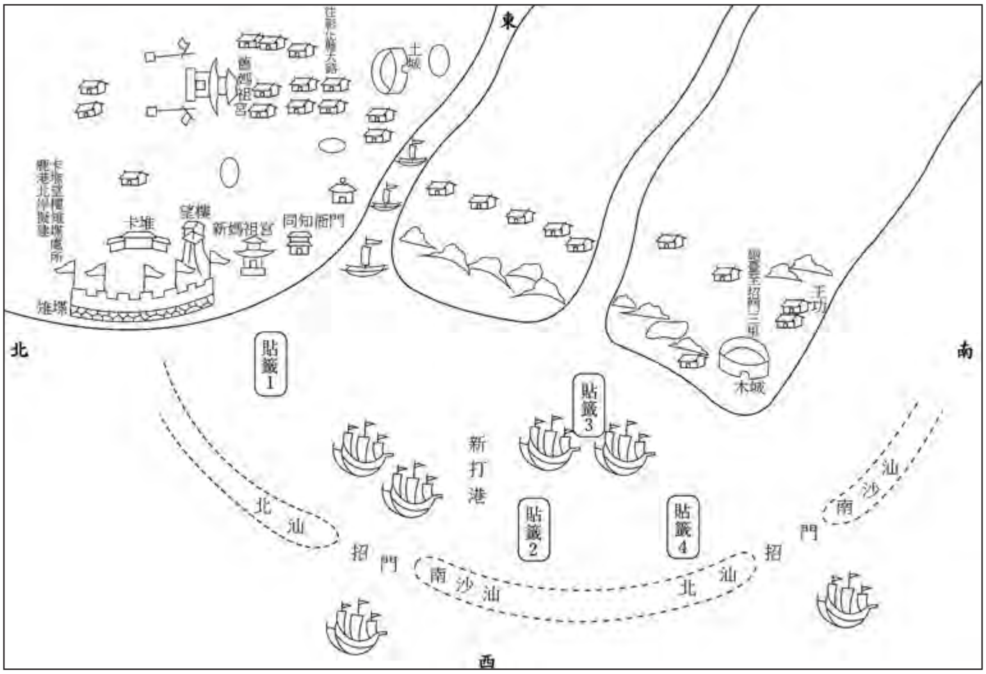

圖 3　1811 年（嘉慶 16 年）鹿港與周邊海域圖

說　　明：貼籤 1：新打港泊船港心闊十六丈零水漲滿深一丈六尺水退乾深五尺零距鹿港北岸約七里合併聲明。

貼籤 2：新打港內招門闊九丈零水漲滿深一丈六尺水退乾深八尺零外招門闊十六丈零水漲滿深一丈三尺水退乾深四尺零南至王功港招門約七里北至鹿港北岸約十里合併聲明。

貼籤 3：王功砲臺前泊船海面至海邊灘塗一百零丈自灘塗至砲臺九十零丈砲臺外俱係浮沙合併聲明。

貼籤 4：王功招內海面闊五十零丈水漲滿深一丈五尺零水退乾深九尺零招門海面闊七尺零深淺與招內相等合併聲明。

資料來源：筆者以〈嘉慶 16 年閩浙總督汪志伊等呈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改繪，原圖收於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23 冊，頁 26-28。

88　〈嘉慶 16 年閩浙總督汪志伊等呈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收於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第 123 冊，頁 26-28。

沙汕」，以及王功港（今彰化縣芳苑鄉）西邊海面的「北汕」及「南沙汕」，沙汕之間頭尾相連延伸大約有 17 公里。對應這兩處港口的沙汕之間，設有導引船隻進出港道的「招門」。[89] 道光年間的軍事繪圖中（圖 4），也可以見到鹿港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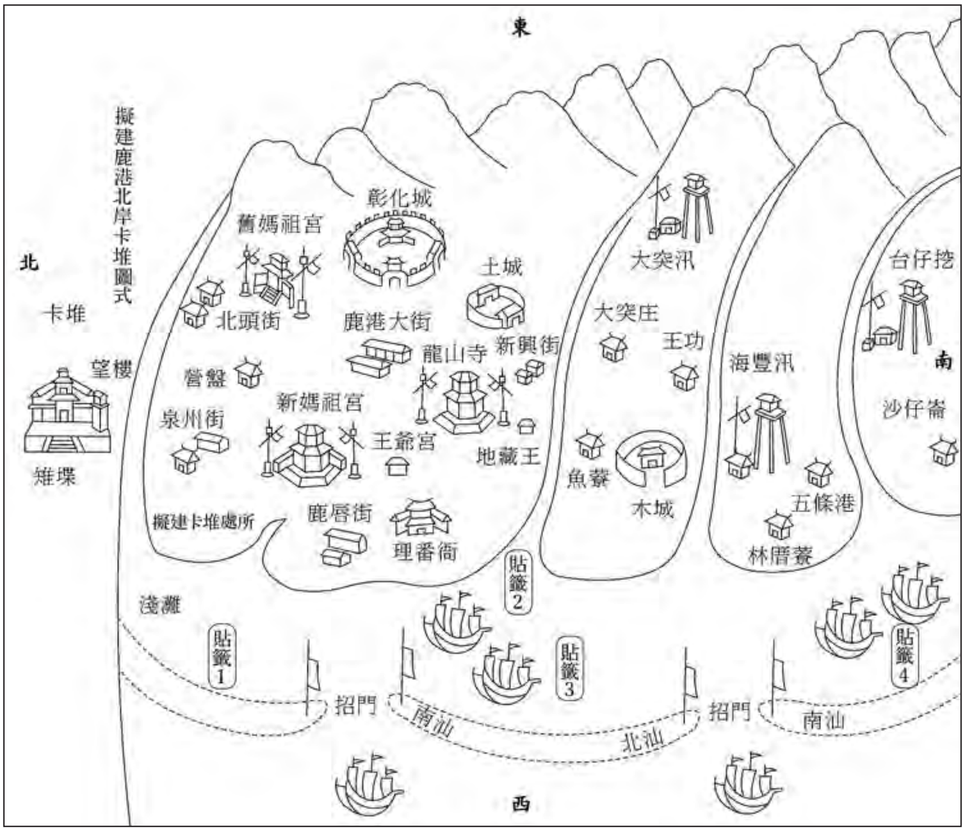

圖 4　1824 年（道光 4 年）鹿港街與周邊海域圖

說　　明：貼籤 1：新打港內招門闊九丈零水漲滿深一丈六尺水退乾深八尺零外招門闊十六丈零水漲滿深一丈三尺水退乾深四尺零南至王功港招門約七里北至鹿港北岸約十里合併聲明。

貼籤 2：新打港泊船港心闊十六丈零水漲滿深一丈六尺水退乾深五尺零距鹿港北岸約七里合併聲明。

貼籤 3：王功砲臺前泊船海面至海邊灘塗一百零丈自灘塗至砲臺九十零丈砲臺外俱係浮沙合併聲明。

貼籤 4：王功招內海面闊五十零丈水漲滿深一丈五尺零水退乾深九尺零招門海面闊七尺零深淺與招內相符合併聲明。

資料來源：筆者以〈道光 4 年鹿仔港圖式〉改繪，原圖收於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42 册，頁 189-191。

---

[89] 所謂的「招門」，也作「口門」、「招口」。

海招門兩側插有旗幟，[90] 標記此處為入港航道，避免船隻偏移航道，同時也要由熟悉水道的水手操作船舶，並利用潮水及風向，才能順利進港。福建分巡臺灣道尹士俍（1690-?）所著《臺灣志略》就說：「鹿耳門……土人插竹繫纓布為招……海航往來，必由招中；否則，沙衝舟滯，立為浪碎」，[91] 可見鹿耳門港道入口插設有標旗作為航道指引，避免船隻誤觸沙汕而擱淺，抑或造成底艙的破壞，與鹿港的做法大致相同。[92]

進入鹿港港道招門的東側，在圖面上標示有「新打港泊船港心」，就是大船停泊下錨的處所，水深且風浪較外港平靜。值得注意的是，以「新打港」一詞指稱鹿港一帶海域，倒是首次在文獻中出現。一般而言，「新打」指的是新開通的港道。依據官方繪圖中標示「新打港」的範圍從鹿港到王功港來判斷，很可能反映的是鹿港港道淤淺，商船改由南邊的王功港出入一事。1840年（道光20年），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姚瑩給朝廷的報告中提到：「昔時鹿港口門最大，嘉慶中口門淤廢，商船由王功港出入」，[93] 可見19世紀初葉，鹿港海域沙汕變化無常，造成航運衝擊不小，甚至影響港口正常運作。

不過，讀完姚瑩「嘉慶中口門淤廢」的陳述之後，會讓人有種鹿港港道被泥沙覆蓋而消失的想像。仔細思考，這句話的意思或許不是說整個港口被泥沙填滿而廢除，而是強調口門是否通暢與港口正常運作有一定關聯。這也就是19世紀初葉，鹿港口門淤淺之後，由王功港替代成為鹿港外港的原因。其實姚瑩在同一篇報告中也說：「道光以來，王功港口又淤，商船皆從番仔挖出入矣。番仔挖口闊水深，外有沙汕一道，迤邐自南而北，商船自此入口，由港內經王功港而至鹿港，故以番仔挖為鹿港外口」。[94] 由此可知，面對臺灣西海岸沙汕變化無常，正口鹿港的外港也接連改易。即使如此，姚瑩也提到番仔挖港「商船自此入口，由

---

90 〈道光4年鹿仔港圖式〉，收於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42冊，頁189-191。

91 尹士俍纂修、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志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245-246。

92 鄭維中注意到插旗為號的做法，早在荷治時期就已經被荷蘭人落實於臺灣西南海岸的大員港。請參閱鄭維中，〈荷治時期大員港的入港規範：駁船、旗號與盪纓〉，收於劉益昌、賀安娟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Ⅴ：早期南瀛》（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頁155-184。

93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説狀〉，收於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復堂選集》（文叢第83種，1960；1867年原刊），第一冊，頁80。

94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説狀〉，頁80。

港內經王功港而至鹿港」，說明儘管鹿港及王功港的招門淤廢，但是從番仔挖（今彰化縣芳苑鄉）進港之後，航行沙汕環繞的內港水域亦可抵達王功港及鹿港。此外，道光年間的《彰化縣志》中也記錄：「以鹿港為正口，然沙汕時常淤塞，深則大船可入，淺則小船得到」。[95] 反映出雖然鹿港海域沙汕變化不定，但並非長期處於淤塞狀態。一般而言，在漲潮之際，大船仍可循著特定較深的水道進港，而較淺的地方則可以利用小船出入，說明並非淤淺而完全喪失航運價值。

在嘉慶朝「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圖 3）中，除了繪製 6 艘三桅大船航行的「新打港」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圖面中間畫有 3 艘單桅帆船駛入的東西向河道。這條河道應該就是大武郡溪，鹿港當地居民多以「舊港溝」或「鹿港溪」稱之，是普遍認知清代的港道所在。港道與當地的「舊街」範圍平行，大致從西邊的泉州街、埔頭街連過瑤林街一線東南而行，最終到龍山寺附近留下「港底」這一地名，表明這是港道最內延的地帶。林會承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舊街」店屋的建築特色與碼頭的對應關係。[96] 這處輸送貨物的船頭行聚集之地，發展出與港道垂直的店屋，狹長且深邃的店屋，分作前、中、後三段，各具功能。在港道卸貨後，即可由後門搬運入店，倉儲於中段，最終貨物可移至前段舖面販售，此即清末鹿港文人洪棄生（1866-1928）所見「店前可以驅車，店後可以繫榜」的情景。[97] 由此可知，舊港溝港道緊接著「舊街」商業區，強化了貨物起落、搬運與銷售的功能，使商貿活動得以順暢流通。

1820 年代，舊港溝面臨港道淤積而衝擊鹿港商貿活動的棘手問題。由於濁水溪水系的東螺溪支流連接舊港溝河道，在含沙量高的溪流堆積作用之下，港道逐漸淤淺。此外，往返兩岸的商船經常在回航之前，會將稱作「船棟」的壓艙砂土傾倒在港道，長久下來自然也會造成淤積。[98] 1822 年（道光 2 年）11 月，鹿港的泉、廈郊商人遭遇舊港溝淤塞造成貨物不通的窘境，於是向新到任的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1764-?）陳請，獲得官府「示諭商船捐銀挑濬，以利舟楫」。最後在泉郊金長順行夥黃英才與管理廈船事務的洪磬共同協助之下，「公議每船派捐

95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上册，頁 115。
96 林會承，《清末鹿港街鎮結構》（臺北：境與象出版社，1985），頁 67-70。
97 〈鹿港乘桴記〉，收於洪棄生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寄鶴齋選集》（文叢第 304 種，1972；1917 年原刊），頁 85。
98 〈鹿港浚河〉，《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3 月 20 日，第 3 版。

番銀四十圓，共收番銀二千圓，雇夫挑濬完竣」。[99] 由此可知，鹿港當地在面對港道淤積後的因應辦法是向官府核備，再由泉、廈郊這兩大商人團體出面向各自管理的船戶攤派銀錢，進行清淤。依每船收取番銀 40 圓，最終收得番銀 2,000 圓來看，共計有 50 艘泉廈郊所屬商船。即使疏濬做法只能治標而未能治本，卻是當時人們認為最有效而積極的辦法。

透過上述討論可知，19 世紀初葉鹿港正面臨著港道淤淺的問題。當地在面對這一波環境變遷的衝擊時，一方面發展出小船接駁大船的辦法，使貨物得以順利流通；一方面也透過泉、廈郊商船攤派經費，進行港道疏濬。

（二）鹿港周邊海域淤淺與竹筏接駁

在舊港溝淤積的同時，鹿港沿岸海域也面臨積泥成埔的陸化衝擊，並留下歷史圖像。延續嘉慶朝的「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1824 年官府重新繪製該圖（圖 4），並添加新的資訊。圖面上除了新添加許多重要廟宇、官衙及軍事設施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鹿港近海一帶特別被標記為「淺灘」。[100] 「淺灘」的出現，顯示原本可供船舶航行的港道，因為泥沙堆積加劇，逐漸陸化成為沙埔，造成海岸線往西推移。這意味著商船得要停泊在距離鹿港街更遠的海面，商品無法直接上岸，從而衍生出近海貨物接運的駁船事業。

進一步來說，港口淤積很容易讓人們聯想起正口商業衰敗，但有意思的是，在相關紀錄與研究中所呈現清代鹿港商貿最為繁盛的時期要屬嘉道年間，實際上正是當地海岸自然環境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施添福對於鹿港古蹟的歷史地理意義的詮釋中指出，1785-1835年（乾隆50年至道光中葉），鹿港進入了全盛時期，也就是方志中所記「鹿港飛帆」的黃金時代，不僅海峽兩岸商業貿易繁盛，官商在此時也累積了充裕的資本，並投注於鹿港當地的公共建設，今日我們所見不少規模宏敞、精雕細琢的廟宇與建物，基本上都在此時創立或重修。[101] 但誠如前述，這

---

99 〈審明安溪縣民盧允霞京控臺灣配運官谷索費苦累商船案〉，收於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47 册，頁 243-244。

100 〈道光 4 年鹿仔港圖式〉，收於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42 册，頁 189-191。

101 相關討論請參閱施添福，〈鹿港古蹟的歷史地理意義〉，收於施添福、林會承、陳國川撰，《鹿港鎮志：地理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頁 235-283。

段期間的鹿港周邊海域及港道正面臨劇烈的泥沙淤積與水域陸化。面對這番自然環境變化的衝擊，鹿港作為清代中臺灣最大商港，如何維繫兩岸貿易正常運作及貨品暢通，不容忽視的關鍵角色是駁船的普及。

駁船可以說是因應鹿港西海岸環境變動而出現的交通方式，因為船體小、吃水淺的特性，容易在沙洲地帶移動，具有高度機動性，成為停泊外港大船接運貨物的首選。鹿港當地運用駁船的實例，具體呈現在閤港大廟龍山寺的重修工程上。龍山寺為舉人林廷璋（生卒年不詳）及八郊等商紳共同倡議重修，修建工程從1829年（道光9年）冬季興工開始，歷時一年多，至1831年（道光11年）2月竣工。今日廊道還留有3塊道光11年的「泉廈郊商船戶捐題緣金」碑，列明船戶捐題、開支情況。[102] 特別的是，碑記中以「泉廈駁船戶起運庭石開列諸船牌名」為項目，強調建材搬運情形。「庭石」就是指鋪設在龍山寺建築四周大量的石材，這些石材採自福建，主要由「泉廈駁船戶」共41艘，分成73次由番仔挖接運到鹿港（詳如表3），供給龍山寺重修。「泉廈駁船戶」應是指道光年間鹿港海域淤淺，泉、廈商船主要改由番仔挖港進出，停在內港再透過駁船將貨物轉運到鹿港，這些駁船分別屬於泉郊與廈郊管理。目前因資料有限，仍無法進一步將表3中的船戶進行團體分類。但是，「泉廈駁船戶」的出現，反映出19世紀鹿港當地最主要的兩大商人團體——泉郊、廈郊面對鹿港海域淤淺問題時，其因應之道就是籌組駁船，處理各自商船從番仔挖到鹿港之間沿海貨運接駁的問題。

駁船究竟是哪一種類型的船舶，頗令人好奇。在洪棄生〈鹿港乘桴記〉一文，記述了清末鹿港駁船接運貨物的情景：

> 鹿港通海之水已淺可涉矣，海艫之來，止泊於沖西內津；……緬載之往來，皆以竹筏運赴大艑矣。然是時之竹筏，猶千百數也；衣食於其中者，尚數百家也。[103]

由引文可知，竹筏作為駁船，被廣泛運用於鹿港海域的貨物接駁。誠如前述，自19世紀初葉以來，鹿港近海水域漸次淤積而陸化，大型船隻只能停泊於「新打港」，

102　〈泉廈郊商船户捐題緣金碑〉，鑲嵌於鹿港龍山寺左側廊道牆面，筆者田野抄錄。

103　洪棄生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寄鶴齋選集》，頁 85。

表3　1831年（道光11年）泉廈駁船起運龍山寺庭石狀況

序號	船戶名	接駁次數	序號	船戶名	接駁次數
1	新益勝	13	22	彝林船	1
2	舊益勝	12	23	林轉船	1
3	金捷發	2	24	芳泰船	1
4	金順興	2	25	正利船	1
5	金德順	2	26	聯成船	1
6	金順源	2	27	黃發興	4
7	金合興	1	28	黃順利	1
8	金和益	1	29	黃恒隆	1
9	金寶盛	1	30	王忠祿	1
10	金捷興	1	31	盧　應	1
11	金合順	1	32	蔡順安	1
12	金益順	1	33	蔡合興	1
13	金東順	1	34	陳進發	2
14	金福春	1	35	陳陞順	1
15	金進利	1	36	陳金興	1
16	金源盛	1	37	陳萬興	1
17	金永順	1	38	陳進益	1
18	許江船	2	39	施順源	1
19	協興船	1	40	康奇石	1
20	德亨船	1	41	洪德協	1
21	德盛船	1			

資料來源：〈泉廈郊商船户捐題緣金碑〉，鑲嵌於鹿港龍山寺左側廊道牆面，筆者田野抄錄。

僅有中小型船隻可以順著舊港溝進到舊街碼頭地帶。1854年（咸豐4年）濁水溪氾濫，一時含沙量甚高的混濁溪水由支流湧入舊港溝，致使淤積的情況更加嚴峻。[104] 這次水災過後，連通海域的舊港溝港道淤積到甚至涉水就可以通行，船舶僅能停泊在距離舊港溝出海口不遠、時稱「沖西」的內港水域。當時貨物綑載相當仰賴竹筏駁運，其數量可說是成千上百，靠操作駁船維生者，也有數百家之多。[105] 今日在舊港溝出海口附近仍留有「筏子腳」（pâi-á-kha，今鹿港鎮東石里）的地名，是早期停放竹筏的處所，[106] 顯示鹿港曾經大量使用竹筏，並且匯聚停泊在一處而成為

104 〈鹿港の貿易〉，《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3月7日，第2版。

105 其實19世紀末以來，港口的淤塞不僅發生在鹿港，亦發生在南臺灣的安平等地，使得竹筏成為臺灣西海岸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甚至因為竹筏廣布港口，而有「竹筏港」的地名出現。請參閱吳建昇，〈「竹筏港」水道之初探〉，《臺南文獻》（臺南）1（2012年7月），頁10-26。

106 陳國川、翁國盈編纂，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上册，頁168。

當地地景，最後被轉化為地名。此外，鹿港周邊低潮線以外的海域被漁民視為「外海」，自清代以來這裡就是竹筏從事近海漁業活動的場所，昔日經常可見竹筏廣布的景象，因此當地人也習慣以「排海」稱呼此片海域。[107]

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這麼理解，鹿港採用竹筏作為駁船的辦法，可能是從普遍被運用於臺灣西部沿海漁業的竹筏發展而來，由於造價低廉且工序較簡易，經過改良成為可以運儎貨物的型態。循此脈絡，於是以大竹編排組成的竹筏，便在19世紀鹿港港道淤積的情形之下，成為接駁船貨起落的替代方案。這些因素導致當地對林圯埔沿山地區竹材需求倍增，無形之中也促成山林與海岸銜接，具體展現山通大海的物流歷程。

（三）養蠣與竹材的運用

鹿港海岸的自然環境變遷，除了造成港道的淤塞之外，同時濁水溪的泥沙沖刷入海，亦導致鹿港海岸迅速陸化，大範圍生成的浮覆灘塗地被居民開闢成蠔圃，造就了當地養蠣業的繁盛。

1811年「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圖3）中的貼籤寫道：「王功砲臺前泊船海面至海邊灘塗一百零丈，自灘塗至砲臺九十零丈，砲臺外俱係浮沙，合併聲明」。[108] 由此段描述可知，王功砲臺附近為大潮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的潮間地帶，也就是引文中所謂的「海邊灘塗」，此外砲臺外的地區也被強調「俱係浮沙」，可見19世紀初王功港已經逐漸陸化，形成沙洲與灘塗的地理景觀。

在王功港陸化的過程中，當地也興起養殖牡蠣的產業。據說最早養殖牡蠣的地方是漢寶（今彰化縣芳苑鄉）近海稱作「石仔盤」的地方，後來因為海水侵蝕，造成大部分蚵田陷入海中消失。石仔盤以南的蚵田則有海坪閣溎、湖溎、二十三份、八份、添丁溎、天送溎、中盤。[109] 上述蚵田分布於濁水溪河口以北的潮間地帶，北與福寶海坪（今彰化縣福興鄉）交界，南至永興海埔地（今彰化縣芳苑鄉）

---

107 顏秀玲，〈北頭漁村漁民生活方式的變遷〉，收於余光弘編，《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頁 53。

108 〈嘉慶 16 年閩浙總督汪志伊等呈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收於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23 册，頁 26-28。

109 洪一平，〈王功地區蚵田文化景觀及產業發展之研究〉（彰化：大葉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頁 61-62。

的海坪，南北約12.7公里，寬約2.5公里，養殖牡蠣面積大致為1,500公頃。[110]

王功港北邊的鹿港，在海岸陸化的過程中，海埔新生地浮覆而促成蚵田的成立。清代鹿港沿海的蚵田，主要分布在鹿港溪出海口往北延伸至洋子厝溪出海口一帶區域。[111] 戰後當地延續清代以來的牡蠣養殖事業，全盛時期面積達到2,000公頃，年產蚵肉120萬公斤，於是大面積的蚵田成為當地特殊景觀，「蠔圃洄潮」更為鹿港八景之一。[112] 不過，由於沿海漂沙持續，海岸線不斷推移，同時也造成蚵田被沙土所掩埋而不斷南移，最終因為彰濱工業區的設置，鹿港的蚵田就此消失。[113]

清代彰化西部沿海的養蠣，廣泛使用插竹式的養蠣技法，此法在清初已經使用於臺灣，如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所記：「蠔，蠣房也，即以為取之之名；用竹二，長丈餘，各貫鐵於末如剪刀，於海水淺處鉤致蠣房」。[114] 插竹式又稱篊插式或篊竹式，彰化沿海居民多以「插蚵枝」（tshah-ô-ki）稱之。蚵農一般會依照當地養殖水域的深度，將竹材加工為長30-60公分，寬度約3-5公分的竹枝，並將一端削尖，方便插入沙土之中。這些經過加工曝曬的竹枝，一端會被夾上牡蠣殼，以提高蚵苗的附著率，最後種插於潮間帶或淺海區域。[115]

用來插養牡蠣的竹材主要是莿竹。據表4日治時期養蠣業狀況所示，彰化西部沿海養蠣用的竹材有兩個來源：一為濁水溪中游的林圮埔地區，一為烏溪中游的大肚、快官一帶。林圮埔山區運出的莿竹大量被運用於今彰化縣大城鄉、芳苑鄉一帶的沿海蚵田，如下海墘厝庄、頂海墘厝庄、西港庄、三塊厝庄（以上為今彰化縣大城鄉）、新街庄、番挖庄、王功庄（以上為今彰化縣芳苑鄉）；而鹿港街、草港尾庄（今彰化縣鹿港鎮）、下見口庄（今彰化縣線西鄉）、新港庄（今彰化縣伸港鄉）則運用來自大肚及快官一帶的竹材。

導致彰化沿海養蠣利用的竹材來源差異，應該考慮蚵田位置與溪流的關係。前述今彰化縣大城鄉、芳苑鄉一帶的蚵田運用林圮埔的莿竹，主要原因正是這些蚵田

---

110 洪一平，〈王功地區蚵田文化景觀及產業發展之研究〉，頁 63。

111 顏秀玲，〈北頭漁村漁民生活方式的變遷〉，頁 74。

112 施文炳著、洪惠燕編，《臺灣末代傳統文人：施文炳詩文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 190-191。

113 顏秀玲，〈北頭漁村漁民生活方式的變遷〉，頁 74。

114 黃叔璥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海使槎錄》（文叢第 4 種，1957；1736 年原刊），頁 22。

115 萱場三郎，〈安平鹿港間水產業〉，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一卷》（臺北：該課，1898），頁 246-248。

表4　日治時期彰化西海岸地帶養蠣業狀況（1914-1915）

蠣田所在街庄名稱	養蠣業者		篊場面積（甲）	插篊數量（支）	篊材料種類	竹材產地	竹材供給月份
	戶數	人數					
下海墘厝庄	80	120	1.5000	79,218	簕竹	南投林圯埔	自9月至12月
頂海墘厝庄			1.0000	52,812			
西港庄			2.0000	105,624			
三塊厝庄			1.0000	52,812			
新街庄			2.0000	105,624			
番挖庄	227	514	12.0000	633,744	簕竹	南投林圯埔	自9月至12月
王功庄			6.0000	316,872			
鹿港街	20	60	14.0000	821,520	簕竹	大肚方面	自9月至隔年2月
草港尾庄	60	200	18.9000	1,663,578	簕竹	快官	自9月至隔年2月
下見口庄	2	18	5.0000	440,100			
新港庄	69	110	42.0000	3,696,840			

資料來源：〈本島の牡蠣養殖業調查〉，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臺灣之水產：第四號》（臺北：該局，1915），頁 26-29。

分布於清代西螺溪與東螺溪出海口的南北兩岸，這兩條溪流的上游即是作為當地重要竹材供應地的林圯埔。戰後，當地仍然持續使用林圯埔地區的竹材，通常成綑的竹排由林圯埔沿山放流運出後，順著溪水可以抵達濁水溪出海口的海墘厝（今大城鄉），再沿著海溝北上至番仔挖及王功，如果受到季風或潮汐影響以致無法沿海放流，居民則會駕駛牛車前赴濁水溪口搬運。[116] 至於鹿港、線西、伸港地區運用來自大肚及快官一帶的竹材，則是因為其位在烏溪出海口南岸地帶。[117] 由此可以瞭解，竹材流通是通過溪流水運而與蚵田之間構成聯繫關係。

清代彰化西海岸養蠣使用竹材的狀況，未留下太多紀錄，但是日治時期的統計資料，卻可以提供具體的參考數據。依據表4養蠣業狀況顯示，彰化沿海養蠣以番挖庄與王功庄最為興盛，共有227戶、514人投入18甲蚵田的經營，其次為番挖庄南邊的下海墘厝庄等五庄，共有80戶、120人經營7.5甲的蚵田。這兩大養蠣區域相當程度仰賴林圯埔竹材的供應，以一年期而言，番挖庄與王功庄需要使用950,616支，下海墘厝庄等五庄則需396,090支，兩區合計1,346,706支。這些用來養

116　林連宗，〈憶早年王功風采〉，收於謝四海主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一輯》（彰化：二林社區大學，2014），頁 144；洪勝湖，〈芳苑歷史掇拾〉，收於謝四海主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四輯》（彰化：二林社區大學，2017），頁 38。

117　雖然彰化地區養蠣調查報告中指出，鹿港、線西及伸港使用烏溪流域的竹材，但鹿港當地的製香及竹工藝業者主要仍使用林圯埔地區的竹材，詳本文第三節討論。

蠣的竹枝屬於耗材，不耐長時間浸泡於海水之中且容易朽壞，大約一至二年就必須易換。「蚵枝」持續的替換更新，意味著需要林圯埔地區不斷供給竹材，這也反映出山林與海岸之間，在竹材供給與需求的市場機制運作之下，兩地互相銜接的緊密關係。

五、結論

本文從清代臺灣中部林圯埔淺山丘陵地帶的林相景觀變化著手，探討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一百多年間，林圯埔山區地景由雜木叢生轉變成為滿山遍野的竹林景觀的背後原因。其關鍵主要是因為彰化平原沿海自然環境的變化，在鹿港海岸淤積陸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插竹式的養殖牡蠣業開始興盛，一方面則是對於作為運輸工具的竹筏需求提升，累加造成對林圯埔地區竹材供應需求的增加。在竹林產業的榮景之下，林圯埔大規模種竹而改變了山林景觀，並成為20世紀初期全臺最大的竹材產地。

18世紀以來，漢人大規模移居林圯埔地區，拓墾活動的進行改造了當地的地景。林圯埔地區多為山地等邊際土地，耕地相當有限，漢人到來之後，逐漸適應氣候環境，並種植適宜的作物，其中竹子因為適應當地地形，竹材與竹筍又可供給日常生活所用，收益不亞於米穀生產，於是逐漸發展成為當地重要的竹林產業。漢人移民也陸續移植原鄉的竹種，使得林圯埔沿山地區發展出多元的竹林樣態。

19世紀之初，竹林買賣的交易行為在當地已經存在，竹材也在這一過程中成為商品標的。由於商品化的推展，使得居民刻意種植具經濟價值的竹林，而當地雜木叢生的原始山林景觀，便在這波商業活動中逐漸被改造，取而代之的是翠竹滿布的地景。至20世紀之初，滿山竹林的樣貌，甚至被人們認為是林圯埔原生的「自然」山林景觀。

在林圯埔沿山掀起山區物產商品化的風潮之下，竹材成為山林經濟的重要物產，以溪河放流竹排的流通方式，更是19世紀以來當地重要的交易型態。林圯埔當地因為具備地理環境上的優勢，特別是獲益於濁水溪與清水溪兩大溪流的水力支持，竹排得以透過便捷且貫通的河道網絡，從山區運往廣袤的濁水溪沖積扇平

原，再由下游各溪流連接北斗、西螺等中大型街市，最終通往西海岸的鹿港，形成了山海相通的竹材水上流通網絡。

19世紀彰化西部沿海的自然環境變遷與濁水溪的沙土堆積，造成海岸陸化，大面積沙埔地的浮出，促進沿海地區養殖牡蠣的興盛，特別是插枝式的養殖方法，帶動了竹材的市場需求。此外，鹿港港道的淤淺也使得大型船舶無法進港，於是興起以大竹編製的竹筏普遍被使用作為接駁貨物的船隻，也開啟對竹材的需求。林圮埔地區在這一熱絡的竹材市場帶動之下，進而大規模種植竹材以擴增供應數量，意外改造了原有的山林景觀。

總結來說，本文探討19世紀林圮埔竹材與鹿港海岸的關聯，指出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林圮埔沿山地景變化的根本原因，與彰化西部沿海自然環境的變化大有關聯。19世紀初竹材流通興起的同時，帶動一波林圮埔山區物產商品化的趨勢，而伴隨著鹿港海岸淤積這一自然因素的影響，養蠣業與竹筏駁運的興盛，間接促成竹材的市場需求增加，使得以鹿港為核心的彰化海岸地帶與沿山的林圮埔建立緊密的經濟連結，也具體呈現了山通大海的格局。同時，這一連結山海的經濟活動，顯示出漢人活動從西部平原推向沿山地帶，由海口走向山區，成為19世紀臺灣重要的社會動態。

引用書目

《臺灣日日新報》

〈泉廈郊商船戶捐題緣金碑〉，鑲嵌於鹿港龍山寺左側廊道牆面，筆者田野抄錄。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檔案，檔號：0039/316.1/.1/01/0001/01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不著撰者，〈鹿港風俗一斑〉（1896，未刊本）。

林邦光親筆，〈林邦光生平記事〉（不著年月，未刊本，林惠朗收藏，林宜敬提供）。

陳鳳儀，《竹山郡管內概要》（1932，未刊本）。

鹿港街役場編，〈鹿港港灣ニ関スル調查〉（未刊本，1923）。

楊朝傑訪問、記錄，〈許永橙先生訪問紀錄〉（2022 年 7 月 4 日於鹿港許宅，未刊稿）。

丁玉書

2006　《勿忘草》。彰化：丁玉書。

三菱製紙株式会社社史委員会（編）

1962　《三菱製紙六十年史：1898-1958》。東京：三菱製紙株式会社。

不著撰者

1985　《集集堡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尹士俍（纂修）、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5　《臺灣志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子定、郭寶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1　《臺灣之竹林與竹材》，臺灣研究叢刊第 14 種。臺北：臺灣銀行。

永山規矩雄

1932　〈臺灣に於ける竹材利用の概要〉，《臺灣の山林》（臺北）81: 59-79。

安倍明義（編）

1938　《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

何培夫（主編）

1994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6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吳建昇

2012　〈「竹筏港」水道之初探〉，《臺南文獻》（臺南）1: 10-26。

李泰翰

2007　〈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臺北）25(2): 139-178。

沈葆楨（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福建臺灣奏摺》，臺灣文獻叢刊第 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　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6　《彰化縣志》，上、下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維強
2015 〈銅版汗青：欽定平定準噶爾回部戰圖之委法製作〉，《故宮文物月刊》（臺北）393: 4-17。
林文燦（總編纂）
2009 《鹿谷鄉志》。南投：鹿谷鄉公所。
林玉茹
2015 〈清中叶台湾三大区域型经济区的成立（1784-1850）〉，《东北史地》（長春）2015(1): 58-69。
2016 〈第三篇 近代台湾经济地理（清统治时期）〉，收於吴松弟主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六卷）闽台近代经济地理》，頁 339-34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玉茹、劉序楓（編）
2006 《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1895-18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石陣（編修）
1978 《平和林灶公渡臺誌暨族譜》。南投：林灶公祭祀公業。
林長金
1937 〈社子國営造林地に於ける蔴竹の造林並栽培経営法に就て〉，《旗山の林業》（高雄）6: 39-53。
林連宗
2014 〈憶早年王功風采〉，收於謝四海主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一輯》，頁 137-145。彰化：二林社區大學。
林會承
1985 《清末鹿港街鎮結構》。臺北：境與象出版社。
林满红
2006 〈贸易与清末台湾的经济社会变迁（1860-1895）〉，收於吴松弟主編，《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頁 138-157。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林漢梁（編著）
2000 《竹山林業史誌》。南投：頂林林業生產合作社。
青井哲人（著），張亭菲、楊朝傑（譯）
2018 〈以竹為特色的市鎮：臺灣濁水溪流域的內陸河港市鎮群與竹造街屋的歷史意義〉，《建築學報》（臺北）104: 103-121。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
1991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
姚 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東溟奏稿》，臺灣文叢叢刊第 4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1867] 《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施文炳（著）、洪惠燕（編）
2008 《臺灣末代傳統文人：施文炳詩文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施添福
2000 〈鹿港古蹟的歷史地理意義〉，收於施添福、林會承、陳國川撰，《鹿港鎮志：地理篇》，頁 235-283。彰化：鹿港鎮公所。
泉風浪
1928 《臺灣の民族運動》。臺中：臺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

洪一平

2007 〈王功地區蚵田文化景觀及產業發展之研究〉。彰化：大葉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洪棄生（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72[1917] 《寄鶴齋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30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洪勝湖

2017 〈芳苑歷史掇拾〉，收於謝四海主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四輯》，頁 32-44。彰化：二林社區大學。

洪麗完

2011 〈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18(1): 41-102。

2013 〈清代臺灣邊區社會秩序之考察：以濁水溪、烏溪中游之「亢五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北）20(4): 1-50。

倪贊元（纂輯）、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11 《雲林縣采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唐贊衮（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8[1891] 《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高宜君

2015 〈毫芒之測：乾隆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探微〉，《故宮文物月刊》（臺北）392: 70-82。

國分直一

1968 《台湾の民俗》。東京：岩崎美術社。

張永楨

2010 〈清代竹山、鹿谷地區的農作經營：以古文書和文獻互相印證〉，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等編，《第四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9-76。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

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

1997 《北斗鎮志》。彰化：北斗鎮公所。

張素玢

2014 《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新北：衛城出版社。

張毓哲

2018 〈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的竹紙產業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英章

1977 《林圯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連　橫

1962[1921]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正祥

1993 《臺灣地誌》，中冊。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陳哲三（總編纂）

2002 《竹山鎮志》。南投：竹山鎮公所。

陳國川、翁國盈（編纂），施添福（總編纂）

2006　《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上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

2009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23、142、147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

陳壽祺（總纂）、洪燕梅（點校）

2007　《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上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鹿港街第二公學校（編）

1931　《鄉土誌》。彰化：鹿港街第二公學校。

曾品滄

2012　〈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臺北）19(4): 1-47。

曾獻緯

2010　〈日治時期竹山地區的竹林產業發展〉，《暨南史學》（南投）13: 107-158。

黃允哲（主編）

2019　《鹿谷黃錫三秀才文集》。南投：南投縣彬彬社文化發展協會。

黃叔璥（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7[1736]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素真

2005　〈業戶許廷瑄與林圮埔大坪頂地區的拓墾發展〉，《臺灣文獻》（南投）56(4): 23-89。

2009　〈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屺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

2011　〈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臺灣文獻》（南投）62(2): 145-179。

塗有忠（主編）

1997　《下崁采風錄》。南投：南投縣竹山鎮中和國民小學。

新道滿（編）

1938　《ロ-マ字發音　臺灣市街庄名の讀み方》。東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楊朝傑

2015　〈清代臺灣西螺街的形成與發展〉，《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9: 5-39。

萱場三郎

1898　〈安平鹿港間水產業〉，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一卷》，頁 232-261。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編）

2022　《福興鄉原始典誌（增訂三版）》。彰化：彰化縣福興鄉公所。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2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15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

1909　《本島製紙業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5　《臺灣之水產：第四號》。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

1921　《臺灣之農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趙　翼（撰）、曹光甫（校點）
2009　《趙翼全集》，第三冊。南京：鳳凰出版社。
劉枝萬
1961　《南投縣風俗志　宗教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蔡炎城
1983　《二水軼聞》。臺北：蔡炎城。
鄭維中
2019　〈荷治時期大員港的入港規範：駁船、旗號與盪纓〉，收於劉益昌、賀安娟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Ⅴ：早期南瀛》，頁 155-184。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盧正恒
2021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臺灣史研究》（臺北）28(4): 41-120。
盧雪燕
2007　〈鏤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銅版畫〉，《故宮文物月刊》（臺北）293: 40-5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190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顏秀玲
1993　〈北頭漁村漁民生活方式的變遷〉，收於余光弘編，《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頁 49-7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藤森狂花
1929　〈竹山の竹の由來〉，《臺法月報》（臺北）27(12): 110-111。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31, No. 3, pp. 33-75, September 202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Relationship between Bamboo Trade in Linyipu and Transformation of Lukang Coastline in 19th Century

Chao-chieh Yang

ABSTRACT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spanning from the late 18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landscape of the Linyipu mountainous region in Central Taiwan underwent dramatic transformations. Over time, the original dense jungles in the region gradually gave way to expansive bamboo forests.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primarily driven by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changes along Taiwan's western coast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which spurred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demand for bamboo.

Investigating transformations of the Lukang coastline reveal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claimed land along the shoreline boosted the thriving coastal oyster farming. The cultivation of oysters using bamboo structure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d demand for bamboo. Furthermore, siltation of the Lukang harbor channel necessitated the widespread use of bamboo rafts, establishing them as a prevalent mode of transport during that era. These factors collectively escalated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bamboo in the region.

The strategic hydraulic advantages provided by the Qingshui and Zhuoshui Rivers facilitated the rapid and extensive ex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amboo,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mboo forestry industry. Eventually, bamboo forests came to dominate the landscape of the Linyipu mountainous region.

The cultivation and widespread adoption of bamboo in Linyipu not only highlight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coastal areas, but also provide a case study for exploring privat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commodity circulation in Taiwan under Qing rule. Simultaneously, this economic activity linking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illustrates the the progression of Han migration from the western plains to the mountains, extending from the seaports into the hilly regions – a notable trend in 19th-century Taiwanese society.

Keywords: Zhuoshui River, Bamboo Raft, Oyster Culture, Mountain Forest Landscape, Bamboo Forest Industry, Zhu Shan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31, No. 3, pp. 77-130, September 202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Forgotten Imperial Culture: The Spread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Kazuhiro Iwama**

ABSTRACT

British tea preferences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shift from bohea tea to congou tea or, in contemporary terms, from oolong tea to black tea, toward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Formosa Oolong Tea Room at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of 1910 enjoyed considerable success and was expected to catalyze the popularization of oolong tea in Britain. However, oolong tea failed to establish a significant presence in the British market. In contrast, during the 1920s, oolong tea remained synonymous with high-quality tea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rtly after Taiwan's annexation in 1895, Japanese colonists cherished oolong tea as a souvenir from Taiwan to Japan. The opening of a Taiwanese tea house in Ginza in 1905,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promot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Oolong tea emerged as a modern favorite beverage in Japan, following the trajectory of black tea and coffee, as its production and export were encouraged for colon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Mitsui & Co. and Mitsukoshi consistently utilized katakana,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Western culture, to advertise Taiwanese oolong tea, as opposed to kanji, which was more closely linked to China. Most oolong tea images featured in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adopted Western or tropical aesthetics, causing it to be easily confused with black tea. Despite being a domestic tea, oolong tea, popular in Japan during that era, was frequently misconstrued as an upscale imported commodity, much like black tea.

In 1903,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inaugurated the Taiwan Pavilion at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hibition in Osaka, where the Taipei Tea Merchant Public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a tea house. Subsequently,

* The draft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3rd Taiw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i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on September 7-9, 2023.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special gratitude to Prof. Tsu-yu Chen, Prof. Pintsang Tseng, Prof. Fu-san Huang and anonymous referees for their valuable comments.
** Professor, Faculty of Letters, Keio University, Tokyo, Japan
來稿日期：2023 年 12 月 5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2 月 21 日。

Taiwanese tea houses became a standard feature at Japanese expositions. The 1910s and 1920s marked the initial period of oolong tea gaining widespread popularity in Japan.

Keyword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Formosa Oolong Tea, Taiwanese Tea House, Taiwanese Tea Party, Mitsui & Co., Ltd., Emperor Taisho,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1903),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in St. Louis (1904),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of 1910

1. Introduction
2. The Spread of Oolong and Black Tea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Oolong Tea Consumption Culture in Imperial Japan
4. Conclusion

1. Introduction

Oolong tea, alongside green and black tea, is deeply ingrained in Japanese beverage culture. While all the tea varieties originally hail from China, modern Japan designates green tea as its own, associating black tea with the Western world, particularly England, and reserving oolong tea as Chinese tea. Notably, iced oolong tea is the quintessential non-alcoholic beverage in *izakayas* (Japanese-style pubs). Despite its significant presence,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of oolong tea in Japan remains underexplored.[1]

Extensiv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ea. From a global historical standpoint, between the 17th and the 19th centuries, the British adopted Chinese tea as a part of their imperial culture. Tea transformed from a Chinese beverage to a major drink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ubsequently, tea produced in colonial India and Ceylon expanded its market to the British homeland and its colonies, spann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ea continued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British Empire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underwent a shift from being an imperial to a global commodity in the post-war period.[2]

---

[1] For the history of the acceptance of oolong tea in Japan, see Kumiko Hirano, *Chūgoku-cha, fūga no uragawa: sūpāburando no karakuri* [The Hidden World of Chinese Tea Elegance: Secrets of Super Brands] (Tokyo: Bungeishunju, 2003); Paolo Mazzarino, "Mukashi ha yokatta-ne? Dai Go-kai: Kōra to Ūroncha [Were the Good Old Days? Episode 5: Cola and Oolong Tea]," *Shinchō 45* [New Tide] (Tokyo) 33: 4 = 384 (April 2014), pp. 230-235.

[2] William H. Ukers, M.A. (William Harrison), *All about Tea*, Vol. I-II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Sakae Tsunoyama, *Cha no Sekai-shi: Ryokucha no Bunka to Kōcha no Shakai* [A World History of Tea: Green Tea Culture and Black Tea Society] (Tokyo: Chūōkōron-sha, 1980); Yukio

Tsunoyama Sakae's book, *The World History of Tea*, published in 1980 and popular in Japan, was a pioneering work that utilized consular reports (領事報告), whic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egan using to provide trade information in 1881, as a historical source. However, traditional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global history of tea by Tsunoyama Sakae and Haruyama Yukio categorized Fujian oolong tea, known as Bohea Tea (a variant of Wuyi [武夷]), as a type of black tea, influenced by British traders. These studies primarily explored the global history of tea across two categories: green and black tea. Other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ea in Japan emphasized green tea, overlooking the spread of oolong tea. Therefore, revisiting the global history of tea, giving due consideration to oolong tea, is essential.

E. Rappaport's 2017 work, Thirst for Empire, a cover photograph, captures British women and Indian soldiers sharing tea around a mobile tea cart in a war zone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book delves into the intricate connection between British consumer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ea. It uncovers how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since the 17th century influenced the marketing, retail, and distribution of tea.[3] Rappaport's book,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mpire of Tea* by Markman Ellis and others,[4] offers a valuable perspective that this paper references when discussing oolong tea's role in Japan's imperial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olong tea was Taiwan's principal export. This period witnessed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various tea types in Taiwan. These encompassed oolong tea and Pouchong tea (包種茶), exemplified by jasmine tea,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black tea from the 20th century; and green tea post-World War II. These aspects ar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by Chen Tsu-yu. Additionally, Chen delves into the relevance of the Taiwanese tea culture and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5]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Tokyo: Heibonsha, 1991, First Edition; 2013, New Edition); Yoshirō Matsuzaki, *Nenpyō: Cha no Sekai-shi* [Chronology: A World History of Tea] (Tokyo: Yasaka Shobo, 2012);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5);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p. 6-7.

4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5 Tsu-yu Chen, "Taiwan Yincha Wenhua yu Zhongri Qinghuai [Taiwanese Tea Culture and Sino–Japanese Sentiments]," in Zhonghua Yinshi Wenhua Jijinhui [Foundation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ed., *Di Shier Jie Zhonghua Yinshi Wenhu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Proceedings of the the 12th Symposium on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Taipei: Foundation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2011), pp. 447-470.

Furthermore, Kawaharabayashi Naoto's work sheds light on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trade of Taiwanese tea and the endeavors of Taiwanese tea traders. Kawaharabayashi's analysis encompasses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wan, Japa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inauguration of *Danshui* (淡水) port after the Arrow War in 1860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Japanese era in 1945.[6]

Moreover, Chen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ese tea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7] She clarified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Fuzhou as an export hub for Fujian tea, starting from the 1850s. However, since the 1870s, international demand for Chinese tea declined, owing to the ascendancy of Indian and Ceylon tea and changes in shipping and financial dynamics. Consequently, Fuzhou's prominence waned, while Xiamen emerged as a trading center for Taiwanese tea.[8] In addition to Chen's work, Yagashiro Hideyoshi delved into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shift in the export route of Taiwanese tea from the route via Xiamen to a direct route from Taiwan's Jilong (基隆) port to North America, following the Japanese acquisition of Taiwan. Yagashiro's analysis encompassed the policies of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臺灣總督府) and the competition among foreign firms, banks, and local traders in both China and Taiwan.[9] Furthermore, Lin Manhong's study examined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Taiwanese tea, tracing its journey from production to export. It further explored the societal changes precipit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tea industry.[10] Recently, Konno Junko's outstand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provided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uchong tea production and export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primar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tea farmers.[11]

---

6 Naoto Kawarabayashi, *Kindai Ajia to Taiwan: Taiwan Chagyō no Rekishi-teki Tenkai* [Modern Asia and Taiwa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Tea Industry] (Kyoto: Sekaishisō-sha, 2003).

7 Tsu-yu Chen, *Jindai Zhongguo Chaye de Fazhan yu Shijie Shicha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ea Industry and the Global Market] (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82).

8 Tsu-yu Chen, "Quanqiuhua Jincheng-zhong de Min-Tai Cha [Min-Tai Tea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ijiao-shi Yanjiu*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Quanzhou) 2011: 2 (Dec. 2011), pp. 117-137.

9 Hideyoshi Yagashiro, *Teikoku Nihon no Ryūtsū Nettowāku: Ryūtsū Kikō no Hen'yō to Shijō no Keisei*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Imperial Japan: Transformation of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and Market Formation] (Tokyo: Nihon Keizai Hyōronsha, 2012), pp. 49-73.

10 Man-houng Lin, *Cha, Tang, Zhangnao-ye yu Taiwan zhi Shehui Jingji Bianqian* [Tea, Sugar, Camphor Industry,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Taiwan] (Taipei: Lianjing Press, 1997).

11 Junko Konno, "Nihon Tōchiki niokeru Taiwan-cha no Hen'yō to Taiwan Chagyō no Hensen: 'Cha' no Motsu Nōsakumotsu to Shikō-sei no Shiten kara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Tea and Evolution of the Tea

These findings offer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aiwanese tea. However,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its consumption has not yet been conducted. Lu Shao-li's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 in modern expositions focuses on Taiwanese tea houses established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hese tea house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introducing Taiwan to the world at prominent events, such as the 1900 Paris Exposition,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in Osaka (1903),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in St. Louis (1904), Sixth National Industrial Exposition (Tokyo Expo) in 1907, and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in London (1910). According to Lu's findings, from 1897 to 1929, Taiwan participated in 74 exhibitions, with 54 of them in Japan. These participations inclu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 houses at 31 expositions and exhibition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aiwan Pavilion at 22 exhibitions. The Taiwanese tea houses and Taiwan Pavilions at these expositions were politically driven, asserting the success of the colonial rule. Economically, they broadened the sales channels for Taiwanese products in the Japanese, European, and American markets.[12]

Building upon prior research,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ffusion of oolong tea,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imperial Japan, and colonial Taiwan to Japa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Oolong tea is a relatively obscure variety of Chinese tea, with primary production centers in Fujian, Canton, and Taiwan. Hence, can the widespread consumption of oolong tea in Japan be attributed,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to Japan's historical colonization of Taiwan? To elucidate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introducing Taiwan's oolong tea to Japan, examining it within a global historical context is imperative.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pread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in modern Japan, tea trends in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black tea consumption in Japan. Consequently, this research offers insight in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into Japan's imperial culture and how this tea culture persisted in Japan after the country lost its colonies.

Industr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 Perspective on the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latability of 'Tea'],” (Ph.D. Dissertation, Rikkyō University, 2022).

12 Shao-li Lu, *Zhanshi Taiwan: Quanli, Kongjian yu Zhimin Tongzhi de Xingxiang Biaoshu* [Exhibiting Taiwan: Portrayals of Power, Space,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Taipei: Mai-tien Publishing, 2005), pp. 186, 399-400.

2. The Spread of Oolong and Black Tea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 Formation of the Tea House Culture in Britain

Although tea had been known in Europe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he first Europeans to introduce tea to the continent were likely from Japan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It is possible that a ship from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established in 1602) stopped at Hirado (平戸) in 1609 and brought the initial shipment of tea to Europe.[13] The first recorded instance of a Dutch ship transporting tea to Europe was confirmed the following year.[14] Thus, the Dutch, who held trade control in East Asia, introduced the tea tradition to Europe before the British.

Around the 1650s, the British beca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tea, Arabian coffee, and Mexican cocoa at about the same time.[15] However, since the Dutch were producing affordable coffee in Java and Ceylon, and Spain dominated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cocoa, the British had no option but to turn to tea.[16]

The origins of Wuyi tea (武夷茶)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The monk Shi Chao Quan (釋超全), who lived in the 17th and early 18th centuries of the Qing Dynasty, is believed to have composed the *Wuyi Tea Song* (武夷茶歌) around 1700.[17] In the *Wuyi Tea Song*, he mentioned that "tea became rough for a long time in Jingtai (景泰年間茶久荒)," and "rock tea was gradually born after that (嗣後岩茶亦漸生)." It is assumed that Wuyi rock tea, a typical oolong tea, began being produced after the Jingtai years (1450-1457) of the Ming Dynasty.

---

13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p. 19, 22.

14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 22; Sakae Tsunoyama, *Cha no Sekai-shi: Ryokucha no Bunka to Kōcha no Shakai* [A World History of Tea: Green Tea Culture and Black Tea Society], p. 15.

15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 31.

16 Sakae Tsunoyama, *Cha no Sekai-shi: Ryokucha no Bunka to Kōcha no Shakai* [A World History of Tea: Green Tea Culture and Black Tea Society], pp. 12-14, 67-72.

17 Shenghong Zhou and Nabing Zhou, "Shi Chao Quan de *Wuyi Cha Ge* Yanjiu [Sha Chao Quan's Research on the *Wuyi Tea Song*]," *Nongye Kaogu*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Nanchang) 2015: 2 (April 29, 2015), pp. 104-106.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there were three types of tea commonly available in the English market—specifically, singlo, the standard-grade green tea; imperial, the higher-grade green tea; and bohea, comprising darker semi-fermented leaves. Bohea is a variation of Wuyi, the primary region for oolong tea production, and the term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late 17th century. British traders referred to bohea as "black tea." However, it is closer to what is today recognized as "oolong tea."[18]

By the late 18th century, China started producing black teas, such as congou (often traced back to the Chinese *gongfu* (工夫), meaning "work") and souchong (possibly derived from *xiaozhong* (小種), meaning "small sort"), which underwent a more robust fermentation process compared with oolong tea.[19] A well-known example of congou black tea is the renowned Keemun black tea, hailing from Qimen (祁門) Prefecture in the Anhui (安徽) Province.

In 1784, the Commutation Bill was passed in Britain, which canceled all existing high duties and replaced them with a single 12.5% duty, ceasing tea smuggling. This change allowed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to monopolize the tea trade to fulfill the demand for higher-quality tea. By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British preferences shifted from bohea tea to congou tea or, in today's terminology, from oolong tea to black tea. Congou tea (black tea) gradually became more popular than bohea tea (oolong tea) because it offered a darker, mellow flavor and could be brewed multiple times.[20]

In 1823, a Scottish army officer and adventurer, Robert Bruce, discovered tea thriving in Assam in India. This discovery l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tea on Indian plantations and its subsequent shipment to the British mainland. Within the next 35 years, the quantity of Assam tea surpassed that of Chinese tea,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surge in British tea consumptio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21]

Dr. Edward Smith, a prominent food scientist, wrote in 1861,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ood of an Englishman has heretofore been roast-beef and beer; but,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pre-eminence of those substances, we may certainly now add

---

18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p. 50, 58, 64, 128.

19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p. 122-124, 128.

20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p. 175-177, 184.

21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p. 209-210, 212, 221, 237, 241-242.

the further characteristic of tea."[22] In 1874, he further stated, "If to be an Englishman is to eat beef, to be an Englishwoman is to drink tea."[23]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tea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24]

Several of London's coffee houses had restrictions on female customers. Therefore, tea gardens, which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became a welcoming source of entertainment for British women.[25] Afternoon tea, known as small five o'clock teas, became a widespread social event around 1840 and traversed social classes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26] Sir Thomas Lipton, who started selling tea in 1889, offered standard tea at an affordable price, primarily catering to working-class women.[27]

In 1853, during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Edo period, Ōura Kei (大浦慶), a female merchant in Nagasaki, sent samples of green tea to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a Dutch trading company. In 1856, William John Alt, a British merchant, purchased Ōura's tea. Thi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tea export trade, which eventually became the second-largest export commodity after raw silk during the Meiji period.[28] In the 1860s, tea from Taiwan, which was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egan to be supplied to the global market (discussed later).

However, green tea was not widely consumed in Britain at the time, and Japanese green tea was primarily used for blend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while relatively popular in Britain,[29] was known for its lighter color compared with Indian black tea, which had a rich, dark brown hue. British women often favored black tea because it retained its color even after multiple brews, which they considered economical.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occasionally blended with other teas owing to its strong aroma. Nevertheless, it was often sold under the label of Chinese tea, and several British people were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names

---

22 Edward Smith, "On the Uses of Tea in the Healthy System,"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London) 9 (Feb. 15, 1861), p. 186.

23 Edward Smith, *Foods* (New York: D. Appleton, 1873), p. 331.

24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p. 221-222, 227;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 10.

25 Yasuo Deguchi, *Eikoku Kōcha no Hanashi* [The Story of British Tea] (Tokyo: PHP Bunko, 1998), pp. 110, 118.

26 Jane Pettigrew, *A Social History of Tea* (London: The National Trust, 2001), pp. 102-105.

27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p. 152-153, 169.

28 Kyōko Honma, *Ōura Kei Jyoden Nōto* [Notes on the Biography of Lady Ōura Kei] (Nagasaki: Honma Kyōko, 1990), pp. 67-123.

29 "Eikoku niokeru Taiwan-cha [Taiwanese Tea in Britain],"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Taiwan Daily News] (hereafter cited as *TN*), Sept. 29, 1909, am ed., p. 5.

Taiwanese or Formosa oolong tea.[30]

The Paris Exposition, held from April to October 1867, marked Japan's official debut at the World's Fair. At the Japan Pavilion, three geisha from Edo, sent by the versatile merchant Shimizu Usaburō (清水卯三郎), worked at the teahouse and possibly became the first Japanese women to set foot on European soil.[31] This was among the earliest instances of green tea, common in China, being promoted internationally as Japanese tea. Subsequently, Japan started establishing Japanese teahouses at various expositions. In the 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Paris in 1900, Japanese green tea and Taiwanese oolong tea were showcased; Japanese-style teahouses serving these teas were set up.[32] Am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tea served in Japanese teahouses, black tea was the most popular, followed by oolong tea, green tea, and Pouchong tea, in that order.[33]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of 1910 (日英博覽會) w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acceptance of oolong tea in Britain. Komura Jutaro (小村壽太郎), who served as Japan's Ambassador to Britain and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rganized this exposition in response to a proposal from Imre Kiralfy (1845-1919), a London-based exposition promoter.[34] Komura aimed to address the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encountered during his time in Britain,[35] which had intensified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The war saw Japan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into northeastern China, which resulted in competition with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railroad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During the Exposition, Japan declared its intention to annex Korea.[36]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featured the Oriental Pavilion (東洋館), which showcased Taiwan, Korea, and Manchuria. However, the pavilion was, in reality,

---

30 "Eikoku niokeru Ūroncha (Ge) Kawada-shi Dan [Oolong Tea in Britain (Part 2): Conversation with Mr. Kawada]," *TN*, April 30, 1911, am ed., p. 5.

31 Mamoru Sawa, "Shimizu Usaburō: 1867-nen Pari Bankokuhaku o megutte [Shimizu Usaburō et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Paris 1867]," *Chiba Keiai Keizai Daigaku Kenkyū Ronshū* [Research Journal of Chiba Keiai Economic University] (Chiba) 19 (Dec. 1981), p. 498.

32 "Pari Hakurankai niokeru Ūroncha no Kōhyō [Positive Reception of Oolong Tea at the Paris Exposition]," *TN*, Oct. 10, 1900, am ed., p. 2.

33 "Saikai Chajō [The Situation of Tea at the Festival]," *TN*, Jan. 10, 1901, am ed., p. 3.

34 Mamiko Itō, *Meiji Nihon to Bankoku Hakurankai* [Meiji Japan and World Expositions]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2008), pp. 161, 173.

35 Mamiko Itō, *Meiji Nihon to Bankoku Hakurankai* [Meiji Japan and World Expositions], pp. 161, 173.

36 Shao-li Lu, *Zhanshi Taiwan: Quanli, Kongjian yu Zhimin Tongzhi de Xingxiang Biaoshu* [Exhibiting Taiwan: Portrayals of Power, Space,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p. 171.

a Japanese colonial exhibit supported by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he Resident-General's Office of Korea (韓國統監府), the Kwantung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關東都督府), and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37] Additionally, the Exposition included displays of the Ainu and Taiwanese aborigines.[38] Journalist Hasegawa Nyozekan (長谷川如是閑) argued that the exhibit of aboriginal life was "a minor humanitarian issue, with many Westerners looking into the huts as if they were visiting a zoo."[39]

All the shops at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were set up by Japanese organizers.[40]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茶業組合中央會議所) constructed a one-story wooden tea house (茶亭) in a traditional Japanese style near the pond in the Japanese Garden. They served various types of tea, including green tea, Japanese black tea, *gyokuro sencha* (玉露製煎茶), and matcha (抹茶). However, the tea house did not attract enough customers as there were few visitors during the evenings and at other times. By contrast, the Formosa Oolong Tea Room (臺灣喫茶店), run by the Nozawa Group (野澤組), a trading company founded in 1869,[41] became the most successful shop at the exposition, despite charging higher prices for their tea.[42] This tearoom was opened by Gotō Shinpei (後藤新平), who had been the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fter serving as the Secretary of Civil Affairs for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tearoom at the request of a trader named Nozawa Genjirō (野澤源次郎).[43] Notably, the tearoom had British women serving customers dressed in an attire resembling the

---

37 Mamiko Itō, *Meiji Nihon to Bankoku Hakurankai* [Meiji Japan and World Expositions], pp. 183-188.

38 Sei Tahara, "Nichi-Ei-haku no Seiban-kan (Jō) [Native People's Pavilion in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Part 1)]," *TN*, Sept. 29, 1910, am ed., p. 1.

39 Mamiko Itō, *Meiji Nihon to Bankoku Hakurankai* [Meiji Japan and World Expositions], pp. 193-194; Nyozekan Hasegawa, "Nichi-Ei-haku Dayori (3) [Letters from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Part 3)]," *(Tokyo) Asahi Shimbun* [(Tokyo) Asahi Newspaper] (hereafter cited as *AS*), July 8, 1910, am ed., p.4.

40 Mutosei, "Nichi-Ei-haku no Kinjō (Jō)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Part 1)]," *TN*, Oct. 30, 1910, am ed., p. 1.

41 Nō-shōmu-shō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d., *Nichi-Ei Hakurankai Jimu-kyoku Jimu Hōkoku*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Secretariat Administrative Report] (Tokyo: Nō-shōmu-shō, 1912), Vol. 2, pp. 845-865.

42 Mutosei, "Nichi-Ei-haku no Kinjō (Jō)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Part 1)]," *TN*, Oct. 30, 1910, am ed., p. 1.

43 Yūsuke Tsurumi, *Gotō Shinpei Den: Taiwan Tōchi hen, Jō* [The Biography of Gotō Shinpei: The Period of Taiwan Administration, Volume 1] (Tokyo: Pacif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 Department, 1943, First Edition; 1944, Third Edition), pp. 321-323.

kimono, featuring *furisode* sleeves (振袖) that imitated *yūzen* dyeing (友禪染).[44] However,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tearoom's popularity was that, in addition to pure oolong tea, it offered a blend of oolong and black tea. Several visitors preferred this blend,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tearoom's success.[45]

At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the *Formosa Oolong Tea Room*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to the extent that tea merchants in London adopted the *Formosa Oolong* brand name. However, Taiwanese oolong tea, notably pricier than Indian black tea and other varieties, predominantly catered to the upper and middle classes.[46] After the exposition concluded, the Nozawa Group continued to run an oolong teahouse in Piccadilly Park, Central Lond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Unfortunately, the business, which primarily offered a blend of black and oolong tea, remained unprofitable because of the high recurring equipment expenses.[47]

During World War I, a significant shortage of ships servic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routes led to surging freight costs, causing a slump in Taiwanese oolong tea exports.[48] Post-World War I, efforts to promote oolong tea in the depressed British market did not yield the expected results. In the 1920s,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retrospectively criticized the Japan–British Exposition, asserting that it had achieved "no discernible results" in promoting oolong tea.[49]

(2) The American Tea Culture

In 1614, the Dutch established a fur trading post on Manhattan Island, the present-day heart of New York City, which they acquired in 1626 and named New Amsterdam. While the Dutch were the first to introduce tea drinking to Europe, it

---

44 Nyozekan, "Nichi-Ei Hakurankai (Roku)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No.6]," *TN*, June 22, 1910, am ed., p. 3.

45 Nō-shōmu-shō, ed., *Nichi-Ei Hakurankai Jimu-kyoku Jimu Hōkoku*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Secretariat Administrative Report], Vol. 2, pp. 863-864.

46 "Eikoku niokeru Ūroncha (Ge) Kawada-shi Dan [Oolong Tea in Britain (Part 2): Conversation with Mr. Kawada]," *TN*, April 30, 1911, am ed., p. 5.

47 "Rondon no Kissaten, Kōhyō wo Hakushi Tsutsuari [A Tea House in London is Gaining Popularity]," *TN*, April 7, 1915, am ed., p. 2.

48 Naoto Kawarabayashi, *Kindai Ajia to Taiwan: Taiwan Chagyō no Rekishi-teki Tenkai* [Modern Asia and Taiwa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Tea Industry], p. 66.

49 "Pari Dai-hakurankai ni Ucha no Shuppin wo Kanyū [Soliciting the Exhibition of Oolong tea at the Paris World Exposition]," *TN*, July 26, 1924, am ed., p. 2.

was the upper classes of New Amsterdam who initiated tea consumption in the Americas.[50] Starting in the early 1720s, British consumer goods gained popularity in the thriving towns of Eastern and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By the mid-18th century, both in North America and London, the middle class, with the means to indulge in leisurely activities, began frequenting “tea gardens” dedicated to tea drinking.[51]

The Boston Tea Party of 1773, historically rememb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War of 1812 fought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Great Britain, hindered the growth of British-style tea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Subsequently, coffee from Latin America gained popularity. Nevertheless, American consumers had a preference for Chinese tea. In the 1840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a Clipper,” a fast-moving ship, accelerated the transport of new tea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844,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the Treaty of Wangxia (望廈條約) with China, ensuring a steady flow of tea trade, which persisted until around the 1880s.[52]

During this period, advocates of temperance enthusiastically organized massive tea parties throughout the States. In the 1880s, tea planters from India and Ceylon made inroad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Nevertheless, for American consumers, tea evoked unpleasant memories of colonial subordination and was, furthermore, viewed as a beverage more suitable for women than men, not aligning with the masculine American palate.[53]

Thomas Lipton is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British businesspeop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Upon acquiring land in Ceylon in 1890, tea planters in Ceylon bestowed upon him the title of “The Greatest Tea Grocer in the World.”[54] Lipton received subsidies from the growers’ association in Ceylon and showcased his Ceylon tea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in Chicago in 1893. He achieved celebrity status in the world of commerce and persuaded Ceylon planters that he would establish hundreds of retail outlets and allocate substantial resources to promote Ceylon tea in America. However, in reality, he operated as a wholesaler, selling Lipton’s teas through established

---

50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p. 103-104.

51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 204.

52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p. 115-128, 234.

53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p. 191, 207.

54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 195.

vendors, and spent a small fortune on a "Continent-wide advertising campaign"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hich proved highly successful.[55]

The promotion of Indian and Ceylon black tea in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d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or Japanese green tea.[56] Starting with the highly successful Centennia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in Philadelphia in 1876,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extensive advertising efforts for green tea.[57]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showcased impressive exhibits at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in Chicago in 1893 and conducted extensive advertising campaign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Japan, Taiwan (Formosa), China, Ceylon, and India vied for the attention of American consumers.[58]

In this context, Formosa Oolong gained popularity to cater to American preferences.[59] In the United States, oolong tea was consumed with milk, lemon, and other ingredients, in addition to sugar.[60] Like black tea, it became customary to enjoy hot oolong tea with milk and cold oolong tea with lemon.[61] New York and Boston were the primary hubs for oolong tea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erved as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tea exports from Fuzhou and Xiame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62] and for Taiwanese oolong te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olong tea was predominantly sought after by the upper clas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63]

In 1904,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referred to as the St. Louis World's Fair, was hosted in St. Louis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nial of the 1803 Louisiana Purchase. Japan actively engaged in this event, partially to garner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ongoing Russo–Japanese War.[64] During this

---

55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p. 196, 198;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 372.

56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 355.

57 William H. Ukers, M.A., *All about Tea*, Vol. II, p. 216.

58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 198.

59 "Chagyō Chōsa [Tea Industry Survey]," *TN*, Aug. 10, 1897, am ed, p. 2.

60 "Hokubei niokeru Taiwan Ūroncha no Jōkyō [The Situation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in North America]," *TN*, Jan. 17, 1902, am ed., p. 2.

61 Ryō Sugimoto, *Kinshu no Kuni o Miru* [Looking at the Land of Prohibition] (Taipei: Taipei Esperanto Society, 1928), pp. 291-292.

62 "Ūroncha no Shōrai [The Future of Oolong Tea]," *TN*, July 21, 1908, am ed., p. 2.

63 "Ūroncha Hanro Kakuchō Keikaku (Jō) [Oolong Tea Sales Expansion Plan (Part 1)," *TN*, May 11, 1911, am ed., p. 5.

64 Machiko Kusumoto, "Bankoku Hakurankai to Kōshitsu Gaikō: Fushimi-no-miya Sadaharu Shinnō to 1904-nen Sentoruisu Banpaku [World Exposition and Imperial Diplomacy: Prince Fushimi-no-miya Sadanaru and

exposition,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introduced the Kinkaku Tea Pavilion (金閣喫茶店), designed in the likeness of the Golden Pavilion (金閣寺) in Kyoto, offering Japanese tea. This initiative received financial back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農商務省) of Japan. Additionally, the Formosa Tea Pavilion (臺灣喫茶店), designed as a Taiwanese-style palace, was commissioned and sponsored by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65] Notably, the Formosa Tea Pavilion outperformed the Ceylon Black Tea House.[66] The period surrounding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witnessed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oolong tea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nstrating the impact of sales promotion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exposition.[67]

During World War I, Indian, Ceylon, and Java teas, which had lost their sales channels in the European market, entered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affected by this economic downturn. However, by approximately 1920, oolong tea's distribution channels expanded, reaching the Midw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ccounted for 48%, Boston for 18%, Chicago and the central region for 5%, the West and Pacific Coast for 14%, and other regions for approximately 15% of the sales. Oolong tea became synonymous with high-quality tea in the 1920s,[68] and in the late 1930s, it was served in upscale hotels, while its lower-grade varieties were blended with black tea.[69]

Notably, in 1923, most of the tea in the global market originated from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South Asia, with 46.6% from India and 23.5% from Ceylon, as estimated by Harrisons & Crosfield, a British tea trading company. Tea from the Dutch colonies of Java and Sumatra was the primary competitor (13.6%). Chinese tea accounted for only 10.2%, with Japanese and Taiwanese tea representing merely 3.1% and 2.9%, respectively.[70] In the same year, annual tea consumption

---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Aichi Shukutoku Daigaku Ronshū: Bungaku-bu, Bungaku-kenkyūka Hen* [Bulletin of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ichi) 35 (March 2010), pp. 31-43.

65 Nō-shōmu-shō, ed., *Sentoruisu Bankoku Hakurankai Honpō Sandō Jigyō Hōkoku* [Japan Collaborative Project Report for the St. Louis World's Fair] (Tokyo: Nō-shōmu-shō, 1905), Vol. 2, pp. 665-678.

66 "Taiwan Kissaten Gaikyō [A General Overview of Taiwanese Tea House]," *TN*, Feb. 19, 1905, am ed., p. 2.

67 "Beikoku niokeru Ūroncha [Oolong Tea in the United States]," *TN*, May 13, 1905, am ed., p. 2.

68 "Ūroncha no Kiki to Kongo no Taisaku (Jō) Bō Jitsugyōka Dan [The Crisis of Oolong Tea and Future Strategies (Part 1), A Discussion with a Certain Businessperson]," *TN*, Oct. 11, 1920, am ed., p. 2.

69 "Ūroncha ha Kōhyō, Hinshitsu Kaizen ni Nao Doryoku wo Yōsu [Oolong Tea Receives Praise: Further Efforts Needed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TN*, Feb. 27, 1939, am ed., p. 2.

70 J. M. Keynes, "Stocks of Staple Commodities," *London &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 *Special Memorandum* (London) 6 (June 1924), p. 15.

in Britain and Ireland, the world's largest tea-consuming nations outside of East Asia, stood at about 410 million pound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cond-largest consumer, reached approximately 100 million pounds.[71]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ket, Japanese and Taiwanese teas held significant weight, with Japanese tea accounting for 21.5% and Taiwanese tea for 11.5% of tea imports in 1924-1925.[72]

During 1920-1933, the era of Prohib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a gained popularit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4 p.m. tea break became common.[73]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d as the world's leading consumer of tea. However, around 1924-1925, Indian and Ceylon black tea accounted for approximately 40% of the total tea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aiwanese oolong tea making up only about 12%, not far behind Japanese green tea, which constituted roughly 20% of the total.[74]

Per the American tea vendors in 1927, Americans displayed a preference for robust Ceylon tea and Brazilian coffee. Oolong tea, which was stronger in flavor compared with Japanese green tea, found favor among women in the Eastern states, including New York and Boston.[75] In the 1930s, market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tea was predominantly viewed as a beverage for women, and American tearooms were considered feminine spaces.[76]

The Southern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significant coffee consumers. However, a 1937 report by a correspondent commissioned by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stationed in Houston, indicated a growing consumption of iced tea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with Ceylon black tea and Taiwanese oolong tea, particularly Lipton black tea, being popular choices. In the 1930s, the volume of tea imports into New Orleans and Houston, includ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increased rapidly.[77]

---

71 J. M. Keynes, "Stocks of Staple Commodities," pp. 14-15.

72 Ryō Sugimoto, *Kinshu no Kuni o Miru* [Looking at the Land of Prohibition], p. 292.

73 "Ūroncha no Hanro ha Beikoku de ha Madamada Nobiru [The Market for Oolong Te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Expand]," *TN*, March 5, 1924, am ed., p. 2.

74 "Senden wo Yō suru Ūroncha, Sono Zento ha Masumasu Yūbō to [Oolong Tea in Need of Promotion, Its Future Looks Even More Promising]," *TN*, April 28, 1925, am ed., p. 2.

75 "Saikin Beikoku deha Seika ga Ochita Nihoncha, Ūroncha ha Tashō Kangei-saru [Japanese Tea Has Recently Lost Favor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Oolong Tea Is Somewhat Welcomed]," *TN*, April 30, 1927, pm ed., p. 1.

76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 233.

77 "Senden ga Kanjin, Saininnsiki sareta Taiwan Ūroncha [Advertising is Crucial: Reevaluat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TN*, April 10, 1937, am ed., p. 3.

During the Golden Gate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in 1939-1940, Taiwanese tea vendors established teahouses to promote Taiwanese oolong and black tea.[78] By this time, although public sentiment against Japan was stro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olong tea was well-received, and some establishments in New York continued to serve oolong tea even after the fair concluded.[79]

3. Oolong Tea Consumption Culture in Imperial Japan

(1) From English Black Tea to Taiwanese Oolong Tea

The importation of black tea, known as *Benicha* (紅茶), to Japan, can be confirmed through an advertisement for "Yokohama 81ban Toan-ten" in the *Bankoku Shimbunshi* (萬國新聞紙), Volume 12. This newspaper was edited by an English teacher, presumably named Bailey, and published by Yokohama Publishing in early May 1868. This was the first black tea to appear in Japanese literature.[80] The term "紅茶" in Japanese, now pronounced as *Kocha*, which translates to black tea, was established by Tada Motokichi (多田元吉) and others. They were dispatch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learn tea-making techniques in Qing in 1875 and in India in 1876.[81] Tada partially translated Edward Money's work,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ondon by W.B. Whittingham and in Calcutta by Thacker. The exact year of its first publication is unknown; however, the third edition was released in 1878. Tada'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Kōcha setsu* (紅茶說) [The Theory of Black Tea] by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al Recommendations (勸農局) in 1878. In

---

78 "Nyū Yōku Hakurankai ni Kissaten wo Chokuei, San-kō Haku nimo Wancha Senden [Directly Operating Tea House at t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Also Promoting Taiwanese Tea at the Expo in San Francisco]," *TN*, Feb. 2, 1939, am ed., p. 2.

79 "Amerika niokeru Shōnō to Ūroncha, Senbai-kyoku Sanji Kawazoe Shūhei Dan [Cambphor and Oolong Tea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iscussion with Special Monopoly Bureau Counselor Shuhei Kawazoe]," *TN*, Feb. 25, 1941, am ed., p. 2.

80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 351.

81 Takashi Sasaki, "Nihon no Kōcha Juyō-shi: Kokucha kara Kōcha he [The History of Tea Acceptance in Japan: From Black Tea to Red Tea]," *Musashino Gakuin Daigaku Nihon Sōgō Kenkyūjo Kenkyū Kiyō* [Bulletin of the Musashino Gakuin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Saitama) 3 (March 2005), p. 167.

the same year, he authored a book titled *Kōcha seihō sanyō* (紅茶製法纂要) [The Compendium of Tea Manufactures], once again published by the Bureau.

Noteworthily, in S. W. Williams'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ed in Shanghai in 1874, the term for black tea is "黑茶" (black tea).[82] However, in H. A. Ga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London, Shanghai, and elsewhere in 1892, black tea is described as "紅茶" (red tea).[83] It is essential to highlight that today, black tea is referred to as *Hongcha* (紅茶) in Chinese, which translates to "red tea." This distinction in terminology arises because, while the five major Chinese teas (green, white, blue, yellow, and black) are classified by the appearance of the tea leaves, *Hongcha* (red tea) is named after the color of the tea. This nomenclature is supposed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and was subsequently introduced to China.[84]

Black tea production in Japan is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to have commenced in 1874 when the Kangyōryō (勸業寮) department within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compiled a manual, *The Black Tea Production Method Book* (紅茶製法書), and experimented with the Chinese tea-making process. Subsequently, trials of oolong tea production began in Oita Prefecture in 1875, and attempts were made to export these teas in 1880. These export efforts encompassed black tea produced by agricultural training schools (傳習所).[85]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se endeavors was the desire of Japanese tea traders to stabilize tea prices. They aimed to achieve this by diversifying tea production and exports to include black and oolong tea, in addition to green tea. The goal was to prevent over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exportation of green tea.[86]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practice of tea drinking in Japan had extended beyond intellectuals and affluent individuals with an interest in Western culture. This shift is exemplified in Izumi Kyōtarō's (泉鏡太郎) (also known as Izumi Kyōka) novel, *Yushima Pilgrimage* (湯島詣), published in Tokyo by Shunyōdō

---

82 S. Wells Williams, LL.D.,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CH'A," p. 5.

83 Herbert A.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892), p. 537.

84 Takashi Sasaki, "Nihon no Kōcha Juyō-shi: Kokucha kara Kōcha he [The History of Tea Acceptance in Japan: From Black Tea to Red Tea]," p. 168.

85 Nōrin-shō Nōmu-kyoku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ureau of Agriculture], ed., *Meiji Zenki Kannō Jiseki Kyūroku* [Early Meiji Period: A Compi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motion Achievements] (Tokyo: Great Japan Agricultural Society, 1939), Vol. 2, pp. 1273, 1280.

86 "Taiwan Ūroncha no Mosei [The Imitation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AS*, Sept. 1, 1887, am ed., p.1.

(春陽堂) in 1899, which opens with the phrase, "It"s a treat of black tea (紅茶の御馳走だ)."[87] Renowned haiku poet Masaoka Shiki (正岡子規), in his work, *Gyōga Manroku* (仰臥漫錄),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by Iwanami Shoten in 1927, noted that he consumed black tea with milk on several occasions in September 1901, as documented in his sickbed notes from a year before his demise.[88] Furthermore, renowned writer Nagai Kafū (永井荷風)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fter Black Tea*, released in Tokyo by Momiyama Shoten in 1911.[89]

In approximately 1906,[90] Lipton's Ceylon black tea debuted in the Japanese market through Meidi-ya (明治屋), a Western liquor and food trading company, and became accessible through numerous retail establishments. It became popular, emerging as the quintessential British black tea representation in Japan. This tea was marketed alongside a collection of tableware designed for coffee and tea, complete with photographic depictions.[91] However, throughout the 1920s,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lack tea predominantly entered the market through a restricted number of retail channels.[92]

Taiwanese tea exports originated in the 1810s when Chinese merchants in Xiamen introduced tea cultivation to Taiwan.[93] John Dodd, a Scottish merchant,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by bringing tea seeds from Anxi County, Fujian Province, known for oolong tea cultivation, to Taiwan in 1865.[94] He oversaw the cultivation by local farmers and initiated exports through Danshui, via Xiamen, in 1867.[95] The export of Taiwanese tea, safeguarded against deterioration through thorough

---

87 Kyōtarō Izumi (Kyōka Izumi), *Yushima Mōde* [Yushima Pilgrimage] (Tokyo: Shunyōdō, 1899), p. 1.

88 Shiki Masaoka, *Gyōga Manroku* [Penning While Lying in a Sickbed] (Tokyo: Iwanami Shoten, 1927, First Edition; 2022, Revised and New Edition), pp. 16, 27, 32, 37, 40, 82;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p. 384-385.

89 Kafū Nagai, *Kōcha no Ato* [After Tea] (Tokyo: Momiyama Shoten, 1911), p. 2;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p. 396-397.

90 Japan Tea Association, ed., *Nijū Seiki no Nihon Kōcha Sangyō-shi*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Japan's Black Tea Industry] (Tokyo: Japan Tea Association, 2003), p. 44; Yukio Haruyama, *Kōcha no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p. 385; Yoshirō Matsuzaki, *Nenpyō: Cha no Sekai-shi* [Chronology: A World History of Tea], p. 182.

91 *Mitsukoshi*, "Kōhī Kōcha Setto [Coffee and Tea Set]," *Mitsukoshi* (Tokyo) 2: 12 (Nov. 1912), p. 54.

92 Zen-Nihon Kōcha Shinkō-kai [All Japan Black Tea Promotion Association], ed., *Kōcha Hyakunen-shi* [A Hundred Years of Black Tea History] (Tokyo: All Japan Black Tea Promotion Association, 1977), p. 244.

93 William H. Ukers, M.A., *All about Tea*, Vol. II, p. 230.

94 Yatang Lian, *Taiwan Tongshi*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Taipei: Taiwan Tongshi She, 1921), Vol. 2, p. 735.

95 William H. Ukers, M.A., *All about Tea*, Vol. II, p. 230.

drying by foreign traders, witnessed steady expansion.[96] The Taiwanese tea industry held significant economic importance, supporting Taiwan's economy from the opening of Danshui Port in 1860 under the Treaty of Tianjin until the advent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owever, its prominence waned as Japanese capital investments bolstered the rice and sugar industries, reducing the tea industry's influence over the Taiwanese economy.[97]

Figure 1 illustrates that Taiwan's tea exports reached their peak in 1893, 1918, and 1954. The 1918 peak was a result of the mechanization of tea production, which was promoted by engineer Tanabe Ichirō (田邊一郎)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From 1896 to 1964,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primary importer of Taiwanese, followed by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he Dutch East Indies (Indonesia). Japan and Britain held the fifth and sixth positions, respectively.[98] Until 1920, oolong tea dominated the tea exports from Taiwan. However, in the 1920s, there was close competition with Pouchong tea. Oolong tea was eventually surpassed by Pouchong tea in the late 1920s and by black tea in the mid-1930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Asia-Pacific War in 1941, the export of oolong tea from Taiwan nearly came to a halt.[99] Taiwanese Pouchong tea initially emerged to enhance the appeal of unsold and deteriorating low-quality Taiwanese oolong tea by infusing it with a floral fragrance. Over time, only superior varieties suitable for Pouchong tea were carefully selected and cultivated. Additionally, coarse tea has been developed to impart fragrance without additional flowers. By the 1920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emand for Pouchong tea in Java among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d by the 1930s, it had gained substantial popularity in Thailand and Manchuria.[100]

---

96 Junko Konno, "Nihon Tōchiki niokeru Taiwan-cha no Hen'yō to Taiwan Chagyō no Hensen: 'Cha' no Motsu Nōsakumotsu to Shikō-sei no Shiten kara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Tea and Evolu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 Perspective on the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latability of 'Tea']," pp. 22-37.

97 Naoto Kawarabayashi, *Kindai Ajia to Taiwan: Taiwan Chagyō no Rekishi-teki Tenkai* [Modern Asia and Taiwa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Tea Industry], pp. 187-188.

98 Taiwan qu Cha Shuchuye Tongye Gonghui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ed., *Taiwan Shuchu Bainian Jianshi* [The Historical Brevities of Taiwan Tea Export, 1865-1965] (Taipei: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1965), pp. 9, 15-16, 20, 29.

99 Peikai Chen, "Taiwan Wulongcha zhi Jianglai [The Future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Taiwan Nongye Tuiguang Tongxinxun* [Taiwan Agricultural Promotion Newsletter] (Taipei) 1: 3/4 (Nov. 30, 1947), p. 5.

100 Junko Konno, "Nihon Tōchiki niokeru Taiwan-cha no Hen'yō to Taiwan Chagyō no Hensen: 'Cha' no Motsu Nōsakumotsu to Shikō-sei no Shiten kara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Tea and Evolution of the T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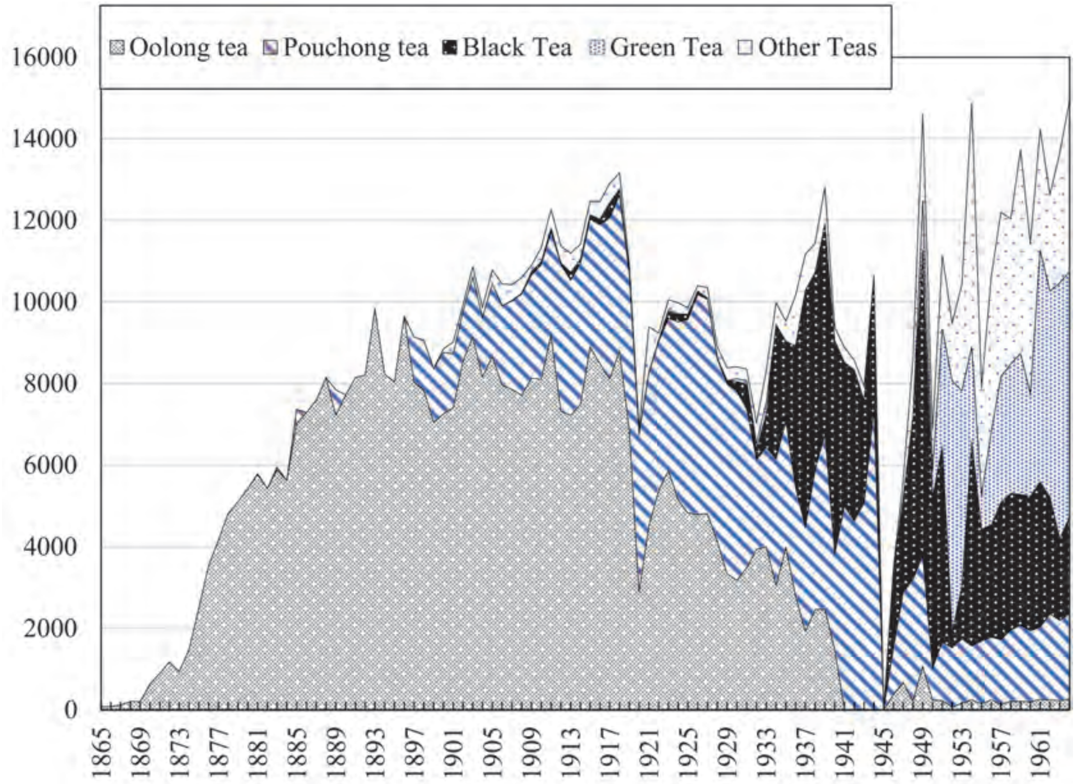

Figure 1 Taiwan's exports of various types of tea leaves (1865-1964)

Notes: Units for export volume are in tons per year.

Source: Compiled by the author from statistical tables in Taiwan qu Cha Shuchuye Tongye Gonghuì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ed., *Taiwan Shuchu Bainian Jianshi* [The Historical Brevities of Taiwan Tea Export, 1865-1965], end of volum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oolong tea production involved exposing freshly plucked leaves to sunlight to enhance aroma through the evaporation of moisture. Additionally, an indoor withering machine was utilized for further drying. After the edges of the leaves underwent fermentation, they were pan-fried at high temperatures to halt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Subsequently, the leaves were kneaded into clumps, followed by loosening, and ultimately, they were dried again. Locally produced coarse tea was purchased by intermediaries and sold to tea processing factories (再製茶館). Notabl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Industr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 Perspective on the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latability of 'Tea'],” pp. 37-86.

of the Taiwan Tea Cooperative Sales Office (臺灣茶共同販賣所) in 1923, approximately 20% of coarse tea began to be sold directly from tea farmers to processing factories or export traders, bypassing intermediaries. The processing factories sorted the tea leaves based on quality, shape, size, and grade and dried them in roasting ovens. These factories repackaged the reprocessed oolong tea into boxes and submitted samples to export merchants. Export merchants examined and evaluated the samples and conducted transactions after negotiations.[101] Export traders in Taipei involved in the oolong tea trade included Japan's Mitsui & Co., the Nozawa Group, and the United Kingdom's Tait & Co. (德記), Ltd., and Jardine & Matheson & Co., Ltd. (義和). Additio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sented by The Anglo-America Direct Tea Trading Co. (新華利) and Carter Macy Tea & Coffee Co. Inc (美時).[102]

In 1901,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stablished an experimental station for tea tree cultivation. In 1903, a model tea processing experimental station was inaugurated to initiat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cal production of oolong and black tea. While tea production in Taiwan was initially manual, the use of tea-processing machinery experienced a surge in the 1910s. In 1918,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promoted a ten-year plan to encourage the tea industry, focusing on improving varieties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ea processing machinery, and advancements in tea processing techniques.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superior tea seedlings was initiated in the same year. In 1923,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issued tea inspection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standards for Taiwanese tea, encouraged inspections of export-grade oolong and Pouchong teas, and eliminated substandard products to prevent the production of inferior teas. In 1930,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stablished a Tea Industry Training School to foster the training of Taiwanese tea manufacturers.[103]

---

101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Chagyō Ippan* [Entire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1920), pp. 88-91;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Taiwan Chagyō Yōran* [Manual of the Taiwanese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Publication Year Unknown), pp. 12-18.

102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okusan-ka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Taiwan no Chagyō* [Tea Industry in Taiwan] (Taipei: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1937), p. 37.

103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Taiwan Chagyō Yōran* [Manual of the Taiwanese Tea Industry], pp. 14-15;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okusan-ka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However, according to Konno's recent research, while reducing labor, time, and costs, the mechanization of tea processing did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instance, the model tea-processing experimental station introduced machinery used for black tea in India and Sri Lanka. It was unsuitable for producing oolong tea in Taiwan, leading to its closure in 1910.[104] Nevertheless, Taiwanese oolong tea gained recognition in exhibitions on the Japanese Mainland. Behind this success were the creative ingenuities of local tea farmers and merchants,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s efforts to improve and enlighten tea cultivation and processing techniques, and the rigorous tea inspection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and export traders.

Additionally, another noteworthy company is The Mitsui General Partnership Company (三井合名會社). It was established in 1868 and has been known as Mitsui Nōrin Co., Ltd. (三井農林株式會社) since 1942, initiated its operations in Taiwan in 1898. By around 1921, it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oolong and Pouchong tea. In 1927, they experimented with producing black te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by 1930, full-scale production of black tea began. Furthermore, the company introduced tea trees from Assam in India. In 1936, they founded the Nittō Colonizati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 Ltd. (日東拓殖農林株式會社) and marketed their product as Nittō Black Tea (日東紅茶). This tea was distributed through Mitsui & Co., Ltd. and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other countries.[105] The name was adopted in 1930,[106] chosen to resemble the sound of Lipt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the most popular black tea of that era.[107] During the 1930s, black tea from Taiwan achieved a level of quality at par with black tea from India and Ceylon. Owing to tariffs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Taiwanese black tea gained a significant presence in the Japanese

---

ed., *Taiwan no Chagyō* [Tea Industry in Taiwan], pp. 46-60.

104 Junko Konno, "Nihon Tōchiki niokeru Taiwan-cha no Hen'yō to Taiwan Chagyō no Hensen: 'Cha' no Motsu Nōsakumotsu to Shikō-sei no Shiten kara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Tea and Evolu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 Perspective on the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latability of 'Tea'']," pp. 86-104.

105 Mitsui Nōrin Co., Ltd., ed., *Nijū-nen-shi (Gai-shi) Mitsui Nōrin Kabushiki Kaisha* [20-Year History (Overview) Mitsui Nōrin Co., Ltd.] (Tokyo: Mitsui Nōrin Co., Ltd., 1969), pp. 1-10, 13.

106 Zen-Nihon Kōcha Shinkō-kai [All Japan Black Tea Promotion Association], ed., *Kōcha Hyakunen-shi* [A Hundred Years of Black Tea History], p. 224.

107 Taiwan qu Cha Shuchuye Tongye Gonghui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ed., *Taiwan Shuchu Bainian Jianshi* [The Historical Brevities of Taiwan Tea Export, 1865-1965], p. 13.

mainland.[108]

Noteworthily, Japanese colonists began valuing oolong tea as a souvenir from Taiwan to Japan following the annexation of Taiwan in 1895.[109] By 1905, oolong tea imported from Taiwan was available in certain Western liquor and grocery stores in Tokyo, the imperial capital.[110] A year later, in 1906, oolong tea was being sold in two to three stores in Tokyo,[111] with a Taiwanese tea house (臺灣喫茶店) in Ginza, opened at the end of 1905,[112]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promot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The owner of this tea house, Nakazawa Yasugorō (中澤安五郎), was a relative of the Tanaka family, proprietors of the Higeta Soy Sauce Brewery in Chiba Prefecture.[113] H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臺灣總督府殖產課) to establish the Taiwanese tea house.[114] For advertising,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supplied tea free of charge to Nakazawa's Taiwanese tea house.[115]

During this period in Japan, several people considered oolong tea nearly the same as black tea or *bancha* (番茶); however, Taiwanese oolong tea found favor among the upper class.[116] In his gourmet novel, *Enlarged and Annotated, Gourmand, Sequel, Spring Vol.* (增補註釋　食道樂　續編　春の巻), published in 1906, Murai Gensai (村井弦齋) wrote, "Oolong tea has recently become widely available in Tokyo (烏龍茶も近頃澤山東京へ來ておりますが)," and mentioned that it could be obtained from Taiwan and Fuzhou, and was used to prepare a delightful tea-infused rice dish called as *chazuke-meshi* (茶漬飯).[117]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Taiwanese tea house in Ginza thrived, attracting a diverse clientele that included government officials, students, bank and company employees,

---

108 "Seicha-kai no Mondai, Taiwan Chagyō no Jūshin ha Ūroncha ka Kōcha ka [Tea Industry Issues, Is the Center of Taiwan's Tea Industry Oolong or Black Tea?]," *TN*, April 16, 1934, am ed., p. 5.

109 "Naichi he Miyage-mono toshite [As Souvenirs for the Mainland]," *TN*, Dec. 15, 1896, am ed., p. 3.

110 "Tokyo no Ūroncha Hanbaiten [Oolong Tea Retailers in Tokyo]," *TN*, April 13, 1905, am ed., p. 2.

111 "Naichi niokeru Taiwan-cha [Taiwanese Tea in the Mainland]," *TN*, July 20, 1906, am ed., p. 4.

112 "Taiwan Kissaten no Kaisetsu [Opening of Tea Houses in Taiwan]," *TN*, Dec. 26, 1905, am ed., p. 7.

113 Shinpei Kojima, ed., *Sanhu oyobi Kinkō Meibutu Annai* [Guide to Famous Places and Things in the Three Prefectur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Tokyo: Nihon Meisho Annaisha, 1918), Vol. 1, pp. 77-78.

114 "Tokyo niokeru Ūroncha no Hyōban [The Reputation of Oolong Tea in Tokyo]," *TN*, March 7, 1906, am ed., p. 4.

115 "Naichi niokeru Taiwan-cha [Taiwanese Tea in the Mainland]," *TN*, July 20, 1906, am ed., p. 4.

116 "Naichi niokeru Taiwan-cha [Taiwanese Tea in the Mainland]," *TN*, July 20, 1906, am ed., p. 4.

117 Gensai Murai, *Zōho-chūshaku Kuidōraku-zokuhen Haru-no-maki*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Foodes, Sequel: Spring Volume] (Tokyo: Hobunsha, 1906, First Edition; 1907, Third Edition), pp. 256-260.

Westerners, and Qing Chinese.[118] In 1908,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provided oolong tea from the Testing Ground for Tea Production (製茶試驗場) to the Mitsukoshi Kimono Store (三越呉服店) in Nihonbashi, Tokyo, for promotional purposes. The tea was served in the store's tearoom.[119]

By the end of the Meiji period in the late 1900s, the once highly publicized "New Territory of Taiwan (臺灣新領土)" had receded into the background. Attention had shifted to Kwantung Territory (關東州) and Manchuria, where Japan acquired lease rights from Russia follow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under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in 1905. Japan secured the southern half of Sakhalin, ceded by Russia, and annexed Korea in 1910. Nonetheless, by that time, Taiwanese influence was pervasive in the imperial capital of Tokyo. This influence was not limited to the Taiwanese tea houses and oolong tea. Instead, a preference for Taiwanese folk culture, referred to as Taiwanese tastes (臺灣趣味), was evident in various aspects of Tokyo life, including stores specializing in Danshui caps (淡水帽子) and Aiyu jelly (愛玉只), and architectural styles reminiscent of Taiwan, such as branch offices of the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and Bank of Taiwan.[120] These Taiwanese influences predated the Japanese version of Chinese tastes (支那趣味) introduced by prominent writers, such as Tanizaki Jun'ichirō (谷崎潤一郎), and China connoisseurs (支那通), such as Gotō Asatarō (後藤朝太郎),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is *chinoiserie* spread to include Chinese-style female clothing, called qipao in China and China dress in Japan, Chinese cuisine (支那料理), mahjong (麻雀), folk tools, and popular Japanese-style Chinese continental songs (大陸歌謠).[121] Nevertheless, by the 1930s, Taiwanese influences were also steadily expanding,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aiwanese cuisine as a distinct category, characterized by tropical flavors and local elements, setting it apart from Chinese cuisine.[122]

In particular, rice noodles, known as *mifen* (米粉), were considered a Taiwanese

---

118 "Tokyo niokeru Ūroncha no Hyōban [The Reputation of Oolong Tea in Tokyo]," *TN*, March 7, 1906, am ed., p. 4.

119 "Ūroncha Hanro Kakuchō Expansion of Oolong Tea Sales Channels]," *TN*, Nov. 27, 1908, am ed., p. 3.

120 "Teito no Taiwan Shumi [The Taiwan Taste in the Imperial Capital]," *TN*, Oct. 6, 1911, am ed., p. 7.

121 Kazuhiro Iwama, "Taishūka Suru Shinowazuri: Nihonjin Ryokōsha no Shanghai Imēji to Shanghai no Kankō Toshi-ka [Popularizing 'Chinoiserie': The Impression of Shanghai among Japanese Travelers and Shanghai's Change to a Tourist City]," *Gendai Chugoku* [Modern China] (Tokyo) 87 (Sept. 2013), pp. 17-32.

122 Natsuko Bessho, "Taiwan Ryōri [Taiwanese Cuisine]," *Ryōri no tomo* [Companion of Cooking] (Tokyo) 24: 12 (Dec. 1936), pp. 109-110.

specialty and readily available throughout the region.[123] These noodles could be found in prestigious department stores across mainland Japan. They were often recommended to be enjoyed with oolong tea, renowned for its translucent agate-like color and tropical aroma, or Taiwan-produced flower tea with the fragrant essence of noble jasmine.[124] Moreover, after World War II, Kenmin Foods, established in 1950 in Kobe by the Taiwanese-born entrepreneur, Takamura Kemin (高村健民), emerged as the leading company in the rice noodle industry.[125] Consequently, rice noodle consumption witnessed significant growth, particularly in Kyushu, Kobe, and Yokohama.[126]

Matsuzaki Tenmin (松崎天民, 1878-1934), who would later emerge as a pioneering food journalist with his publication of the magazine *Shokudōraku* (食道樂, 1928-1930), expressed a distinctive perspective in 1913 when introducing the Ginza neighborhood in the *Tokyo Asahi Shimbun* (東京朝日新聞). He remarked, "When I am tired of black tea and I do not like coffee, the most delicious thing is its oolong tea. If the aroma of black tea reminds me of the Western art world, the fragrance of oolong tea reminds me of the political color of Japanese territory."[127] Furthermore, Nakazawa Yasugorō, proprietor of a Taiwanese tea house in Ginza, made an intriguing statement in a 1918 guide to renowned locations in Japan. He mentioned that he opened his establishment to introduce the Japanese people to the authentic flavors of oolong tea, hailed as "a specialty of the newly acquired territories (新占領地の特產物)," and was not concerned about any potential losses.[128]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oolong tea were primarily promoted for colonial development. However, while oolong tea gained popularity as a modern beverage, following black tea and coffee, it continued carrying significant political connotations.

Furthermore, Miyoshi Tokusaburō (三好德三郎, 1875-1939) exemplifie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oolong tea and colonial politics. He traveled to Taiwan

---

123 Masatoshi Yamamoto, *Seikatsu Senryaku: Hadaka Ikkan Seikatsu-hō* [Life Strategy Talks: The Naked and Penniless Lifestyle] (Tokyo: Sakushinsha, 1926), pp. 106-107.

124 Natsuko Bessho, "Taiwan Ryōri [Taiwanese Cuisine]," pp. 109-110.

125 Kenmin Food Corporation's website, accessed Aug. 20, 2023; available form https://www.kenmin.co.jp/company/info.html.

126 "Bīhun, Rekishi (Shokutaku) [Rice Vermicelli, History on the Dining Table]," *Nihon Keizai Shimbun (The Nikkei)* [Japan Economic Newspaper], March 30, 1988, pm ed., p. 9.

127 Tenmin, "Ginza Kaiwai [Around Ginza]," *AS*, April 5, 1913, am ed., p. 5.

128 Shinpei Kojima, ed., *Sanhu oyobi Kinkō Meibutu Annai* [Guide to Famous Places and Things in the Three Prefectur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pp. 77-78.

in April 1899 and, in just over a month, in May, established the Tsujirihei Store (辻利兵衛商店) from Kyoto in Taipei.[129] Within a little over a decade, he earned the distinction of "Taiwan's prominent man (臺灣の名物男)".[130] The Miyoshi family remain the proprietors of one of Japan's most renowned Uji tea (宇治茶) specialty establishments, Gion Tsujiri (祇園辻利). Miyoshi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expanding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s for Taiwanese oolong tea in mainland Japan while simultaneously introducing Uji tea to Taiwan.[131] In May 1900, during the Crown Prince's wedding, who would later become Emperor Taisho, he presented tea to the Crown Prince's Palace. This success surprised Gotō Shinpei (後藤新平), who served as the Secretary of Civil Affairs and assisted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132]

In 1914, to promote domestically produced goods, the Emperor decided to serve oolong tea from Taiwan, instead of the previously favored black tea from India, when entertaining foreign dignitaries at the palace.[133] Thi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shift toward the use of products originating within the imperial territory during significant imperial ceremonies.[134] In response to this shift, the Tsujiri Tea Shop, owned by Miyoshi, presented a unique oolong tea, named *Niitaka-yama* (新高山), to the Imperial Household Ministry. This presentation occurred at the Emperor's coronation ceremony in Kyoto during the autumn of 1915. The tea was branded with the name of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aiwan at the time, now known as *Yushan* (玉山).[135] Furthermore, in 1923, as a commemoration of the Crown Prince's visit

---

129 Shōichi Namikata, *Minkan Sōtoku*: *Miyoishi Tokusaburō to Tsujiri Chaho* [Civilian Governor: Misyoshi Tokusaburō and Tsujiri Tea Shop] (Tokyo: Nihon Tosho Center, 2002), pp. 273, 294-296.

130 "Miyoshi Tokusaburō-kun [Mr. Miyoshi Tokusaburō]," *TN*, Jan. 1, 1911, am ed., p. 7.

131 Lingyi Zeng, "Ujicha to Taiwan Ūroncha: Miyoshi Tokusaburō to Nittai-kan niokeru Cha no Kōryū [Uji Tea and Taiwanese Oolong Tea: Miyoshi Tokusaburō and the Exchange of Tea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Shudan Lin and Mingtzu Chen, eds., *Higashi Ajia niokeru Chi no Kōryū: Ekkyō, Kioku, Kyōsei* [Intellectual Exchanges in East Asia: Cross-Border, Memory, Coexistenc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09-135.

132 Kuo-hsing Hsieh, Shu-min Chung, Naoto Kagotani, and Li-chiao Wang, eds., *Chakuraishanjin no Yitsuwa: Sanhao Desanlang de Taiwan Jiyi* [Anecdotes of Chakuraisanjin, Tokusaburō Miyoshi's Memories of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2015), pp. 310, 402.

133 "Seishi Kyōku ni Taekazu: Yūnyū-cha o haishi [Unable to Withstand the Fear of the Imperial Edict: Discontinuation of Imported Tea]," *AS*, Oct. 12, 1914, am ed., p. 3.

134 "Haru-Aki no Go-taiten ni [At the Banquet for the Imperial Ceremonies of Spring and Autumn]," *TN*, Aug. 28, 1915, am ed., p. 7.

135 "Tsujiri Chaho no Meiyo [The Honor of Tsujiri Tea Shop]," *TN*, Feb. 12, 1917, am ed., p. 5.

to Taiwan, who would later become Emperor Shōwa, Miyoshi's Tsujiri Tea Shop began a tradition of annually gifting special oolong tea to the Emperor and Empress.[136] Miyoshi gained significant renown in the Taiwanese tea industry and established numerous personal connections through his various official roles. In the 1920s, he earned a reputation as a prominent local figur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civil governor (平民總督), owing to his outspoken stance against the policies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137]

In the 1920s, the Taiwanese oolong tea industry faced the necessity of diversifying its sales avenues in Japan, given the stagnation of ex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138] However, a pivotal moment occurred in July 1924 wh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high luxury tariff, imposing a 100% duty on black tea.[139] This sudden shift significantly reduced black tea imports by approximately one-third, creating an opening for Taiwanese oolong tea to explore and expand its presence in Japan.[140] In 1924, Taiwanese oolong tea reached 5,295.3 tons, with export and shipment volume of 5,144.2 tons. Thus, most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destined for export. Of the total export and shipment volume, 85.8% (4,413.8 tons) was direc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as only 0.6% (32.3 tons) found their way to mainland Japan.[141]

Mitsui & Co., Ltd. actively promoted oolong tea by engaging with the Mitsukoshi Kimono Store, renamed as Mitsukoshi Corporation in 1928, and individual tea merchants in various regions. Mitsui distributed complimentary paper packets of oolong tea to tea merchants and tea houses across diverse areas. In doing so, Mitsui explained that oolong tea occupied a middle ground between black and green tea and could be enjoyed without milk, distinguishing it from black tea.[142]

---

136 "Ūroncha no Kenjō [Presentation of Oolong Tea]," *TN*, May 30, 1928, pm ed., p. 2.

137 Shōichi Namikata, *Minkan Sōtoku*: *Miyoishi Tokusaburō to Tsujiri Chaho* [Civilian Governor: Misyoshi Tokusaburō and Tsujiri Tea Shop], pp. 296-299.

138 "Tokyo de ha ima Ūroncha ga Ōmote [Oolong Tea is Currently Popular in Tokyo]," *TN*, Feb. 24, 1924, am ed., p. 2.

139 "Ūroncha no Senden, Imaichi no Kan Ari [Promotion of Oolong Tea: A Sense of a New Momentum]," *TN*, Jan. 12, 1925, am ed., p. 2.

140 "Kōcha Yūnyū Gekigen, Ūroncha Senden no Kōkikai [Sharp Decline in Black Tea Imports, Opportune Moment for Oolong Tea Promotion]," *TN*, July 11, 1925, am ed., p. 6.

141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Taiwan Chagyō Tōkei* [Statistics of Taiwan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1935, Edition), pp. 21-22, 26.

142 "Kōcha ga Shashi-hin to Minasareta no ha Ūroncha Senden no Kōki [The Perception of Black Tea as a

By the end of 1924, Mitsukoshi’s flagship store in Nihonbashi began offering oolong tea as a choice for year-end and New Year’s gifts. They emphasized that domestically produced oolong tea was priced at less than half of the imported Lipton black tea, positioning it as an excellent home beverage that could substitute for both green and black tea.[143]

If we examine the *Tokyo Asahi Shimbun* between December 9, 1925, and March 29, 1931, we find that Mitsui published 195 advertisements for oolong tea and oolong black tea under the company name. Of these, 185 advertisements used the *katakana* form “oolong tea (ウーロン茶),” while only 10 utilized the *kanji* form “oolong tea (烏龍茶)” to describe the product. During this period, Japanese tea vendors routinely employed *katakana*,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West, to promote Taiwanese oolong tea, rather than *kanji*, which was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hina. The majority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oolong tea featured in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had a Western or tropical aesthetic, making it challenging to distinguish it from black tea.

Figure 2　Mitsui & Co., Ltd.’s advertisement for oolong tea and oolong black tea

Source: *Tokyo Asahi Shimbun*, Dec. 11, 1925, am ed., p. 11.

Luxury Is An Opportune Moment for Oolong Tea Promotion],” *TN*, Aug. 21, 1924, pm ed., p. 2.

143 “Ūroncha, Mitsukoshi no Yikkai [Oolong Tea at Mitsukoshi’s First Floor],” *AS*, Dec. 17, 1924, am ed., p.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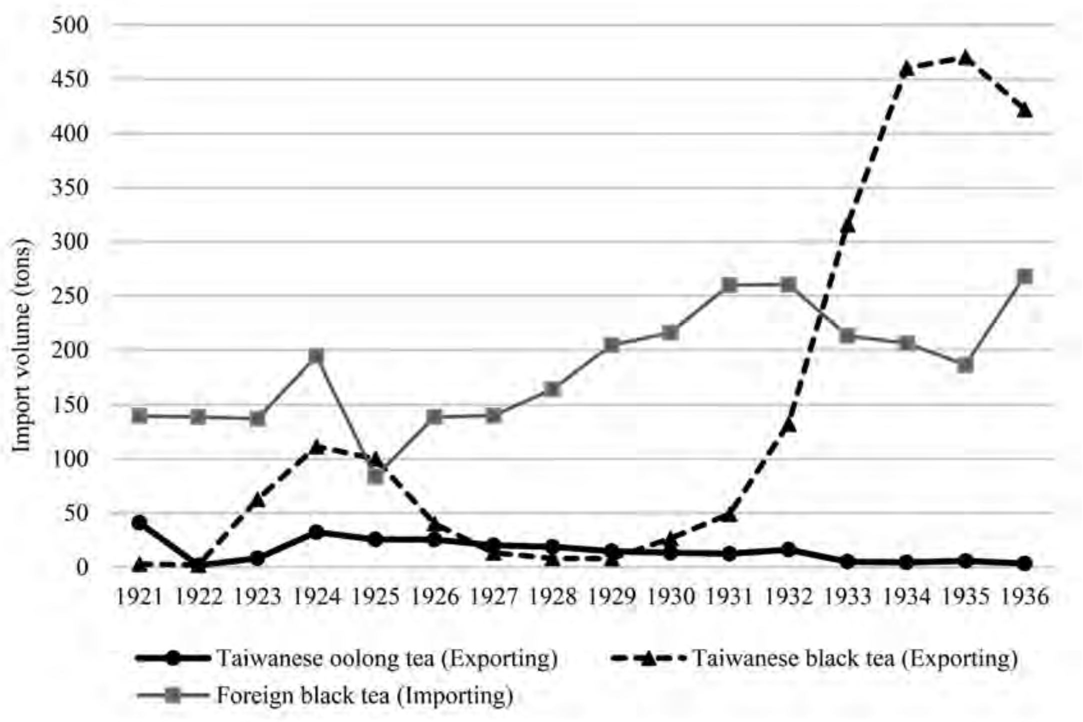

Figure 3　Japan's import quantities of oolong and black tea (1921-1936)

Note: Taiwanese oolong and black tea represent the quantities exported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Japan 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he statistics for black tea reflected the quantities impor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were sourced from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Tax Bureau, the Tariff Section (大蔵省主税局関税課).

Source: Compiled by the author from statistical tables in Taiwan Sōtokufu Zeikan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Customs Office], ed., *Taiwan Bōeki Nenpyō* [Annual Return of the trade of Taiwan (Formosa)] (Taipei: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Customs Office, 1918-1924);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Taiwan Chagyō Tōkei* [Statistics of Taiwan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1929 and 1939, Editions).

In Japan, a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oolong tea was often encouraged to be combined with black tea, added sugar, milk, and lemon, or made into iced tea, mirroring the trends of black tea.[144] The advertisements from that era reveal a marketing approach that promoted oolong tea as a viable

144 Yoshisuke Nagaoka, "Kokusan-hin wo Aiyō seyo: Taiwan Ūroncha to Kōcha wo Suishō-su [Embrace Domestic Products, Advocat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and Black Tea]," *Jitsugyō Jidai* (Tokyo) 7: 10 (Oct. 1930), pp. 58-61.

alternative to black tea. Noteworthily, before World War II, English-style milk tea held sway as the predominant tea variety in Japan, while the post-war period saw the rise of American-style lemon tea,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Occupation Forces.[145]

The strategy employed to market oolong tea from colonial Taiwan with a modern Western image, akin to the image associated with black tea from England, aligned with the Chinese tastes that surfaced in Japan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and experienced a partial resurgence in the 1980s. Chinese tastes in 20th-century Japan often directed its focus toward the Western world, creating a romanticized vision of Asia based on convenience,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e stark realities of imperialist domination in Asia.

Nagaoka Yoshisuke (永岡芳輔), who had spent eight years as a reporter in Taiwan before relocating to Tokyo, advocated for Taiwanese oolong and black tea with the slogan, "Destroy foreign tea, love domestic tea (外國茶驅逐、國產茶愛用)" in 1930-1931. Oolong tea, much like black tea, was often mistakenly perceived as a "foreign product (舶來品)" and a "luxury cultural taste product (高級文化嗜好品)." However, Nagaoka underscored that oolong tea was a high-quality domestic product rather than a luxury item.[146] He emphasized that oolong tea had its origins in China and was, in fact, a Japanese domestic product, despite its Western-style allure.

Furthermore, Gotō Asatarō positioned Taiwanese oolong tea as the most renowned Chinese tea in Japan.[147] The perception that oolong tea, a minor tea variety in China, was a representative Chinese tea, rather than merely a Western-style substitute for black tea, had a relatively lower prominence in Japan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However, it gained mainstream recognition in the late 1970s.

As mentioned above,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introduced and promoted in various ways, associating it with Western culture, domestic products, and Chinese

145 "Bimi no Kigen, Kōcha Chūgoku ga Gensan, Eikoku ga Sekai ni [The Origin of Delight: Black Tea, Originating in China, Blossomed Worldwide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Yomiuri Shimbun* [Yomiuri Newspaper], Sept. 4, 1988, am ed., p. 14.

146 Yoshisuke Nagaoka, "Kokusan-hin wo Aiyō seyo: Taiwan Ūroncha to Kōcha wo Suishō-su [Embrace Domestic Products, Advocat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and Black Tea]," pp. 58-61; Yoshisuke Nagaoka, *Ryōfū Hitsusen-roku* [Records of Pen Battles in the Refreshing Breeze] (Tokyo: Jitsugyō Jidaisha, 1931), pp. 142-149, 272.

147 Asatarō Gotō, *Omosiroi Shina no Fūzoku* [Interesting Customs of China] (Tokyo: Osaka Yagō Shoten, 1923), pp. 98-99.

tea. Despite these efforts, exports to Mainland Japan steadily declined, reaching 12.2 tons in 1931 and 4.5 tons in 1934, each setting a record low.[148]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uxury tariff in 1924, which reduced the import of foreign black tea, did not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import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see Figure 3). While Taiwanese oolong tea attracted attention as a novelty in the consumer culture of modern Japan, it failed to achieve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market expansion compared with other Taiwanese products such as sugar and rice.

(2) Expositions and Gatherings: The Spread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throughout the Empire

From March to July 1903,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 was held in Tennoji, Osaka. This exposition marked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Japan's vigorous adoption of imperialistic exhibition practices.[149]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inaugurated the Taiwan Pavilion, the first of its kind at a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aimed at introducing Japan's newly acquired territory to the people of mainland Japan.[150] The Taiwan Pavilion influenced similar colonial showcases from France, Russia, the Netherlands, Britain, and other nations at the 1900 Paris Exposition.[151]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had exhibition experience at the Hanoi Exposition held in French Indochina in 1902-1903. This knowledge was lever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Pavilion at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in Osaka, which commenced a month later.[152]

---

148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Taiwan Chagyō Tōkei* [Statistics of Taiwan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1937, Edition), p. 26.

149 Toshiya Yoshimi, *Hakurankai no Seijigaku: Manazashi no Kindai* [Political Science of Expositions: Modern Perspectives] (Tokyo: Chūōkōron-shinsha, 1992), pp. 212-213.

150 Hiroshi Tsukide, *Taiwan-kan* [Taiwan Pavilion] (Taipei: Dai-gokai Naikoku Kangyō Hakurankai Taiwan Kyōsan-kai [Taiwan Support Association for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1903), pp. 1-2.

151 Ichitarō Hitomi, "Pari Hakurankai niokeru Kakukoku Shokuminchi no Sekkei nitsuite (Dōjō) (Shōzen) [On the Design of Coloni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t the Paris Exposition (Ditto) (Continued)]," *Taiwan Kyōkai Kaihō* [Taiwan Association Bulletin] (Tokyo) 31 (April 1901), pp. 7-12; 32 (May 1901), pp. 5-12; Mamiko Itō, *Meiji Nihon to Bankoku Hakurankai* [Meiji Japan and World Expositions], p. 108.

152 Yukio Hiyama, "Hanoi Hakurankai to Taiwan Sōtokufu: Panfuretto 'EXPOSITION DE HANOÏ' o Chūsin-ni' [The Hanoi Exposition and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Focusing on the Pamphlet 'EXPOSITION DE HANOÏ'," in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Chūkyō University, ed., *Taiwan Sōtokufu Bunsho Mokuroku* [Catalog of Documents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 (Tokyo: Yumani Shobou, 2001), Vol. 8, pp. 680-682;

During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the Taiwan Pavilion stood out with its Chinese-style architecture; however, it prominently featured numerous Japanese flag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avilion.[153] This duality reflected the inherent tension within the colonial empire, wherein efforts were invested to culturally differentiate Taiwan, a country within the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from Japan, while simultaneously attempting to politically detach Taiwan from China and bring it under Japanese sovereignty.[154] From May 1 to 2, 1903, the Emperor and Empress "poured out their hearts for the new territory of Taiwan" by visiting the Taiwan Pavilion.[155]

Moreover, the imperialistic character of the exposition is exemplifi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ademic Humankind Pavilion (學術人類館). The controversial practice of showcasing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ften referred to as native villages or human exhibitions, emerged at the Paris Exposition of 1889[156] and gained popularit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870s to 1910s.[157] It reached its zenith when the St. Louis World's Fair of 1904 hosted the largest such exhibition, featuring 1,200 individuals from various tribes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58] The Academic Humankind Pavilion at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in 1903 featured exhibitions showcasing the daily lives of various groups, including the Ainu of Hokkaido, native Han Chinese (土人), and indigenous people (生蕃, 熟蕃) from Taiwan, as well as individuals from Ryūkyū, Korea, India, Java, Malaya, Turkey, and Zanzibar Island in Africa. Subsequently, owing to protests from the Qing Dynasty, the Korean Empire, and Okinawa Prefecture, the exhibitions involving these populations were canceled. However, exhibitions featuring other

---

"Hanoi Hakurankai no Shisatsu [Inspection of the Kawachi Exposition]," *TN*, March 24, 1903, am ed., p. 1.

153 *Fūzoku Gahō*, "Taiwan-kan [The Taiwan Pavilion]," *Fūzoku Gahō* [Illustrated News of Customs] (Tokyo) Special Supplement 269 (Month Unknown, 1903), pp. 34-35, with an illustration.

154 Junichirō Abe, *〈Idō〉 to 〈Hikaku〉 no Nihon Teikoku-shi: Tōchi Gijyutsu toshiteno Kankō, Hakurankai, Fīrudo Wāku* ['Movement' and 'Comparison' in Japanese Imperial History: Sightseeing, Exposition, and Fieldwork as Governing Technologies] (Tokyo: Shinyosha, 2014), pp. 156-157.

155 Hokushūsei, "Ryōheika no Taiwan-kan Gojyunran [Their Majesties' Tour of the Taiwan Pavilion]," *TN*, May 8, 1903, am ed., p. 2.

156 Mamiko Itō, *Meiji Nihon to Bankoku Hakurankai* [Meiji Japan and World Expositions], p. 114.

157 Rikke Andreassen, *Human Exhibitions: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Ethnic Display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 18.

158 Toshiya Yoshimi, *Hakurankai no Seijigaku: Manazashi no Kindai* [Political Science of Expositions: Modern Perspectives], pp. 184, 198-199, 213.

groups continued as planned.[159]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Public Association (臺北茶商公會), a collective of tea traders, initiated a fundraising campaign and established a tea house within the Taiwan Pavilion to promote Taiwanese tea.[160] The association perceived the exposi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replace black tea with oolong tea on the Japanese mainland.[161] The Taiwanese-style tea house gained immense popularity owing to the distinctive attire, hairstyles, and bound feet (纏足) of the Taiwanese women who served tea and offered sweets to visitors from mainland Japan.[162] Additionally, Japanese residents in Taipei engaged Taiwanese cooks and waitstaff to operate Taiwanese restaurants within the Taiwan Pavilion.[163] Taiwanese cuisine was advertised on the flyer as "the best culinary method that incorporates essence from Chinese cuisin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world's finest, as well as from the cuisines of other civilized nations."[164] In practice, the cuisine was an eclectic adaptation tailored to the tastes of mainland Japan.[165]

At the Taiwan Pavilion, the female staff working in Taiwanese restaurants and tea house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overshadowing the presentation of essential Taiwanese products, a matter that some officials withi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deemed "highly regrettable".[166] By contrast, Tuboi Shōgorō (坪井正五郎), a prominent figure who championed the *Academic Humankind Pavilion* as a senior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encouraged observers to note both the female waitstaff at Taiwanese establishments and the native individuals (土人) who served as keepers of Taiwanese product displays. He expressed that, in doing so,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re are some benefits to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67] Consequently, the issue of

---

159 Mamiko Itō, *Meiji Nihon to Bankoku Hakurankai* [Meiji Japan and World Expositions], pp. 113-119; Junichirō Abe, *〈Idō〉 to 〈Hikaku〉 no Nihon Teikoku-shi: Tōchi Gijyutsu toshiteno Kankō, Hakurankai, Fīrudo Wāku* ['Movement' and 'Comparison' in Japanese Imperial History: Sightseeing, Exposition, and Fieldwork as Governing Technologies], pp. 103-104.

160 Hiroshi Tsukide, *Taiwan-kan* [Taiwan Pavilion], p. 9.

161 "Naikoku Hakurankai Kissaten ni Tsuite [On the Domestic National Exhibition Teahouse]," *TN*, Jan. 17, 1902, am ed., p. 2.

162 Kimura Jiten, "Hakurankai Bekkenki (5) [Glimpses of the Expo (Part 5)]," *TN*, April 8, 1903, am ed., p. 1.

163 Hiroshi Tsukide, *Taiwan-kan* [Taiwan Pavilion], p. 14.

164 Kyōko Matsuda, *Teikoku no Shisen: Hakurankai to Ibunka Hyōshō* [Imperial Gazes: Exposi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es]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2003), p. 60.

165 Hiroshi Tsukide, *Taiwan-kan* [Taiwan Pavilion], p. 14.

166 Hokushūsei, "Taiwankan no Kachi [The Value of the Taiwan Pavilion]," *TN*, April 24, 1903, am ed., p. 2.

167 Shōgorō Tsuboi, "Dai-gokai Naikoku Kangyō Hakurankai niokeru Jinrui-gaku [Anthropology at the Fifth

racism within the *Academic Humankind Pavilion*, where living individuals were on display, was shared by the Taiwanese restaurants and tea houses.[168]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1906, the *Gonikai* (五二會), an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promoting seven types of export crafts, organized a grand *Kyōshinkai* (共進會), an exhibition and trade fair aimed at advancing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Hibiya Park, Tokyo. This event commemorated the army's and navy's triumph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169] During this exhibition, Nakazawa Yasugorō, proprietor of a Taiwanese tea house in Ginza, introduced a Taiwanese oolong tea house. The Taiwanese tea establishment at the event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success, attributable to its captivating architecture, the presence of Taiwanese women serving customers, and the novelty of oolong tea. It attracted notable figures such as Ōyama Iwao (大山巖), a prominent army general, and Tōgō Heihachirō (東郷平八郎), a celebrated navy general who achieved hero statu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170]

During the Six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referred to as the Tokyo Exposition, which was held from March to July 1907, a Taiwan Pavilion was established. This pavilion featured a tea house serving oolong tea.[171] However, this tea house drew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ree Taiwanese girls sent to Japan by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hese girls, aged 13 to 17 years, had bound feet and served more as visual attractions than waitstaff.[172] Additionally, the Taiwan Pavilion displayed a motion picture of Taiwan made by Takamatsu Toyojirō (高松豐次郎, 1872-1952), proprietor of a motion picture theater in Taiwan. This motion picture showcased approximately 30 girls engaged in tea-picking at a Taiwanese tea plantation.[173]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Tokyo Jinruigakukai Zasshi* [Journal of the Tokyo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Tokyo) 206 (May 20, 1903), pp. 299-303; Junichirō Abe, *〈Idō〉 to 〈Hikaku〉 no Nihon Teikoku-shi: Tōchi Gijyutsu toshiteno Kankō, Hakurankai, Fīrudo Wāku* ['Movement' and 'Comparison' in Japanese Imperial History: Sightseeing, Exposition, and Fieldwork as Governing Technologies], pp. 95, 105.

168 Kyōko Matsuda, *Teikoku no Shisen: Hakurankai to Ibunka Hyōshō* [Imperial Gazes: Exposi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es], p. 61.

169 "Kissaten-yō Ūroncha Kaisō [Delivery of Oolong Teahouse Use]," *TN*, Aug. 22, 1906, am ed., p. 4.

170 "Gonikai to Hontō Shuppin [The 5-2 Association and Main Island Exhibits]," *TN*, Nov. 9, 1906, am ed., p. 2.

171 "Tokyo Hakurankai [The Tokyo Exposition]," *AS*, March 24, 1907, am ed., p. 6.

172 "Taiwankan to Taiwan Bijin [The Taiwan Pavilion and Taiwanese Beauties]," *TN*, April 5, 1907, am ed., p. 3.

173 "Taiwan Shōkai Katsudō Shashin [Introduction of Taiwan through Motion Pictures]," *TN*, May 12, 1907, am ed., p. 5; "Tōgū Taiwan-kan Gyōkei [Crown Prince's Visit to the Taiwan Pavilion]," *TN*, July 11, 1907, am ed., p. 2.

During the Takushoku Exposition (拓殖博覽會) in Tokyo, from October to November 1912 by Shinobazu Pond in Ueno, a tea house was established within the Taiwan Exhibition Hall. This tea house featured Taiwanese female waitstaff who served oolong and Pouchong tea. Prominent figures,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Saionji Kinmochi (西園寺公望), Princess Nashimoto (梨本宮妃), and her sister, visited this unique establishment.[174] At this exposition, Tsujiri Tea Shop, operated by Miyoshi Tokusaburo in Taipei, showcased oolong tea and was honored with a prestigious gold medal.[175] Moving forward to the Tokyo Taishō Exposition (東京大正博覽會), held by the Tokyo Prefectural Government from March to July 1914 in Ueno Park by Shinobazu Pond,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stablished the Taiwan Pavilion, a building reminiscent of the Dragon's Palace.[176] They initiated the Takushoku Exhibition Association (拓殖出品協會), which operated a tea house introducing oolong tea to visitors.[177]

Between March and July 1922, the Peace Memorial Tokyo Exposition (平和記念東京博覽會) was organized by the Tokyo Prefectural Government (東京府) in Ueno Park to commemorate the peace achieved after World War I. During this event,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Taiwan Pavilion. This unique Taiwanese-style house, exuding a rich tropical ambiance, featured a tea house on its second floor, where patrons could savor oolong tea.[178]

When examining local citie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1910s and 1920s marked the initial period of widespread oolong tea consumption in Japan. Osaka stood out as the Japanese city with the highest demand for Taiwanese oolong tea.[179] The introduction of oolong tea in Osaka can traced back to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in 1903. During the Meiji Commemorative Takushoku Exposition (明治記念拓殖博覽會), held by Osaka Prefecture from April to June 1913 at Tennoji Park, the Dadaocheng Tea Merchant Public Association (大稻埕茶商公會) from Taipei opened a tea house aimed at promot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with

---

174 "Takuhaku Kissaten Kōkyō [Prosperity of the Takushoku Expo's Teahouse]," *TN*, Nov. 8, 1912, am ed., p. 1.

175 "Chaho Meiyo [Honoring the Tea Shop]," *TN*, Dec. 1, 1912, am ed., p. 6.

176 Tokyo Taishō Hakurankai Annai Henshūkyoku [Tokyo Taisho Exposition Guide Editorial Office], ed., *Tokyo Taishō Hakurankai Kanran Annai* [The Tokyo Taisho Exposition Guide] (Tokyo: Bunyosha, 1914), pp. 87-88.

177 "Taishō-haku Taiwan-kan [Taiwan Pavilion at the Taisho Expo]," *TN*, Feb. 27, 1914, am ed., p. 7.

178 "Heiwahaku-nai no Taiwan-kan, Enrei Yūbi na Chin Kenchiku [Taiwan Pavilion at the Peace Expo, Exquisite and Beautiful Unusual Architecture]," *TN*, Jan. 23, 1922, am ed., p. 5.

179 "Taiwan Ūroncha no Juyō [Demand for Taiwan Oolong Tea]," *TN*, Dec. 2, 1910, am ed., p. 5.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180] Furthermore, at the Great Osaka Commemorative Exposition (大大阪記念博覽會), organized by the *Osaka Mainichi Shimbun* (大阪每日新聞) in Tennoji Park and Osaka Castle from March to April 1925, though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did not establish a Taiwan Pavilion, efforts were invested in promoting Taiwanese products through the tea house and concession stands.[181]

Around 1924, the Taipei Province Industrial Promotion Division (臺北州勸業課) distributed oolong tea free of charge to various locations suitable for promotional purposes. The Osaka Hotel in Dojima exploited this opportunity and organized a tasting event during a summer party, advertising it as "Free Oolong Tea Day." This tasting event attracted around 2,000 visitors daily and featured motion pictures showcasing Taiwan, which were warmly received. Influenced by such extensive publicity, the Osaka Tea Association (大阪茶業組合) and Kobe branch of Meidi-ya placed substantial orders for oolong tea from the Taipei Tea Merchant Public Association (臺北茶商公會) in Taipei Province.[182] In July 1924,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n extravagant tariff and imposed a 100% duty on black tea,[183] leading the Kobe branch of Meidi-ya to switch to importing oolong tea as a more affordable alternative.[184] Furthermore, in August 1925, the Taipei Province Industrial Promotion Division established a tea house at the venue of the Taiwan Product Fair, sponsored by the Takashimaya kimono store (高島屋吳服店) in Osaka, to showcase and promote oolong tea.[185]

In Kyoto, the Tsujiri Tea Shop in Taipei consistently showcased oolong tea and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beginning with the War Memorial National Gonikai Exhibition (戰時記念全國五二會品評會) in 1904.[186] The first Chinese restaurant

---

180 "Kissaten no Kettei [Decision of the Teahouse]," *TN*, Feb. 16, 1913, am ed., p. 2.

181 "Dai-Osaka Hakurankai de Angai Seikō-shiteiru Taiwan Bussan no Senden [Surprisingly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Taiwanese Products at the Osaka Exposition]," *TN*, April 16, 1925, am ed., p. 2.

182 "Ūroncha no Kanban o Kakagete [Displaying the Signboard of Oolong Tea]," *TN*, Aug. 20, 1924, am ed., p. 5.

183 "Ūroncha no Senden, Imaichi no Kan Ari [Promotion of Oolong Tea: A Sense of a New Momentum]," *TN*, Jan. 12, 1925, am ed., p. 2.

184 "Naichi to Ūroncha, Ureyuki Sukoburu Ryōkō [The Mainland and Oolong Tea, Sales Are Quite Good]," *TN*, Feb. 4, 1925, am ed., p. 2.

185 "Ūroncha no Senden [Promotion of Oolong Tea]," *TN*, Aug. 1, 1925, pm ed., p. 2.

186 Kuo-hsing Hsieh, Shu-min Chung, Naoto Kagotani, and Li-chiao Wang, eds., *Chakuraishanjin no Yitsuwa: Sanhao Desanlang de Taiwan Jiyi* [Anecdotes of Chakuraisanjin, Tokusaburō Miyoshi's Memories of Taiwan], p. 338.

documented in Kyoto, distinct from the Fucha cuisine (普茶料理) that existed since the Edo period, was the Taiwanese restaurant launched by interpreter Chen Qianman (陳千萬) in 1911. The primary aim was to familiarize mainland Japanese residents with Taiwanese culture.[187] While no explicit record exists,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probably featured on the menu.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1915, the Dadaocheng Tea Merchant Public Association from Taipei, with support from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stablished a tea house at the Kyoto Exposition Commemorating the Coronation of the Emperor (大典記念京都博覽會) held in Okazaki Park, Kyoto.[188] Capitalizing on this exposition, Miyoshi Tokusaburo from the Tsujiri Tea Shop in Taipei offered *Niitaka-yama* to the Emperor during his visit to Kyoto[189] and had the honor of having it acquir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190] Similarly, from March to May 1924, during the Exposition Celebrating the Crown Prince's Wedding and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Exposition (東宮殿下御成婚奉祝萬國博覽會參加 50 年記念博覽會), hosted in Okazaki Park, the Taipei Tea Merchant Public Association set up a tea house to promote their oolong tea.[191] To staff the tea house, several Taiwanese women, aged 15-20 years, with a basic command of Japanese, were recruited. Following this exposition, a substantial quantity of oolong tea was transported from Taipei to Kyoto, partly in respons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 tariffs on imported black tea in July 1924.[192]

In Nagoya,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showcased a Taiwan Pavilion adorned with palm trees and Taiwanese-style flower lanterns at the Tenth Kansai Prefectural Union Exhibition (第十回關西府縣連合共進會), held from March to June 1910. Within the tea house, two Taiwanese ladies and other female waitstaff served oolong tea.[193] Furthermore, an Oolong Tea House was featured at the Nagoya Exposition Celebrating the Coronation of the Emperor (御大典奉祝名古

---

187 "Kyoto no Taiwan Ryōri [Taiwanese Cuisine in Kyoto]," *TN*, April 29, 1911, am ed, p. 7.

188 "Kissaten Hojyokin [Subsidies for Tea Houses]," *TN*, Aug. 15, 1915, am ed., p. 3.

189 "Kinen Meicha Kenjō [Presentation of Commemorative Famous Teas]," *TN*, Nov. 16, 1915, am ed., p. 3.

190 "Tsujiri Chaho no Ūroncha [Tsujiri Tea Shop's Oolong Tea]," *TN*, Dec. 9, 1915, am ed., p. 7.

191 "Chashō Kōkai Bo Hōchajyo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eks Tea Girls]," *TN*, Feb. 28, 1924, am ed., p. 5.

192 "Kyoto no Orimonoichi to Taipei hoka San-kasho de Kaisai Keikaku [Plans for Holding the Kyoto Textile Market in Three Other Locations, Including Taipei]," *TN*, Oct. 31, 1924, am ed., p. 5.

193 "Taiwankan no Kōkei [Scenes from the Taiwan Pavilion]," *TN*, March 25, 1910, am ed., p. 5.

屋博覽會)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1928.[194] Additional instances include a Taiwan Pavilion at the Kyushu-Okinawa Products Exhibition (九州沖繩物產共進會) in Fukuoka from April to May 1918,[195] the Taiwanese Tea House at the East Asia Industrial Exposition (東亞勸業博覽會) from March to May 1927,[196] and the Oolong Tea House at the Shōwa Industrial Exposition (昭和產業博覽會) in Hiroshima from March to May 1929.[197] These venu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opularizing oolong tea across Japan.

Moreover, the Tsujiri Tea Shop had previously exhibited oolong tea in Takamatsu at the Fourth National Specialty Products Exposition (第四回全國特產品博覽會) in 1911.[198] The tea house within the Taiwan Pavilion at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Exposition (全國產業博覽會), organized by Takamatsu City from March to May 1928 at Takamatsu Castle,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and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described as a "symbol of modern culture." Following the exposition, oolong tea found its way into Takamatsu's *Karyū-kai* (Geisha world, 花柳界) and cafés, further cementing its popularity.[199]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most expositions and exhibitions in mainland Japan that featur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besides Tokyo, were primarily held in western Japan. This concentr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ignificant number of Japanese residents in Taiwan immigrating from western Japan.[200] In other instances, such as the Domestic Product Promotion Exposition (國產振興博覽會) hosted by the *Hokkai Times* (北海タイムス) newspaper company in Nakajima Park, Sapporo, in August 1926, special products from Taiwan were showcased. This even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substantial sales of oolong tea and bananas in Sapporo.[201] In September 1927, Gobankan (五番館), a department store in Sapporo, placed

194 "Nagoyahaku oyobi Taiwan Bussan [Nagoya Expo and Taiwanese Products]," *TN*, Nov. 10, 1928, am ed., p. 4.

195 "Seisō-sitaru Taiwan-kan [The Adorned Taiwan Pavilion]," *TN*, April 17, 1918, am ed., p. 7.

196 "Taiwankan Kissaten Daiseikō [Great Success of the Taiwan Pavilion Tea House]," *TN*, May 28, 1927, pm ed., p. 4.

197 "Shōwa-haku no Taiwan-kan, Subarashii Ninki [Taiwan Pavilion at the Shōwa Expo, Remarkable Popularity]," *TN*, April 13, 1929, am ed., p. 2.

198 "Tsujiri Chahu no Kinpai Juryō [Receipt of the Gold Medal by Tsujiri Tea Shop]," *TN*, Nov. 5, 1911, am ed., p. 7.

199 "Takamatsu, Kindai Bunka no Shōchō, Zenkoku Sangyō-haku (San) [Takamatsu, Symbol of Modern Culture, National Industrial Exposition (Part Three)], *TN*, April 21, 1928, pm ed., p. 2.

200 Shao-li Lu, *Zhanshi Taiwan: Quanli, Kongjian yu Zhimin Tongzhi de Xingxiang Biaoshu* [Exhibiting Taiwan: Portrayals of Power, Space,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p. 400.

201 "Taiwan to Hokkaido [Taiwan and Hokkaido]," *TN*, Sept. 1, 1926, pm ed., p. 3.

an order for 2,000 cans of the finest oolong tea from a tea merchant located in Dadaocheng, Taipei.[202]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primarily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 onset of the 1929 Great Depression resulted in an overproduction of tea, prompting expectations that mainland Japan would help bridge the demand gap. This expectation wa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oolong tea had found its way into mainland Japan, with Mitsukoshi and Takashimaya stores in Tokyo, a Taiwanese tea house in Ginza, and various local shops across Japan offering this tea for sale.[203]

Regar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oolong tea to the influential figures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of Tokyo, the Taiwanese Tea Party (臺灣お茶の會) organized in 1929 by women with connections to Taiwan deserves a special mention. The Taiwanese Tea Party was founded with Kawamura Fumiko (川村文子, 1875-1960) as its chair. She was the wife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and the founder of Kawamura Jogakuin (川村女學院),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s Kawamura Gakuen (川村學園) since 1924. Kawaharada Yaeko (河原田八重子), the wife of the Secretary of General Affairs, served as the vice chair. Their primary goals were to introduce Taiwan, foster harmony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Japan, and encourage mainland women to support local Taiwanese products.

The initial gathering of the Taiwanese Tea Party—on March 8 at the Japan Industry Club (日本工業倶樂部) near Tokyo Station—drew around 300 attendees, including the spouses of prominent figures, such as Yamamoto Teijirō (山本悌二郎), th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Ogawa Heikichi (小川平吉), the Minister of Railways, Mizuno Rentaro (水野鍊太郎), the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and Inukai Tsuyoshi (犬養毅), an Asianist and party politician who was the Prime Minister from 1931 to 1932. During the party, participants enjoyed oolong tea and were treated to a performance on the *chikuzen biwa* (筑前琵琶), a traditional Japanese lute. This performance was associated with Prince Kitashirakawa-no-miya Yoshihisa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1847-1895), who had been stationed in Taiwan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Tragically, he succumbed to illness in Taiwan and later became revered as a deity at the Taiwan Shrine.[204] This gathering facilitated

202 "Hokkaidō kara Ūroncha no Chūmon [Ordering Oolong Tea from Hokkaido]," *TN*, Sept. 15, 1927, am ed., p. 2.

203 Yoshisuke Nagaoka, "Kokusan-hin wo Aiyō seyo: Taiwan Ūroncha to Kōcha wo Suishō-su [Embrace Domestic Products, Advocat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and Black Tea]," pp. 58-61.

204 Kumi Yokomori, "Taiwan niokeru Jinjya: Kōminka Seisaku to no Kanren nioite [Shrines in Taiwan: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Policy of Imperialization]," *Taiwan Kingendai-shi Kenkyū* [Studies on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Tokyo) 4 (Oct. 1982), pp. 195-196.

the dissemination of oolong tea appreciation through the influential network of politicians' wives from Taiwan, a colony, to Japan, the suzerain state.

However, from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black tea achieved a certain level of popularity despite the prevalence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green tea in modern Japan. In contrast,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oolong tea was limited to a few urban dwellers and remained far from a nationwide phenomenon. In 1937, Mainland Japan's total consumption of domestic tea was 40,119.8 tons. In contrast, the imported tea from Taiwan amounted to only 971.5 tons, with over half of it being black tea (504.0 tons), and oolong tea accounting for less than 1% (7.5 tons) (also see Figure 3).[205] During this period, in Taiwan, there was an extensive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 tea industry should focus on black or oolong tea. However, whil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black tea as a globally recognized commodity,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the long-standing, unique production of Taiwan's specialty: oolong tea.[206]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Taiwanese teas were exported. However, in the 1930s, oolong tea began to gain popularity on various occasions in Taiwan, its place of production. For instance, at an advertising festival in July 1932, organized to boost Taiwan's inaugural commercial art exhibition,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臺北茶商公會) generously contributed oolong tea, which was served cold by local bartenders and waitresses. This cold oolong tea quickly gained favor among the public.[207]

Furthermore,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promoted enthusiastically in Korea and Manchuria, regions under Japanese imperial rule following Taiwan. In 1907, Japanese imperial authorities organized a trade fair in Hanseong (漢城; present-day Seoul) where the Dadaocheng Tea Merchant Public Association from Taipei showcased oolong tea.[208] At this event, oolong tea from Miyoshi Tokusaburō's Tsujiri Tea Shop received a silver medal and was acquired by the Crown Prince

---

205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ed., *The Annual Statistical Tea Report of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1937* (Tokyo: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1939), pp. 13, 56-57.

206 "Kōcha ni Asserare Ūroncha no Kage Usushi [Oolong Tea Casts a Dim Shadow as Black Tea Dominates]," *TN*, July 6, 1937, am ed., p. 3.

207 "Kōkokusai, Iyoiyo Ashita kara, Shinai wo Kōshin [Advertising Festival, Marching Through the City Starts Tomorrow]," *TN*, July 22, 1932, am ed., p. 7.

208 "Kankoku Hakurankai he Shuppin [Exhibition at the Korean Exposition]," *TN*, Aug. 16, 1907, am ed., p. 4.

of Korea, Yi Un (李垠, 이은).[209] However, even in the 1920s, oolong tea was not widely recognized in Korea.[210] Therefore,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ook a proactive step by directly operating an oolong tea house within the Taiwan Pavilion at the Korean Exposition (朝鮮博覽會), held in Gyeongseong (京城; present-day Seoul)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1929,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Korea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he oolong tea house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with the wives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Korea visiting soon after its opening. Nevertheless, owing to limited demand among the Korean population, the primary focus was on expanding oolong tea sales channels among Japanese residents in Korea.[211]

In Manchuria, loca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with the transfer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Branch Line, running between Changchun (長春) and Lushun (旅順) as part of the China Eastern Railway (東清鐵路), from Russian to Japanese ownership under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in 1905, follow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Subsequently, in 1906, the Japanese Empire established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Yamato Hotels, commencing in Dalian in 1907. As part of a strategic advertising campaign,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initiated the dispatch of oolong tea to the Manchurian Railways, starting in 1907, and was made available to passengers at each hotel. Oolong tea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wealthy in Manchuria.[212] By the 1920s, oolong tea had become a staple in Japanese households, including the Manchurian Railway employees. However, it was viewed as "a kind of black tea" rather than a distinct variety of Chinese tea, as perceived in mainland Japan.[213]

Oolong tea made its way to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nchuria, influenced by Japan's presence. During the Dalian Industrial Exposition Commemorat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ity's Founding (市制十周年記念大連勸業博覽會), hel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1925, the city of Dalian featured a special pavilion

---

209 "Tsujiri Chaho no Meiyo [The Honor of Tsujiri Tea Shop]," *TN*, Nov. 20, 1907, am ed., p. 5.

210 "Ūroncha no Naichi Ishutsu, Senden no Kōka Ooini Araharu [Export of Oolong Tea to the Mainl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f Promotion Evident]," *TN*, Nov. 26, 1924, am ed., p. 2.

211 "Tokusetsu-kan chū no Ninkimono, Chōsen-haku no Taiwan-kan Kissaten mo Ō-iri [Popular Attractions within the Special Pavilion, Taiwan Pavilion at the Korea Expo, Crowded Teahouse]," *TN*, Oct. 2, 1929, am ed., p. 6.

212 "Ūroncha Hanro Kakuchō [Expansion of Oolong Tea Sales Channels]," *TN*, Nov. 27, 1908, am ed., p.3.

213 Mantetsu Shain Shōhi Kumiai [Manchurian Railway Employees' Consumption Union], *Manshū Katei Hōten* [Manchurian Home Glorious Book] (Dalian: Mantetsu Shain Shohi Kumiai, 1929), pp. 203-204.

dedicated to Manchuria, Taiwan, and Korea. In contrast to the palatial Korean pavilion, the Taiwan pavilion exuded a tropical ambiance and showcased a wide array of products, including oolong tea, pineapples, and bananas. While Pouchong tea was commonly served in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consumed by laborers in Manchuria, the Taiwan Pavilion's tea house served oolong tea, attracting over 2,000 Chinese patrons daily. However, the consumption of Pouchong tea was relatively minimal.[214]

Originally, Manchuria primarily sourced its tea from Zhejiang and Fujian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215] Howev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chukuo (滿洲國) in March 1932, Chinese tea lost its tariff exemption, exposing it to competition from Taiwanese and Japanese teas.[216] Recognizing this opportunity, Taiwanese tea merchants devised plans to introduce Taiwanese tea to the Manchukuo market.[217] At the Manchurian Grand Exposition (滿洲大博覽會) held in Dalian from July to August 1933,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unveiled the Taiwan Pavilion, showcasing oolong, black, and Pouchong tea, along with the opening of a dedicated tea house.[218] Pouchong tea saw increased demand in Manchuria, a daily staple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rather than oolong tea.[219]

During its peak production period, more than 60% of the Pouchong tea produced in Taiwan was exported to the Dutch East Indies.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in import tariffs, the export quantity decreased, and tea began to be exported to Manchuria.[220] In 1932, when the state of Manchukuo was established, Taiwanese Pouchong tea exports to Manchukuo amounted to approximately 6.9 tons.

---

214 "Dairen Hakurankai de Ūroncha no Shin-hanro wo [Opening New Sales Channels for Oolong Tea at the Dalian Exposition]," *TN*, Sept. 18, 1925, am ed., p. 2.

215 "Taiwancha ni Zekkō no Chansu Torai, Jihen de Shinacha no Manshū-iri Tozetsu [Taiwanese Tea Sees Excellent Opportunity: Prevention of Chinese Tea Entering Manchuria due to the Incident]," *TN*, Oct. 8, 1937, am ed., p. 2.

216 Hsien-yao Hsu, *Taiwan Baozhongcha Lunji*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Pouchong Tea Essays] (Taipei: Lexis Book Co., Ltd., 2005), p. 197.

217 "Manshūkoku Meate ni Taiwan-cha Yushutsu kaisha [A Taiwanese Tea Export Company Targeting Manchukuo]," *TN*, July 7, 1932, am ed., p. 5.

218 "Manzhou Bolanhui, Pei Taiwancha Chengji Xuanchuan Kuozhang [Manchurian Exposition, Distributing Taiwanese Tea,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expansion]," *TN*, July 10, 1933, am ed., p. 4.

219 "Nanpō Kyōei to Nittō Takushoku [Southern Co-prosperity and Nitto Takushoku]," *TN*, Jan. 9, 1942, am ed., p. 2.

220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okusan-ka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Chagyō ni Kansuru Chōsasho*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1935), p. 335.

However, in the following three years, it surged to 775.9 tons by 1935, becoming the leading export quantity of Taiwanese Pouchong tea among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same year, the export of Taiwanese black tea to Manchukuo was only 210.0 tons, making Pouchong tea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three-quarters of the tea exported from Taiwan to Manchukuo. Pouchong tea, destined for Manchuria, was primarily scented with jasmine and is now known as jasmine tea.[221]

However,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 July 1937 marked a turning point, prompting the Japanese Navy to block sea traffic in China. This blockade disrupted the inflow of Chinese tea and made the import of Lipton black tea, which was popular at the time, relatively challenging, owing to stricter foreign currency controls. Consequently, exports of Pouchong and black tea from Taiwan to Manchuria experienced a notable upsurge.[222] In July 1941, whe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roze Japanese assets within its borders, Taiwan faced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as it could no longer export oolong and black tea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Pouchong tea, which had established sales channels with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s part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Zone (大東亞共榮圈).[223]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Asian–Pacific War in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Taiwan's resources and labor were redirected toward enhancing food production and bolstering troop strength. This reallocation resulted in the devastation of numerous tea plantations.[224] As the war escalated in 1944, ship procurement beca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leading to a sharp decline and eventual cessation of Taiwanese tea exports in 1945.[225]

Following World War II, all Japanese-owned tea companies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tea factory under Mitsui's ownership, were seiz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merged into the publicly-owned Taiwan Tea Company (臺灣茶業公司), which was administered by the Taiwan Province.[226] By 1954, Taiwan's

---

221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okusan-ka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Taiwan no Chagyō* [Tea Industry in Taiwan], pp. 42-46.

222 Hsien-yao Hsu, *Taiwan Baozhongcha Lunji*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Pouchong Tea Essays], p. 222.

223 "Kyōei-ken Chagyō Chōsei, Taiwan Chagyō Kyōkai ga Zadan-kai [Co-Prosperity Sphere Tea Industry Adjustment: Roundtable Discussion by the Taiwan Tea Industry Association]," *TN*, Jan. 28, 1942, am ed., p. 2.

224 Taiwan qu Cha Shuchuye Tongye Gonghui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ed., *Taiwan Shuchu Bainian Jianshi* [The Historical Brevities of Taiwan Tea Export, 1865-1965], p. 18.

225 Hsien-yao Hsu, *Taiwan Baozhongcha Lunji*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Pouchong Tea Essays], pp. 205, 225, 227.

226 Taiwan qu Cha Shuchuye Tongye Gonghui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ed., *Taiwan Shuchu Bainian Jianshi* [The Historical Brevities of Taiwan Tea Export, 1865-1965], p. 19; "Huangdi Tuocheng Chatian: Zengchan Tuzhong de Taicha [Convert uncultivated land into tea fields: The Taiwan Tea Industry amid Increasing Production]," *Shenbao* [Shanghai Daily], Oct. 10, 1947, p. 6.

tea exports had reached a new pinnacle, marking the resurgence of the Taiwanese tea industry's prosperity.[227]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aiwan refrained from producing green tea as it competed with mainland Japanese tea in the export markets. However,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Taiwan's exports of green tea to Japan and other nations witnessed a surge. By 1961, green tea had become the leading variety among Taiwanese teas, and in the 1970s, green tea constituted 70-80% of the total tea exports.[228] The ascendancy of green tea as Taiwan's primary export tea represented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s decolonizing the Taiwanese tea industry.

4. Conclusion

In Victorian Britain, colonial black tea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shap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in Japan, Taiwanese oolong tea was not integrated into the Japanese cultural identity. During the era of imperial Japan, Taiwanese oolong tea primarily served as a domestic substitute for British black tea.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actively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ese tea houses, notably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in St. Louis in 1904 and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in 1910. Participation in both events was seen as a pivotal step toward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markets dominated by Ceylon tea. Thus, the success of Taiwanese tea houses he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y under Japanese rule.

The introduction of oolong tea to mainland Jap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te 19th century when Japan annexed Taiwan. Since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held in Osaka in 1903,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actively promoted Taiwanese oolong tea by establishing Taiwanese tea houses. The popularity of these tea houses was fueled by the allure of Taiwanese girls who often served there. Additionally,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opened a Taiwanese tea house in Ginza, Tokyo, in 1905 to introduce oolong tea. By the 1920s, oolong tea had become widely available, being sold in Tokyo's prestigious department stores, such as Mitsukoshi and Takashimaya, and various local stores across Japan.

---

227 Taiwan qu Cha Shuchuye Tongye Gonghui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ed., *Taiwan Shuchu Bainian Jianshi* [The Historical Brevities of Taiwan Tea Export, 1865-1965], p. 20.

228 Tsu-yu Chen, "Taiwan Yincha Wenhua yu Zhongri Qinghuai [Taiwanese Tea Culture and Sino–Japanese Sentiments]," pp. 452, 455.

In the Japanese Empire, oolong tea from colonial Taiwan was marketed with a modern, Western image. It was positioned as a high-end imported alternative to black tea rather than Chinese tea. Simultaneously, it was promoted as “a specialty of the newly acquired territories” and as a “domestic tea” to be favored. In 1914, the Emperor decided to use Taiwanese oolong tea instead of Indian black tea for entertaining foreign guests at court to boost domestic products. Oolong tea emerged as a modern beverage of choice,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black tea and coffee. Nevertheless, it was a product closely tied to the political goa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ony.

Compared with Taiwanese black tea, Taiwanese oolong tea faced challenges in successfully expanding its market in Mainland Japan. The cause of this stagn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in the modern Japanese market, oolong tea remained a substitute for black tea and was overshadowed by foreign-produced and Taiwanese black teas. However, for modern Japanese consumers, oolong tea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beverage with dual roles: representing the aspirational Western culture, much like black tea, and serving as a commodity from the colony to encourage development. The Japanese consumption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can be seen as carrying a similar significance to how the British consume Indian-produced black tea.

What stands out in the history of oolong tea’s reception in Japan is its historical disjunction. Oolong tea gained national prominence in Japan after the 1980s. Following the World War II defeat, the Japanese populace largely forgot the consumer culture of oolong tea that had flourished during the Japanese Empire’s rule over Taiwan. It was only during the wellness trend that commenced in the late 1970s that oolong tea regained attention.

Oolong tea was perceived as a product of Fujian rather than Taiwan. This shift occurred following the termin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72. During this period, Japan fostered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mainland. Additionally, the price of Taiwanese tea elevated, yet its production diminished. Oolong tea from Fujian Province became widespread in Japan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It was recognized for its health benefits, particularly its effectiveness in weight management. Furthermore, it was easier to package as a canned or PET-bottled soft drink, which preempted the marketing of green tea.

References

(Tokyo) Asahi Shimbun 《（東京）朝日新聞》 [(Tokyo) Asahi Newspaper] (*AS*)

Nihon Keizai Shimbun (The Nikkei)《日本経済新聞》 [Japan Economic Newspaper]

Shenbao 《申報》[Shanghai Daily]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臺灣日日新報》 [Taiwan Daily News] (*TN*)

Yomiuri Shimbun 《読売新聞》 [Yomiuri Newspaper]

Kenmin Food Corporation's website, accessed Aug. 20, 2023; available form https://www.kenmin.co.jp/company/info.html.

Abe, Junichirō 阿部純一郎

2014 *〈Idō〉 to 〈Hikaku〉 no Nihon Teikoku-shi: Tōchi Gijyutsu toshiteno Kankō, Hakurankai, Fīrudo Wāku* 《〈移動〉と〈比較〉の日本帝国史：統治技術としての観光・博覧会・フィールドワーク》 ['Movement' and 'Comparison' in Japanese Imperial History: Sightseeing, Exposition, and Fieldwork as Governing Technologies]. Tokyo: Shinyosha.

Andreassen, Rikke

2016 *Human Exhibitions: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Ethnic Displays*. London: Routledge.

Bessho, Natsuko 別所夏子

1936 "Taiwan Ryōri 〈臺灣料理〉 [Taiwanese Cuisine]." *Ryōri no tomo* 《料理の友》 [Companion of Cooking] (東京) 24(12): 109-110.

Chen, Peikai 陳培鍇

1947 "Taiwan Wulongcha zhi Jianglai 〈臺灣烏龍茶之將來〉 [The Future of Taiwanese Oolong Tea]." *Taiwan Nongye Tuiguang Tongxun* 《臺灣農業推廣通訊》 [Taiwan Agricultural Promotion Newsletter] (Taipei) 1(3/4): 2-6.

Chen, Tsu-yu 陳慈玉

1982 *Jindai Zhongguo Chaye de Fazhan yu Shijie Shichang* 《近代中國茶葉的發展與世界市場》[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ea Industry and the Global Market]. 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2011 "Taiwan Yincha Wenhua yu Zhongri Qinghuai 〈臺灣飲茶文化與中日情懷〉 [Taiwanese Tea Culture and Sino–Japanese Sentiments]." In Zhonghua Yinshi Wenhua Jijinhui [Foundation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ed., *Di Shier Jie Zhonghua Yinshi Wenhu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第十二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Symposium on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pp. 447-470. Taipei: Foundation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2011 "Quanqiuhua Jincheng-zhong de Min-Tai Cha 〈全球化進程中的閩台茶〉 [Min-Tai Tea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ijiao-shi Yanjiu* 《海交史研究》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Quanzhou) 2011(2): 117-137.

Deguchi, Yasuo 出口保夫

1998 *Eikoku Kōcha no Hanashi* 《英国紅茶の話》 [The Story of British Tea]. Tokyo: PHP Bunko.

Ellis, Markman, Richard Coulton, and Matthew Mauger

2015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London: Reaktion Books.

Fūzoku Gahō 風俗畫報

1903 "Taiwan-kan〈臺灣館〉[The Taiwan Pavilion]." *Fūzoku Gahō* 《風俗畫報》 [Illustrated News of Customs] (Tokyo) Special Supplement 269: 34-35, with an illustration.

Giles, Herbert A.

1892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Gotō, Asatarō 後藤朝太郎

1923 *Omosiroi Shina no Fūzoku* 《おもしろい支那の風俗》 [Interesting Customs of China]. Tokyo: Osaka Yagō Shoten.

Haruyama, Yukio 春山行夫

2013 *Kōcha no Bunka-shi* 《紅茶の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Black Tea]. Tokyo: Heibonsha, 1991, First Edition; New Edition.

Hirano, Kumiko 平野久美子

2003 *Chūgoku-cha, fūga no uragawa: sūpāburando no karakuri* 《中国茶　風雅の裏側：スーパーブランドのからくり》 [The Hidden World of Chinese Tea Elegance: Secrets of Super Brands]. Tokyo: Bungeishunju.

Hitomi, Ichitarō 人見一太郎

1901 "Pari Hakurankai niokeru Kakukoku Shokuminchi no Sekkei nitsuite (Dōjō) (Shōzen)〈巴里博覽會に於ける各國植民地の設計に就て（同上）（承前）〉[On the Design of Coloni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t the Paris Exposition (Ditto) (Continued)]." *Taiwan Kyōkai Kaihō* 《臺灣協會會報》 [Taiwan Association Bulletin] (Tokyo) 31: 7-12.

1901 "Pari Hakurankai niokeru Kakukoku Shokuminchi no Sekkei nitsuite (Dōjō) (Shōzen)〈巴里博覽會に於ける各國植民地の設計に就て（同上）（承前）〉[On the Design of Coloni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t the Paris Exposition (Ditto) (Continued)]." *Taiwan Kyōkai Kaihō* 《臺灣協會會報》 [Taiwan Association Bulletin] (Tokyo) 32: 5-12.

Hiyama, Yukio 檜山幸夫

2001 "Hanoi Hakurankai to Taiwan Sōtokufu: Panfuretto 'EXPOSITION DE HANOÏ' o Ch ūsin-ni'〈ハノイ博覧会と台湾総督府：パンフレット『EXPOSITION DE HANOÏ』を中心に〉[The Hanoi Exposition and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Focusing on the Pamphlet 'EXPOSITION DE HANOÏ'." In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Chūkyō University, ed., *Taiwan Sōtokufu Bunsho Mokuroku* 《台湾総督府文書目録》 [Catalog of Documents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 Vol. 8, pp. 671-700. Tokyo: Yumani Shobou.

Honma, Kyōko 本馬恭子

1990 *Ōura Kei Jyoden Nōto* 《大浦慶女伝ノート》 [Notes on the Biography of Lady Ōura Kei]. Nagasaki: Honma Kyōko.

Hsieh, Kuo-hsing 謝國興, Shu-min Chung 鍾淑敏, Naoto Kagotani 籠谷直人, and Li-chiao Wang 王麗蕉 (eds.)

2015 *Chakuraishanjin no Yitsuwa: Sanhao Desanlang de Taiwan Jiyi* 《茶苦來山人の逸話：三好德三郎的臺灣記憶》 [Anecdotes of Chakuraisanjin, Tokusaburō Miyoshi's Memories of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Hsu, Hsien-yao 許賢瑤
2005 *Taiwan Baozhongcha Lunji* 《臺灣包種茶論集》[Collection of Taiwanese Pouchong Tea Essays]. Taipei: Lexis Book Co., Ltd..

Itō, Mamiko 伊藤真実子
2008 *Meiji Nihon to Bankoku Hakurankai* 《明治日本と万国博覧会》 [Meiji Japan and World Expositions].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Iwama, Kazuhiro 岩間一弘
2013 "Taishūka Suru Shinowazuri: Nihonjin Ryokōsha no Shanghai Imēji to Shanghai no Kankō Toshi-ka 〈大衆化するシノワズリ：日本人旅行者の上海イメージと上海の観光都市化〉 [Popularizing 'Chinoiserie': The Impression of Shanghai among Japanese Travelers and Shanghai's Change to a Tourist City]." *Gendai Chugoku* 《現代中国》 [Modern China] (Tokyo) 87: 17-32.

Izumi, Kyōtarō 泉鏡太郎 (Izumi, Kyōka 泉鏡花)
1899 *Yushima Mōde* 《湯島詣》 [Yushima Pilgrimage]. Tokyo: Shunyōdō.

Kawarabayashi, Naoto 河原林直人
2003 *Kindai Ajia to Taiwan: Taiwan Chagyō no Rekishi-teki Tenkai* 《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 [Modern Asia and Taiwa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Tea Industry]. Kyoto: Sekaishisō-sha.

Keynes, J. M.
1924 "Stocks of Staple Commodities." *London &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 Special Memorandum* (London) 6: 1-18.

Kojima, Shinpei 兒島新平 (ed.)
1918 *Sanhu oyobi Kinkō Meibutu Annai* 《三府及近郊名所名物案內》 [Guide to Famous Places and Things in the Three Prefectur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Vol. 1. Tokyo: Nihon Meisho Annaisha.

Konno, Junko 今野純子
2022 "Nihon Tōchiki niokeru Taiwan-cha no Hen'yō to Taiwan Chagyō no Hensen: 'Cha' no Motsu Nōsakumotsu to Shikō-sei no Shiten kara 〈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茶の変容と台湾茶業の変遷：「茶」の持つ農作物と嗜好性の視点から〉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Tea and Evolu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 Perspective on the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latability of 'Tea']." Ph.D. dissertation, Rikkyō University.

Kusumoto, Machiko 楠元町子
2010 "Bankoku Hakurankai to Kōshitsu Gaikō: Fushimi-no-miya Sadaharu Shinnō to 1904-nen Sentoruisu Banpaku 〈万国博覧会と皇室外交：伏見宮貞愛親王と 1904 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 [World Exposition and Imperial Diplomacy: Prince Fushimi-no-miya Sadanaru and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Aichi Shukutoku Daigaku Ronshū: Bungaku-bu, Bungaku-kenkyūka Hen*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Bulletin of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ichi) 35: 31-43.

Lian, Yatang 連雅堂
1921 *Taiwan Tongshi* 《臺灣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Vol. 2. Taipei: Taiwan Tongshi She.

Lin, Man-houng 林滿紅

1997 *Cha, Tang, Zhangnao-ye yu Taiwan zhi Shehui Jingji Bianqian* 《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 [Tea, Sugar, Camphor Industry,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Taiwan]. Taipei: Lianjing Press.

Lu, Shao-li 呂紹理

2005 *Zhanshi Taiwan: Quanli, Kongjian yu Zhimin Tongzhi de Xingxiang Biaoshu*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Exhibiting Taiwan: Portrayals of Power, Space,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Taipei: Mai-tien Publishing.

Mantetsu Shain Shōhi Kumiai 滿鐵社員消費組合 [Manchurian Railway Employees' Consumption Union]

1929 *Manshū Katei Hōten* 《滿洲家庭寶典》 [Manchurian Home Glorious Book]. Dalian: Mantetsu Shain Shohi Kumiai.

Masaoka, Shiki 正岡子規

2022 *Gyōga Manroku* 《仰臥漫録》 [Penning While Lying in a Sickbed]. Tokyo: Iwanami Shoten, 1927, First Edition; Revised and New Edition.

Matsuda, Kyōko 松田京子

2003 *Teikoku no Shisen: Hakurankai to Ibunka Hyōshō* 《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 [Imperial Gazes: Exposi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es].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Matsuzaki, Yoshirō 松崎芳郎

2012 *Nenpyō: Cha no Sekai-shi* 《年表　茶の世界史》 [Chronology: A World History of Tea]. Tokyo: Yasaka Shobo.

Mazzarino, Paolo パオロ・マッツァリーノ

2014 "Mukashi ha yokatta-ne? Dai Go-kai: Kōra to Ūroncha 〈むかしはよかったね？〈5〉：コーラとウーロン茶〉 [Were the Good Old Days? Episode 5: Cola and Oolong Tea]." *Shinchō 45* 《新潮 45》 [New Tide] (Tokyo) 33(4) = 384: 230-235.

Mitsui Nōrin Co., Ltd. 三井農林株式会社 (ed.)

1969 *Nijū-nen-shi (Gai-shi) Mitsui Nōrin Kabushiki Kaisha* 《20 年史（概史）三井農林株式会社》 [20-Year History (Overview) Mitsui Nōrin Co.,Ltd.]. Tokyo: Mitsui Nōrin Co., Ltd..

Mitsukoshi 《三越》

1912 "Kōhī Kōcha Setto 〈珈琲紅茶セット〉 [Coffee and Tea Set]." *Mitsukoshi* 《三越》(Tokyo) 2(12): 54.

Murai, Gensai 村井弦齋

1907 *Zōho-chūshaku Kuidōraku-zokuhen Haru-no-maki* 《增補註釋　食道樂　續編　春の巻》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Foodes, Sequel: Spring Volume]. Tokyo: Hobunsha, 1906, First Edition; Third Edition.

Nagai, Kafū 永井荷風

1911 *Kōcha no Ato* 《紅茶の後》 [After Tea]. Tokyo: Momiyama Shoten.

Nagaoka, Yoshisuke 永岡芳輔（涼風）

1930 "Kokusan-hin wo Aiyō seyo: Taiwan Ūroncha to Kōcha wo Suishō-su 〈國產品を愛用せよ　台灣ウーロン茶と紅茶を推獎す〉 [Embrace Domestic Products, Advocating Taiwanese Oolong Tea and Black Tea]." *Jitsugyō Jidai* 《實業時代》(Tokyo) 7(10): 58-61.

1931 *Ryōfū Hitsusen-roku* 《涼風筆戰錄》 [Records of Pen Battles in the Refreshing Breeze]. Tokyo: Jitsugyō Jidaisha.

Namikata, Shōichi 波形昭一

2002 *Minkan Sōtoku*: *Miyoishi Tokusaburō to Tsujiri Chaho* 《民間総督：三好徳三郎と辻利茶舖》 [Civilian Governor: Misyoshi Tokusaburō and Tsujiri Tea Shop]. Tokyo: Nihon Tosho Center.

Nihon Kōcha Kyōkai 日本紅茶協会 [Japan Tea Association] (ed.)

2003 *Nijū Seiki no Nihon Kōcha Sangyō-shi* 《20 世紀の日本紅茶産業史》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Japan's Black Tea Industry]. Tokyo: Japan Tea Association.

Nōrin-shō Nōmu-kyoku 農林省農務局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ureau of Agriculture] (ed.)

1939 *Meiji Zenki Kannō Jiseki Kyūroku* 《明治前期　勸農事蹟輯錄》 [Early Meiji Period: A Compi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motion Achievements], Vol. 2. Tokyo: Great Japan Agricultural Society.

Nō-shōmu-shō 農商務省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d.)

1905 *Sentoruisu Bankoku Hakurankai Honpō Sandō Jigyō Hōkoku*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本邦參同事業報告》 [Japan Collaborative Project Report for the St. Louis World's Fair], Vol. 2. Tokyo: Nō-shōmu-shō.

1912 *Nichi-Ei Hakurankai Jimu-kyoku Jimu Hōkoku* 《日英博覽會事務局事務報告》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Secretariat Administrative Report], Vol. 2. Tokyo: Nō-shōmu-shō.

Pettigrew, Jane

2001 *A Social History of Tea*. London: The National Trust.

Rappaport, Erika

2017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saki, Takashi 佐々木隆

2005 "Nihon no Kōcha Juyō-shi: Kokucha kara Kōcha he〈日本の紅茶受容史：黒茶から紅茶へ〉[The History of Tea Acceptance in Japan: From Black Tea to Red Tea]." *Musashino Gakuin Daigaku Nihon Sōgō Kenkyūjo Kenkyū Kiyō* 《武蔵野学院大学日本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 [Bulletin of the Musashino Gakuin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Saitama) 3: 164-173.

Sawa, Mamoru 澤護

1981 "Shimizu Usaburō: 1867-nen Pari Bankokuhaku o megutte 〈清水卯三郎：1867 年パリ万国博をめぐって〉[Shimizu Usaburō et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Paris 1867]." *Chiba Keiai Keizai Daigaku Kenkyū Ronshū* 《千葉敬愛経済大学研究論集》 [Research Journal of Chiba Keiai Economic University] (Chiba) 19: 493-511.

Smith, Edward

1861 "On the Uses of Tea in the Healthy System."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London) 9: 185-197.

1873 *Foods*. New York: D. Appleton.

Sugimoto, Ryō 杉本良

1928 *Kinshu no Kuni o Miru* 《禁酒の國を見る》 [Looking at the Land of Prohibition]. Taipei: Taipei Esperanto Society.

Taiwan qu Cha Shuchuye Tongye Gonghui 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ed.)

1965 *Taicha Shuchu Bainian Jianshi* 《臺茶輸出百年簡史》 [The Historical Brevities of Taiwan Tea Export, 1865-1965]. Taipei: Taiwan Tea Exporters' Association.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1920 *Chagyō Ippan* 《茶業一班》[Entire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1929, 1935, 1937, 1939 *Taiwan Chagyō Tōkei* 《臺灣茶業統計》 [Statistics of Taiwan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Year Unknown *Taiwan Chagyō Yōran* 《臺灣茶業要覽》 [Manual of the Taiwanese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aiwan Sōtokufu Shokusan-kyoku Tokusan-ka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ed.)

1935 *Chagyō ni Kansuru Chōsasho* 《茶業ニ關スル調査書》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Tea Industry]. Taipei: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1937 *Taiwan no Chagyō* 《臺灣の茶業》[Tea Industry in Taiwan]. Taipei: The Special Products Division, Bureau of Industries,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aiwan Sōtokufu Zeikan 臺灣總督府稅關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Customs Office] (ed.)

1918-1924 *Taiwan Bōeki Nenpyō* 《臺灣貿易年表》 [Annual Return of the trade of Taiwan (Formosa)]. Taipei: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Customs Office.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茶業組合中央會議所 (ed.)

1939 Chagyō Kumiai Chūō Kaigisho Tōkei Nenpō: Shōwa Jūni Nendo《茶業組合中央會議所統計年報　昭和十二年度》 [The Annual Statistical Tea Report of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1937]. Tokyo: The Nippon Tea Association.

Tokyo Taishō Hakurankai Annai Henshūkyoku 東京大正博覽會案內編輯局 [Tokyo Taishō Exposition Guide Editorial Office] (ed.)

1914 *Tokyo Taishō Hakurankai Kanran Annai* 《東京大正博覽會觀覽案內》 [The Tokyo Taishō Exposition Guide]. Tokyo: Bunyosha.

Tsuboi, Shōgorō 坪井正五郎

1903 "Dai-gokai Naikoku Kangyō Hakurankai niokeru Jinrui-gaku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に於ける人類學〉 [Anthropology at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Tokyo Jinruigakukai Zasshi*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Tokyo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Tokyo) 206: 299-303.

Tsukide, Hiroshi 月出皓

1903 *Taiwan-kan* 《臺灣館》 [Taiwan Pavilion]. Taipei: Dai-gokai Nāikoku Kangyō Hakurankai Taiwan Kyōsan-kai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協贊會 [Taiwan Support Association for the Fifth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sition].

Tsunoyama, Sakae 角山栄

1980 *Cha no Sekai-shi: Ryokucha no Bunka to Kōcha no Shakai* 《茶の世界史：緑茶の文化と紅茶の社会》 [A World History of Tea: Green Tea Culture and Black Tea Society]. Tokyo: Chūōkōron-sha.

Tsurumi, Yūsuke 鶴見祐輔

1944 *Gotō Shinpei Den: Taiwan Tōchi hen*, Jō 《後藤新平傳　台灣統治篇　上》 [The Biography of Gotō Shinpei: The Period of Taiwan Administration, Volume 1]. Tokyo: Pacif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 Department, 1943, First Edition; Third Edition.

Ukers, William H., M.A. (William Harrison)

1935 *All about Tea*, Vol. I-II.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Williams, S. Wells, LL.D.

1874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Yagashiro, Hideyoshi 谷ヶ城秀吉

2012 *Teikoku Nihon no Ryūtsū Nettowāku: Ryūtsū Kikō no Hen'yō to Shijō no Keisei* 《帝国日本の流通ネットワーク：流通機構の変容と市場の形成》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Imperial Japan: Transformation of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and Market Formation]. Tokyo: Nihon Keizai Hyōronsha.

Yamamoto, Masatoshi 山本政敏

1926 *Seikatsu Senryaku: Hadaka Ikkan Seikatsu-hō* 《生活戦話：裸一貫生活法》 [Life Strategy Talks: The Naked and Penniless Lifestyle]. Tokyo: Sakushinsha.

Yokomori, Kumi 横森久美

1982 "Taiwan niokeru Jinjya: Kōminka Seisaku to no Kanren nioite 〈台湾における神社：皇民化政策との関連において〉 [Shrines in Taiwan: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Policy of Imperialization]." *Taiwan Kingendai-shi Kenkyū* 《台湾近現代史研究》 [Studies on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Tokyo) 4: 187-221.

Yoshimi, Toshiya 吉見俊哉

1992 *Hakurankai no Seijigaku: Manazashi no Kindai* 《博覧会の政治学：まなざしの近代》[Political Science of Expositions: Modern Perspectives]. Tokyo: Chūōkōron-shinsha.

Zeng, Lingyi 曾齡儀

2018 "Ujicha to Taiwan Ūroncha: Miyoshi Tokusaburō to Nittai-kan niokeru Cha no Kōryū 〈宇治茶と台湾烏龍茶：三好徳三郎と日台間における茶の交流〉 [Uji Tea and Taiwanese Oolong Tea: Miyoshi Tokusaburō and the Exchange of Tea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Shudan Lin 林淑丹 and Mingtzu Chen 陳明姿, eds., *Higashi Ajia niokeru Chi no Kōryū: Ekkyō, Kioku, Kyōsei*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の交流：越境・記憶・共生》 [Intellectual Exchanges in East Asia: Cross-Border, Memory, Coexistence], pp. 109-135.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Zen-Nihon Kōcha Shinkō-kai 全日本紅茶振興会 [All Japan Black Tea Promotion Association] (ed.)

1977 *Kōcha Hyakunen-shi* 《紅茶百年史》 [A Hundred Years of Black Tea History]. Tokyo: All Japan Black Tea Promotion Association.

Zhou Shenghong 周聖弘 and Zhou Nabing 周娜冰

2015 "Shi Chao Quan de *Wuyi Cha Ge* Yanjiu〈釋超全的《武夷茶歌》研究〉 [Sha Chao Quan's Research on the *Wuyi Tea Song*]." *Nongye Kaogu* 《农业考古》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Nanchang) 2015(2): 104-116.

《臺灣史研究》
第 31 卷第 3 期，頁 77-130
民國 113 年 9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被遺忘的帝國文化：
臺灣烏龍茶在 20 世紀前半日本的傳播

岩間一弘

摘　要

18 世紀末，英國人的口味從 bohea 茶變成 congou 茶，或者按現在的說法，從烏龍茶變成了紅茶。1910 年日英博覽會上展出的臺灣烏龍茶室獲得了巨大成功，但這並沒有讓烏龍茶的消費在英國紮根。然而，在 20 世紀 20 年代的美國，烏龍茶就是高級茶的代名詞。

1895 年臺灣被吞併後，日本殖民者立即重視起烏龍茶，並將其作為從臺灣帶到日本本土的紀念品。而 1905 年底在銀座開業的一家臺灣喫茶店在推廣臺灣烏龍茶方面，更是起到了核心作用。烏龍茶因為日本發展殖民化產業被促進生產和出口，於是就成為了近代繼咖啡和紅茶之後最受歡迎的飲品之一。

在營銷方面，三井物產和三越公司經常使用更容易聯想到西方的片假名來宣傳臺灣烏龍茶，而不是使用更容易聯想到中國的漢字。事實上，報紙廣告中描繪的烏龍茶形像大多是西方或南洋風格的，很難與紅茶區分開來。結果，當時的烏龍茶雖然是「國產茶」的一種，但是卻和紅茶一樣，很容易被誤解為是「進口的高級商品」。

1903 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在大阪舉行，臺灣總督府開設了臺灣館，由茶商組成的行業協會的臺北茶商公會在臺灣館開設了一家喫茶店。此後，臺灣喫茶店經常在日本的博覽會和共進會上開設，1910 年代和 1920 年代成為烏龍茶在日本全國普及的第一個時期。

關鍵詞：臺灣總督府、臺灣烏龍茶、臺灣喫茶店、臺灣お茶の會、三井物產、大正天皇、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1903）、聖路易斯世博會（1904）、日英博覽會（1910）

《臺灣史研究》
第 31 卷第 3 期，頁 131-174
民國 113 年 9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留日臺籍建築師徐迺欣與他的時代：
聚焦 1943 年〈朝日日記〉*

郭聖傑**

摘　要

徐迺欣（1919-1969）為日治時期留學日本、二戰後於臺灣執業的臺籍建築師；在臺灣近代建築史的陳述中，他是未曾被留意的建築師，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十分「尋常」的建築專業者。然而也正因其尋常的人物像，在充滿特例的建築史論述中顯得格外重要，能提供我們描繪更真實的「臺灣建築師」形象。本文聚焦徐迺欣於 1943 年記錄之日記，透過爬梳日記內容掌握戰前日本實業教育中建築科學生的真實學習樣貌，也進一步探究留日臺籍建築師養成之內涵。透過本文可知，除專業課程外，戰間期的實業學校學生的思想教育、戰爭準備教育也都融入在日常學習中；從日記細節推敲而知實業學校體系出身的徐迺欣對文學、哲學保有高度興趣的同時，其養成教育更可能因指導教員藏田周忠而與西歐近代建築發展接軌，此點改寫過往對於臺籍建築家的刻板印象。更深刻的則是由於日本近代建築教育對於「自我」認識的強調，徐迺欣也因此進一步意識「臺灣」，在其所迎接由中國籍建築師主導的戰後臺灣建築發展中，臺灣主體意識的抬頭別具意義。此外，過去臺灣近代建築史論述長期對於臺籍建築師的不重視，可以說是臺灣近代建築史研究始終留有的缺憾，本文企圖補白臺灣近代建築史的遺漏，也期待喚起對於臺籍建築師研究的關心。

關鍵詞：徐迺欣、臺灣戰後建築、近代建築、留日知識青年、實業教育、日記

---

* 本文承蒙徐文琴女士提供珍貴資料與建議，特此感謝。
**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23 年 12 月 7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3 月 28 日。

一、前言
二、徐迺欣與其日記
三、〈朝日日記〉的內容
四、〈朝日日記〉的考察
五、結論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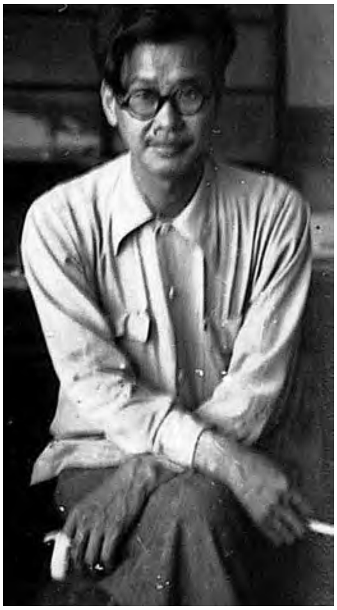

圖 1　徐迺欣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本文透過爬梳建築師徐迺欣（圖 1，1919-1969）於 1943 年所書寫的留學日記，企圖窺視其建築師生涯關鍵養成時期的內涵。與此同時，期待透過針對徐迺欣經歷的爬梳，思索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留日臺籍建築師[1] 於臺灣戰後建築發展脈絡中的意義。臺灣近代建築史的陳述中，徐迺欣是一位未曾被提起的建築師；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是一位十分「尋常」的建築專業者。因為徐僅於戰後初期取得臨時建築技師資格而從未正式開業、二戰結束後隨即投入職業學校的教學；辭任教職後則轉任華南銀行建築課，擔任民間企業的建築專業人員。如此的「普通形象」卻也讓徐迺欣完美地展現戰後初期臺灣社會中，「臺籍建築師」（無論是否留日）的標準形象：具以實業教育為基礎的建築技術訓練、執

1　根據中華民國國籍法，出生時若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出身者，皆可主張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然而今天臺灣的現況處於對於國家認識的扞格中，本文所限定之「臺灣籍」的明確定義確實有待斟酌。因此，本文將「臺灣出生的建築師」定義為「臺籍建築師」。

業範圍地緣關係深厚或投身民間單位，作品多為私人建築且疏於論述而多從事利益導向的建築活動。

對於過去多以「明星建築師」為主體的近代建築史論述而言，針對徐迺欣的研究將為臺灣建築研究帶來有別以往的視野。與此同時，本文聚焦徐迺欣於 1943 年所書寫的日記，「日記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史料，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親歷經驗的書寫具有主觀性，但相對於國家的、官吏的檔案書寫之全面性與宰制性，卻具有微觀性和客觀性，是研究歷史不可或缺的史料」。[2] 尤其於筆者能力所能及範圍中，目前為止尚未見有關於建築師日記的相關研究，因此對於更為宏觀的臺灣史研究而言，徐迺欣日記研究也能給予積極貢獻。

過去的臺灣戰後建築史多聚焦於 1949 年之後伴隨國民政府來臺之中國建築師與其建築活動，特別對於擁有西方經驗的建築師如王大閎（1917-2018）、陳其寬（1921-2007）有所青睞；其原因或許是過往研究者多抱持臺灣戰後建築應該服膺於西方現代建築價值的期待，因而形成以一種他者視角展開建築史書寫的習慣。然而此舉卻也逐漸扁平化臺灣戰後建築發展應可呈現的多層次內涵。如同 1967 年所頒發的第一屆建築金鼎獎十大優秀建築師獎名單：王大閎、陳其寬、林慶豐（1913-1995）、陳仁和（1922-1989）、楊卓成（1914-2006）、沈祖海（1926-2005）、修澤蘭（1925-2016）、張紹載（1923-?）、林柏年（1919-?）與陳濯（1913-?），[3] 即已忠實描述「臺灣建築師」組成所具有的混血性格。具體而言，這份名單首先展示了臺灣戰後建築發展中的中國系譜與日本系譜的並存；林慶豐及陳仁和皆為二戰前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深造、戰後回臺執業的臺籍建築師代表，成為建構日本系譜的重要角色。而透過林、陳兩位建築師在臺灣建築發展歷程中的浮現，我們可以進一步察覺支撐此系譜的最大群體應屬由延續日治時期實業教育內涵的臺灣本土建築教育，所培養的建築師如高而潘、蔡柏鋒等人。日本系譜的建築師除上承日治時期臺灣建築發展外，其中同為早稻田大學建築教育體系出身的吉阪隆正（1917-1980）、林慶豐與陳仁和、或是 1960 年代前往前川國男（1905-1986）、佐藤武夫（1899-1972）事務所修業的高而潘（1928-2022）的專業養成經歷，也

---

2 張隆志主編，簡宏逸、楊朝傑、鄭螢憶、林紋沛、陳冠妃、莊勝全、劉世溫、陳柏棕、曾獻緯，《跨越世紀的信號 2：日記裡的臺灣史（17-20 世紀）》（臺北：貓頭鷹出版，2021），頁 27。

3 〈建築金鼎獎　得獎人評定〉，《聯合報》，1967 年 4 月 11 日，第 2 版。

透露了日本系譜於東亞世界的橫向連結。於此之上，坂倉準三（1901-1969）、丹下健三（1913-2005）等日本建築師的作品在臺灣雖是如同特殊事件般的出現，[4] 但由於他們的建築主張與對現代建築的旗手——科比意（Le Corbusier, 1887-1965）的嚮往，進一步提示科比意的影響繞道日本延伸至臺灣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國系譜則由戰後來臺，主要受中國建築教育養成的中國籍建築師所組成，上述名單中除林慶豐與陳仁和之外的建築師皆可歸納於此系譜。若進一步探究細節，陳其寬與修澤蘭同為中央大學（南京）所培養、沈祖海為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出身、楊卓成則在廣東的中山大學學習建築；林柏年、陳濯與張紹載則皆出身天津一帶的建築學院體系，由此也可知在中國系譜中亦存在著地域性所衍生的細緻差異。而其中，曾在哈佛建築研究所（GSD）受教於葛羅培（Walter Gropius, 1883-1969）的王大閎及擁有在葛羅培的建築事務所 TAC（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工作經歷的陳其寬相對受到注目，兩位建築師的身分也明確展示葛羅培的影響延伸至戰後臺灣的事實。王與陳的建築活動也透露臺灣戰後建築的發展中，除日本／中國兩種身分認同所延伸的建築觀念的對峙外，更有與現代建築發展脈絡嫁接的可能。例如，王大閎的建國南路自宅，陳其寬、貝聿銘（1917-2019）及張肇康（1922-1992）共同完成的東海大學校園建築群，都被視為臺灣戰後建築回應現代建築潮流的重要作品。

透過以上簡略地從「建築師」的養成重新描繪臺灣戰後建築發展的架構，可以理解其中存在的多樣性；因此臺灣戰後建築的發展難以收納於單一價值體系的認識應為自明之理。然而過去的我們在服膺西方現代建築價值的建築史建構邏輯中，除去部分具有所謂「現代性」的作品、或是具有「現代經驗」的建築師如王大閎、陳其寬，或因設計具有國族符號意義的公共建築而被討論的修澤蘭、楊卓成等人之外，迄今世人對於上述名單中的建築師始終認識有限，更遑論未被任何獎項評價的建築師。有鑑於此，進一步展開「臺籍建築師」研究的必要性有以下三點：

1. 由於近代臺灣發展歷程的特殊性所造成人口組成及意識形態等二元對立

4　坂倉準三早年追隨現代建築大師科比意修習建築，1965 年於基隆完成「鹽野義製藥廠」；丹下健三則為日本現代建築代表人物之一，對於科比意十分推崇並曾加入科比意第一位日本弟子前川國男的事務所。丹下則於 1967 年完成「天主教聖心女子高級中學」。作品相關簡介可參考：王俊雄、徐明松，《粗獷與詩意：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臺北：木馬文化，2008），頁 126-131、146-157。

的社會結構，過去的近代臺灣建築論述也習慣以 1949 年為分界，被理解為一種由兩種對立價值所構成的認識體系。然而，過去的我們不經意地遺忘始終留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在建築研究的領域中，這些人就是臺籍建築專業者。這些專業者或是經過臺灣實業教育養成、或是進一步前往日本深造，臺籍建築專業者因其出身、教育、執業皆與近代臺灣發展歷程息息相關，可以說是填補因二戰所產生之臺灣近代建築史斷裂的關鍵。

2. 如同建築學者弗藍普頓（Kenneth Frampton）為過去的現代建築論述補充所提出的「批判性地域主義建築」論點，承認了「現代建築」無法歸納於單一種統一概念，必須尊重並嘗試理解既定價值體系以外的建築制作。[5] 批判性地域主義建築以地域性、歷史性等價值挑戰過去現代建築對於普遍性的追求，然而這些原本無法收納於 20 世紀前葉對於現代建築的理解，在非西歐國家的建築發展歷程中實為主流。例如，亞洲建築的先進國日本因明治維新而受西方新古典主義建築啟發，自 20 世紀起展開在西洋／東洋、現代／傳統兩種價值間反覆辯證。雖然日本透過歐洲工業技術輸入進而嫁接「現代建築」的發展，其歷程從時間上來說幾乎與西歐世界並肩而行，但日本建築師始終不曾否認在自我建築歷史發展的牽引中，「現代」可能存在與西歐世界不同的詮釋方式。因此，如同日治時期井手薰（1879-1944）完成的建功神社、或二戰後王大閎設計的建國南路自宅，皆展現廣義的「現代建築」的概念與內涵在非西方國家中的多義性，混血社會的臺灣更需留意單一價值的歷史書寫所可能產生的局限。因此，過去被忽視的臺籍建築師之建築活動有其留心之必要。

3. 筆者於先行研究的過程中察覺臺籍建築師與具有臺灣本土意識的社會團體之間存在著尚未釐清的聯繫。[6] 例如日治時期不遺餘力投入臺灣自治等社會運動的楊肇嘉，眾所周知楊的東京自宅為在日臺灣人政治、文化活動的據點，同時也對經濟狀況不佳的臺灣留學生予以援助。[7] 進一步爬梳之後可以發現，楊肇嘉

---

5 肯尼斯・佛兰姆普頓（Kenneth Frampton）著、張欽楠等譯，《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4 版），頁 354-370。

6 關於留日臺籍建築師初步調查可參考郭聖傑，〈戦後台湾における留日台湾人建築家に関する調査〉，收於日本建築学会編，《日本建築学会大会学術講演梗概集》（東京：日本建築学会，2019），頁 431-432。

7 李成市、劉傑編著，《留学生の早稲田：近代日本の知の接触領域》（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5），頁 194-197。

為愛女療養用所興建、位於輕井澤的度假山莊是委託剛從早稻田大學建築學科畢業的林慶豐設計，[8] 而其原因或可推測與楊肇嘉、林獻堂等組織之臺灣同鄉會曾主辦「鄉土訪問演奏團」，參與者林秋錦（1909-2000）與林慶豐為姊弟有關。此外，知名雕塑家楊英風於 1944 年赴日準備報考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科時借住的也是楊肇嘉的退思莊。[9] 二戰後，楊大力支持清水中學的興建工程，除委託同具日本留學經驗的顏水龍（1903-1997）負責校園禮堂立面浮雕的設計外，也將建築設計委託臺中在地建築師、武藏工業專科學校畢業的楊貽炳（1908-1992）操刀；無獨有偶，顏水龍的臺中住所也由楊貽炳設計。如上所述，我們熟知戰前臺灣意見領袖如林獻堂、楊肇嘉等人除自身大力倡導臺灣民眾自決運動之外，也對培養知識青年不遺餘力；然而，過去我們認為這些被贊助者多以藝術家為主，楊貽炳及林慶豐的經歷則透露了日治時期臺灣民主運動中建築專業者並未缺席的可能。因此，留心臺籍建築師活動將可豐富臺灣文化建構的歷程，與同時代脈絡中的美術、音樂等創作活動共同思考其意義，對於臺灣史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臺籍建築師人數雖眾，但由於主要作品多為私人設計案，加上對於論述生產、作品資料保存意識的薄弱及過往研究社群的不關心，相關研究的展開確實有其不易之處。目前首先被留意的臺籍建築師為早稻田大學建築學科專門部出身的陳仁和，不論是建築圖面的保存、研究皆留下具體成果；[10] 從陳延伸而出的則是對於臺灣建築教育體系所培養之臺籍建築師高而潘及蔡柏鋒的留意，針對其作品的整理與探討亦有一定成果；[11] 另一方面，對於同為早稻田大學建築學科出身的林慶豐，因圖面資料的公開而有基礎研究的展開。[12] 關於徐迺欣，已有兩篇論文[13] 皆

---

8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二）》（臺北：三民書局，1968），頁 331。

9 蕭瓊瑞總主編，《楊英風全集　第 21 卷：早年日記》（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8），頁 191。

10 關於陳仁和，以柳青薰的〈不連續的現代性：陳仁和的時代與他的建築〉（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17）為基礎，後有「前行無畏：陳仁和的建築時代」特展（國立臺灣博物館，2018）及吳光庭主持，「陳仁和建築師作品研究」（2019 年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8-2221-E-006-026-）的展開，為目前最為完整的臺籍建築師研究成果。

11 請參考：徐明松，《蔡柏鋒：不帶偏見的形式實驗者》（新北：木馬文化，2012）；徐明松、劉文岱，《走向現代：高而潘建築的社會性思考》（新北：木馬文化，2015）。由此延伸，國立臺灣博物館也曾於 2020 年舉辦「高瞻遠矚：高而潘建築作品珠玉展」，為高而潘作品提供系統性的說明。

12 請參考：張雅倫，〈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師：林慶豐及其建築機能主義〉（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13 蔡芳梅，〈戰後初期台籍專業人員職場之適應：以留日專業人員徐迺欣為例〉（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

以徐迺欣為例，聚焦臺灣戰後初期的時代背景中臺籍建築師角色的釐清。相對於上述研究針對作品探討或嘗試描述巨觀時代背景中臺籍建築師的活動樣態，本文則具有從微觀角度，細緻掌握臺籍建築師養成環境、心境變化，進而理解「臺籍建築師」內涵之可能。於此之上，由於所掌握之資料的特殊性，本文亦能描繪日治時期修習工科之臺籍青年的生活樣態，於未來與其他臺籍知識人研究連接，具擴大研究視野之可能。

綜言之，筆者期待透過細緻解讀日漸浮現的資料線索，藉由針對「個人」研究的錨定，期待未來進而逐次達到「群體」論述的展開。因此，本文透過建築師徐迺欣日記的研究，企圖補白過去臺灣建築研究的部分遺漏，提供近代臺灣建築研究的新視野，期許於建立臺灣建築論述主體意識的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的同時，於未來回應將臺灣戰後建築史研究編入臺灣史研究範疇的期待；此為本文的原創性，也可以說是本文學術貢獻之所在。

二、徐迺欣與其日記

（一）徐迺欣的生平[14]

1919 年 9 月 2 日，徐迺欣於臺中出生。父親徐灶生（1899-1984）與當時在中臺灣經營鐵路貨運特許事業的林金生（1874-1928）之女林冬柑結婚而加入岳家事業，並因而逐漸積累財富及地方人望；二戰後徐灶生進而從政，曾先後擔任臺中參議會議長、臺灣省議會議員、臺中市議會議長等公職。[15] 與此同時，徐灶生也因對藝術的愛好，及曾就讀早稻田大學函授學校的背景，與顏水龍、陳夏雨（1917-2000）等藝術家共同發起「臺灣省中部美術協會」，推廣臺灣美術的發展。而在徐迺欣家族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多次在其日記中出現的大舅林鳳麟（1908-?）。林為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生，於 1935 年起分派至滿洲國任職司

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李偉呈，〈戰後臺籍建築師的時代定位及其社會網路：以徐迺欣建築師為例〉，《逢甲人文社會學報》（臺中）46（2023 年 6 月），頁 37-74。後文為本文之關聯研究。

14 關於徐迺欣家族關係，根據其女徐文琴所提供之資料整理而成。

15 王靜儀等編撰，《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小傳及前傳》（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14），頁 332-334。

法部總務廳參事官，參與滿洲國憲法、民事、刑事法等制定工作；[16] 此外，林鳳麟亦為戰前臺中富商盧安（1880-1959）的女婿。成長於殷實商人家庭的徐迺欣，自然擁有資源接受更多教育的機會。1927 年徐迺欣入臺中公學校就讀、後於 1932 年轉學至臺中市曙公學校，次年考上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同班中有知名畫家廖德政（1920-2015）、辜顯榮（1866-1937）第六子辜偉甫（1918-1982）等人。透過上述可以察覺，徐迺欣的家族關係牽引出臺中仕紳間綿密的關係網，值得進一步探究。中學校畢業後，為更進一步接受高等教育，[17] 在家族資源支持下徐迺欣如同許多臺灣富人階級子女一樣，前往日本本土留學。

徐迺欣於 1938 年進入東京中央大學修習法律，但因志趣不合於 1941 年轉考武藏高等工業學校（以下簡稱「武藏高工」）就讀建築科。武藏高工於 1929 年由實業家西村有作（1891-1956）、手塚昌猛（1853-1932）及慶應義塾法學教授及川恆忠（1890-1959）創立，最初設有電氣、建築、土木三科，後加設機械工學科，為少數初期即設有建築科的高等工業學校。校址原在東京府荏原郡大崎町（今東京都品川區），1932 年接受目黑蒲田電鐵五島慶太（1882-1959）的邀請，移轉至東京市大森區北千束町（今東京都大田區）為大岡山第一校舍，並由藏田周忠（1895-1966）設計。1939 年再度移轉至世田谷區玉川等等力町，徐迺欣即在此校區度過三年的學習時間。二戰後，武藏高工升格為武藏工業大學。根據學校刊物《武藏》的記載，1941 年武藏高工共錄取 256 名學生，其中建築工學科有 35 人。錄取者絕大多數為日本當地學生，非日本當地學生則以來自朝鮮的學生居多，徐迺欣與錄取機械工學科 A 組、來自高雄的林鶴（?-?）則是當年唯二的臺灣人。[18] 關於武藏高工建築科的臺籍青年，除徐迺欣外，另有楊貽炳、徐建英（1912-?）、林靖虎（1914-?）及蔡伯壎（1921-?）相繼就讀該校。[19] 相對於二戰前赴日修習建築的臺籍青年多選擇早稻田大學或日本大學就讀，[20] 除志趣不合之外，目前無

---

16 許雪姬，《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新北：左岸文化，2023），頁 200-201。

17 日治時期臺灣唯一的高等工業教育機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於 1940 年增設土木、建築科，意味著欲修習高等建築教育的臺灣青年僅能前往日本、滿洲學習。

18 同窓會編輯部編，《武藏　第 58 號》（東京：武藏高等工科學校同窓會，1941），頁 11。

19 根據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編，《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錄》（臺中：該會，1979）及趙家琪主編，《傳承與超越：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中：臺灣省建築師公會，2000）。

20 郭聖傑，〈戦後台湾における留日台湾人建築家に関する調查〉，頁 431-432。

法確認徐迺欣轉讀武藏高工的其他原因。

徐迺欣於 1943 年自武藏高工畢業，同年即接受父親安排於秋天回臺，進入「合發商行」任職；日本投降後的翌年，徐迺欣轉而進入「臺灣省立臺中工業職業學校」擔任教職，並於不久後接任主任一職。同一時期亦可見蔡東魯（1919-?）、廖上焜（1921-?）等同具留日背景的建築專業者於同校任教。[21] 1953 年教育部對於職業學校課程施行簡化政策，徐迺欣因所任教的建築科與土木科合併而去職。沉潛三年後，徐進入華南銀行臺北總行營繕課擔任專員，負責設計監造華南銀行各地新建工程及相關委託案。戰後初期徐雖以「暫代技師」身分展開建築活動，但未正式取得建築師執照。然而在因緣際會下他轉而在華南銀行展開不同於一般開業建築師的執業生涯；直至 1969 年罹癌過世前，所完成的主要作品為：臺中靈山寺（1947）、林耀坤自宅（圖 2，1951）、日月潭玄光寺（圖 3，1955）、東來大旅社（1963）、秋江醫院（1965）、華南銀行苗栗分行（1965）、日月潭孔雀園（1968）等。[22]

圖 2　林耀坤自宅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圖 3　日月潭玄光寺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

[21] 蔡東魯為日本大學建築科畢業、廖上焜則為早稻田大學建築科畢業。詳細紀錄可參考：趙家琪主編，《傳承與超越：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122、350。

[22] 關於徐迺欣回臺後經歷與作品皆根據其女徐文琴之整理。

（二）徐迺欣的日記狀況

目前確認徐迺欣留下日記 3 冊，年代分別為 1943 年、1957 年及 1968 年，內容簡述如下：[23]

1. 1943 年日記

記主以日文書寫，因缺頁或未有記載的部分共 47 日；[24] 封面以「朝日日記」為標題，並以日本皇紀年標示「紀元二千六百三年　昭和十八年」，由朝日新聞社發行（圖 4）。此日記為徐迺欣於武藏高工三年級時所記，內容包含留日時期的日常生活、校園生活及徐返臺後最初的家庭、工作相關紀錄；提供近距離觀察二戰前留日建築師的養成內涵及執業內容，為臺灣建築師研究少見之珍貴紀錄，詳細內容於次章說明。

圖 4　〈朝日日記〉封面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2. 1957 年日記

記主以中、日文夾雜書寫，內容記載的部分共計 30 頁面。此日記應為徐迺欣入職華南銀行初期所用之筆記本，內容多以工程材料、工資紀錄為主。例如 8 月 4-10 日的頁面，徐迺欣記錄白鐵皮、五金等價格，同時也可見小工一日工資為 70 元的記載。此日記內容雖未詳盡，但忠實反映臺灣戰後初期建築材料與工資水準，值得日後進一步推敲其內涵。

3. 1968 年日記

內容主要以中文書寫，有記載的部分共計 51 頁面。1968 年徐迺欣正負責生涯重要作品「日月潭孔雀園」的規劃設計與施工。「日月潭孔雀園」的興建由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啟光發起，主要經費來源為華南、第一與彰化銀行三間民間銀行籌措；

23　本小節言及之頁面統計均以日記本攤開為一頁面計算。

24　無法確認內容的日期為：4 月 5 日，6 月 19 日，8 月 16 日，9 月 18-20、30 日，10 月 6、12-13、16-22 日，11 月 9-11、14-17、22-28 日，12 月 3-5、7、9、16-17、20-29 日。

由於孔雀在戰後臺灣尚屬少見，因此園內孔雀主要由旅日華僑林以文（1913-1976）[25] 從日本引進捐送。[26] 當時任職華南銀行的徐迺欣，可能因業務關係而承接此規畫案，此本日記的主要內容即是圍繞當時的計畫日程而進行的工作紀錄。

例如 3 月 10-16 日的頁面（圖 5）清楚記載孔雀園計畫應於 4 月 15 日啟動基地調查、5 月 1 日建築設計開始而於當月底發包，宿舍、禽舍等設施僅有 3 個月的施工期，計劃於 10 月 30 日開園；透過內容可以了解孔雀園興建日程的緊湊。伴隨著工程進度的壓縮，我們也能從日記中察覺徐迺欣忙碌的行程規畫。例如，5 月 26 日到 6 月 8 日兩頁面記載徐於 5 月 30 日前往日月潭出差 4 日，依序路經臺中、埔里、魚池、水里，後於 6 月 2 日回到臺北，期間同時必須處理他案工程用本票；休息一日後，再度於 6 月 4 日前往日月潭。而在接近工程尾聲時，10 月 4 日的日記中也明記「總統來日月潭」的訊息；孔雀園則如期於 10 月 31 日「全部完成」。一般而言，我們雖能從工程紀錄中追蹤建築計畫案的設計、施工與完成的過程，然而徐迺欣 1968 年日記卻提供第一人稱視角記錄建築完成的過程，為此日記十分特殊且重要的特質；筆者將再於他稿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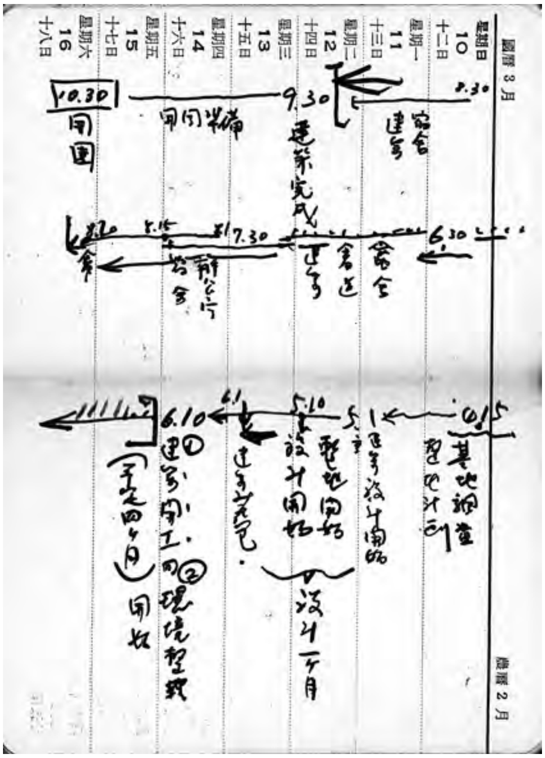

圖 5　1968 年日記內頁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25　林以文，霧峰出身，1943 年自日本中央大學畢業。為知名在日臺灣籍實業家，曾任東京華僑總會會長等職。關於林以文可參考：稻葉佳子、青池憲司著，黃耀進譯，《臺灣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臺北：凌宇有限公司，2020），頁 85-94。

26　〈黃主席巡視孔雀園工程〉，《臺灣民聲日報》，1968 年 7 月 9 日，第 5 版。

除上述三冊日記之外，徐迺欣另有黑色隨身筆記本一冊，記主以中、日文夾雜書寫，有內容記載的部分共計 18 頁面。內容十分多元，包括閱讀筆記、工作紀錄與草圖；例如徐迺欣以「日本建築家列傳」為標題，詳細筆記康德（Josiah Conder, 1852-1920）[27] 以降包含辰野金吾（1854-1919）、武田五一（1872-1938）到吉田鐵郎（1894-1956）、村野藤吾（1891-1984）等日本近代建築師的名字、學校與畢業年的筆記，亦有描繪日本白川鄉、出雲地區等聚落形式的筆記；除此之外，也可見以「信義路二段許宅」為案名的兩層樓街屋平面草圖。此冊筆記透露徐迺欣於執業期間對於建築專業方面的關心，值得進一步留意。

綜言之，徐迺欣日記提供探索戰後初期臺灣建築師真實樣貌的重要線索，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則是本文的研究對象〈朝日日記〉及 1968 年日記。原因除了是相對完整的紀錄之外，兩本日記皆提供第一人稱視角窺探戰前高等工業教育現況與戰後初期臺灣建築師的工作歷程的線索與機會。以下針對〈朝日日記〉進行進一步的詳讀與說明。

三、〈朝日日記〉的內容[28]

〈朝日日記〉是徐迺欣於武藏高工三年級上學期接近尾聲到畢業的就學期間及同年 9 月底返臺三個月期間所寫的日記；此日記共計 47 日未記載，多集中於記主返臺後的時間，但仍舊可以說徐相當完整地記錄其留日生涯關鍵的一年。從內容可以判斷記主書寫時並未期待供第三者閱讀，因此內容相對瑣碎龐雜；針對日記的整理，本文分為東京生活、校園生活與返臺生活三種面向分別整理、說明，並將日記引用文提及之人物整理成表 1 所示。

1. 東京生活

徐迺欣瑣碎地記載著自己在東京最後八個月的生活，內容雖然片斷與繁瑣，

---

27 康德（Josiah Conder），明治政府為建立近代建築教育而招聘之英國建築師，於工部大學校培養出辰野金吾、片山東熊等重要近代日本建築師。康德在日期間也相繼完成上野博物館、鹿鳴館等具有代表性的明治時期新古典建築。

28 由於記主在日記中的筆跡多有不易判讀之處，為求中譯之正確，本文以徐文琴女士提供之版本（由記主妻子徐林雪霞口譯、李松台筆譯、徐文琴校對彙整）為基礎，於本文中所引用之內容再由筆者判讀、確認日記日文原文後使用。文責由筆者負責。

表 1　〈朝日日記〉人物表

人名	說明	人名	說明	人名	說明
林雪霞	妻	三木韶	師	林池塘	朋友
林鳳麟	舅	須永正俊	同學	江文也	音樂家
林鳳棋	舅	池田惠三郎	同學	西田幾多郎	哲學家
藏田周忠	師	井上務	同學	久鬼周造	哲學家
藤島亥治郎	師	平田義憲	同學	桑原武夫	哲學家

說明：由筆者整理，僅列出能判斷之人名，其中同學姓名係根據 1941 年入學名單。
資料來源：同窓會編輯部編，《武藏　第 58 號》，頁 11。

但也隨處插入身為臺灣知識青年對於自我的反思與期待。這些尚未形成結構的雜思內容，透露著他認為成為一個「建築家」的線索。例如：

> ……最近可說相當篤定，能夠專注地唸書，沒有焦急的必要，作為一個建築家，修養很重要。日本建築家所寫的優良著作並不多見，充其量只是隨筆程度的作品。真正精心致力於研究的人，好像意外的少。藤島老師的著書內容，份量也不算多。（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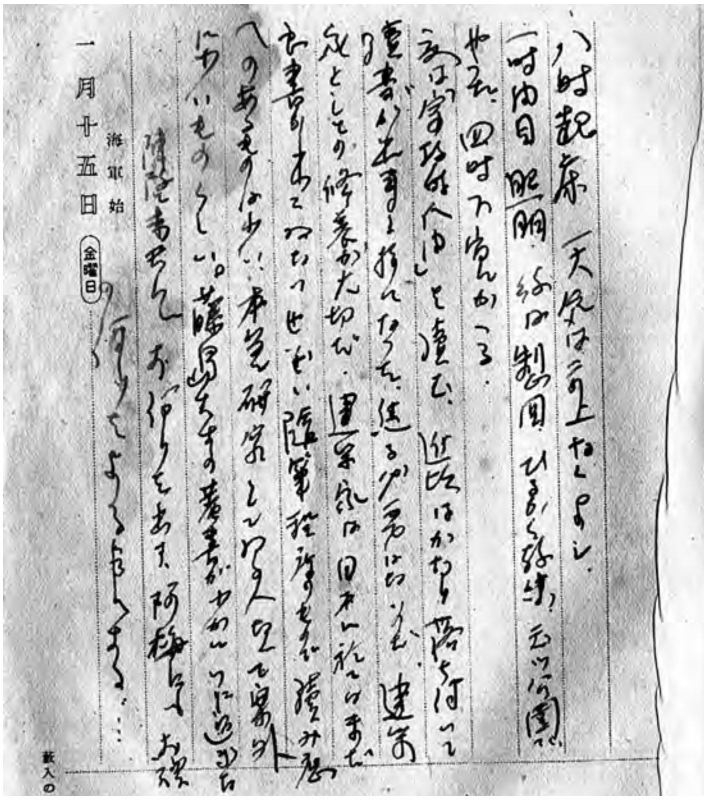

圖 6　〈朝日日記〉1 月 15 日內頁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或是

> 最近整理書籍，看起來已經有滿滿的、扎扎實實的四大箱。不知從何時開始，自己已經變成讀書家了！對這樣的成果自己也感到自豪，非常快樂。不過書籍種類相當龐雜，這不是很好的事情，要想辦法統一起來，讓它們系統化。就從作為一個建築家所需要的學養，為讀書思考的方向吧。（<u>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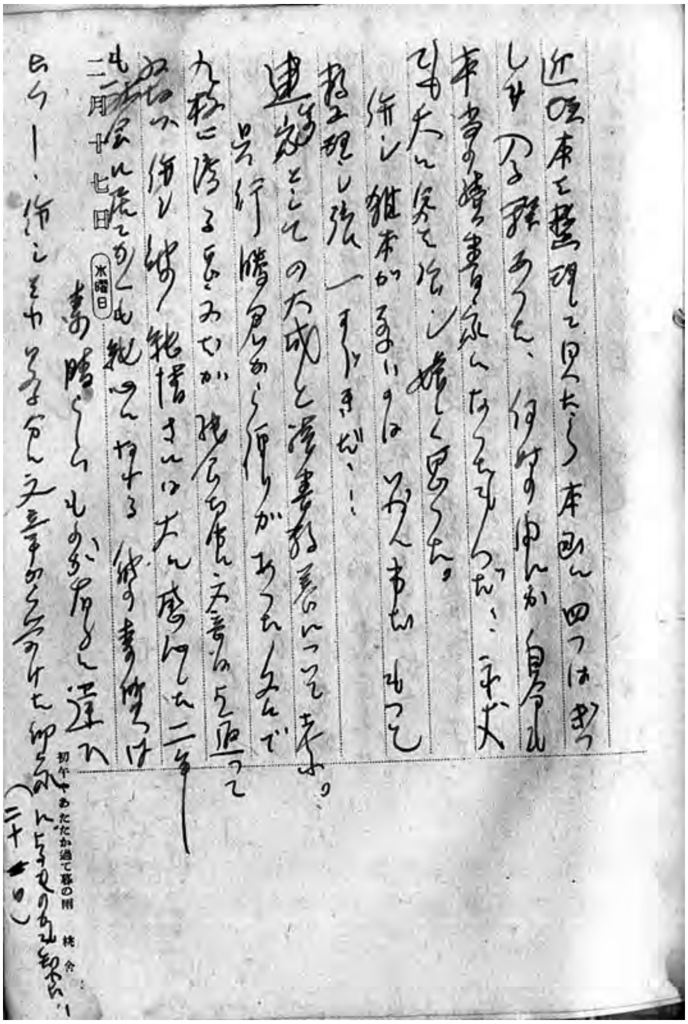

圖 7　〈朝日日記〉2 月 17 日內頁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透過上述內容（圖 6、7）可以了解記主認為「建築家」的成立在於個人的「修養」，而他認為透過「閱讀」是可以達成目標的方式。可能正因為如此的想法，〈朝日日記〉內容的特徵之一就是徐迺欣綿密地記錄購買及閱讀的書籍。例如：

> 九點起來，天氣很溫暖很好。……十一點去新宿，在柏木的淀橋圖書館辦完鳳棋托付的事之後，在玉山附近吃中飯並碰到叔伯。然後用走的，到了新宿更過去一點的地方（邊走邊隨意探看舊書攤）。買了九鬼周造氏（京都帝大教授）的文藝論（岩波出版、四元），好久沒有買過這麼貴的書。之後，隨意的從青梅街道一帶走到上原。（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朝日日記〉中所記載的書籍，可以整理成表 2 所示；[29] 1943 年 1-9 月期間，徐迺欣共購入或選讀 65 本書，足見其對於閱讀之熱忱。

表 2　〈朝日日記〉書籍表

記載日期	書名[30]	作者
建築類		
1 月 1 日	支那の建築と風土	藤島亥治郎
1 月 11 日	厚生住宅	平山嵩
1 月 28 日	支那及満蒙の建築	伊藤清造
7 月 21 日	近代英國田園住宅抄[31]	藏田周忠
哲學類		
1 月 2 日	精神衛生講話	下田光造
1 月 4 日	世界観の研究	ディルタイ
1 月 6 日	善の研究	西田幾多郎
1 月 11 日	宗教の人間	前田利鎌
1 月 19 日	ニイチェのツァラツ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解釋與批評）	阿部次郎
2 月 2 日	トーマス・ヒル・グリンの思想体系（托馬斯・希爾・格林的思想體系）	河合榮治郎
2 月 8 日	倫理学の根本問題[32]	阿部次郎

---

[29] 記載日期為該書於日記中被記載頁面之日期；日記中並未全數提及作者，表 2 所示之作者為筆者根據書名與年代判斷後記載。

[30] 表中書名皆為日文原題，以日記中的書名紀錄記之。筆者僅針對以片假名為主的書名按日文原題就字面翻譯，僅供參考。

[31] 日記原始記錄為「英國近代田園都市」，由於藏田周忠著作中類似標題只有表中書名，因此推測應該記主筆誤。

[32] 同時期有多本同樣名稱的書名，如：リップス（Theodor Lipps）著、藤井健治郎譯，《倫理學の根本問題》（東京：同文館，1932）。由於日記無法確認作者為誰，因此以徐迺欣曾讀過的作者記之。

2 月 14 日	現代思想概観	樺俊雄 等
2 月 19 日	文化哲学基礎論	池上鎌三
3 月 12 日	財産起源論	レヴインスキー
3 月 17 日	純粋感情の美學	ヘルマン・コーヘン
4 月 15 日	西田哲学[33]	高山岩男
5 月 22 日	ヘルバルト（赫爾巴特）	稲富栄次郎
6 月 14 日	心理学	高橋穣
6 月 16 日	行為的世界	柳田謙十郎
7 月 1 日	プラトン全集（柏拉圖全集）	岡田正三譯
7 月 11 日	ミル功利主義（彌爾功利主義）	高橋穣
7 月 24 日	歴史哲学序説	樺俊雄
7 月 24 日	面とペルソナ（面與表面形象）	和辻哲郎
7 月 31 日	日本支那現代思想研究	土田杏村
8 月 2 日	一般者の自覚的体系	西田幾多郎
8 月 6 日	ルソー（盧梭）	林達夫
藝術類		
1 月 8 日	芸術の始源[34]	グローセ
1 月 24 日	文芸論	九鬼周造
2 月 22 日	美の構造	金原省吾
3 月 1 日	芸術論集	桑原武夫
3 月 7 日	日本繪畫三代誌	石井柏亭
4 月 18 日	アラン芸術論集（阿蘭藝術論集）	アラン
6 月 16 日	沙翁舞台とその変遷：西洋劇場史研究	上田整次
8 月 12 日	日本美術の特質	矢代幸雄
文學類		
1 月 30 日	波	山本有三
2 月 4 日	多情佛心	里見弴
4 月 19 日	大尉の娘	プーシキン
4 月 25 日	老（アルト）ハイデルベルヒ（老海德堡）[35]	W・Meyer-Förster
5 月 15 日	生の誘惑（イヴェット）	モウパッサン
5 月 22 日	左千夫歌論抄	伊藤左千夫
5 月 27 日	セヴィニェ夫人手紙抄（塞維涅夫人信件抄）	セヴィニェ夫人
6 月 1 日	近代文学十講[36]	厨川白村
6 月 24 日	海軍	岩田豐雄
8 月 6 日	獨白録（Monologe）	シュライエル マッヒャー
8 月 15 日	破船	久米正雄
8 月 22 日	歌集紅曉	齋藤茂吉
8 月 22 日	萬葉集私見	土屋文明
8 月 22 日	少安集	土屋文明

33 徐迺欣僅記錄「西田哲學」，未有更進一步說明，因此這裡記錄最接近年代且書名為「西田哲學」之出版物。

34 由於字跡難以判讀，本文的記載是由從可辨識的文字及出版年代推測。

35 相近年代存在幾本不同譯作，表中為 W. Meyer-Förster 著、三浦吉兵衛譯（東京：郁文堂書店，1937）。

36 日記記錄為「近來文學十講」，但無法確認該書的存在，有可能為記主筆誤。

8 月 22 日	歌道小見[37]	島木赤彥
歷史文化與其他類		
1 月 8 日	台湾の山と蕃人	田中薫
2 月 9 日	最新台湾誌	廣松良臣
2 月 18 日	上海	殿木圭一
3 月 11 日	新約聖書	無法確認
3 月 12 日	寺廟神の昇天：臺灣寺廟整理覺書	宮崎直勝
4 月 24 日	孫子[38]	孫武
5 月 23 日	支那・支那人	鳥山喜一
6 月 7 日	大和古寺風物誌	亀井勝一郎
6 月 8 日	台湾征討史	松本正純
6 月 21 日	考古學入門	濱田青陵
7 月 3 日	風災	岩波書店
7 月 5 日	鄉土生活の研究法	柳田國男
7 月 30 日	天平の文化	朝日新聞社
8 月 18 日	物理学概論	石原純
8 月 22 日	世界史概観：近世史の諸時代	ランケ
8 月 22 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史	橘樸
9 月 13 日	三國誌	陳壽

說明：筆者整理。

徐迺欣對於讀書的喜好如同他生動記錄：「早上向鳳棋拿了十圓，但一日就用完了：付學校書店二圓五十買書錢，還市原二圓，買《藝術論集》二圓六十錢……加上交通費十錢，所以十圓也就沒有了。我沒有隨便亂花錢喔，因為買了桑原武夫譯的《藝術論集》」。[39] 若以當時一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生的初任薪水約 80 日圓為標準，[40] 其購書頻率可以說成為生活開支的顯著部分，但徐迺欣卻樂此不疲，因他認為學養的系統性建立是成為建築家的重要課題。

另一方面，如同徐告白：「哲學與建築、美學與藝術，這些是我一生的伴侶。有了這些事物，我就心滿意足了……」，[41] 若進一步檢視表 2 書單可以察覺，僅有 4 冊是建築相關書籍，徐迺欣平日多閱讀哲學、文學小說等相關書籍，或許與實業教育著重技術修習而缺少人文科目有關。建築書籍可分為住宅與中國建築兩種

37 日記記錄為「短歌小見」，然而該作者類似標題只有島木赤彥，《歌道小見》（東京：岩波書店，1924），可能為記主筆誤，表中以《歌道小見》記錄之。

38 日記僅記錄「孫子」，接近年代出版品有：山田準、阿多俊介譯註，《孫子》（東京：岩波書店，1935）及櫻井忠溫註，《孫子》（東京：章華社，1935）。目前尚未能確定是哪一冊。

39 〈朝日日記〉，1943 年 3 月 1 日。〔按：以下引用該日記均由徐迺欣家屬提供，不一一註明〕。

40 〈初任給・昇給を規定：会社職員給　改正〉，《朝日新聞》，1940 年 9 月 12 日，第 1 版。

41 〈朝日日記〉，1943 年 3 月 5 日。

主題，判斷為藏田周忠與藤島亥治郎兩人所負責課程的延伸讀物。其中，平山嵩（1903-1986）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建築設備專家，由此判斷記主所選之書應為設計相關之工具書。日記出現的建築書籍數量雖明顯為少數，但無法斷定徐迺欣對於建築書籍不關心，因為日記中也曾出現：「和橋口去東中野，途中買新的建築相關書籍，一共付了 13 圓 50 錢」；[42] 從金額可以判斷記主應該購入相當冊數。

哲學、藝術類的書籍多圍繞京都學派的著書，選擇閱讀西田幾多郎、九鬼周造、桑原武夫、高山岩男等人的著作；而文學類則更具特徵，徐迺欣對於短歌應該相當傾心，在日記中也特別記下伊藤左千夫的短歌「冬のくもり（冬日的陰霾）」，[43] 而文學類書籍的作者中也察覺由伊藤左千夫主導，主要成員為齋藤茂吉（1882-1953）、島木赤彥（1876-1926）等「アララギ」歌人團體成員的顯著存在。除了讀書之外，與友人閒談、散步成為徐迺欣東京生活的休閒活動，而新興娛樂–電影及百貨公司也散見於生活中，日記留下「夜晚到附近的電影院看『航空戰記』。這個電影由江文也[44] 配樂， 所以特別注意音樂與音響效果的表現」[45] 等電影鑑賞的內容。

伴隨著書籍的購入紀錄，徐迺欣也記錄了當時物價的真實情況，例如：「香菸在今天早上竟然一齊漲價，キンシ（金鵄）15 錢、ひかり（光）30 錢」、[46] 「中午在中華馬花了 80 錢吃飯」，[47] 徐同時也留下「中午丸二食堂又休息，所以與須永到自由之丘陸橋下的食堂吃午餐。近來不管哪裡的食堂，如果沒有外食卷就無法吃飯，所以沒有外食卷的人實在非常淒慘」[48] 的紀錄；內容皆透露日本自 1941 年因「國家總動員法」戰時狀態管制米糧以來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真實狀態。此外，國家總動員法同樣管制日本的可用資源，包含人力，尤其太平洋戰爭進入白熱化的 1943 年對於工、礦產業人才的需求雖然大增，但同時造成就業的不平衡狀態，

---

42 〈朝日日記〉，1943 年 1 月 23 日。

43 〈朝日日記〉，1943 年 5 月 8 日。

44 江文也（1910-1983），作曲家、聲樂家、教師。出生於臺北，1928 年進入武藏高等工業學校電氣科就讀，課餘時於東京音樂學校夜間部進修，逐漸展露音樂才華。曾參加 1936 年柏林奧運的藝術競技，獲得佳作，是首位享譽國際的東方作曲家。

45 〈朝日日記〉，1943 年 5 月 29 日。

46 〈朝日日記〉，1943 年 1 月 18 日。

47 〈朝日日記〉，1943 年 2 月 14 日。

48 〈朝日日記〉，1943 年 6 月 2 日。

因此日本政府對於相關產業進行就業管制。徐迺欣的日記內容也反映了當時求職的情況：

> 與藏田老師討論就業的問題。一直在等待家裡的來信，然而，好久都沒有音訊。所以，也就無法跟藏田老師具體商量就職事情，真是困擾。對我而言回去臺灣也好，留居日本或去滿州，或許也都不錯……（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或是

> 這幾天都五點半就醒了，但是繼續睡到九點才起床。……父親從臺北打來電報，說到協志組之任用業已確定。我自己也認為去那裡應是對的。回去本島，可以為本島人所經營的企業之發展提供助力，自己也覺得有很大的義務。（五月六日　星期四　立夏）

首先我們可以再次確認對於戰前受高等教育的臺灣青年而言，同為日語圈的滿洲、日本與臺灣皆在求職的視野中。由於徐迺欣的大舅林鳳麟當時在滿洲國國務院任職，因此上述內容提及前往滿洲對於徐而言也是情理之中的選擇。另一方面，藏田周忠應該擔任類似導師的角色為畢業生安排工作，日記中確認安排包含徐迺欣共 8 名武藏高工學生接受「西松組」的面試，卻沒有一人合格。臺灣方面，徐父也嘗試安排徐迺欣至林煶灶（1893-1971）[49] 創建之「協志組」〔按：協志商會〕任職；1940 年代的協志商會除承攬建築、土木工程外，林煶灶更於 1939 年另創「大同鐵工所」，專營鋼鐵五金建築材料供給、工程機器保養，可以說是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由臺籍人士所經營之建築土木集團。[50] 然而，徐迺欣終究無法如願入職。

由於求職過程的不順遂，徐迺欣也留下「今年的就職情況應該是非常困難，武藏高工竟會陷入如此低迷的情境……我該往何處去就業啊？今晚儘快寫信給父親，

49　林煶灶，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生，為臺灣本土最初受日本實業教育培養的建築專業者。1918 年成立協志商號，為日治時期少見由臺人創建的建築請負業者。

50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撰寫，《臺灣營造業百年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64。

我有覺悟要到新竹合發就職。接洽、交涉的事情，完全交由父親去處理，結果如何再通知我，我等著回臺工作。如今我覺悟到必須退而求其次，祇能到第二流的公司去找工作了」的紀錄。[51] 最終在別無選擇之下，徐於同年 10 月 27 日正式入職「合發」。

2. 校園生活

處於戰時總動員期間的 1943 年日本，戰爭對於校園生活也出現一定程度的影響。〈朝日日記〉中關於武藏高工建築科的相關專業課程多為流水帳的紀錄，但是記主對於因戰爭所被安排的公民、教練課，甚或是類軍事訓練與奉公等活動則留下相對詳細且生動的敘述。例如關於公民課的內容，徐迺欣留有以下記載：

> 大清早七點起來，感覺沒那麼冷。很早就出門到學校去，晨間體操，很冷清，虛應其事而已。
>
> 第一堂課是結構力學；第二節則是校長講授的皇民課。聆聽了校長闡釋之後，才理解到時局的嚴重程度。在所羅門群島、北亞細亞、史達林格勒這三地的戰爭，假如其中任何一個據點崩潰的話，都將為日本帶來極其嚴重的影響，今年對日本來講，是極具關鍵性的時期。戰爭！！世界正分裂為二大集團，陷入慘烈大戰亂當中。然而儘管處於這種局勢，自己卻沒有那種感覺。不僅我，班上其他同學們也都沒人警覺到在不久的將來，他們都可能要當兵上戰場的事實，這是何等嚴重的事情啊！！面對這種局勢，我個人充滿著無力感的痛苦。此時個人的教養、學問，或者是對將來出路的迷茫不是都無何意義了嗎？（<u>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u>）

而日常的教練課除了體能訓練外，學生們也被安排行軍、野營等訓練。例如 1943 年新年假期結束後的第一個週六，武藏高工建築科進行了沿著多摩川 11 公里強行軍的演練，記主也在日記中繪製演練路線；[52] 而週五下午的教練課也曾安排「戰爭訓練」，[53] 演練戰場上衝鋒與射擊狀況。進入春天後，則留有前往北富士進行五天四夜野營訓練的紀錄：

---

[51] 〈朝日日記〉，1943 年 7 月 7 日。
[52] 〈朝日日記〉，1943 年 1 月 9 日。
[53] 〈朝日日記〉，1943 年 2 月 5 日。

五點鐘，寄宿家的姑娘來叫起床。六點出發，七點到新宿車站前集合，搭乘八點新宿開往甲府的列車。……十點駛抵大月車站，在此轉車，十一點到達富士吉田車站後，在站前茶屋中餐。……十二點再出發，前往相距約八公里的兵營，一路行軍。與池田、井上奉命沿途擔任斥候任務，走在部隊前頭，塵土飛揚，滿面風沙，加上溫熱天氣，真是很難受的行軍旅程。（五月一日　星期六）

五點半起床，富士山很晴朗，感覺很舒服、愉快；尤其是接受到這個靈峰吹來的靈氣，心情真是爽快。早上六時，向宮城作遙拜儀式，並向雙親打招呼，想到遠在臺灣的父母之種種事情，當時的心情所感，真是不可思議。九時演習開始：午前各戰鬥教練、午後分隊戰鬥教練提起全副精神，拚命努力操練，所以很疲倦。五點結束，一天很快就這樣過去了。（五月二日星期日）

五時半起床。……上午是小隊戰鬥教練，下午原訂是中隊戰鬥教練，但後來還是繼續小隊戰鬥教練。……聽到大家在講畢業後就入營當兵的事情，觸及這類話題，令人心中難安。……而且不只是我自己而已，其他人如：池塘君、寶樹、其他所認識的人，甚至五百萬人的命運也是如此。真是愈想愈悲涼……（五月三日　星期一）

五點起來，今天繞行山中湖，進行行軍演習。軍營前道路直走再向右轉，約六公里就到了山中湖畔，稍為休息。……約再行軍三公里，此時腳底都已長出水泡，真是淒慘。三點半過後不久，回到兵營，隨即休息。晚上中子上校作了軍人勅諭的演講，九點熄燈。這裡的食物很粗糙，大家都食不下嚥。（五月四日　星期二）

半夜三點緊急集合，接著進行拂曉攻擊…這個項目之後，所有行軍活動就算結束了。（五月五日　星期三）

透過上述內容我們可以鮮明地掌握日本戰時實業學校軍事訓練的真實樣態，而如

表 3　徐迺欣的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一	上	建築計畫	結構力學	鋼骨鐵筋 結構	結構力學	照明 日本建築史	建築計畫 日本建築史
	下	製圖	公民	鋼骨鐵筋 結構	製圖	日本建築史	無紀錄
二	上	建築計畫	結構力學	鋼骨鐵筋 結構	結構力學	劇場計劃 日本建築史	建築計畫 日本建築史
	下	製圖	公民 工程估算	鋼骨鐵筋 結構	製圖	日本建築史	無紀錄
三	上	工業經濟	公民	製圖	造園	日本建築史	製圖
	下	工業經濟	製圖	無紀錄	製圖	製圖	音響學
四	上	工業經濟	公民	製圖	造園	日本建築史	製圖
	下	工業經濟	製圖	無紀錄	製圖	製圖	音響學
午休							
五	上	製圖	德語	工程估算	結構力學	教練	現代（日本） 建築史
	下	製圖	暖氣設備	工程估算	結構力學	教練	製圖
六	上	製圖	製圖	製圖	都市計畫	教練	現代（日本） 建築史
	下	製圖	製圖	製圖	都市計畫 軍訓	教練	製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同徐迺欣所記載「五百萬人的命運也是如此，真是愈想愈悲涼」一般，可以察覺青年學子對於訓練甚或是戰爭本身的無奈。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透過〈朝日日記〉中綿密記載的學習生活，掌握 1943 年武藏高工建築科三年級課表（1943 年 1-9 月）如表 3 所示。[54]

以上授課內容若與同時期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福井高等工業學校、神戶高等工業學校等建築科相互對照後，可以了解建築專業科目原則一致；[55] 但從工業經濟、工程估算等特別科目則可以說明武藏高工對於實際工程專業方面的著力。師資方面，首先需要留意的是藏田周忠。工手學校[56] 出身的藏田於 1913 年畢業後

54 日記中若同一時間出現兩種課程名稱記載時，筆者亦同時記載。上、下學期則根據日記中所記載之 1943 年 3 月 26 日到 4 月 12 日的假期為分界。

55 日本建築学会編，《近代日本建築学発達史》（東京：丸善，1972），頁 1902-1911。

56 1887 年由包含辰野金吾在內 14 位帝國大學教授發起創立，為日本最早設立的私立工業學校；其目的在於培養中階工業技術人才。

進入三橋四郎（1867-1915）[57] 主持的設計事務所任職，1920 年以選科生的身分進早稻田大學就學，加入日本分離派參與活動，[58] 為活躍於大正、昭和時代的建築師，負責「製圖」課程。藏田之外，負責建築史相關課程的則為藤島亥治郎；藤島師承伊東忠太（1867-1954）及關野貞（1868-1935）兩位建築史研究的碩學，1923 年自東京帝國大學建築科畢業後赴京城高等工業學校任教，並在 1929 年返回東大任教前，赴德、法、美留學兩年，[59] 為昭和時期知名建築史研究者。另一方面，負責教授音響、照明等課程的是三木韶（1910-1982）、工程估算為豬野勇一（?-?），皆為早稻田大學出身的研究者。此外，可能因處於戰間期的緣故，課程進行常因突發事件而變更，日記中也常見未完全按照課表進行的狀況。許多老師如藏田周忠多有請假，徐迺欣也多有翹課的紀錄，[60] 實業學校的學習紀律似乎比一般印象中的鬆散自由。

另一方面，即將畢業的徐迺欣每週也花相當程度的時間用於製圖練習。日記中提及的設計題目為「建築物一樓為銀行的事務所」及「圖書館」，皆為具有一定規模與複雜程度的設計題目；而題目也反映實業教育的有效性，因為僅兩年建築設計的訓練即可操作如此複雜機能的課題實屬不易。日記中也可得知記主於 5 月初開始展開畢業設計製圖，最初提出「碼頭建築」的構想，欲提案碼頭倉庫；[61] 但後因碼頭於戰時為軍事管制設施而只能改提他案。遺憾的是目前為止無法確認徐迺欣更改題目後的設計內容。

徐迺欣的學習生活中另一值得留意的是他與藏田周忠的互動；例如「藏田老師來了，講了一些話。……藏田老師叫我過去，並告訴我確定已能升上唸三年級生了，同時也按照慣例給我一些忠告」、[62] 「拿父親寄來的信給藏田老師看，他

---

57 三橋四郎，明治末期建築師，畢業於帝國大學工科大學造家學科。因曾入職遞信省、獨立開業後也承攬外務省業務，因此作品多為官廳作品，如京都郵便電信局（1902）、奉天總領事館（1912）等。

58 日本分離派由六位東京帝國大學建築科畢業生：堀口捨己、瀧澤真弓、山田守、森田慶一、石本喜久治、矢田茂，以「我們要奮起，要與過去過去的建築圈分離」為主張於 1920 年結成；一般認為日本分離派標示著日本建築開始反思自我的先聲。

59 〈故　藤島亥治郎先生　年譜〉，《建築史学》（東京）39（2002 年 9 月），頁 57-60。

60 例如 1943 年 2 月 27 日的日記敘述：「藤島老師沒來上課，所以十點起才有課，啊！好久沒這樣悠哉了。」或是 2 月 25 日：「七點半起床，八點去學校，近日來今天是最冷的氣溫。第一節課綾井老師請假，大家都在趕製圖，我則自己一人在美術教室看書……」、2 月 23 日：「第一節是酒井老師的課。第二節蹺課。十點半回宿舍，抽空閱讀格林的《思想體系》……」等記載。

61 〈朝日日記〉，1943 年 5 月 11 日。

62 〈朝日日記〉，1943 年 1 月 11 日。

很認可我要到『合發』就職這件事情，要將這個決定早日通知父親」。[63] 從上述敘述可以判斷藏田應是擔任類似導師的角色，因此對於日常學習、乃至於就業都對學生進行建言。此外，對於另一位著名教授藤島亥治郎，徐也曾留下「下午是藤島老師的課，卯足全力地用兩小時的時間充分地講解鐮倉時代。做了不少的筆記，藤田教授真是一位優秀的老師……」，[64] 為此日記中少見記主對於授課老師的正面評價。此外，從日記中使用「御講義」的用法，也可察覺徐對於藤島的尊敬。除了日常課程與軍事操練課程外，關於校園生活紀錄中值得留意的部分則是 1943 年 3 月 25 日深夜出發的關西建築參訪之旅，記主同樣留下生動的紀錄：

> ……六點回到宿舍，馬上吃晚飯，之後去澡堂。八點去新宿，再次造訪歐陽先生，還是沒見到面。十點到東京車站，大家都到齊了，人山人海，十分混亂。上車時大家拚命，擠來擠去。托平田君的福佔了一個位子給我，因此我們和大家分開。一夜在火車內搖來搖去。（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
> 早上八點半左右，抵達山田市（伊勢）。在火車站前集合，等候與三木老師會合。很久都未見他的踪影因此大家先一同前往伊勢外宮去參拜，出來後再搭市內電車轉往內宮參拜。這個地方非常清淨充滿靈氣，前來參拜的人也很多……（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
> 八時起床，雨已停止了。吃過早餐後前往奈良車站，乘火車去京都。大約十時左右抵達宇治山市。參觀平等院與附近的宇治神社……下午乘電車去六地藏的黃檗山萬福寺參觀。聯想到一茶的「若出山門、日本的採茶歌」等詞句。走進山門看到的是中國建築，與臺灣建築一點也不一樣。參觀途中，思考著臺灣建築。（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上述紀錄描繪徐迺欣一行人的旅行足跡大抵規畫從日本關西地區南部的伊勢，經奈良再進京都；途中參訪的著名古剎除伊勢神宮外，還有法隆寺、唐招提寺、東大寺、平等院等。行程中略有波折的則是御所離宮〔按：桂離宮與修學院

---

63 〈朝日日記〉，1943 年 8 月 26 日。

64 〈朝日日記〉，1943 年 1 月 16 日。

離宮〕的參訪，因手續不完備當日無法成行，隨行教師當夜趕回東京交涉無果，直到同年 7 月結業後才再次由藏田周忠帶領前往，可見對兩處御所離宮參訪的重視。而 7 月的旅行中也造訪另一日本庭園重要作品西芳寺。對於兩處，徐迺欣留下：「五點半抵達京都，雨下不停，京都本來就是多雨而出名的地方。由於沒有睡好，昏昏沉沉的……桂離宮實在是值得好好用心，仔細參觀學習的建築。其庭園之美，真是難以用筆墨形容。……下午參觀修學院離宮，因為昨夜睡眠不足，所以一路走來，不但很累而且昏昏欲睡，但還是堅持下去。」[65] 及「……九點搭坐大宮往嵐山的電車，在第一個站下車，大約走十五分鐘就抵達西芳寺苔寺。庭園很好，一整面都是綠苔，幽靜深邃。庭園裡有名為湘南亭的茶室；靜坐於其靈臺上眺望庭園，心情覺得十分平靜。」[66] 的敘述，是日記中少見對於建築相關感想的具體內容。

1943 年 7 月 23 日武藏高工預先舉行結業式，但課程尚未完全結束；在準備正式結業的期間徐迺欣因勤勞奉仕服務分派工作的緣故，於 8 月 4-13 日之間被派往位於蒲田、主要製造除了飛機通信機以外金屬外殼的長谷川製作所；武藏高工學員們的主要工作是使用銼刀將金屬產品的稜角修整得光亮平滑，一天需工作 7 小時。除此之外，學員們也學習如何固定螺絲釘，徐迺欣對於工廠機械性的操作並不覺得無趣，反而認為「學固定螺絲釘，感覺責任重大，務必要求鎖緊，不可絲毫鬆懈。這個工作並不令人討厭，且還能樂在其中，工作效率也不錯。將來走出社會，就須像這樣子，從一開始就保持幹勁，謹慎認真」，[67] 隱約透露徐對於「工作」的個人態度。結束勤勞奉獻任務的徐回到學校，繼續製作畢業設計與完成所剩無幾的課程，原訂 9 月 20 日舉行的結業式因戰事緊張而提早 10 天舉行，徐迺欣就在日本報導義大利宣布無條件投降的隔日結束武藏高工三年的學習生涯。

3. 返臺生活

畢業後的徐迺欣在東京短暫停留數日後，於 9 月 21 日下午 3 點乘坐東京前往熊本的特急車富士號向九州出發，9 月 25 日下午 5 時於門司港登船返臺。由於返臺前才從收音機得知 9 月 16 日戰艦大和丸在「內臺航線」被擊沉的消息，因

---

65 〈朝日日記〉，1943 年 7 月 25 日。

66 〈朝日日記〉，1943 年 7 月 26 日。

67 〈朝日日記〉，1943 年 8 月 9 日。

此徐在日記中也連日記錄當時的不安心情：

> 搭八點的火車來到門司，行李終於寄來了，趕緊領取後，送交船務公司，我已經下定決心搭船了，儘管內心有些害怕，但不坐也不行。……一點多，輪船進港了。五點出航。夜間船內警戒森嚴，雖然如此，仍無法感到安心。不過想到回家的種種事情，心中仍然感到快樂。但是這次航行是否能夠平安無事呢？（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
> 航海第二日，早上船向西行，往大陸的方向行進，下午以後，轉向南行朝向臺灣。（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
> 五點左右醒來，四周天色還很昏暗，或許可能現在隆隆砲聲就會傳來，想到就不放心，趕緊抱了一個救生袋再躺下睡覺。航海第三天，愈靠近臺灣，就愈來愈危險。今晚航行的這一帶，最是驚險地區。預定明天早上十一點，可抵達基隆港。誠心盼望能夠平安回到臺灣。所以晚上特別小心，不敢闔眼睡覺。（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
> 夜近拂曉，天亮。九點時舉行最後的緊急演習，心想此刻開始，危險逐漸解除，心情非常愉快。十點左右，看見臺灣的山巒了，真是無可言喻的快樂。一直站在甲板上，遠眺故鄉青山。……下午一點平安抵達基隆，立即打電報通知家裡。（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從記主簡短的敘述中即能感受到當時太平洋戰爭進入白熱化的緊張情勢。自基隆上岸的徐迺欣在回臺中前陸續與親族友人碰面，其中包含即將結為夫妻的林雪霞；關於第一次見面，徐描述「她穿著紅色的寬上衣，白色的短裙。她突然打招呼說：旅途辛苦了，然後立刻躲進房間裡面去了。瞬間讓我意識到這就是將要成為我妻子的人。此時腦海顯現一片茫然，完全不知自己的立場應該如何，真是令人困惑。初次穿西裝，還繫著領帶，實是非常不習慣。雪霞自進去之後，就沒有再露面了」[68] 的鮮明描述。返臺後的日記內容多數迴繞著工作與妻子林雪霞進行記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徐迺欣與妻子是以相親的方式結為連理，當時徐

---

[68] 〈朝日日記〉，1943 年 10 月 2 日。

尚未完成日本的學業，訂婚儀式是在徐未在場的情況中由在臺家人協助完成；[69] 因此徐迺欣返臺後頻繁地與林雪霞見面，相約出遊。例如，1943 年 11 月 15 日的日記中留下一段相當仔細的紀錄：

> 六點起床。原本打算乘坐六點半的火車，帶雪霞到獅頭山觀光。但到車站時晚了一分鐘，沒有趕上火車。這個時候天色還很暗，新竹的風很冷，同時還下著小雨。讓雨淋著，一直走到飛機場附近。
>
> 改坐八點半的車，九點半在竹南下車，轉搭巴士到獅頭山。山中徒步參觀寺廟，忘記帶香來，這是美中不足之處。然而敬神並非此行的目的，今天很單純的就是要和雪霞兩人做一日的清遊，所以忘記帶香來並非大事。正午往臺中金山方向走去，在青海寺的尼姑庵吃飯，拿出二圓奉獻。下午就在山中步行到峨眉，然後再到竹南乘巴士回臺中。抵達臺中時已經八點多。和雪霞一起旅遊非常快樂，不過今天用了十五圓，感覺很心痛。[70]

返臺後的徐迺欣忙碌於工作與家庭之間，但對於原本就非首選的工作環境也逐漸產生不滿情緒。1943 年的最後一日，徐在日記中記載：「八時起床後，馬上回臺中，新竹那邊應該要寄錢來，卻什麼也沒有。本店真是沒有誠意⋯⋯像合發這樣的不負責又無實力的公司，未來是否還要繼續替它工作，要好好思考思考。今日是今年的最後一日，本來應該是要很愉快的度過，然而卻發生這樣的事情。⋯⋯到大約過了十二時寫日記，一邊寫一邊回憶有關東京的事情，然後就寢」；[71] 徐以對於當時工作的不滿及對未來的思考，結束 1943 年。

四、〈朝日日記〉的考察

（一）「京都學派」的接觸

透過前章對於日記內容的爬梳可以了解〈朝日日記〉雖然多是日常紀錄與心

69 〈朝日日記〉，1943 年 6 月 17 日。
70 〈朝日日記〉，1943 年 11 月 15 日。
71 〈朝日日記〉，1943 年 12 月 31 日。

情抒發，其中卻有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線索。首先，從日記對於書籍的記載中可以察覺徐迺欣對於短歌的關心，尤其聚焦「アララギ」成員的作品。「アララギ」是以正岡子規門人為核心，由歌人伊藤左千夫所領導的藝文團體所創辦之雜誌名稱，成員作品以聚焦生活、深具寫實性為特徵，該團體為昭和初期最具代表性的短歌團體之一；日記中出現的齋藤茂吉、島木赤彥等皆為中心人物。徐迺欣對於短歌的關心可能來自於日治時期臺灣日語教育所養成的習慣；因為自公學校以來的「國語」教育中，代表日本古典文學的俳句與短歌是教學內容中重要的教材。如此的影響應該是全面的，因為除了徐之外，同一時期也在東京留學的葉盛吉，其日記中同樣多有俳句內容的記載。[72] 另一方面，短歌也可以說是二戰終戰前知識青年的主要休閒活動之一；從 1940 年針對在日中國留學生休閒活動的調查中可以了解「歌謠・歌」是學生們相對熟悉的日本愛好。[73] 此外，甚至在由民間創辦，日本最早的建築專業雜誌《建築世界》中，也可見俳句專欄的篇幅，由此可見如俳句或短歌等藝文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程度。[74]

於此之上，徐迺欣的書單中顯露出對於一個獨特知識體系的興趣，「京都學派」。狹義而言，京都學派是大正、昭和初期以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西田幾多郎為中心，包含和辻哲郎、九鬼周造等日本戰前學者所構成，可以說是「日本思想界的中心」；[75] 而同一時期的工學部建築科，分離派成員森田慶一則透過與美學研究者森田康算及拉丁語研究者田中秀央的接觸，獨自展開對於維特魯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76] 的解讀。森田從建築領域所展開的哲學思考，可以視為京都學派延長線上的一部分。1938 年國家總動員法頒布以來，對於思想相關研究會的管

---

72 例如葉盛吉在 1942-1943 年的生活筆記中記載：「在一寮開始舉行俳句會⋯⋯」（筆者譯），也可以看到葉嘗試將所見風景與心境轉化成俳句的內容。相關內容可以參考：葉盛吉著，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三）1942-1943》（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頁 485-489。

73 見城悌治，《留学生は近代日本で何を学んだのか：医薬・園芸・デザイン・師範》（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8），頁 220-221。

74 例如 1920 年前後的《建築世界》（建築世界社出版）可以在雜誌尾頁「樂園」專欄中登載「俳句、狂句」的內容。

75 市川秀和，《「建築論」の京都学派：森田慶一と増田友也を中心として》（東京：近代文藝社，2014），頁 53。

76 維特魯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 80-70 BC-25 BC），古羅馬工程師。維特魯威獻給當時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之《建築十書》被視為西洋古典建築的經典，至今仍具影響力。

控日益增加；而徐迺欣所處的 1940 年代在日本思想史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則都與京都學派有關。[77] 對於哲學學習有所愛好的徐，應該無法忽略京都學派的存在，進而有所關心而在日常閱讀習慣中透露。目前無法進一步追蹤徐迺欣關心京都學派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同為分離派成員藏田周忠的介紹，另一種可能則是西田哲學在當時的知識青年間是一門顯學；因為同樣在葉盛吉的生活筆記中也能看到對於西田哲學的提及。[78] 順帶一提的是，徐迺欣與葉盛吉在相近的時間點都留下閱讀《寺廟神の昇天》與《中華民國三十年史》的紀錄；其中前者是由南方司政官宮崎直勝書寫關於臺灣新宗教政策的專著，[79] 徐與葉同時都閱讀此書所透露的應該可以說是在日臺籍知識青年對於家鄉事務的留心，也反映留日臺灣學生群體間資訊交流頻繁的可能。

無論如何，如同徐迺欣在日記中多次表示「閱讀《善的研究》到十二點。每次讀這本書，對它的內容都有不了解的地方。對這本書沒有理解的能力，實在感到羞愧。」、[80] 「晚間，再閱讀《西田哲學》，對於哲學。完全沒有任何基本知識，就貿然地閱讀，真是有說不出的痛苦。哲學一詞應如何詮釋？對哲學如此強求，我的本意在哪裡？一般社會人士能夠了解哲學嗎？若了解能指導我嗎？我為何如此愚昧？」，[81] 對於獨學的青年而言，融合東西方哲學觀念的西田哲學應該不容易理解之外，也透露徐對於理解西田哲學的渴望。此外，在京都學派的相關書籍中，九鬼周造的《文藝論》應該帶給他最大的共鳴。記主鮮少在日記中對於特定書籍內容有所著墨，然而對於《文藝論》則留下「閱讀九鬼周造《文藝論》中，『情緒之系圖』這部分之章節，對於領略『短歌』的優美、特色，有所幫助」[82] 的記述之外，九鬼帶有耽美主義色彩的哲學思考似乎也觸發徐迺欣對於「自我」的診斷：

> 九點起床，不想去學校，想要單獨一個人在安靜的氣氛中，好好思考自己的事情。自己總是被周邊的人說是一個「悠閒派」的人。儘管如此，我仍

---

[77] 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譯，《日本思想全史》（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 294-296。
[78] 葉盛吉著，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三）1942-1943》，頁 573。
[79] 〈寺廟神の昇天〉，《朝日新聞》，1943 年 2 月 24 日，第 1 版。
[80] 〈朝日日記〉，1943 年 1 月 7 日。
[81] 〈朝日日記〉，1943 年 4 月 27 日。
[82] 〈朝日日記〉，1943 年 1 月 28 日。

> 打算堅持始終如一的理念。「悠閒派」自有悠閒的哲學，或許就在何時何日，能夠讓他人有所理解亦未可之。我真的是屬於「悠閒派」的人嗎？「悠閒派」通常都稱得上是美學派。他們對於人類內心之美，行為之美，形體之美，調和韻律之美，通通有所感受。至於不屬於悠閒型的人，只顧橫衝直撞的追求激進，他可能連從容地來理解美的餘裕都沒有呢！我很滿足於此種「悠閒派」的優越感，並且會終身堅持下去。我非常盼望讓大舅了解自己的心志。大舅與我，幾乎可說是兩個完全相反性格的人物！他是一位追求飛黃騰達的立身出世主義者！（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除此之外，徐迺欣更在返臺後的一次機會中將該書送給妻子閱讀，並認為「閱讀是無法取代的一種修養」，[83] 足以見得對於九鬼論述的青睞。

（二）「建築旅行」的意義

於此之上，我們必須藉由爬梳徐迺欣所身處的時代背景，思索昭和初期的日本社會對於徐在建築師養成歷程中的可能影響。1937-1945 年日本投降為止是戰前日本社會的變動期。1937 年 7 月 7 日「支那事變」發生後，日中全面開戰；日本很快在中國戰場取得優勢，同年 12 月日本軍佔領南京。1940 年 8 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確立包含日本・滿洲・中國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外交方針，日本成為東亞世界的霸權。1941 年日美兩國針對日中戰爭展開交涉未果，同年 12 月日本接收天津的英法租界、登陸馬來半島並攻擊夏威夷珍珠港，自此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徐迺欣的東京留學生涯正是在如此大時代的背景中展開，日記中隨處可見講授皇民教育的記載、行軍操演乃至於勤勞奉仕任務，都反映戰爭時代對於青年生活的影響。

建築發展方面，雖然 1933 年以來在建築媒體如《新建築》中已經出現「統制與建築」、「非常時期」等戰爭相關用語，但在雜誌媒體上並未出現顯著的建築發展動向。而在日本政府扶植中成立的滿洲國，讓日本建築師多了一個可以發揮的新天地後，全面的對中戰爭也讓國族主義成為建築師設計意識中重要的課題。[84] 丹下健三於戰時所設計的「大東亞建設忠靈神域計畫」（1942）及「在盤古日本

83 〈朝日日記〉，1943 年 11 月 18 日。
84 佐々木宏監修，《建築昭和史》（東京：新建築社，1977），頁 70。

文化會館」（1943）可以說是日本國族主義具象化的最好案例，同時也反映縱使如丹下健三般推崇現代主義的青年建築師也必須在戰爭時代思索如何利用建築表述國家的方法。[85] 在如此非常的時期中，徐迺欣正在武藏高工學習建築。據上所述，如果身處戰爭時期的日本建築師對於設計活動的共識為透過建築凝聚國家集體意識，當時處於學習階段的徐迺欣如何被培養？或是透過如何的手段在不論有無意識間培養對於「日本」的意識？成為本文於此期待突顯的議題。除了日記中教條式的課程講述外，兩次的關西建築參觀之旅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

以「旅行」的名義，透過親眼目睹日本文化的種種具象化成果可以說是日本針對知識青年建立文化意識的長年策略。例如東京美術學校因創辦者岡倉天心（1863-1913）見到法隆寺夢殿救世觀音時的感動經驗，將參觀旅行列為學校正規活動，如知名臺籍藝術家黃土水（1895-1930）應該參加了 1919 年所舉行的奈良、京都之旅，對於其美術史觀的建立帶來影響；[86] 藤島亥治郎也曾表示其立志成為建築師的契機即在於中學時代前往奈良及京都的畢業旅行。[87] 對於武藏高工而言，進行關西地區的畢業旅行是行之有年的活動，建築科將其界定為「教學的延長，半強迫地要求三年級生參加」。[88]

從前章得知徐迺欣在 1943 年 3 月底進行一週左右的關西建築參觀旅行，行程從近畿南部城市伊勢向北、經奈良、宇治到京都；而依照時間順序整理參訪作品則為：伊勢神宮外宮、內宮、橿原神宮、法隆寺、中宮社、法輪寺、藥師寺、唐招提寺、興福寺、東大寺、春日大社、新藥師寺千輪院、平等院、宇治神社、黃檗山萬福寺，最後則是御所離宮（桂離宮、修學院離宮）。

以上的寺廟、神社固然多為名勝，然而從日本建築發展歷程的角度而言，徐迺欣的旅程實有深意。一般認為，伊勢神宮為日本古墳時代以來流傳的形式，為受佛教建築傳來前日本原生的建築形式。[89] 伴隨著佛教傳入，中國文化大量引入

---

85 丹下健三於東京大學建築科的畢業論文〈ミケランジェロ頌：ル・コルビュジエ論への序説として（米開朗基羅頌：作為科比意理論的序說）〉中不假辭色推崇現代主義大師科比意，並於畢業後隨即加入曾於科比意事務所工作的前川國男所主持的事務所，皆可見他對於現代主義建築的嚮往。

86 鈴木惠可著，王文萱、柯輝煌譯，《黃土水與他的時代：臺灣雕塑的青春，臺灣美術的黎明》（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頁 114-115。

87 藤島亥治郎，〈わが建築青春記（10）〉，《建築雑誌》（東京）1211（1983 年 9 月），頁 15。

88 片山恂一，〈關西見學旅行記〉，收於同窓會編輯部編，《武藏　第 58 號》，頁 7。

89 太田博太郎，《新訂　図説日本住宅史》（東京：彰国社，2007），頁 11。

日本，此時代表的佛寺建築如法隆寺、藥師寺等皆反映中國唐代建築的影響；[90] 而「寢殿造」的形式也伴隨而生。之後，日本貴族轉向淨土教信仰，因技術進步與日本獨自審美觀而迎來平等院的完成。[91] 進入中世時期，東大寺所代表的則是受中國宋代建築影響發展而來的建築形式。與此同時，因使用需求改變等原因而逐漸成形的「書院造」，則意味著日本建築開始遠離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寢殿造，[92] 而桂離宮即為書院造的傑作。綜言之，徐迺欣的旅程可以說是透過實物理解日本建築從原初型態到受中國建築影響及進一步發展出獨自性的自立過程。

於此之上，對於日本建築師而言參訪傳統建築更不單純只是旅行。正如同岸田日出刀（1899-1966）[93] 在著作《過去の構成》序言中明言：「過去的日本建築的珍貴之處，對於普通人僅是遙遠過去的事物，最終還是被以懷古情緒來理解與評價；但是我將進一步以現代人的角度，從過去的日本建築中發掘造型或構成上能帶來啟發的要素。」；[94] 換言之，認識傳統建築實為以日本固有文化為基底，謀求對應近代建築潮流的方法。若進一步觀察武藏高工所安排的關西參訪，其過程也與德國建築師陶特（Bruno Taut）參訪眾多日本傳統建築後所彙整之日本建築發展脈絡雷同。[95] 必須留心則是陶特之目的在於強調日本建築自伊勢神宮到桂離宮的發展中具有邁向「現代品質」的潛力，而桂離宮則為具現代性的傑作；前述提及藏田周忠對於德國近代建築發展的傾心，也曾赴德留學。1933 年陶特來日時藏田也曾接待，從陶特日記記載如：「中午時，藏田氏來訪（他穿著和服，非常好）與上野氏〔按：上野伊三郎〕三人一同前往龍安寺。……（龍安寺庭園）全體正是日本的景觀，那廣闊的面與纖細的情感雖然單純，卻含蓄著極其複雜的深意。原本有中國的影響，但卻從中孕育出完全不同的日本的事物」，[96] 而當 1936

90 太田博太郎，《日本建築史序説》（東京：彰国社，2018 年增補第 3 版），頁 56-70。
91 太田博太郎，《日本建築史序説》，頁 79-88。
92 太田博太郎，《新訂　図説日本住宅史》，頁 28-29。
93 岸田日出刀，東京帝國大學建築科教授。岸田研究室出身者有前川國男、丹下健三、淺田孝等知名日本建築建築師，為昭和時期日本建築發展的重要推手。
94 岸田日出刀，〈自序〉，收於岸田日出刀，《過去の構成》（東京：構成社書房，1929），無頁碼。
95 相關內容可參考：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著、岳冲譯，《日本美的构造：布鲁诺·陶特眼中的日本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頁 189-201。
96 陶特（Bruno Taut）著、篠田英雄譯，《タウト全集　第二卷：日本雜記》（東京：育生社弘道閣，1943），頁 335-336。

年 10 月陶特即將離日的送別會上，藏田也是座上賓，[97] 皆可見兩人的交情。由此相信藏田對於陶特的建築主張及其對於日本建築的見解應有所認識與共鳴；而武藏高工的參訪安排應該也並非偶然。因此藏田才會在徐迺欣第一次關西旅行時因手續準備不足而無法參觀桂離宮後，於當年夏天堅持再次親自引領學生前往參訪，可以理解桂離宮對於藏田而言應有超越傳統價值的訊息想傳遞給武藏高工的學子才是。綜上所言，由藏田周忠、藤島亥治郎等人所組織的修學旅行，其內容意味的不僅是透過實物展示日本建築自立的過程，更可以說是透露日本建築所提供邁向現代的線索。

此外，必須進一步留心的是整個參訪過程中徐迺欣僅特別提及黃檗山萬福寺，留下「走進山門看到的是中國的建築，與臺灣建築一點也不一樣。參觀途中，思考著臺灣建築」[98] 的記述。黃檗山萬福寺為日本三大禪宗黃檗宗的大本山，該建築忠實保留中國明代建築的風格。徐迺欣在目擊日本建築自立的過程中，成熟的中國建築風格進一步觸發他展開對於「臺灣建築」，或可說是於其中開始展開分辨「自我」與「他者」的思考。

日本近代建築發展的歷程中，自我與他者的辯證扮演著推動進步、自立的關鍵角色，而最初可以說是來自辰野金吾的發動。辰野於 1893 年 12 月 20 日取代契約到期的康德，就任工部大學校（今東京大學工學部）教授職的舉措意味著日本開始自力培養建築專業者，對於明治維新以來依賴西洋輸入建築技術與知識的日本建築界意義重大。在日本近代建築邁向自立的過程中，工部大學校經歷改組成為帝國大學工科大學，辰野首先著手課程的改良；除「自在畫」，「材料構造」等專業課程的導入外，對於日本特有的建築課題—地震也加開相關課程，為回應日本特殊環境要素的舉措。諸多課程改良中影響最為深遠是聚焦日本風土、歷史的「日本建築學」的創設。辰野邀請曾有御所大工家總領身分的木子清敬（1844-1907）擔任講師，以「設計者」的角度傳授日本傳統建築的設計方法。木子的課程對於當時以西洋建築術為基礎的日本造家學是相當異質的存在，但同時象徵著辰野將「日本建築」編入以西方建築學為骨幹的知識體系的企圖。辰野改造日本建築教育體質的過程中，伴隨著技術知識的傳授，1900 年前後起，辰野開始派遣

---

97 陶特（Bruno Taut）著、篠田英雄譯，《タウト全集　第二卷：日本雜記》，頁 541。

98 〈朝日日記〉，1943 年 3 月 29 日。

造家學科的學生前往關西地區進行古建築實測，日本建築研究成為造家學中重要一環的同時，[99] 實地目擊過去發生的建築實物開始成為日本學子學習建築的重要環節。

辰野的課程改良為日本近代建築發展帶來的新活力很快就展現出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由伊東忠太所進行的法隆寺調查，伊東也因而提出著名的「法隆寺論」，主張日本古建築與希臘神殿在比例美的相似性，並進一步在 20 世紀初針對未來的日本建築發展提出奠基於日本建築發展脈絡的「建築進化論」。[100] 伊東之後，在面對西方現代建築浪潮襲來之際，前述提及的岸田日出刀也同樣主張迎接新思潮之前必須先認識日本建築，其所出版《過去の構成》為近代日本建築師帶來諸多啟發。若再次將徐迺欣的參訪名單與書中作品例對照，可以比對半數左右的參訪作品與《過去の構成》中所提作品例一致。[101] 綜上所述，在日本近代建築的發軔期，辰野金吾建立了學習新時代建築術必須同時探究傳統建築的基本立場，而前往關西地區調查古建築可以說是重要的環節；如此的舉措對於日本近代建築師而言更傳遞著「自我」確立與探尋的訊息。因此，我們也可以在徐迺欣的學習過程中看到雷同的養成過程，只是從日記中可以發現對於徐而言，「自我」的根源不是日本或中國，而是開始意識「臺灣」的內涵。

徐迺欣對於臺灣或是身為臺灣青年的意識建立，非常可能來自臺灣公學校教育的影響。1930 年代日本計畫利用「鄉土教育」的推廣，企圖藉由「愛鄉心」的培養，進而擴大至「愛國心」的認同；其中又以臺中州為鄉土教育著力最深的地方。[102] 從時期判斷，來自臺中的徐迺欣於公學校求學時期正逢強化鄉土教育時期。雖然殖民政府企圖避免因愛鄉心的放大而鼓舞臺灣人民族意識的強化，因此鄉土教育著力於美術、工藝教育的鄉土化，進而反映於現實鄉土的經濟振興，呈現日治時期臺灣鄉土教育重層性的同時，也間接解釋徐迺欣在日記中片斷出現

---

99 河上真理、清水重敦，《辰野金吾：美術は建築に応用されざるべからず》（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頁 95-100。

100 伊東忠太於 1909 年《建築雜誌》發表「建築進化の原則より見たる我邦建築の進化」的主張。伊東認為建築是由「材料」與「設計」所構成，透過使用材料與設計的進步才能促成建築的進化。因此提倡日本近代建築應擺脱木構，走向石造進而進入鐵材時代才能產生符合近代精神的日本建築。

101 岸田日出刀，《過去の構成》，目次頁，無頁碼。

102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新北：衛城出版，2015），頁 147-168。

如：「回去本島，可以為本島人所經營的企業之發展提供助力，自己也覺得有很大的義務。協志組乃是本島人所經營的最大企業，我感覺使這個企業能夠繼續維持與發展是自身之義務，回去臺灣並非是不好的事情」、[103] 或「日本自身文化優劣的競爭性是很大的，做臺灣的青年更需要奮發向上，如果沒有這樣做，想要出頭天，是很難辦到的。教養是生活根底的一種表現，也是氣質思想的反映。過去根深蒂固五千年的歷史，所累積養成出來的臺灣民族習性，應呈現一種悠閒，但也具有自主本性的內涵」[104] 等，期待學成後可以回饋故鄉的思考。

（三）「立體」的啟發

另一方面，同樣在武藏高工的課程中有另一必須探究的線索。1943 年 4 月 19 日日記中記載：「下午是藏田的立體，但這些內容在二年級的時候就已經學過。因為有點無事可講，就談了有關就業的話題。整天都在下雨，陰陰森森的……」，[105] 其中必須留意的細節為藏田的「立體」課程。根據前章所整理的課表，週一下午的課程通常是製圖課，也可以說是設計課；根據記主的說明，製圖課的進行方式為授課老師以某一特定建築類型出題，學生進行設計與製圖後於學期末由老師點評。日記內容透露製圖課中授課老師不單純僅指點設計，亦可能存在設計觀念的講述。目前為止我們無法掌握確切的講述內容，但「藏田」與「立體」這兩個關鍵詞則牽引出武藏高工製圖（設計）課程連結近代建築發展的可能。日記中的「藏田」自然指的是 1932 年進入武藏高工任教的藏田周忠。如同前述提及，私立工手學校建築科畢業、早稻田大學建築學科選科生的教育背景，[106] 藏田的履歷在當時以東京帝國大學建築科馬首是瞻的日本建築界中並不出眾。然而，藏田卻能加入以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堀口捨己、瀧澤真弓等人為核心的日本分離派，一定程度上標示著藏田在當時日本青年建築家群體間的位置。

藏田周忠於 1913 年自工手學校畢業後進入三橋四郎事務所，三橋當時則是

[103] 〈朝日日記〉，1943 年 5 月 6 日。

[104] 〈朝日日記〉，1943 年 5 月 31 日。

[105] 〈朝日日記〉，1943 年 4 月 19 日。

[106] 選科生為僅選擇特定學科部分課程學習的學生，對於校方而言，多為填補正式生員額不足時的舉措。因此可以想像正式生與選科生間在身分上的差異。

前述刊物《建築世界》的重要資助者，[107] 而藏田也曾為該雜誌繪製過建築插圖。此段經歷對於藏田或許帶來深遠影響，因為比起建築設計者，藏田以建築文化傳播者的角色為人周知，尤其嚮往包浩斯（Bauhaus）。1930 年 3 月中藏田前往德國，雖未能如願進入包浩斯就學，但以客座研究員的身分加入當時已經離開包浩斯的葛羅培於柏林的事務所。[108] 藏田在柏林停留一年三個月，期間將自己在歐洲所目睹的近代建築運動現場，透過《國際建築》雜誌介紹給日本建築界。[109] 必須留心的是在德國近代建築發展浪潮中，藏田特別關心居住環境的課題，高度留意「集合住宅（Siedlung）」的發展。藏田滯德期間更曾居住過陶特所設計的采倫多夫（Zehlendorf）集合住宅，以實際行動體感德國的住環境。返日後，藏田甚至選擇居住在具日本現代建築代表性的代官山同潤會集合住宅，成為當時日本少數能以自身經驗比較日德兩國最新居住環境設計的建築師。[110]

藏田首先帶著對包浩斯的關心從 1927 年起加入東京高等工藝學校的教學團隊，負責教授「立體設計」課程，[111] 也被認為是「高等工藝唯一講述包浩斯理念的老師」。[112] 自德國返日後，藏田進一步帶著親身的德國經驗，投身日本建築教育現場，於 1932 年進入武藏高工任教。目前尚未能有進一步資料說明藏田「立體設計」的實際內容，但從同一時期他著書來判斷，應該與建築的「立體構成」有關。1926 年，藏田出版《ロダン以後》〔按：羅丹以後，中央美術社〕，報紙廣告中說明此書以「邁向構成派的建築師」為對象、內容與三次元〔按：立體〕造型有關。[113] 《ロダン以後》的第三章「新空間觀念」中，內容言及包含萊姆布魯克（Wilhelm Lehmbruck）等雕刻家；藏田將「新空間」與「雕刻」連結，認為

---

[107] 《建築世界》於 1906 年（明治 39 年）創刊，1945 年（昭和 20 年）3 月廢刊；該刊為日本建築學會官方雜誌《建築雜誌》以外，20 世紀日本最初由民間出版的雜誌。三橋四郎在擔任遞信省技師時即已投入私財贊助雜誌創刊，獨立開業後也持續其後的出版事務。

[108] 大川三雄，〈蔵田周忠：生活芸術を追求したモダニズムの啓蒙家〉，收於丸山雅子監修，《日本近代建築家列　》（東京：鹿島出版会，2017），頁 316。

[109] 矢木敦，〈日本モダニズムの「水先案内人」〉，收於彰国社編，《モダニスト再考（日本編）：建築の 20 世紀はここから始まった》（東京：彰国社，2017），頁 190。

[110] 矢木敦，〈日本モダニズムの「水先案内人」〉，頁 192-193。

[111] 村松貞次郎，《日本建築家山脈（復刻版）》（東京：鹿島出版会，2005），頁 237。

[112] 大川三雄，〈蔵田周忠：生活芸術を追求したモダニズムの啓蒙家〉，頁 316。

[113] 〈ロダン以後〉，《朝日新聞》，1926 年 6 月 21 日，第 3 版（廣告）。

必須思考建築本身所構成的空間。[114] 綜合上述可以理解，進入武藏高工任教的藏田周忠接受了當時最前衛的建築思潮如包浩斯的洗禮，其中的關鍵概念為從立體造型（雕刻）所延伸出來對於建築空間「構成」的關心。若進一步推演，藏田所留心的「構成」，其概念背後所指涉的是 20 世紀初以來塔特林（Vladimir Y. Tatlin）等藝術家以繪畫和雕刻為題材，所開創的構成主義造型建議加上運動及其進一步體系化、實踐之後的風格派與包浩斯教育。[115] 如同為包浩斯帶來許多啟發的范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 1883-1931）[116] 說明：「建築的純粹表現方式是平面、團塊〔按：量體〕與空間。建築師賴以表達審美體驗的是平面、團塊與內部空間以及前兩者與空間的關係」，[117] 藏田亦於日後進一步指出現代建築的性格為面與體的關係。[118] 由於藏田所顯露出的建築概念核心即是如此，我們或可大膽推測其「立體」課程中反映上述內涵。

若從上述角度觀察徐迺欣的作品，例如林秋江醫院的上部立面（圖 8），相對於戰後臺灣街屋為成就遮陽效果多利用直線語彙於立面創造陰影，他則相對複雜地透過切線與倒圓角製造立面深度的同時，也構成具雕刻性的建築表現。而未發表的計畫案「人間ドック設計図」（圖 9，按：健康檢查設計圖），規矩的長方形量體中同樣透過立面深度的創造展現立體感；若更留心查看，可以發現左側開放空間中徐以懸挑而出的斜坡連接量體，透露著歐洲現代主義建築的訊息。另一方面，值得仔細觀察的則是孔雀園的設計，入口空間配置的量體明確地透過面與體的操作，構成空間意象（圖 10）。入口右側建築物，徐迺欣用白色水平屋頂強調其與下方量體的對比，強化面的存在；園區內屋舍也能察覺同樣手法，在建築量體與斜屋頂量體間的水平板形成差異構成，清楚反映面與體的對照性（圖 11）。值得一提的是，孔雀園園區的建築也與藏田早期完成的住宅案如加納川邸、

---

114 田路貴浩，〈分離派建築会：モダニズム建築への問題群〉，收於大村理恵子、本橋仁編，《分離派建築会 100 年：建築は芸術か？》（東京：朝日新聞社，2020），頁 22-31。

115 日本建筑学会編，徐苏宁、冯瑶、吕飞譯，徐苏宁校，《建筑论　大师思想》（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頁 58。

116 提奥・范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荷蘭藝術家、風格派創始人。20 世紀初以巴黎及威瑪（包浩斯所在地）為主要據點，為現代藝術及建築帶來重大影響。

117 提奥・范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著、谢明心譯，《新构型艺术的基本概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頁 16。

118 藏田周忠，《近代建築史》（東京：相模書房，1965），頁 149-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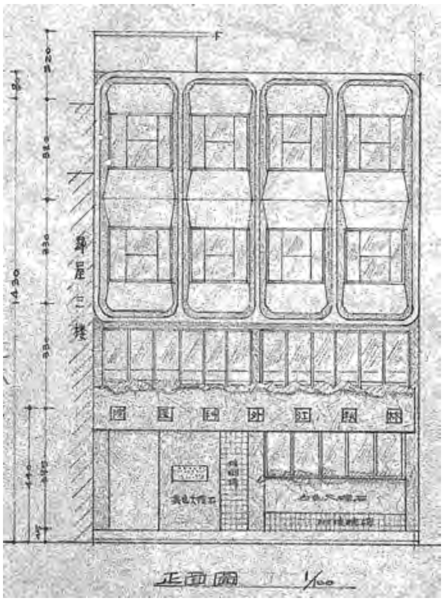

圖 8　秋江醫院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圖 9　人間ドック設計図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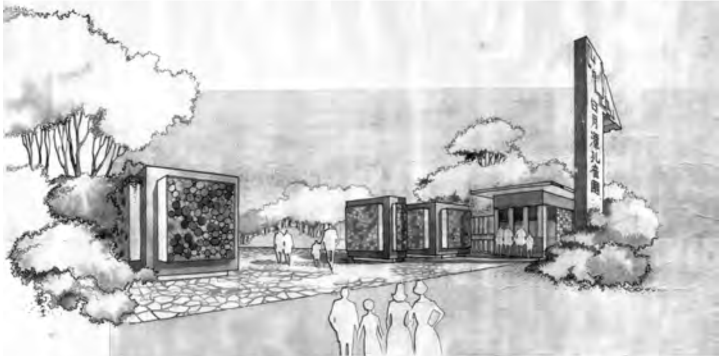

圖 10　孔雀園入口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圖 11　孔雀園全景

資料來源：徐迺欣家屬提供

小泉邸所展示的表現手法神似，[119] 透露來自其啟發的可能。透過作品特徵的掌握，我們可以在徐迺欣的作品中察覺藏田周忠的影響，而其中最具意義的則是徐所受的建築教育的內涵中極有可能經由藏田而與歐洲近代建築前衛觀念進行接續。

於此之上，藏田對於居住環境課題的留心應該也成為徐迺欣日後建築活動的養分；我們掌握到徐任教省立臺中工業職業學校以「生活與住宅」為題所論述的短文：[120]

> ……我認為在全世界的文化及民族當中，對於人們生活基礎的住宅建築最不關心的，莫過於漢民族。我國是一個王道思想發達的國家，儒教尤其非常努力而徹底的尊崇、推行此種禮教，並以之為治理統治社會的依據。在此種情況之下，自然而然，宮殿建築的技術變得極端的發達。……極端的說，四、五千年以來，一般人民的住宅建築，沒有特別的進步和發達之處。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凡是關心中國建築和居民生活的人，都會感受到這個事實。……首先，我們所面臨並要討論的問題，不要擴及全中國，應將範圍限定在臺灣。先考慮臺灣的建築問題，以臺灣為基礎，全中國的問題放在秩序的第二順位。目前要面對的是臺灣的問題，將來也是，我認為應該用這種態度來思考。

對於百廢待舉的臺灣戰後初期建築界而言，徐迺欣的發言可以說是留意居住環境課題的先聲，而強調優先考慮臺灣建築問題的發言同時也反映前述對於「自我」的強調。

綜合上述考察可以得知，過去一般認定臺籍建築師為技術者的角色，然而徐迺欣自身對於文學、哲學的追求，顛覆了過去以來對於臺籍建築師只重技術修習的認知。於此之上，透過對於徐迺欣於武藏高工學習歷程與藏田周忠經歷的爬梳，除了理解日本近代建築教育對於建立自我認同的重視，更為關鍵的是我們確認徐可能經由藏田接觸二戰前歐洲前衛建築思潮，並透過相關課程修習類似包浩斯教學內容的可能性；此點也再次顛覆臺籍建築師多與歐洲建築發展脫節的既定認識。

---

119 大村理恵子、本橋仁編，《分離派建築会 100 年：建築は芸術か？》，頁 122-123。

120 原始資料中未標記時間，但因以日文書寫及該資料背面記有課程表，藉此判斷應為返臺初期任職臺中工業職業學校時期所留下之手稿。

五、結論

徐迺欣 1943 年的〈朝日日記〉，提供我們近距離窺視二戰前留日臺籍建築師養成關鍵期的內容。透過本文可知，除日常專業課程之外，戰間期實業學校學生的思想教育、戰爭準備教育亦皆融入課程之中，我們可從徐迺欣的日記中掌握具體情況。於此之上，首先必須留意的是徐迺欣在武藏高工所受的建築專業教育透露著因藏田周忠等指導教員的專業而與歐洲近代建築發展接軌的可能，而從徐的作品也能察覺其影響，此點改寫過往對於臺籍建築師疏於歐洲近代建築發展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歸因於徐迺欣對文學、哲學保有高度興趣促進反思及所身處的昭和時代建築界處於深化探索自我認識的階段，徐在日記中不時顯露自省態度，因而感到對於戰爭的無奈及身為「臺灣青年」的期許。其中最為關鍵的則是因為古建築參訪而觸發分辨日本、中國與臺灣建築的差異，可以察覺徐迺欣於留日期間逐漸顯露的「臺灣意識」。如此的意識在其不久後迎接由中國籍建築師所主導的戰後臺灣建築發展歷程中別具意義；相對於 1949 年起陸續抵臺的中國籍建築師盡力於「自由中國」形象塑造，徐迺欣所展現臺灣優先的姿態突顯「留日臺籍建築師」在戰後臺灣的角色與意義。此外，由於日本建築教育的高度一致性及留日臺籍知識青年社群的緊密性，我們甚或可以期待留日臺籍建築師社群或許對於「臺灣」有一集體意識的存在，值得日後持續深化探究。

引用書目

《朝日新聞》

《臺灣民聲日報》

《聯合報》

《建築史学》

1943 年〈朝日日記〉，由徐迺欣家屬家提供。

吳光庭主持，「陳仁和建築師作品研究」，2019 年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8-2221-E-006-026-。

Meyer-Förster, W.（著）、三浦吉兵衛（譯）

1937　《アルト・ハイデルベルヒ》。東京：郁文堂書店。

リップス（Lipps, Theodor）（著）、藤井健治郎（譯）

1932　《倫理學の根本問題》。東京：同文館。

山田準、阿多俊介（譯註）

1935　《孫子》。東京：岩波書店。

大川三雄

2017　〈蔵田周忠：生活芸術を追求したモダニズムの啓蒙家〉，收於丸山雅子監修，《日本近代建築家列伝》，頁 309-316。東京：鹿島出版会。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撰寫）

2012　《臺灣營造業百年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田博太郎

2007　《新訂　図説日本住宅史》。東京：彰国社。

2018　《日本建築史序説》。東京：彰国社，增補第 3 版。

日本建築学会（編）

1972　《近代日本建築学発達史》。東京：丸善。

日本建筑学会（編），徐苏宁、冯瑶、吕飞（譯），徐苏宁（校）

2012　《建筑论与大师思想》。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王俊雄、徐明松

2008　《粗獷與詩意：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臺北：木馬文化。

王靜儀等（編撰）

2014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小傳及前傳》。臺中：臺灣省諮議會。

市川秀和

2014　《「建築論」の京都学派：森田慶一と増田友也を中心として》。東京：近代文藝社。

田路貴浩

2020　〈分離派建築会：モダニズム建築への問題群〉，收於大村理恵子、本橋仁編，《分離派建築会 100 年：建築は芸術か？》，頁 22-32。東京：朝日新聞社。

矢木敦

2017 〈日本モダニズムの「水先案内人」〉，收於彰国社編，《モダニスト再考（日本編）：建築の 20 世紀はここから始まった》，頁 186-199。東京：彰国社。

布鲁诺・陶特（Taut, Bruno）（著）、岳冲（譯）

2021 《日本美的构造：布魯諾・陶特眼中的日本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同窓會編輯部（編）

1941 《武藏　第 58 號》。東京：武藏高等工科學校同窓會。

佐々木宏（監修）

1977 《建築昭和史》。東京：新建築社。

李成市、劉傑（編著）

2015 《留学生の早稲田：近代日本の知の接触領域》。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李偉呈

2023 〈戰後臺籍建築師的時代定位及其社會網路：以徐迺欣建築師為例〉，《逢甲人文社會學報》（臺中）46: 37-74。

村松貞次郎

2005 《日本建築家山脈（復刻版）》。東京：鹿島出版会。

見城悌治

2018 《留学生は近代日本で何を学んだのか：医薬・園芸・デザイン・師範》。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

岸田日出刀

1929 《過去の構成》。東京：構成社書房。

河上真理、清水重敦

2015 《辰野金吾：美術は建築に応用されざるべからず》。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肯尼斯・佛兰姆普頓（Frampton, Kenneth）（著）、張欽楠等（譯）

2012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4 版。

柳青薰

2017 〈不連續的現代性：陳仁和的時代與他的建築〉。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徐明松

2012 《蔡柏鋒：不帶偏見的形式實驗者》。新北：木馬文化。

島木赤彦

1924 《歌道小見》。東京：岩波書店。

徐明松、劉文岱

2015 《走向現代：高而潘建築的社會性思考》。新北：木馬文化。

郭聖傑

2019 〈戦後台湾における留日台湾人建築家に関する調査〉，收於日本建築学会編，《日本建築学会大会学術講演梗概集》，頁 431-432。東京：日本建築学会。

張隆志（主編），簡宏逸、楊朝傑、鄭螢憶、林紋沛、陳冠妃、莊勝全、劉世溫、陳柏棕、曾獻緯

2021 《跨越世紀的信號 2：日記裡的臺灣史（17-20 世紀）》。臺北：貓頭鷹出版。

張雅倫
2022 〈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師：林慶豐及其建築機能主義〉。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清水正之（著）、田世民（譯）
2018 《日本思想全史》。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佩賢
2015 《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新北：衛城出版。

許雪姬
2023 《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新北：左岸文化。

提奧・范杜斯堡（van Doesburg, Theo）（著）、谢明心（譯）
2021 《新构型艺术的基本概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陶特（Taut, Bruno）（著）、篠田英雄（譯）
1943 《タウト全集　第二巻：日本雜記》。東京：育生社弘道閣。

楊肇嘉
1968 《楊肇嘉回憶錄（二）》。臺北：三民書局。

葉盛吉（著），許雪姬、王麗蕉（編）
2018 《葉盛吉日記（三）1942-1943》。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鈴木惠可（著），王文萱、柯輝煌（譯）
2023 《黃土水與他的時代：臺灣雕塑的青春，臺灣美術的黎明》。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趙家琪（主編）
2000 《傳承與超越：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中：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編）
1979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錄》。臺中：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稻葉佳子、青池憲司（著），黃耀進（譯）
2020 《臺灣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臺北：凌宇有限公司。

蔡芳梅
2011 〈戰後初期臺籍建築專業人員職場之適應：以留日建築專業人員徐迺欣為例〉。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瓊瑞（總主編）
2008 《楊英風全集　第 21 卷：早年日記》。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藤島亥治郎
1983 〈わが建築青春記（10）〉，《建築雑誌》（東京）1211: 15。

蔵田周忠
1965 《近代建築史》。東京：相模書房。

櫻井忠溫（註）
1935 《孫子》。東京：章華社。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31, No. 3, pp. 131-174, September 2024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Taiwanese Architect Syu Naisin and His Era:
Focusing on the 1943 "Asahi Diary"

Sheng-chieh Ko

ABSTRACT

Syu Naisin (1919-1969) was a Taiwanese architect who studied in Jap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later practiced in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In Taiwan's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Syu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and was considered rather "ordinary" in his profession. However,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his unassuming character that he holds exceptional importanc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ese architecture, characterized by its uniqueness and exceptions. His understated presence allows for a more realistic portrayal of "Taiwanese architec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Syu's 1943 diary, aiming to uncover the authentic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architectural students in Japan's pre-war industrial education system.

Analyzing the diary details reveals that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students in industrial schools not only engaged in routine professional courses but also integrate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war preparation into their daily learning. Moreover,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Syu, despite receiving industrial education, maintained a keen interest i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Furthermore, under the mentorship of Kurata Chikatada, his education alig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uropean architecture, challenging prevailing stereotypes of Taiwanese architects.

More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emphasis on self-awareness in modern Japanes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Syu also developed a heightened consciousness of "Taiwan." The emergence of Taiwan's subjectivity holds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the post-war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led by Chinese architects. The longstanding neglect of Taiwanese architects in discussion on Taiwan's modern architectural history remains a persistent regret i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ese gaps and spark renewed interest in researching Taiwanese architects.

Keywords: Syu Naisin, Post-War Architecture in Taiwan, Modern Architecture, Young Intellectuals Educated in Japan, Industrial Education, Diary

稿　約

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出版之《臺灣史研究》（以下簡稱「本刊」）為季刊，每年三、六、九、十二月各出版一期，刊登有關臺灣史研究之中、英文研究論著，以及研究討論、資料介紹與書評。

二、投稿格式請依本刊之撰稿體例。

三、投稿請附上論文 word 電子檔，並寄至本刊信箱：twhr@gate.sinica.edu.tw。

四、本刊審查完成後發投稿者修改之稿件，自發信日起，給予兩週修改期限，請投稿者務必在期限內寄回修訂稿；若超過一個月後仍未交回修訂稿，將視同退稿處理。

五、本刊已接受刊登之論文，論文作者須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同意不限地域、時間及方式將本論文之著作財產權以無償、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本所得自行或轉授權第三人以紙本或數位化方式重製、出版、發行並銷售，或進行數位化編輯後，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使用者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行為。每一期紙本出版後，電子全文將刊登於本所網頁。

六、本刊不再提供抽印本，作者可獲得當期《臺灣史研究》兩本。此外，會提供作者論文印製版之 word 與 pdf 檔案，和抽印本封面 pdf 檔案，供作者自行製作抽印本。

七、經《臺灣史研究》發表之論文，由作者自負文責。

八、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如發表於研討會中，以該研討會不出版論文集或不收錄於該研討會論文集者為限，並盡告知義務。

Guidelines for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R*) is published quarterly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of each year. It publishes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announcements, documents and source materials, and book reviews on historical subjects of Taiwan.
2. Preparation of manuscript for submission should consult the style sheet of the *THR* as a guide to format.
3. Manuscripts must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in Microsoft Word (.doc/.docx) format to the journal's email at twhr@gate.sinica.edu.tw.
4. The contributor should submit the revised manuscript within 2 weeks as of the date the notification email is sent. Failure to submit within 4 weeks will result in rejection.
5.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for publication, the Author must sign the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to grant the *THR* an irrevocable non-exclusive license to publish the manuscript electronically or use it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unlimited by region, time, and means. The user license also permits a third party to carry out digitization, remake and other value-added processes before storage in the database, and to provide electronic retrieval, browsing downloading, transmission and printing through stand-alone computers, the internet, wireless networks, and other means of public transmission. Upon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in print, the full text will also be published electronically on the *THR* website.
6. Contributor(s) of each published work will be entitled to 2 hard copies of the issue of the journal containing their work. The journal no longer provides offprints.
7. Published works in the *THR* represent neither the points of view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or those of the *THR* editors. The contributors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statements, whether of fact or of opinion.
8. No manuscript will be considered if it has been published or if it i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reprinting of the journal's article requires prior notice and permission from the *THR*.

《臺灣史研究》撰稿體例

一、本刊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出刊。本刊為一學術性刊物，刊行臺灣史研究之相關著作。凡屬此領域之學術論著（中文不超過四萬字，英文不超過30 頁為原則），研究討論（以三萬字為原則），田野調查與資料介紹之相關論述（以一萬五千字為原則），書評（以一萬字為原則）等，均歡迎惠賜稿件。論著請用橫式寫作，並附中、英文摘要，以各五百字為限；請附關鍵詞。

二、英文稿件格式，請參照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三、中文格式部分

㈠本文部分

1.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請用「 」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標示，未出版之專書、研究報告等用「 」。臺灣之「臺」，書名或文章名，無論中、日文，均依照原書、原文之寫法，除此之外，內文中遇有臺灣之「臺」，一律採用繁體寫法。

2.中、日紀元（西元紀年）的情形，一律採用「咸豐 2 年（1852）」的形式，若單以西元紀年表記則不在此限。

3.括號一律採用全形括弧（ ）。

4.文中數字與西元紀年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5.正文中引用外文文獻之「書名」、「引文」、「專有名詞」時，必須附中文翻譯；凡正文中使用特殊字型如明體改楷體、加粗或斜體等，強調特定語詞時，須加註說明，方便讀者閱讀。

6.獨立引文每行前空三格；遇多段之引文，則每段開頭多空二字。正文內之引文，請加「 」；若引文內別有引文，則使用『 』表明。引文原文有誤時，應以〔 〕表示正確的字或附加（原誤）。引文有節略而必須表明時，不論長短，概以節略號六點……表示，如「╳╳╳ ……╳╳╳ 」；英文句中三點...，句末則為四點....。

7.註釋號碼，請用阿拉伯字數碼表示，並請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8.所附之照片、圖表，需於縮版印刷後，仍然清晰可辨識。說明文字、數字及符號，須與內文一致，並以橫列為原則，由左至右書寫；如需直寫，則由右而左。表、圖均需編號，並加標題於表之上、圖之下；相關說明文字，則均置於圖、表之下。

9.文章或註釋當中，若出現作者「按」，無論係改正錯誤或僅為說明文字，均採取〔按：×××〕之形式表示。

10.內文中自製或引用之表、圖、附錄涉及統計數字者，應確實查核所列數字正確與否。

(二)註釋部分

1.註釋中，作者與譯者之表現方式，如各僅為一人時，二者間以頓號表示，如「×××著、×××譯，……」；若作者或譯者有二人以上時，以「×××、×××著，×××譯，……」或「×××著，×××、×××譯，……」之方式表示之。

2.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請用「」標示，書名、期刊用《》，文章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標示，未出版之專書、研究報告等用「」。

3.論著註釋，請依下列格式加註：

第一次出現時：

(1)專　　著：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分)，頁碼。

(2)論文著作集：作者，〈論文名〉，收於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分)，該文起迄頁碼。

(3)期刊論文：作者，〈篇名〉，《刊物名》(出版地) 卷: 期 (年月)，頁碼。

再次出現時：

作者，篇名或書名，頁碼。

4.註釋中若遇合刊之期刊，以《期刊名》3: 3/4 的形式表示。

5.註釋或參考書目中之頁碼，以頁 1、2、3-4 的形式表示（採用頓號、以-取代～）。

6.文叢、研叢及原刊年的表現方式：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47 種，1957；1852 年原刊)，頁 11-12。

7.期刊卷期之後需附出版時間，或簡（只有年代）或繁（年月均有）皆可。

8.報紙的表現方式：

第一次出現時：

〈標題〉,《報紙名稱》，年月日，版次。

再次出現時：

〈標題〉。

9.引用電子資料時，請註明下列資料：

作者（年代),〈篇名〉，下載日期，網址。

㈢引用書目部分

1.全篇論文之後，需詳列引用之書目。不分期刊論文、論文著作集，或是專著，中、日、西文並列時，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中、日文書目，可按作者姓名筆劃，西文書目依字母次序排列，姓在前，名在後。

2.引用書目中，若有版本或原刊年等說明文字，皆於該書後加括號說明之。

3.書目範例：期刊論文、論文著作集、專著書目，依下列格式編排之。

(1)期刊論文：

王世慶

1985　〈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的關係〉,《臺灣文獻》(南投）36(2): 107-150。

Coe, Michael D.

1955 "Shamanism in the Bunun Tribe, Central Formosa." *Ethnos* (Stockholm) 20(4): 181-198.

(2)論文著作集：

松田吉郎

1992 〈臺灣の水利事業と一田兩主制〉，收於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頁 105-13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Wang, Tay-sheng

2013 "Legal Modernization and Repeated 'Extension of Mainland': From Late Japanese Colonial to Early Postwar Taiwan." In Kuo-hsing Hsieh, ed., *Shaping Frontier History and Its Subjectivity*, pp. 89-15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3)專著：

曹永和

1985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史研究

第 31 卷　第 3 期

編 輯 者	臺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652-5350
	傳真：(02)2788-1956
劃撥帳號	17308795
製版印刷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02)8227-8766
定　　價	新臺幣 200 元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ISSN 1024-2805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